



西學東漸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由其民 周

西學東漸与中国事情

本书为作者根据多年精心搜集和珍藏的有关书籍，加以考订、比较、研究而写成。十九世纪以来，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力东渐”即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挑战。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活动，震惊了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朝野，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为其敲响了警钟。众多汉译西方著作和中国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的作品传入日本，成为其了解世界大势的精神食粮，幕末志士从中汲取营养，为明治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构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灿烂篇章。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 主编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由其民 周启乾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日]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启乾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 - 7 - 214 - 06415 - 8

I. ①西… II. ①增… ②由… ③周… III. ①文化

交流-研究-中国、日本-19世纪 IV. ①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0934 号

SEIGAKU TOZEU TO CHUGOKU JIJO(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

By Wataru Masuda(増田涉)

© 1979 by Kyo Masuda

First published 1979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an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Kyo Masuda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 - 2010 - 414

书 名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著 者 [日]增田涉

译 者 由其民 周启乾

责任编辑 沈 亮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页 2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6415 - 8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译者的话

本书中译本曾以《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为题,于1993年首次出版,惜至今已经绝版多年。当年热心向国际交流基金推荐申请翻译出版资助的吴廷璆、大庭脩先生,以及主要译者由其民先生,也已相继辞世。作为后来者,深感有责任让它流传久远,以不负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前辈学者的隆情厚谊。

时隔近二十年之后,幸得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岳兵博士热心推荐,刘东教授慨允将本书纳入他所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使本书得以再度与中国读者见面,继续为中国事情发挥作用,当可告慰包括原著者在内的诸位前辈学者于九泉。

关于本书的学术特色与中译出版的缘起,请参见《1993年版中译本前言》,兹不赘述。这次付印前,又与日文原书及初译本核校一过,在可以辨识的范围内,径直改正了其中的误植。由于水平所限,不周之处仍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刘岳兵博士不辞辛劳,居间联系协调岩波书店、江苏人民出版社及译者诸方面,大力促成了此事的顺利进行。作为译者之一,谨对刘东教授、刘岳兵博士及中、日相关出版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启乾

2010年6月1日于天津

1993 年版中译本前言

日本著名学者增田涉先生(1903—1977)的名字,对于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期,增田即来到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跟随鲁迅先生学习中国小说史及现代文学,并撰有《鲁迅传》在日本杂志上发表。他返回日本后,继续就教于鲁迅,相互间书信往还不断,直至鲁迅辞世。此后,增田参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建立和《大鲁迅全集》日文版的筹划与翻译出版,致力于把鲁迅及其著作介绍给日本读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田先后在日本多所著名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文学和鲁迅著作,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已经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事实,兹不赘述。

中国读者较少了解的,则是本书所反映出的增田学术的另一侧面,即对于近代与前近代时期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史的精湛研究。如所周知,日本在 1868 年明治维新后结束了封建的幕藩体制,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日本正是通过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如果说,在古代的中日关系中,主要是日本向先进的中国学习,那么,到了近代,局面则为之一变,对迅速崛起

的东邻日本，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以日本为师”的口号，影响及于广泛的阶层。迫于形势的发展，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下诏实行“新政”，以日本为模式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大批留学生东渡，更形成了学习日本的热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吸收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许多西方学术正是通过中国而传入日本的。以往，中国的这一媒体作用常被忽视而未予应有的注意，本书作者则独具慧眼，以其深厚的功力，广泛挖掘日中两国典籍，乃至稗官野史，剔抉梳理，考订鉴别，以充分的史实说明日本在这方面同样深深受惠于中国。

19世纪以来，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力东渐”即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挑战，西方殖民者力图打开中、日两国的大门，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活动，震惊了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朝野，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给日本敲起了警钟。众多汉译西方著作和中国有识之士所著睁眼看世界的作品传入日本，被广泛阅读，成为了解世界大势的精神食粮。幕末维新志士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明治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吸引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也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客观条件。明治新政府的领袖运用来自汉译书籍的知识，与欧美使节樽俎折冲，明治初期使用汉译西书作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从一些重大事件直至逸闻花絮，书中都有生动翔实的记载与说明。

事实表明，中日两国面对外来压力所作出的反应颇为不同。例如，魏源《海国图志》成书后，不仅迅速传入日本，而且被广泛翻刻、训点乃至日译，版本多达20余种，流行程度和发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国。日本的当政者和有识之士为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积极提倡海防，奋起御敌。如果说，幕末志士佐久间象山标榜“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

希望在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维持原有的制度与道德,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局限性,那么时隔不久,明治维新的功臣们就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在日本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公开声称“脱亚入欧”,跻身西方列强的行列。在日本维新成功30年之后,中国始出现要求维新的“戊戌变法”,但仍不能见容于最高统治者而遭无情镇压。这时提出“中体西用”,更是为时过晚,已完全不能阻挡列强的瓜分。至20世纪初,无论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新政”,抑或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民国”,同样都未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是短暂的一瞬,而一旦失去机遇,即会招致无可挽回的损失。

本书原名《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杂书”札记》,是作者运用多年精心搜集和珍藏的书籍,加以比较研究而写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对于中国文化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从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确实源远流长,相互影响无所不在。在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完全有理由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继往开来,把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我于1981年第一次赴日时即接触到这本书,深为其内容所吸引,体味到它的学术价值,亟愿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然而,鉴于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局面,这一想法当然不易实现,只能暂时搁置下来。近年,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傅佛果先生(J. A. Fogel)将本书英译,在他主编的《中日研究》上连载介绍给了西方读者。承傅佛果教授惠赠,我们又读到了这本书的英译文。当时的心情,与其说是兴奋,不啻是受到极大的震动和鞭策。这样一部有关中国事情史的好书,难道不应迅速出版中译本,介绍给我们的学术界吗?我把此书拿给我所由其民先生阅读,他同样高度评价其学术价值,并愿意着手汉译。其民先生早于30年代即曾留学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卢沟桥畔的枪声召唤他毅然中断学业,束装归国,投身抗战。如今,他虽届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一举译出初稿,我则作了一些“填平补齐”的工作。可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译稿完成后，承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廷璆教授和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大庭脩教授热心推荐，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1993年度翻译出版资助。对于中译本的出版，原出版者岩波书店提供了方便。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院出版社社长王辉教授等给予关照。国际交流基金驻华代表小熊旭先生寄予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冯佐哲教授在百忙中代为查核稀见资料，校订了部分引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承柏教授惠予阅览的便利。凡此种种，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繁荣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也期待学术界对于本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为便于阅读，根据需要作了译注。所引中日汉文旧籍本应一一查核原文，但限于条件，未能全部做到，只能从日语译出。原书中的书影插图从略。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周启乾

1993年8月

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目 录

译者的话	1
1993 年版中译本前言	1

第一部

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面	3
1. 《万国公法》与医学书	3
2. 科学书	8
3. 《智环启蒙》等书	12
4. 地理书	16
5. 《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书	23
6. 松阴与魏源	27
7. 鸦片战争与《道光洋艘征抚记》	32
8. 《鸦片传闻书》	36
9. 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41
10. 《夷匪犯境录》与《鸦片始末》	45
11. 斋藤竹堂的《蕃史》及其他	50

12. 佐藤信渊《海陆战防录》、《存华挫狄论》	55
13. 鸦片战争异闻	62
14. 岭田枫江《海外新话》及其他	67
15. 《清英战记》问题以及《圣武记》的翻刻与 荷风《下谷丛话》	72
16. 《云南新话》与“太平天国”读物	78
17. “小刀会”和小说《满清纪事》	85
18. 《满清纪事》与《粤匪大略》	89
19. 《外邦太平记》与《新说明清交战记》	94
20. “太平天国”传说与大盐平八郎	99
21. 对洪秀全的各种描述	110
22. 《盾鼻随闻录》的问题及有关太平天国的杂记	119
23. 《宽永小说》与《日本乞师纪》	128
24. 乞师颠末	136
25. 萨摩、倭寇与中国(明)	146
26. 朝鲜战役中的萨摩和中国(明)	154
27. 郑成功与“国姓爷”	161
28. 《明清斗记》与郑成功传	171

第二部

日本开国与鸦片战争	183
《满清纪事》及其著者	
——关于我国所传的“太平天国”	191
山本 宪(梅崖)	220
编者后记	242

第一部

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面

1. 《万国公法》与医学书

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一文中说：“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按原书所引，录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358 页。——译者)

清朝初期，雍正皇帝对基督教采取了禁教政策；但清朝末期，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解除了教禁，于是，众多外国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进行了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这样一种启蒙活动。所以中国老早就有了各类西洋书籍的汉文译述的传教著作。这种汉文译述和著作，主要在上海等地出版。至于具体书名和译述者姓名，梁启超制有详细的《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二年序刊)。以前，拙著《中国文学史研究》([日]昭和①四十二年第一版，岩波书店)一书，已予全部转载。

① 文中凡初次出现的日本年号均加[日]字，以示区别。昭和时期为 1926—1989 年。——译者

中国人士目睹鸦片战争以来的迭次战败，在沉痛反省自己国家和本国文化缺点的同时，通过大量出版西方学术、文化的汉文译述，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变革国家体制的倾向。这些启蒙读物，成了从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进行体制变革的桥梁。

这些经外国教士之手，在清末中国出版的汉文“西学”书籍，很快被引入我国。由幕末到[日]明治^①初年，将之加注训点^②翻刻出版的不在少数。这些读物对于我国，也成为西洋所开发的新知识的供给源泉。可以说，在从幕末到明治时期为求体制改进而进行的启蒙活动上，它们同样也起了不小作用。

我之所以对这些中国书籍及其引入我国的翻刻本怀有兴趣，我想是由于阅读了故中山久四郎《近代中国对维新前后日本的各种影响》(昭和四年，史学会编，富山房出版的《明治维新史研究》收载)一文的缘故。由于我早就关心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在文化方面)，对于这类翻刻书籍，从史料意义出发，目之所及无不尽量搜集。这二三十年间，不断购求，现在愿就案头所藏，略陈数语：

《万国公法》(共4卷)。此书是美国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翻译的美国学者惠顿(Wheaton)原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汉文本。丁韪良于道光三十年(1850)渡华，先任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习(即教授)，后任校长。我收藏的汉文原译本，是同治三年(1864)“京都崇实馆存板”(此处的京都指北京)。另外，我还藏有[日]庆应元年(1865)幕府时期“开成所”^③翻刻并加训点，附有人名、地名读音的6卷本。^④到了明治时期，这一刻版还有所增印(东都^⑤老皂馆，万屋兵四郎发行)。

① 明治时期，1868—1912年。——译者

② 训点，指为按日本固有语音阅读汉文而加注于汉文的字母(假名)及标点；也包括“送假名”(起活用语尾、助词、助动词作用的符号)和“返点”(起语序倒顺指示作用的符号)。——译者

③ “开成所”，幕府设立的专授英、法、德、俄、荷兰等国西学的学校。明治元年改称“开成学校”，后为“东京帝国大学”，战后为“东京大学”。——译者

④ 此书未载训点者之名，但据《日本洋学编年史》(大概如电原著，佐藤荣七增订，昭和四十年，锦正社出版)指称，是西周助(周)。

⑤ 东都，江户时代(1603—1867)指东京。——译者

《万国公法释义》(4册)。是堤穀土志混合了汉字与日语字母译为日文的(但止于第2卷),庆应四年(即明治元年),京都发行。

《万国公法蠡管》(8册)。是“高谷龙州注解,中村正直批阅”的,明治九年东京府发行。有训点并收载了与内容有关的汉文注释,是一种大版、大字的出色版本。

以上所举,仅限于我所收藏的范围。此外,据说明治三年鹿儿岛藩出版有重野安绎译述的《日译万国公法》(但以第一卷的第一章、第二章为止)。又据说,明治十九年还有山田謹一郎的训点本。

《万国公法》一书何以如此备受欢迎和重视呢?原来从幕末到维新,我国在种种方面同世界各国的交涉折冲问题突然增多;此际,拥有万国公法即国际法知识就成为当务之急。而由于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以前迄无所知,这部汉译国际法书籍,便成了唯一的宝典。据说先觉者坂本龙马^①为要在土佐翻刻此书,就曾在出版资金方面竭尽其力。特别在维新之后的明治政府转向开国政策(即开放政策——译者)之际,《万国公法》一书被当局视如经典。明治三年制定大学规则时,科目中就列有“万国公法”一项。明治四年,京都小学校的课程中也有“万国公法”。此外,各地学校还把《万国公法》采用为参考书。关于此节,前举中山久四郎的文章和尾佐竹猛的文章《万国公法思想的引进》(昭和七年,共立社书店《近代日本国际观念的发展》收载)中都曾提到。

今天,我们使用的“权利”、“义务”等词,据认为就是来自《万国公法》的。而瞥一下该书的目录,也可以看到它已经使用了“自治”、“自主”、“主权”等语。据说,明治政府的外务卿(明治十八年以后改称外务大臣——译者)大隈重信,当与英、法外交官发生辩论时,便运用此书,纵横捭阖,常能制胜。关于这样的轶事,尾佐竹猛在他的《万国公法与明治维新》一文(昭

^① 坂本龙马(1835—1867),江户末期著名尊皇倒幕代表人物,曾组织海援队,与西乡隆盛等策划恢复皇权。——译者

和十年,学而书院出版的《维新史从说》收载)和他的《明治维新》上卷(昭和十八年,白杨社出版)的“攘夷论与开国论”中,以及前举《万国公法思想的引进》一文中,都引用了各种记录、资料,做了详细叙述。^①

又丁韪良于光绪六年(1880),把生于瑞士的德国法学者步伦(Bluntschli)所著 *Das moderne Völkerrecht als Rechtsbuch* 汉译为《公法会通》(10卷)。我藏有明治十四年岸田吟香训点翻刻,由他的乐善堂以活字本(5册)出版的此书。可见,当时国际法仍属必需之书。

幕末维新前后,同为我国寄望甚大而与国际法的引入并驾齐驱的,大概就是西洋医学的汉译书籍了。这主要是合信(Benjamin Hobson)汉译出版的书。^② 合信是英国传教士医生,道光十九年(1839)被派去中国,开设医院于香港。后迁广东,再迁上海。既行医又传教。他的《全体新论》(二卷)咸丰元年(1851)出版于广东。所说的全体,乃是身体全部之意。这是一部有丰富插图的人体解剖书。其序文有云:“余自弱冠以医为业”,经对人体进行剖析而熟知其各部,兹“集西国之医书,相互考订,删烦撮要,记述成书”(原为汉文)。我没有咸丰元年的原本,但藏有作为“清本之翻刻”的[日]安政四年(1857)越智氏(据说是伏见的医生)训点翻刻的二卷本。另外还有其他版本,以及明治十年代的《全体新论译解》、《通俗全体新论》等。

合信的《西医略论》,于咸丰七年(1857)出版。翌年出版了《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都由上海“仁济医馆”发行。其中拙藏有《西医略论》三卷本的原刻本,插图竟达400帧之多,详尽涉及了外科手术等。书末附有关于药品的记载。我的藏本上盖有“箱馆医学所”的藏印。此书的

^① 在维新大业上被誉为武勋第一的西乡隆盛,在他附有日期为明治元年4月的一封信函中,也有这样的话:“鄙人业已答复英国公使,对于德川庆喜(1866年继位的第15代将军,翌年便“奉还大政”。——译者)之处置,将不欲招致万国公法上之非议”(渡边修次郎著,昭和十九年北海出版社《近世从谈》所载《海外知识》一文)。由此足以窥见当时是如何理解公法的,以及早期政治情况之一斑。

^② 高市庆雄编撰的《明治文献目录》(昭和七年,日本评论社)中,误将合信用假名按 Gatchin 拼音,应按 Hobson 拼音才对。

日本翻刻本分为4册，是安政五年（1858）桃树园三宅氏藏版，老皂馆万屋兵四郎发行。《西医略论》是以外科为主；与此对照，《内科新论》正如字面所示，是关于内科的书。我无原本。日刻本分为上、中、下三册。下册名为《东西本草录要》，记载了药剂和药品。日刻本是安政六年（1859）“桃树园藏粹”，也是老皂馆发行。序文中说：“内科新说之所论，用药法之审证，均取自欧罗巴医书，择其要点而以汉文‘意译’之。”（原为汉文）《妇婴新说》是关于妇科和儿科的书，我无原本，但藏有安政六年（1859）的“平安，天香堂藏版”的翻刻本（3册）。书末载有“选用方剂”。

合信的这些医书，可以说，是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序言中屡屡谈及这一点），为了有效地用干实际治理而编写的从文字和内容上也可以看出它照顾到中国人的理解，每部书署上了中国助手名字，成了合写著作。

看到穗亭主人所著，并冠有日嘉永五年“例言”的《西洋学家译述目录》（[日]大正十五年松云堂再版，可知国的荷兰医学译著业已多有出版。然而由于学力不足，译文大都劣不精，此节见于杉田玄白和建部清庵合著的《荷兰医事问答》（大正三年国书刊行会《文明源流丛书》第三卷所收）。于稍后，安政年间^③翻刻的、以合信临床经验为主的西洋医学书，可以说给我国留下了巨大功绩。^④ 我时常在旧书店里看到盖有明治前期某某医学校藏印的翻刻合信氏医书。^⑤

① 嘉永五年，1852年。——译者

② 大正时期，1912—1926年。——译者

③ 安政年间，1854—1859年。——译者

④ 当时我国的知识分子都能阅读汉文。阅读汉文人口占压倒多数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是这些医学书籍能够普遍被利用的一个原因。

⑤ 此外，顺便一提，向中国介绍西方医学，是经由明末渡华的外国传教士之手进行的。特别是精于医学的来华教士、伽利略的朋友瑞士人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会同利玛窦等人，在修改历法的同时，并于明崇祯末年在杭州李之藻处节译了被视为近代解剖学之祖的比利时人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的著作《人身概说》（今通译《人体结构》——译者）二卷。此书好像在中国就不太普及，似乎也没有传入日本。若被介绍到日本来的话，也许对杉田玄白等人有相当助益；因为从杉田撰写的《兰学事始》中可以看出，他们翻译《解体新书》时是备经艰辛的。

2. 科学书

合信的著作不仅限于医书,他的《博物新编》也被日本翻刻。拙藏的原本是,“咸丰五年(1855)新镌,江苏上海墨海书馆藏板”,“英国医士合信著”。内容分三集:第一集是“地气论”、“热论”、“水质论”、“光论”、“电气论”,可以说是物理学的解说书。第二集是宇宙天文之类的问题,包括“天文略论”、“昼夜论”、“地球亦行星论”、“月轮圆缺论”、“月蚀定例论”、“水星论”、“地球论”、“潮汛随月论”、“金星论”、“火星论”、“木星论”、“土星论”、“彗星论”等,分述甚细。第三集是“鸟兽略论”,是对各种兽类、禽类的解说。卷首除有“胎生类”(兽物)“卵生类”(鸟类)的插图外,也有“鳞介类”与“昆虫类”的插图。不仅限于第三集,所有各集都有丰富的图片,可以说,这是此书的特色。

为此书加训点进行翻刻的(也收进了插图)是幕末时期的洋学中心“开成所”。翻刻本第一集的学术用语,注有荷兰语语音。日刻本未记出版年月,但卷尾的“老皂馆万屋兵四郎”出版书目广告中,此书与《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并列,广告末行记有“[日]元治甲子(1864)秋日”。据此,可以确信此书是在此以前翻刻的。有人说是[日]文久年间^①翻刻的。拙藏的日刻本《博物新编》(3册),各册第一页都分别盖有“一桥学问所”的朱印。这是“开成所”的习惯做法呢,还是一桥时代德川庆喜的“学问所”的藏书印记,尚难可知。

《博物新编译解》(5册)有庆应四年(即明治元年,1868年。——译者)的序言,是杂以日文假名翻译的。卷头凡例中有云:“原文未加更动,须顺序读之。”(原为汉文)。因此,正如这是原封不动的日译一样,插图也原封刊入。译者是“解谷(号)大森中”。

由幕末到明治初,《博物新编》因其传播西方开发了的理科知识而大

^① 文久年间,1861—1863年。——译者

受欢迎。这一点,看一看自明治建政以来此书翻刻本的迭次增印,并在译解之外还出版了它的“注释”、“演义”、“讲议”以及栏外加注的《博物新编》等,就不言自明了。至于详细情况,小泽三郎的论文《侨居中国的耶稣教传教士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昭和十九年亚细亚书房《幕末明治耶稣教史研究》刊载)有记述。

《谈天》(18卷,3册)是一部天文学书。英国天文学会会长(凡例所云)侯失勒(Herschel)著,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来到上海的英人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与中国人李善兰共同译为汉文的。我所收藏的原本上,有“咸丰己未(1859)仲秋、墨海活字版印”字样。书前还记载说:“英国侯失勒原本,英国伟烈亚力口译,海宁李善兰删述”。恐不能说是全译,但已经是部拥有18卷的堂堂巨书了。插图也处处可见。梁启超在他的《西学书目表》中,评之为“最为精善”。此书是上海出版的,仅仅两年后,即[日]文久元年(1861)浪华(大阪古称——译者)的福田泉就加以训点翻刻了(3册),书名仍是《谈天》。转载了原本李善兰的序言和伟烈亚力的序言,紧随其后的便是“司天生理轩福田泉”志于“浪华顺天堂中”的“刻《谈天》序”。此人情况不详,但既称“司天生”,想必是个专门的天文方^①了。这是把上海版的卷八到卷十四适当加以删订而翻刻的。

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的作品中有《重学浅说》一书,此书也见于汇集了王韬著译的《西学辑存》书中。我尚无此书的原本,只藏有翻刻本《重学浅说》(一册)。因其封面内载有“咸丰八年(1858)四月,沪上墨海书馆活板印”,故知这是将原本加上训点翻刻的。没有原本的序言,而有训点者的“叙”。叙文中载有“安政庚申(1860)春”。此书也是上海出版的,两年后,日本就翻刻出版了。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对这类知识是孜孜以求的。此书内容是关于力学的(重学即力学),开卷及收尾均有“总论”。章节分为“杆”

^① 天文方,江户幕府一种官员职称,掌管天文、历法、测量、地志、外文书籍翻译等有关事宜。——译者

(杠杆)、“轮轴”、“滑车”、“斜面”、“螺旋”等,有插图及说明。末页印有“[日]万延元年庚申(与安政庚申同)六月,淀阳、木村淳邑粹夫翻刻,淀阴、荒井公履叔礼旁点”,“黄花园藏梓”。似是大阪附近人士训点翻刻的。^①

此外,继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年间(1603)与徐光启(由拉丁文)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6卷之后,伟烈亚力与李善兰(由英文)合译完成了第7—15卷。我藏有曾国藩于同治四年(1865),将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与伟烈亚力、李善兰咸丰七年(1857)翻译的第7—15卷合在一起在南京出版的《几何原本》(8册)。由于此书未出日刻本,故不在本文主题范围内。但尽管如此,我还要说,今天我们使用的“点”、“面”、“线”、“直角”、“锐角”、“钝角”、“矩形”、“平行线”、“对角线”、“底边”、“立方体”、“体积”、“比例”等,既然已经早在中国翻译的《几何原本》上出现,那么我们便是借用来的了。首先须知,“几何”这一明朝时候的中国译词,至今我们还在原封使用着呢!^{②③}

作为涉及理科全面的启蒙书,《万国公法》的译者丁韪良著有《格物入门》(7卷)。我无此书的原本,但藏有明治二年本山渐吉的训点本(7册)。训点本转载有同治七年(1868)原本徐继畲的序言和董恂的序言。按明治二年是1869年,就是说,原本问世后的翌年,日本就出了翻刻本。据此,可以认为当时此书对于我国也是有用的。据序言称,丁韪良“博闻

^① 关于力学学说,已见于医生与荷兰学学者广瀬元恭根据荷兰书籍编纂的嘉永七年版《理学提要》(我的藏本为前篇4册,后篇1册)。

^② 此外,“几何”一词的中国发音是把拉丁语的 Geometria 前半部分的发音表示出来的,然而这一词语也赋予了若干意译性质(几何、多少)。关于这一点,渡边修次郎在他的《近世从谈》中说:“早在文久2年版的《英和辞书》中,尽管正确地将此字译为‘测量学’,而明治以来,‘几何学’却成为惯用语了。为此,有人提出非议,认为此字不译测地学而译几何学实属不妥。这是从译义的见地出发的”。附载此说,以供参考。

^③ 又拙藏有伟烈亚力的《数学启蒙》(咸丰三年,门人金成福跋)一书,未载出版者姓名,仅在封面内载有“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的出版日期。但因冠有“官板”字样,所以是日本刻本。有“通分”、“约分”、“循环小数”、“开平”、“对数”等术语,附有对数表。内阁文库的《汉籍目录》中也列举了此书翻刻本一册。该目录还把“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听写”的《代数学》的日刻本,作为“明治五年,塚本毅校”列出。

强记”,“来华已久,能操华语”,“综合所习之西学”以问答体通俗易懂地撰成此书。

训点的日刻本分为7册。第1册“水学”,第2册“气学”,第3册“火学”,第4册“电学”,第5册“力学”,第6册“化学”,第7册“算学”。各有插图。其中“算学”一门属于测量计算,分为“测量水学”、“测量气学”、“测量光学”、“测量力学”各章。据其凡例载称:“为使简明易解,有用于实际而编成此书”云云。还说,文章经中国人士李光祐、崔士元等润色。

《格物探原》(3卷),“光绪二年(1876)活字板印”,是咸丰五年(1855)到上海的英人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撰述的。第1卷一如理科解说书那样,有“论天地”、“论物质”、“论地球形势”、“论空气”等。此外还有“论皮相”、“论首”、“论咽喉胃肠”、“论骨”、“论筋肉”等关于医学的论述。第2卷则是“上帝唯一”、“上帝至大”、“上帝全智全仁”,纯属基督教的宣传,把“上帝”纠缠到物理和博物中来说教。第3卷是“论元质”、“论造物为人”、“论上帝主理人事”,最后是“论死后复活”。由此可知,这是旨在宣传宗教的一本《格物探原》。

《格物探原》也在明治十一年加了训点翻刻出版,是“熊野与训点,奥野昌纲校订”的。据该书重野成斋的序言称,熊野与是一位儒者,而奥野昌纲早在明治六年就和植村正久等人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教开拓者之一。^① 熊野与在卷首的例言中说:“此书所论,大至天地阴阳,微至鸟兽鱼虫,一卉一草无不源自上帝之创造措施(中略),实为人人必读之书”(原

^① 他并且是明治七年成立的圣经翻译委员会(由外国教士3人组成)的助理(3人)之一,专门协助委员赫伯恩(James Curtis Hepburn)。而当时汉译圣经为之提供了参考一事,《福音书》、《使徒行传》、《启示录》等书的汉译本被原封采用就是明证。我曾拿汉译圣经与日译圣经稍做比较,便发现被原样采用的地方非常多。我国的圣经翻译始自明治七年,完成于明治十三年(参阅昭和四年日本基督教会事务所发行,山本秀煌著《日本基督教会史》)。当时正在训点和翻译其他汉文书籍的奥野,想必出力很大。另外我还藏有加注训点、送假名的汉译圣经《训点旧约全书》3册(明治十六年“美国圣经会出版”,“日本横滨印行”)和《训点新约全书》(明治十七年,同前)。此书似有一种相当普及的同版而装订不同的本子。奥野昌纲还翻译了“英国韦廉臣撰,清国董树棠笔”的《基督实录》。我也有藏本(明治十五年,饭岛静谦出版)。

为汉文)。这种将万物解释为上帝所创造和措施的看法,在当时基督教刚被解禁的时候,对儒者是一种新的、有刺激性的解释也未可知。

我还收藏有“韦廉臣辑译、李善兰笔述”的《植物学》3册的日本训点翻刻本。扉页里面有“咸丰丁巳(1857)墨海书馆开雕”,记载了原本的年月和出版所;但没有作为日刻本的序,日刻本何年出版不得而知。有人认为是庆应三年(1867)的书,但我的藏本是后来印的。

3. 《智环启蒙》等书

《翻刻智环启蒙》是庆应三年(1867)“江户开物社”训点翻刻的。我的藏本盖有朱印“藩黉藏书之印”,不清楚是何处的藩校^①。此书把西方的初步知识分为200题加以说明,也可以称为小百科辞典,是一本仅有百页的小书。各页的上段是英文,下段是它的汉译文。序言是英文的,末尾署名J.L.。J.L.是James Legge的略写。他是汉名译作“理雅各”的侨居香港的英国传教士。他以英译中国古籍《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而知名(他先住香港,后被召往自己的故乡苏格兰。协助他完成上述英译业绩的是王韬)。《智环启蒙》原是理雅各将著者名为贝克尔(Baker)的《The Circle of Knowledge》(Grandation I)译为汉文,取名《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由香港“英华书院”出版。日本翻刻的《智环启蒙》是据该书同治三年(1864)的再版本(根据序言,初版是1856年),并将英语原文也加了进去,汉文则加上了训点。封底内页注有“训点者柳河春三”。

原本的跋也由翻刻本加了训点转载。这跋语是任瑞图于丙辰(1856)之冬撰写的,因此,初版本就有了此跋。任瑞图在跋语中说:“理雅各先生系耶稣教会牧师,英华书院教授”。又说:“余自甲寅之岁

^① 藩黉,即藩校或藩学,是日本明治以前各藩为教育本藩子弟而设的学校。——译者

(1854),忝居西席”,可知任氏也是“英华书院”的教师。接下来,跋语赞扬了理雅各的人品和勤勉作风。然后说:“兹者,遂译《智环塾课》一卷,以授生徒”(原为汉文)。由此可知,此书原是“英华书院”的教科书,旨在供学生学习英文并兼以进行西方知识的启蒙和基督教的宣传。关于此书内容,任氏说:“上帝之体性功用遍及(上帝)所造之天文、地理、人事、服饰、器用;凡此飞、潜、动、植之物,无所不载”。(原为汉文)然而,“上帝之体性功用”只构成最后的第 192 课到第 200 课;其他各课分为“身体论”、“饮食论”、“居所论”、“教学论”、“生物哺乳类论”、“飞禽论”、……“草木论”、“地论”、“诸物质体论”、“天气诸天论”、“地球分域论”、“人生会聚同居等事论”、“国政论”、“大不列颠以外之别国论”、“通商贸易论”、“物质及移动等论”、……“五官论”、“上帝体用论”等 24 个门类。各门类又分为若干课来进行说明,全部为 200 课。不过,虽然名之为“论”,但也只是中国的习惯用语之法,实则可以说是一些解说或说明而已。把原题“Human Beings”译作“人类论”,把“The Body and its Parts”译为“身体论”,一切都加上“论”字。而且,汉文译词与其说是直译性质的,不如说是解释性质的。例如第 32 篇“借力匠器论”,原题本是:“The mecanical Powers”(机械力——译者)。

训点者柳河春三(明治三年歿)是幕末时期的洋学学者,当过幕府“开成所”的首脑。据说他通晓荷兰、法、英、德等国语言。幕府将军家庭医官桂川甫周(洋学学者)的女儿今泉峰著有《惜别之梦》(昭和十五年,自费出版;昭和十六年,长崎书店版;昭和三十八年,平凡社《东洋文库》版),书中最先出场的人物就是柳河春三,但关于他的详细情况,尾佐竹猛的《新闻杂志的创始者柳河春三》一书作了记述(昭和十五年,高山书院出版)。正如标题所示,书中对庆应三年(1867)创刊《西洋杂志》、同四年发行《中外新闻》的柳河春三的功绩予以高度评价。但如果谨慎将事的话,则不可忘记,在我国发行自己的新闻、杂志之前,我国业于文久年间(1861—1864)就翻译发行了荷兰殖民地巴达维

亚(今称雅加达——译者)出版的报纸《巴达维亚新闻》。与此同时,还训点翻刻了自咸丰七年(1857)起在上海发行的《六合丛谈》(主笔是伟烈亚力)。小池洋二郎在《日本新闻历史》(明治十五年,严严堂)一书中,开头就指出:“报纸新闻在日本的创办,是以文久三年(1863)之秋,江户本所(东京一地区——译者)商人万屋兵四郎发行的《巴达维亚新闻》(实为文久二年)及《六合丛谈》为滥觞”。在《六合丛谈》之外,咸丰八年在宁波开始发行的《中外新报》,同治元年(1862)在上海开始发行的《中外杂志》,咸丰十一年(1861)在香港开始发行的《香港新闻》等,也都在文久年间作为“官板”被日本翻刻,由万屋兵四郎发行。此节见于《博物新编》翻刻本等书卷末的广告中。但是,由于当时还处于禁教时期,翻刻本就略去了有关耶稣教的报道。拙藏有翻刻的《六合丛谈》(卷一至卷一三)、《中外新报》(第1号至第8号)、《中外杂志》(第1号至第7号),卷号都不完全。然而却可以说是具体考察日中文化关系史一个方面的资料。必须知道,这些书籍为幕末时期的我国提供了海外情报,充当了启蒙的媒介角色。例如桥本左内^①就从《六合丛谈》(未翻刻前的本子)中抄写了《泰西近事纪要》、《印度近事》、《金陵近事》(太平天国的情报)、《粤省近事述略》(鸦片战争经过记事)。^②

前面提到的尾佐竹猛的著作中,引用了柳河为翻刻《智环启蒙》致桂川甫周信函的一部分。柳河信上写的是,想翻刻《智环启蒙》的初版本,但友人成岛柳北^③(幕府官吏,维新后为新闻记者、《朝野新闻》社长)藏有再版本,而再版本订正了初版本的错误数处。所以认为使用再版本翻刻为好。为此,想要交换。倘若交换成功,将尽速加上返点,送往桂川府上。因此,恳请桂川“务必赐助!”由此可见,柳河是这样根据再版本加训点翻刻此

^① 桥本左内(1834—1859),幕末志士,通西学及医学,精于化学。是“安政大狱”(安政五年)中,因反对迎立德川家茂继承将军职位而被处死的志士之一。——译者

^② 见于山口宗之《未入全集桥本左内关系史料研究》(昭和四十年,非卖品)。

^③ 成岛柳北著有《柳河先生略状》、《柳河先生逸事》等文(均由明治二十五年博文馆《柳北遗稿》收载)。“与先生交谊殊深”的柳北,极口称赞柳河的天才气质。

书，并借助桂川之力而实现的（书末刻有：发行 大和屋喜兵卫）。

柳河著有《法语语法》、《英语日常用语》、《洋学便览》以及其他许多有关洋学的著作。并且他似乎也颇通晓汉文。尾佐竹猛的书中，便引用了很多柳河汉译的我国俗谣戏诗。除《智环启蒙》训点本之外，他也参加了前述《格物入门》的日译（20册）。这部《日解格物入门》是由数人分担，用汉字混合日本字母的文体翻译的。柳河承担了《水学部分》（2册）。

顺便一谈，像柳河等这些明治初年的洋学书生的译词，迄今还使我们蒙受恩惠的，要算名词下加“的”字使其转化为形容词或副词的便利运用方法。大槻文彦^①曾说，明治初年做出大量翻译的人，“有柳河春三、桂川甫策、黑泽孙四郎、箕作奎五、熊泽善庵及其他等人。鄙人也忝居其列。而难以思议之事是，此辈同僚挚友大都爱读中国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等书。某日，众友聚而闲谈，一人无意中提出以下之说：将 System 译作‘组织’，当然妥当，但 systematic 则很难译。tic 这一后缀（接尾词）和（中国）小说的‘的’字声音相似，倘若译作‘组织的’是否可以？众人皆说甚妙，试试看！不久，让人誊清一篇谈‘组织的’文章，持往藩主府邸领钱。‘你呀，真地做了？’‘嗯！’‘不太过分了吗？’‘哪里，我才不在乎呢！’凡此种种，本属嬉戏，然而这一‘的’字果然屡屡解决了困难，遂由信口开河变成真事。以后便不加犹豫地使用了，并成为众所接受之事，云云。”

（大槻文彦《复轩杂纂》，明治三十五年，广文堂书店）

《启蒙智慧之环》（3册）据说是明治五年的初版本，拙藏是明治七年第四版。书中到处有插图，是用汉字和日本假名混合翻译的《智环启蒙》。有“於菟子译述”字样。於菟子即瓜生寅。其上卷卷首有文部少丞长洲的序言。文中说：“瓜生君者，同僚也。尝与共议学制。间或出示其记述之《启蒙智慧环》，其时，方以小学生无宜读之书为忧，（中略）此书尤为今日之

^① 大槻文彦（1847—1928），语言学者，所撰《言海》、《广日本文典》是日本近代辞典的先驱。——译者

必需。因忿患其急速刻之，以惠天下之小学生。”（原为汉文）接着又说：“有开智发蒙之效，岂仅有益于小学生耶！”当时身为文部省官员的瓜生，将此书译得平易宜读，意在有助于初步西洋知识的普及。而且可以认为，这部《智环启蒙》收到了所期望的效果。不过，这部译述本结束于第192课，原本最后部分的耶稣教宣传各课均予删去。此外，则收入了原本所无的“日本论”为第144课。“通货论”在原本中是说明中国和英国通货情况的，现则整个改为对日本通货的说明。这一译述本，似乎甚受欢迎，明治九年就出了第5版。从事《智环启蒙》日本版（译述也包括在内）搜集和调查研究的小泽三郎，在他的《智环启蒙与耶稣教》一文中（《幕末明治耶稣教史研究》收载）指出，除柳河本之外，还有明治三年沼津学校翻刻的、删去英文的汉文训点本，以及同年在鹿儿岛藩翻刻的没有英文的汉文训点本。据说，还有根据咸丰七年初版本翻刻的、出版年代不详、没有英文的汉文训点本。

“日解”本除瓜生本外，据说还有石川县学校藏版、明治六年广瀬、长田的译述本，以及全是英文的攻玉塾藏版本。

根据小泽调查的“日本版的传播”结果，《智环启蒙》在田边藩、德岛藩、福井藩、延冈藩、名古屋藩等地皆都使用。《启蒙智慧之环》在埼玉县、东京女子学校、京都府等处，都用作小学教科书。此书作为西洋知识入门的启蒙书，或作为英语教科书，对明治初年为我国开发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须给以高度评价。

4. 地理书

柳河春三著有《横滨繁昌记》一书，木版本一册。扉页上载有“吃霞仙客校本，幕天书屋藏板”，并有太平逸士和锦溪老人的序诗。但是，正文开始处又写作“锦溪老人著，太平逸士校”。因为是一部游戏之著，所以是一本使用了日本假名（字母）的书。出版年月遍寻无着，疑是文久年间的著作。据称，这部《横滨繁昌记》连同在桂川府邸中写成的谈笑书

《天香社会话》(未见此书,系抄本)等书一起纳入了名为《吃霞楼新六六部集》中(根据尾佐竹氏的说法)。推定这大约在文久年间,因为尾佐竹氏的《柳河春三略年谱》便载称,《天香社会话》是文久元年的作品。

《横滨繁昌记》是用汉文写的,但与普通的汉文不同,它混合着中国旧小说使用的文字。“那个”、“不好了”、“刮落的”、“难道……不成”、“那话儿”等所谓“俗语”,随处可见。同时还使用了从清末起成为美国代名词的“花旗”(即星条旗)之类的文字。然则,前面谈到的柳河等人从中国小说中取来“的”字之说,也自属可信了。

这部《横滨繁昌记》中,有“舶来书籍”一节。据称:“近者,英美二国勤习汉学,于香港上海等处,所刊汉文著作颇多,(中略)莫利宋、林则徐之所著更不必论。^①新出书中,推步(历算)类有《谈天》、《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格物(科学)类有《博物新编》、《重学浅说》、《格物究理问答》、《智环启蒙》;刀圭(医学)类有《全体新论》、《内科新说》、《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广舆史乘(地理、历史)类有《瀛环志略》、《地理全志》、《地球说略》、《万国纲鉴录》、《大英国史》、《联邦志略》;新报记事(报纸杂志)类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上海新闻》等”,列举了当时从中国舶来的种种书籍和报纸杂志。但最后说:“本人尚未多所目睹,姑录耳闻以备看客之参考耳”。(原为汉文)

所录的虽是“耳闻”,但由此可知,这种从中国舶来的书籍、报纸及杂志已经成为追求新知识的人们之间的话题了。

利玛窦于明末万历年间(据认为是 1583 年)携来中国(广东肇庆)的《坤舆万国全图》,和稍后抵达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的《职方外纪》(汉文),为中国传播了世界地理知识。但因该书收入了明末李之藻编集的《天学初函》(天学即天主教学),属于宽永年间^②“禁书”

^① 莫利宋著有题为《古今万国纲鉴录》的世界各国史一书,明治时期日本翻刻。至于林则徐,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作为“林则徐译”的部分很多,所以这里可能是指这些作品而言。见后文。

^② 宽永年间为 1624—1644 年。——译者

之列。然而正如近藤正斋(书物奉行,即主管书籍的长官)在《好书掌故》第74卷“禁书”一节中指出的(明治三十九年国书刊行会本《近藤正斋全集》第3卷所收):“至[日]享保^①五年,不涉邪道之书解禁”。又说:“以前,禁书之中在长崎解禁发行者”也有《职方外纪》。正如所注说明:“享保十六丑年,唐船(中国船——译者)携来《皇明职方地图》请准发售,其中有《职方外纪》”,因此以后准其发售,进入我国。

但是,因为是传教士的著作,而且最初已被列为“禁书”,所以发售虽已解禁却没有加以翻刻。这是所谓只允解“禁”,而翻刻流通则所不许吧!刻本虽然没有,但《职方外纪》却以抄写本的形式广被传读。可以说,为当时我国世界地理知识作了不少介绍和启蒙工作。据说,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已故鲇泽信太郎就藏有文化、文政、天保^②等年代的《职方外纪》抄本8种之多(见《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昭和二十八年,乾元社)。查看了一下,我手头也藏有该书抄本4种。这可以说是该书当时通过抄本广为流传的证据。

《职方外纪》一书,在艾儒略的自序中有天启三年(1623)的纪年。我国稍为广泛流传的时候似在江户末期。另一方面,到了幕末,洋学学者更直接参考了荷兰的数种地理书,撰述了新的世界地理书。这有箕作省吾的《坤舆图识》3册(弘化^③二年);同书补遗4册(弘化三年);箕作阮甫的《八纮通志》6册(嘉永^④四年至安政三年)等(但后者只有“欧罗巴部”),作为续篇的唯一一册“亚细亚部”没有出版。另有从英文(Colton著)译述的、“佐波银次郎译、手塚律藏校”的《格尔屯氏万国图志》(文久二年)等。以上皆是我所收藏的书(为了了解在中国是如何处理而购买的)。此外,在这前后还有许多由欧洲国家文字译述的世界地理书出版

^① 享保年间为1716—1736年。——译者

^② 三者分别为1804—1817年、1818—1829年和1830—1843年。——译者

^③ 弘化,1844—1847年。——译者

^④ 嘉永,1848—1853年。——译者

(详见鲇泽信太郎、大久保利谦《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

在这些书中,可以说,清末时候居留上海的英人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地理全志》(汉文)翻刻本,对当时我国人士传播了颇为系统的世界地理、地志知识。我没有原本,所收藏的是“安政己未(六年,即1859)新刊,爽快楼藏版”的训点翻刻本(据说还有被认为是安政五年新刊的同版本)上篇5册,下篇5册,共计10册本。上篇分为“亚细亚志”、“欧罗巴志”、“阿非利加志”、“大洋群岛志”等册;下篇卷一“地质论”,卷二“地势论”,卷三“水论”,卷四“气论”,卷五“光论”,卷六“草木总论”,卷七“生物总论”,卷八“人类总论”,卷九“地文总论”,卷十“地史论”收为5册。卷尾载有“发弘书林”、“日本桥通二丁目、山城屋佐兵卫”。这是否就是当初的原出版社,还不得而知。虽未刊载训点者的姓名,但卷头有“安政五年秋九月”盐谷宕阴(世弘)的序。盐谷宕阴是位汉学家者,并且关心海外情况,热心海防问题。尤其是他收集中国鸦片战争情报并撰写了向我国提出危机警告的《阿芙蓉汇闻》、《隔靴论》、《筹海私议》^①等书。

宕阴在序文中将《地理全志》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两书均有翻刻本,见后文)相比较说:“《图志》失于杂,《志略》以事迹为主,皆未尽方舆之能”(原为汉文)。虽然指称此书“记有国朝(日本),而多所疏漏误谬”,但又说:“盖简而括,浏览三日,几足明悉五洲之大势,讲地理者焉能不以此为捷径耶!”(原为汉文)接着最后说:“顷者,蟾州岩瀨君捐资刻之,征言于鄙人,欲辞不能。”(原为汉文)就是说,蟾州岩瀨君自己出钱翻刻此书,并求他作序文。

所说的蟾州岩瀨君,是幕末时期的外国奉行^②(最初掌监察职务)岩瀨肥后守^③(名忠震),蟾州是他的号。岩瀨早就关心外国情况,尤其在幕

^① “阿芙蓉”是鸦片别称;“隔靴论”意为隔靴搔痒,未触要害;“筹海”意为筹划海防。——译者

^② 外国奉行,主管外交与通商贸易的长官,1858年设立,1868年废止。——译者

^③ 肥后守,“肥后”,旧国名,今熊本县;“守”即长官。意为肥后最高长官。以下某某守皆同。——译者

末,他坚持日本的“开国方针”,被称作是扭转原来倾向于攘夷论的幕府外交走向开国政策的人物。福地櫻痴(源一郎)的《幕末政治家》(明治三十三年民友社版)书中,把岩瀨奉为“幕末三杰”之一来加以论述。特别是关于岩瀨等幕府官员同美国使节哈里斯逐条审议哈里斯起草的通商条约全文时,书中写道:“岩瀨至为机敏,其诘难所指,哈里斯往往苦于答辩。不仅如此,经岩瀨驳倒而按其主张加以改变之条款亦甚多。此节,余(福地自称)晚年于美国亲身闻自哈里斯。据此,即足以知岩瀨之才气矣。”^①

所以说,岩瀨因目睹当时的条约反对派在对海外情况一无所知的状态下,一味固执于闭锁主义的攘夷论,而为之慨叹(此事见于他的信函中),并想通过刊行这样的书籍来进行启蒙。他怀有这样的政治、外交的考虑才翻刻此书。

《桥本景岳全集》(昭和十八年前傍书房版)中的《景岳诗文集》第2卷中,有桥本左内的“读《地理全志》书其后”一诗。这首诗据认为是安政五年十二月之作(根据该诗前后记有日期之诗推断),这是左内幽禁中的作品。岩瀨翻刻的《地理全志》中有“安政五年九月”的宕阴序言,所以说,大概是岩瀨翻刻了此书后赠送左内阅读的(尽管说,还有版权页刻有安政三年的《地理全志》)。为使幕政改革力量加强,岩瀬认为在堀田(老中,即幕府政务首脑。——译者)和以后的井伊(大老,即幕府最高执政官。——译者)之外,再争取地位更高的德川一家中有名望的福井藩主松平春岳(庆永)才好。因此,就和春岳的亲信桥本左内保持密切关系^②。左内和岩瀨又同是开国论者,这也是二人据以结合之点。而且反对幕府的左内也从岩瀨处得到幕府内的种种情报。收载在《桥本景岳全集》中

^① 岩瀨也略晓荷兰学问,福地便曾说过此事。但栗本锄云(外交官员,幕末驻法国,因听说国内维新而归国。曾任“报知新闻社”社长)说,岩瀨曾致力于使当时一般学习荷兰知识的现象改变为学习英国知识。岩瀨致桥本的信,有的就横写为 Sanai(左内)先生启, Higo(肥后)缄(见《桥本景岳全集》第6卷影印版)。

^② 在谋图拥立一桥庆喜为将军后继人的问题上,岩瀨和左内(以及春岳)是一致的。

的岩瀨写给左内的 20 余通书信,就为二人之间的上述关系提供了证明。又中根雪江(师质)在他手录的《昨梦记事》(雪江歿后,明治二十九年出版,胜海舟序,八尾书店版)中也详细记述了二人奔走国事的密切关系。雪江和左内被称作松平春岳亲信的左右两臂,当时涉及机密之事二人是信息相通的。

此外,岩瀨在记有安政五年 4 月 20 日的致左内的一封信中说道:“鄙人所藏书中有《遐迩贯珍》,倘欲一睹,赐知便即奉上。并乞便中请示为荷!”所说的《遐迩贯珍》是外国教士在香港发行的月刊新闻——汉文杂志(1853 年创刊),持续至 1856 年(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这刊物不像《六合丛谈》等,我国没有翻刻它,大抵以手抄本流传(我也藏有三期的手写本抄件)。不过,当时多少总会有些原本传入我国,尽管出版年月略有歧异。我于十数年前即曾一度在旧书店的目录上看到过有原本。吉田松阴等也见过这一杂志,安政四年 9 月 2 日他给长原武的信上说:“拜领《遐迩贯珍》,特申谢忱!”(明治四十二年,民友社发行《松阴先生遗著》第 2 编“书牍杂辑”所收)。又松阴在同年 11 月 24 日的《跋伊索寓言》中说,他在《遐迩贯珍》中读到过伊索故事的“马与鹿同游”(汉译)(明治四十一年,民友社发行《松阴先生遗著》所收“幽室文稿”)。

岩瀨掌管外交事务,关心海外情势,亦收集此类杂志藉供浏览^①。此外,上面他在致左内的信中所说“并乞便中请示为荷”,原是因为他意在向左内的主人松平春岳提出“赐知便即奉上”的,故请左内“便中请示”春岳。

顺便再说几句。文久二年乘坐幕府官方贸易船只“千岁丸”抵达上海的高杉晋作,曾经数访《地理全志》著者慕维廉。此事见于高杉所著

^① 关于岩瀨肥后守,栗本劬云(岩瀨在昌平黉的同学)著有《岩瀨肥后守之事迹》(明治二十五年報知社出版的《匏庵十种》所收)。此书有较详细的关于岩瀨为人和阅历的介绍。又杂志《中央史坛》(大正十五年国史讲习会版)的“秋季特刊”幕末明治人物史论中载有太田熊太郎的《岩瀨忠震》一文,颇为详细地记述了岩瀨的生平。

《游清五录》(大正五年民友社发行《东行先生遗文》收载)。书中记载,5月23日晨,他和五代才助(以后改名友厚,大阪商法会议所首任会长)“造访英人慕维廉。慕维廉系耶稣教传教士,布教上海土民。城内教堂属彼管辖,亦即该氏之常住所……求得《联邦志略》等书而归。”25日上午他又和五代一起去访,人不在,未遇。27日,他和中牟田(名仓之助,后为海军中将、海军大学校长、军令部长)“同至慕维廉处,求得《上海新报》、《数学启蒙》、《代数学》等书而归。”前面提到过,《数学启蒙》、《代数学》是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著述的。6月26日他再和中牟田一起去访,人不在。

据说,中村孝也著的《中牟田仓之助传》(大正八年,非卖品)一书,利用的材料多是中牟田的手记,其中所记“航渡上海”一节说,中牟田“6月12日造访英人慕维廉时,借用有关长发贼(太平天国)著作4册”,“翌日日记上记称:‘终日抄写’”。这时期正值太平天国的一派迫临上海近郊,上海消息混乱。中牟田原于5月27日与高杉一同往访慕维廉,高杉购得前面提及的《上海新报》(载有太平天国的消息)、《数学启蒙》、《代数学》等。中牟田也求得了书籍,并作为日前(25日)慕维廉赠书的答礼还赠了扇子和彩色版画云云。这是中村书中叙述的情况。慕维廉赠给中牟田的书是他的什么著作,没有具体记载。不过,在其他引用的中牟田《航渡上海记事》有关中牟田于上海求得的地图、书籍目录中,看到有慕维廉的著作《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所以,所馈赠的谅必是《地理全志》、《大英国志》(文久元年已出有训点翻刻本,见后文)之类。或者,在高杉的“求得《联邦志略》等书而归”一语中的“等书”中,是否也有《地理全志》呢!

高杉、五代和中牟田之所以访问常居基督教堂的慕维廉,当然,不能认为是为了追求基督教这一宗教(当时它是国家的禁教)。和他们同时航抵上海的纳富介次郎,在所著《上海杂记》(昭和二十一年全国书房《文久二年上海日记》中收载)中提到,他们曾两次撵走来访他们住处、欲送圣经的中国学生。仅此一端,也可得知,他们并不是想寻求国家所禁止的基督教。当时的教会拥有印刷所,于印刷出版旨在宣传基督教所需书

籍的同时，也出版教士撰写的启蒙性质的西洋学术知识著作以及报纸杂志之类的读物（处处插入传教词句）。因此，不能不认为高杉等人是为了寻求新知识（及情报）才频频出入教堂的。

5. 《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书

若从给予我国以刺激或影响的角度来谈有关世界地理和地志的汉文著作的话，那么恐怕就必须以《海国图志》为第一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海国图志》不仅单纯传播地理、地志知识，它同时也传播了针对当时拥有精锐强大军事力量——军舰和大炮，咄咄逼向东洋的海外各国进行防卫上的战略用兵研究。那时，我国正逢培理和普提雅廷^①来航沿海；同时又受到哈里斯强硬外交姿态的刺激，海防议论趋于活跃。另方面，激于鸦片战争败北之愤，将其实际经验引作教训而由魏源执笔撰写的《海国图志》，连同几乎是由他同时写成的《圣武记》，都是带有具体性质的海防论，因此对我国多有启迪之处。^② 但《圣武记》主要记述的是清朝迄今为止讨伐镇压边境民族叛乱或海盗集团及宗教集团盗匪活动的“圣上”武勋，不能说它是有关海外诸国地理、地志的书。不过，因为在武功的记述之后，作为附录载有《武事余记》，其中有对应史实所采取的用兵战略。这一部分也是我国当时海防问题的参考所需，有其裨益之处。

^① 培理(Matthew Galbraith Perry)，美国海军军人。1853年率东印度舰队抵日本浦贺，向幕府提交美总统亲笔函，迫使日本开港。翌年又来，缔结日美亲善条约。普提雅廷(Putyatin Vasilievich)，俄国海军提督。1853年航抵长崎，1855年缔结日俄亲善条约，1858年缔结日俄友好通商条约。——译者

^② 在北方虾夷地区已经有俄罗斯人出没。[日]宽政九年(1797)大原左金吾的《北地危言》(我藏的是明治二十一年东京日日新闻附录本，福地源一郎序)记述了此事。另外，在警惕俄国、英国船只迫临我沿海的气氛中，天保九年(1838)古贺侗庵撰写了《海防臆测》(拙藏有明治十三年活字本，山县有朋等序)一书，吸引了社会视听。到了嘉永年间，英船、美船航来我沿海，当局发出严防的敕谕，而盐谷容阴的《筹海私议》(拙藏本为“容阴迂夫未定稿”，柏原藩主田村久长的抄写本)问世。嘉永六年(1853)培理来浦贺，普提雅廷来长崎，这时藤森天山(弘庵)的《海防备论》(拙藏为抄本，有嘉永六年的跋语)问世，此书有的地方也给众人带来了巨大刺激。不久哈里斯到来，提出了缔结通商贸易条约的要求，这时海防论便已成为现实问题了。

所以,当时我国翻刻的三种《圣武记》(见后文)都是这一部分(在丛书中还有一部未加训点全按原本行文翻刻的)。同样,《海国图志》也是我国论者热衷的话题,但多数人视为问题来对待的,不是记载世界各洲各国地理、地志的本文,而是开头的第1卷《筹海篇》,亦即含有战略、战术意义的海防之策的论述部分。最初于嘉永七年(1854)翻刻的该书也是这一部分。以后,可以称作《海国图志》本文的地理、地志记述,才陆续经数人分别按洲别或国别训点翻刻;还有杂以日文字母翻译出版的。于是,世界各国的情势也同时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

大庭脩的《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籍研究》(昭和四十一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一书的“资料篇”,主要是汇集了幕末时期长崎交易所记录中国书籍输入名称、部数、买进价格及投标价格等项的账簿。在记载中,《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比其他书为多。这些书大都被幕府的高层官员“老中”^①等买去;而《海国图志》除“老中”外则被江户城内的“红叶山学问所”和“昌平坂学问所”买去。据此可知,我国是把这些书看作重要书籍的。尤其像《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输入书籍,价格总在上涨。据大庭氏调查,《圣武记》在弘化元年(1844)开始进口,担任老中的阿部伊势守购进时是25匁^②;而安政六年(1859)6月投标,启太郎书店以160匁3分中标。《海国图志》也是这样,在嘉永四年(1851)开始进口时的价格是130匁,但据安政六年七月的投标记录,则是启太郎书店以436匁的高价中标。从这一点看,也证明了这些书是人们竞相阅读的书。

著者魏源(字默深)的身世,见于《清史稿》(列传二七三“文苑”三)和《清史列传》(卷六九“儒林”下二),他以学者和著述家知名。另外,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将魏源列入“作史学

^① 老中,幕府时代直属于将军的总理政务长官。——译者

^② 匁,旧时日本货币一两的1/60。——译者

家列传”中。这是根据魏源的著作,将他列入历史学家的吧。早在他应试举人时,试卷感动了皇帝(宣宗),因获赏而闻名。这是《清史稿》和《清史列传》都记载着的。他很早就成为名士,后为贺长龄(江苏布政使)所招,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亦即对国家社会有用清朝人士论文的汇集(魏源代贺长龄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尔后,撰写了《圣武记》、《海国图志》,名声日益提高。最近,把他视为思想家的人也不少。人民中国建国以来,侯外庐在所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把魏源看作是清末的启蒙思想家,即是说,魏源的政治思想具有进步性质,并引魏源著作中的话来证明他的政治思想是最早的“变法”和“维新”的思想。此外,冯友兰的《魏源底思想》(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收载)一文,对魏源的思想作了阶级分析,认为他出身于中途没落的无权地主阶级,由于他重视商人的经济力量,他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开始崩溃,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开始出现。他不以固定不变的书本记事为依据,而是尊重来自变动的现实经验的知识,对于历史和政治着重在“变”上,是一位持有不同于一切封建社会传统思想见解的“变法”论者,是中国历史上大变动时期出现的进步思想家。

此外,石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1957年,北京三联书店)中,采录了《海国图志》序言、同书第一卷《筹海篇》、《圣武记》序言、《皇朝经世文编》序言,列举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参考文献。^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中也选载了《皇朝经世文编》序言、《海国图志》序言和《古微堂内集》中的《默觚》(十二条),列为近代哲学史参考文献。

梁启超在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说道:“魏氏又

^① 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的《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1963年,中华书局)书中,也首先举出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序,此外还有他的《圣武记》序、《海国图志》序及《图志》中的《筹海篇》(一)议守上、(二)议守下、(三)议战、(四)议款。

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据《饮冰室文集》卷六。——译者)。西乡隆盛和《海国图志》有何种联系,眼下手头尚无资料^①,但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均都读过《圣武记》、《海国图志》,这一点见于他们的著作中,看起来好像受过某种“刺激”。然而这是间接性质的,果真起到了与明治维新相关联的作用吗?还是个疑问。

《省讐录》(木版日式本一册,明治四年胜海舟序)是象山出狱后,于安政元年(1854)4月追记的自己在囚禁时长达七个月的狱中反省和感慨的著作。是用汉文撰写的。这里看一看其中涉及魏源及其著作的地方:

“先公登相台,嗣管防海之事。时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予感慨时事,上书陈策^②,实天保壬寅(1842)十一月也。后观清魏源《圣武记》,又感慨时事之所著。而其书之序,又作于是岁之七月,则先予上书,庶四月矣。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引文据岩波书店1944年版,第97页。——译者)

就以上看来,由于象山说到二人一面生于不同国家,一面又同时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意在对魏源寄以同志的好感。可以把这一点说成一种刺激也未可知。尽管如此,仍可知象山并未受到《圣武记》的影响,象山在海防策上和魏源见解不同之处也显然存在:

“但魏云,自上世以来,中国有海防而无海战,遂以坚壁清野,杜绝奸,为防海家法。予则欲盛讲炮舰之术,而为邀击之计。驱逐防截,以制贼死命于外海。是为异耳。”(同前书,第97页。——译者)

但在其他问题上他也举出了相同之点:

^① 查阅了《大西乡全集》(大正十五年—昭和二年,平凡社)3册,未发现隆盛和《海国图志》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梁启超的误会吧!

^② 又拙藏中还有象山论海防策的抄写本1册。

“嘉永己酉(1849)冬,来江都(中略)其在江都日始获魏氏之书而读之,亦欲内地设学,专译夷书夷史,了悉敌情,以补于驾驭。是又其见之与予相符者”。(同前书,第98页。——译者)

这里所说的“魏氏之书”,从所引用的字句看,应是《圣武记》卷一二“武事余记”中的一节。但象山也读过《海国图志》,他说过以下的话:

“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居首。魏氏海国图识中,辑铳炮之说,类皆粗漏无稽,如儿童戏嬉之为。凡事不自为之,而能得其要领者无之。以魏之才识,而是之不察。当今之世,身无炮学,贻此谬妄,反误后生,吾为魏深惜之。”(同前书,第98页。——译者)

象山自身是“炮学”家,并以大炮制造者自命,因此才对魏源的“炮学”无知提出指摘。

如上所述,以《省讐录》中所能看到的情况为限(我手头只有此书,没有《象山全集》),象山受到魏源的影响不是那样深。至少,关于海防问题,“炮学”家象山在阅读魏源著作之前似已有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象山的弟子吉田松阴又是怎样看待魏源的呢?下面且根据《松阴先生遗著》一书来看看。

6. 松阴与魏源

佐久间象山《省讐录》中,有胜海舟的序言。据序言说,《省讐录》是象山身遭厄运之际(指安政元年松阴想乘来航日本的培理军舰偷渡美国而被捕,这时象山也遭牵连被捕入狱),在狱中执笔的。原稿藏在箧底。其子恪(二郎)也遭连累,但在颠沛流离间仍护守这份遗稿。最近携(此稿)以示余(海舟),因资助其付梓,云云。海舟之妹是象山的正妻(序言有云“余姻亲象山翁”),因有这等关系,海舟出资援助。到了明治,始得印行。在这篇序言中,海舟盛赞象山是“唱开化日新之说”的先觉者。然而,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却批评说:“学问渊博,多少也有一些见地,但总嫌

他吹嘘，令人困惑”(《冰川清话》)。由于是姻亲，才故意这样坦率直言也未可知。不过，在象山的有关《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的言论中，也不是看不到说大话夸海口的毛病。

松阴学习魏源之作甚为热心，就当时日本代表性的海防论者来说，他是魏源论调的仿效者，但又对魏源严厉地提出诘问。

嘉永三年(1850)松阴在《西游日记》(九州旅行日记)中记载说，9月15日在平户访问叶山佐内(平户的儒学家)，借《圣武记附录》4册。这四卷本的《圣武记附录》是日本的翻刻(木活字)本，我现在也藏有此书，但无翻刻者的姓名。因为是木活字本，所以没有加进训点。松阴最初看到的《圣武记》，我想或许就是这一翻刻的附录部分吧！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那以后，松阴几乎每日都贪婪地阅读《圣武记附录》，并且做了摘录。

9月15日，日记上记下了在叶山家借了《圣武记附录》。翌16日又记下“再到叶山宅阅读《圣武记》”。17日也写着“到叶山处，读《圣武记附录》”。作为“书中佳句”，从该书中摘录下了他所喜爱的地方。18日又读该书，摘录“佳句”；19日也是阅读和摘录。从21日起，借《阿芙蓉汇闻》(盐谷宕阴编)，详细抄下该书目录，并作了摘录。似乎把《圣武记附录》的摘录工作停了下来。但是，在24日、25日又双管齐下，阅读和摘录了《圣武记》。从26日起，还借了《经世文编抄》(翻刻本，后详)乙集，抄写了该书目录，并做了摘录。28日记有“《阿芙蓉汇闻》七册毕业(读完)”。顺便插一句，《阿芙蓉汇闻》是以抄写本流传的，仅知这一书名的我未睹其书，但通过松阴的这一详细目次和摘录，我已能够知晓该书的大体了。^①

《阿芙蓉汇闻》虽已读毕，但《圣武记附录》还在继续进行。10月12

^① 又据宕阴之孙盐谷时敏(青山)编《宕阴先生年谱》(大正十二年盐谷温发行)载称，《阿芙蓉汇闻》7卷是弘化四年宕阴39岁时所辑。文曰：“此前，清国有鸦片之乱。先生谓，剥肤之渐(日本也将渐次迫临危急)不可不备。因辑《阿芙蓉汇闻》七卷。长州、萨州、西条、佐仓等藩均遣人抄写，以资鉴戒云。”(原为汉文)由此可知当时各藩认为清国的鸦片战争说不定迟早会波及我国命运，竞相抄录以作“鉴戒”。

日仍记有：“于叶山处读《圣武记》”。同日还记道：“询问是否一斋先生也有此书抄本，铠轩（叶山佐内的别号）答曰，未听说。只缘每本书页上下及栏外彼之记语及附条甚多，并处处夹有纸片，标出所需之处。因此，阅读铠轩之书者亦多仿效。”由此可知，佐藤一斋（幕府时代教授儒学的官吏，昌平黉的教授）也写过附语，加过附笺而精读过此书（叶山佐内是佐藤一斋的门人）。16日仍继续“于叶山处读《圣武记》”。是何时读毕的，不甚清楚，但同日借了《先哲丛谈》，以后即开始了《丛谈》的摘录。另外，松阴这次旅行中，还在长崎借到过高野长英的《梦物语》（梦的故事——译者）以及写鸦片战争的《隐忧录》和清朝陈炯的《海国闻见录》，照例将《海国闻见录》的目次抄录下来，并做了摘录。此书未经翻刻，根据大庭氏所编的《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籍研究》一书，它以部数相同于《海国图志》等的程度输入我国。看来此书也是给予松阴以海外知识的书籍，现在我也藏有一部（道光三年重刻），共二册，一册是文章，一册是地图。

翌年，嘉永四年（1851）8月，松阴自江户致叔父玉木的信上说：“8月22日晨，参加山鹿会^①；傍晚，参加《圣武记》研读会；薄暮归家。”他和一些志愿者共同研读《圣武记》，这说明他仍在继续进行该书的研究。安政元年（1854）12月，在致其兄长的信中，对于当时闻名的会泽（正志斋）所著《新论》和盐谷（宕阴）所著《筹海私议》，他写道：“即令询问此二人如何制造军舰，亦所不知”。他这样首先批评了光是议论和意见无补于实际。接着又说看到了盐谷宕阴的上书，针对所陈向荷兰购买军舰和大炮之策一节，他评贬说：“造舰不如购舰，造炮不如购炮云云，此乃清人魏源《圣武记》中之说。（中略）今人所谈购求之策，悉皆仿效魏源论调”。松阴的这种非难姑且不论，在这样的指摘之中，却反映了他当时对魏源著作的广泛阅读和研究。而且可知，由于同已经提上具体日程的海防问题相

^① 山鹿会：即山鹿素行（1622—1685）研讨会。该氏为江户前期之儒家、兵法家，江户时代兴起的“国学”开山祖。日本旧兵学有两派：北条派及山鹿派。

关,魏源的政策和用兵战略给了松阴以甚大影响。

然而,也有针对魏源的议论而提出反对的地方。松阴的《野山文稿》中,有一篇用汉文写的《读甲寅囉顿(伦敦)评判记》(安政二年),说过下面一段话(原汉文的意译):

“清人魏源,喜谈外国事情(以下指《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三)‘议战’的记载),据谓,俄罗斯与美利坚、法兰西皆恶英吉利,故宜接受其水陆援助。(对此)援古引今,举示确凿之据。然依我之见,此盖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接下来,松阴陈述自己之见解如下。他说,大凡夷狄作风,见利而不见义。苟有利,敌仇亦可结盟;苟有害,同盟亦成敌仇,此其常也。“今读此记(指《囉顿评判记》),俄罗斯与土耳其开衅,英法诸国合谋助土拒之。然则俄英之交恶,正如源之所计,而英法合谋则出乎其计之外。且源对美利坚诸国之态度,亦复不知如何。”这样,在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上,他指出了魏源的不当之处。

松阴还在题为《读筹海篇》(指《海国图志》首篇)的文章中,提出更为根本性的疑问来。这是安政二年5月用汉文写的(收载于《野山文稿》)。松阴文章中明确针对着《筹海篇》的“议守”、“议战”及“议款”,一方面大加推许说,清国若能悉加采用,则不待说不仅能挟制英国,也能制御俄国、法国;一方面又说:“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 (由此起)未曾三四年,广西之民变(指太平天国革命),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致北京危殆不守,其所底止,尚不可知。即清之所宜为患者,不在外夷而在内民。默深对此,何以一言不置耶?”对于国内大事件、大混乱愈益加剧的内部状况,该书不见有任何考虑,松阴对此提出疑问的同时,带有责备的口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松阴当时对“太平天国”事件也深为关心。安政二年(1855)松阴26岁时,在野山狱中,以《清国咸丰乱记》为题,根据抄本翻译了一位乘培理军舰抵日的清国人士传来的最新“太平天国”情报(由初始到当时的经过)。只是,松阴在例言中关于该书原

本的问题说道：“不知何人所著，亦无书名”。我曾根据自己收藏的抄本书籍，对松阴所据稿本的笔者及其传来经过稍稍做了一些较详的考证。顺便也就松阴的这一译述，大致达到何等程度一事稍稍做了一些检查（见《〈满清纪事〉及其著者——关于我国所传的“太平天国”》，昭和四十七年《鸟居久靖教授华甲纪念论集》收载，本书重载）。

又，前面援引的松阴说“此书之出版为道光二十七年”一语，说明了当时输入日本的《海国图志》是同年出版的 60 卷本（我藏有该版的影印本）。《图志》的原刻本是 50 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出版；增补的该书是 60 卷本。以后又加上咸丰二年（1852）的增补，出了百卷本。^①

安政元年 11 月，松阴在他致其兄长的信中说：“《海国图志》一卷，日前拜用分抄完毕”。又说“再者，林则徐、魏源二人皆为有志之士，终成通晓蟹行书籍（横写文字的书籍）之人。亟须劝勉（我国）有志之士习蟹行书，以著述斯类好书，尊意以为如何？”于赞赏《海国图志》为好书的同时，劝勉我国有志之士攻读横书文字，殷望能著述这样的好书。但是，松阴以为林则徐和魏源是通晓横写文字之人，这是误解。在《海国图志》中的印度、欧洲、美国等部的卷首上都分别标记着“欧罗巴人原撰、侯官林则徐译、邵阳魏源重辑”字样（也有单标“邵阳魏源辑”的卷头）。看到这一点，大概就以为林则徐和魏源通晓外文了。

作为《海国图志》之基础的是林则徐译的《四洲志》。魏源在该《图志》序言的开头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引文据该书原叙。——译者）由此可知，《海国图志》中的“欧罗巴人撰、林则徐译、魏源重辑”的部分，是以《四洲志》为依据的。《四洲志》业已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再补篇”中，尽管该《丛钞》的特点是略写本，从

^① 我收藏的百卷本，是载有光绪元年左宗棠叙言的重刊本（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而 60 卷本自第 53 卷以后，百卷本自第 84 卷后，都是枪炮、船、炸弹、望远镜等物的制法，或为地球天文（甚至有 5 卷之多）等类的东西占据了篇幅，以及为海防、备战所做的记述。

前也一度想把它和林则徐所译部分对照比较看看，但因手头没有《舆地从钞》的这一篇章，迄未实现。因而《从钞》的序言之类文字也未看到，所以，关于和《四洲志》的关系问题，我目前不能说什么。

但是，林则徐并不是直接翻译的，而是授命通晓外国语的什么人译的，可以认为仅是署了林则徐的名。中国大官在任期间发表的著作，大抵如此。特别是这个场合，可以认为是林则徐作为外交军事的最高负责人，为了和外国对抗而收集的“情报”之一种。魏源也在《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提到：“林则徐自去年来广东，日日遣人探侦西事(西洋事情)、翻译西书(西洋书籍)，又购入其新闻报纸”。所谓“魏源重辑”，也是序言上所说，根据“近日之夷图夷语”加以补充的。应该认为“夷图夷语”也是利用魏源左右之人所提供的资料。即使看一看林则徐和魏源的年谱或他们自己写的东西，也找不到他们学习过欧洲文字的迹象。只是，此书从“蟹行书”中取用的材料甚多。这一点由下引魏源序言中的说法得知：“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譚西洋也。”(引文据《海国图志》原叙。——译者)

7. 鸦片战争与《道光洋艘征抚记》

正如前引《丙辰日记》中所见到的情况，松阴每日那样从事摘录，极其仔细地攻读《圣武记》，但他大概并没有看到这部书的第10卷《道光洋艘征抚记》。我认为这是因为松阴虽然攻读《圣武记》，但所依据的是仅将其中的《武事余记》部分翻刻过来的日本版。即便说他见到了原本《圣武记》，当时进入日本的《圣武记》，也是未将该书第10卷末尾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亦即处理鸦片战争部分加入在内的《圣武记》。

话虽稍嫌琐细，但这项涉及鸦片战争的第10卷末尾部分，据认为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第三次重订本才开始加进去的。可是我所收藏的《四部备要》本(《四部备要》为中华书局战前出版的丛书，公认是集佳著

加以翻印之书)《圣武记》6册,是“据古微堂原刻本”印的。目录之后有附言,谈到了种种修订的地方,并说此系“第三次重订本”,最后有道光二十六年的纪年。尽管如此,却没有《道光洋艘征抚记》亦即鸦片战争部分。另一种1936年出版的世界书局版第三次重订本的《圣武记》,则收入了这一部分。世界书局版根据的是何种版本尚不清楚,但清朝末期,上海申报馆曾出版此书,所以我想世界书局本恐怕是根据申报馆版本所印。眼下我无这一申报馆版本,但手头有关于该馆出版的图书解题小册子《申报馆书目》,其中有光绪五年(1879)的序言。不待说,该馆的《圣武记》是在这年之前出版的。这一《书目》(正、续二集)的续集载有《圣武记》的解题,据称,《圣武记》“虽30余年来流传于世,仍以有所避忌,竟将《道光洋艘征抚》之两记(上下两记)强行删汰。云云。”然而,解题又说:“兹据该书原本将此刊出”。所以说,《四部备要》所据“古微堂原刻本”也和上面的一样。当时世间流传的《圣武记》中《道光洋艘征抚记》似是被删掉了。

当时对惨遭失败的鸦片战争的谈论,关系到中国的面子问题,我想是因此而加以避忌的吧!^①(是谁“强行删汰”的?此事不明)但如果《圣武记》的这一部分传入我国的话,则是属于燃眉之急的教训资料,毫无疑问,这一部分会迅速被翻刻的。当然,翻刻出版也要官府允许,尽管结果难以预料(斋藤竹堂(馨)写的《鸦片始末》被禁出版,以抄本流传。我所藏的该书也是嘉永三年的抄本。昭和十二年始得印行),但至少也会以抄本流传的,而现在却是不见它的踪迹。

锁国时代的海防之策也罢,清朝政权的武功也罢,现在对我们几已引起不起兴趣。但是,鸦片战争是世界史的问题,至少是东洋历史的大问题。在中国,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近代”的觉醒。对于我国也可以说,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迫使我国缔结通商条约

^① 也可以理解为,造成悲惨结果的鸦片战争的责任者依然在世,作为在朝的达官显贵依然拥有权力,因此而有所忌惮。

的美国使节哈里斯,于安政四年10月在首席老中(江户时代直属将军的幕府最高官员。——译者)堀田正睦府邸中,对聚集的幕府首脑们做了重要演说,说他自身从香港英国总督听到,英国乘制服清国之余威,随后就要把鸦片运来日本。如遭拒绝,停泊香港的军舰会被派来日本。吃惊的幕府终于不得不踏上开国之路,从而决定了以后日本的方向。哈里斯当时在堀田府邸中的威胁性演说,被作为《美利坚使节声明书》,以抄本广泛流传,我也收藏有数种。木村芥舟(幕末时期的军舰奉行,即管辖军舰的长官、海军所首长)所著《三十年史》(明治二十五年,交询社)中也收载了这一声明书(大隈重信的《开国大势史》也引用了它)。胜海舟的《开国起原》(明治二十四年,宫内省)也收载了它。又,内藤耻叟的《开国起原安政纪事》(明治二十一年,东崖堂)也大体记载了它。最近重印的吉野真保所编《嘉永明治年间录》上卷(昭和四十三年,岩南堂)也收录了它。如今,以活字印行的并不鲜见。哈里斯的这项演说和幕府的反应大概尤使攘夷派震动。我所藏抄本的一种,就是梅田云滨送给大和十津川的同志的(那是明治十四年十津川山崎村一位名叫玉田音吉之人抄写的)。

福地樱痴^①在《幕府衰亡论》(明治二十五年,民友社)中说道:“10月26日(哈里斯)前往堀田阁老府宅,演说约历六小时,论锁国之不利,言开国之必要。(中略)引证之实例远至西洋,近及清国,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之辩才发挥其说。聆听此种实际政治议论,姑不论堀田阁老,即就幕府之俊秀而言亦属有生以来初经之事,是以更为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如迷梦之初醒,(中略)可知,后来执开国之策为国是以应百难之精神,乃吃此哈里斯演说之一棒喝故也。”

中根雪江^②的《昨梦纪事》中也说,“试听当时莅会之人日后所语”,于

^① 福地樱痴,即福地源一郎(1841—1906),明治时期著名报人,曾任《东京日日新闻》主笔,还著有《怀往事谈》等。——译者

^② 中根雪江(1807—1877),名师质,通称勒负。幕末政治家,所著《昨梦纪事》、《再梦纪事》、《续再梦纪事》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史料。——译者

是道出了出席人的话。他写道，堀田阁老只顾“眨眼叹气，畏缩不振”，几乎没有发言的人。用现代口吻说，当时哈里斯的演说对我国来说，确实是“历史上决定性的瞬间”，从那时起，日本即坚定了向新时代迈进的决心。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确实是一桩前所未有的大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甚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有《鸦片战争》资料6册，其第6册载有《鸦片战争书目解题》，1954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版)，其中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就被《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荣孟源重编，1954年北京三联书店版)首次加以收录，这当是为了便于利用而编入的吧！附带提一句，《近代史资料选辑》是荣孟源把1940年出版于延安并自那时以来各解放区翻印使用的书加以内容取舍改编而成的。这一点见于此书的“出版说明”。

我在谈及鸦片战争的时候，如今也还有时要根据梁廷楠的《夷氛闻记》连同这部《洋艘征抚记》来确证一下史实关系。但是仍有必要并用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1955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此书参照《筹办夷务始末》及其他多种资料，校订了《洋艘征抚记》记述中的不足和谬误之处。姚氏在这个校订本的“前言”中说：“《道光洋艘征抚记》确是记述鸦片战争史事的第一等著作；后来流传的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记述，大都就是这篇著作的化身或缩影。”此言并非过誉。^①

关于鸦片战争问题，过于重视其起初史实本身的整体性，而想把它单独作为文化关系史来掌握，似乎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以

^① 但是，师道刚发表文章说，《道光洋艘征抚记》不是魏源之作，实是以早于“申报馆”重订本14年即同治四年出版的李德庵《英吉利夷船入寇记》(后改名为《洋务权舆》)为祖本，记名魏源，并在辗转传抄删改之中已失原来面目之书。同完全否定此说的姚薇元展开了争论。1959年5月2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师道刚的《关于〈洋务权舆〉一书》，同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12期(北京，科学出版社)发表了反驳此文的姚薇元文章《〈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问题》。师道刚又发表了答复文章《〈道光洋艘征抚记〉作者问题的再商榷》(1960年《历史研究》第4期)，论战纷起。我想，凡此一切都是由于《圣武记》后来才收入《洋艘征抚记》，因而成为种种议论产生的根源。这里已经没有具体详述这些意见的篇幅了。尽管也各有可以首肯之处，但各方都未能作出斩钉截铁的论断。

为,如果现在是以当时的记录著述和它在我国被翻刻作为中心话题,那么就此范围内来看(作为文化关系史)不也是可容许的吗?因此,在讨论《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在我国的翻刻和翻译之前(由于这些也属有关鸦片战争的著作才被翻刻、翻译的),拟就下列各端,试做介绍:将鸦片战争本身具体情况传来我国的荷兰向幕府提供之情报、中国所作记述的输入和我国所作的翻刻,还有我国人士所做的有关这一战争的著述(包括小说)。

关于我们这个邻国的对“外夷”的战争和败北,尽管只是一些泛泛不详的情报,一般说,对于锁国梦中的我国却也引起了颇为好奇的冲动,这一点的反映是,甚至出版了以这场战争为主题的小说读物。光是我收集的这种书就有数种。

8. 《鸦片传闻书》

有关鸦片战争的、当时在我国流传的“传闻书”(情报)和记录类文字,想就我目前手边持有的史料,择其主要者加以叙述。

一般说,当时的情报有通过长崎长官从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馆长^①得来而作为幕府所获海外情报的一部分流传出来的;也有从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传来的片断。编辑《阿芙蓉汇闻》的盐谷宕阴在他的“序言”(明治三年《宕阴存稿》第4卷收载)中也说:“兹据清商、兰客(指清朝商人及荷兰客商——译者)之报单札记,着力采访,积盈囊笥,颇足稽其颠末。”(原为汉文)

其中,来自荷兰商馆馆长的情报,提供了相当具体的情况。我想其主要来源是国外报纸等,所以才能够收集到广泛的情报资料。福地櫻痴讲过下列一段与此事有关的话,可为佐证。櫻痴在他的《报纸实史》(载

^① 指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机构的负责人。——译者

明治七年，民友社《怀往事谈》)中说：

“余十五六岁时尚在故乡长崎，从我师名村花蹊先生学荷兰语，学习翻译。然而，荷兰人年年来航，每次泊港辄以书面向长崎长官提出海外事件之报告，取名为《传闻书》。当时幕府盛称此举为荷兰忠诚表示之一。名村先生由荷兰商馆馆长处领取上述书面报告，每临翻译，常命余执笔记之。身居出岛(长崎之荷兰商馆所在地)之荷兰商馆馆长，用何方法为此项《传闻书》取得如斯之消息？以询先生，先生告曰：‘此者，乃西洋各国提倡报纸，每日发行，本国时事自不待论，更有刊登其他外国时事之报。荷兰商馆馆长读其报，专抄记其中之重大事件，以呈我地方长官府衙者也。’云云。”

荷兰船只进港的时候，可以为出岛的荷兰商馆带来各种海外报纸，商馆馆长可从中摘取他所提供的传闻。但是，另外有关特别事件的消息，则是巴达维亚荷兰总督送来的所集情报，这大概就是商馆提供给日本方面的东西。根据巴达维亚首脑命令提供的这些东西写成的传闻书，留传下来的很多。

我手头的现有收藏中，有题为《鸦片传闻书》的一种抄本(3册)。它逐年逐月具体详细地记述了始自300年前的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及一再反复地对鸦片禁止、私贩、严刑处理等；终于，林则徐到广东上任，实施严厉取缔，焚烧英国商人的鸦片，以及其后发生的纷扰和由开战到外交交涉，各地战争情况；最后是从实现议和到和约条文以及事后的小规模骚扰等。还把得自广东、香港、澳门、厦门、上海、新加坡等地的情报采录在内。

这种《传闻书》的抄写本(江户末期之物)，是用美浓纸(日本岐阜县美浓地方所产纸张——译者)约80张以蝇头小字书写的。对折装订为3册。内容大致是汇辑了先后4回提供的荷兰书面文字的译文。第1册开始的序言说：

乃自荷兰历(西历)1838年(天保九年)起至1849年止，英吉利

人等在清国为要求废止鸦片商法所引起之重大事件，爰为之记。

第1册后半部的开始处，也同样有序言说：“为自荷历1840年（天保十一子年）至1841年（天保十二丑年）对英吉利人于清国要求废止鸦片商法所作之记录。”

在第2册的序言中，有1841年至1842年（4月），第3册的序言中有1842年（5月以后）至1843年的纪年，并分别在序言中指称是为“特别事件所作之记录”。而以下则对事情的经过，用分项列举式进行叙述。

在这第一回提出的译文末尾，记有下面一段话：

“上述之意经雅加达（当时的巴达维亚）首脑（指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上报，并接奉指示。特此奉告。商馆馆长某某谨具。”关于该馆长提供的这些文件的翻译问题，下一行记有：“如上所示，经提请翻译，并对原书（原文）有所增添”等语。还记得有年月：“子七月”（即1840年7月），并有翻译人员的署名：“中山作三郎、石桥助十郎”。

所以说，情况是经巴达维亚首脑当局上报，出岛的荷兰商馆馆长才奉命（向长崎地方长官）提供的。由此看来，可知所谓特别情报（“特别传闻书”），是巴达维亚荷兰总督汇集上报的情况。这不限于“传闻书”，另外经“雅加达首脑（也有相当于“总督”之职者）指示”的也不在少数。

原因是，当时西方只有荷兰一国得到同日本通商贸易的优待，为此而负有提供海外情报的义务。此举原是出于防止耶稣教侵入之策的。《通航一览》第246卷《荷兰国篇》第8（大正二年，国书刊行会）有云：

宽永时期，有船长名为耶扬子者稟陈，嗣后，每年进港之时，令其呈报关于被禁黑船^①以及各外国之变乱异说等见闻之事。此后，进港船只呈交报告遂成惯例。

其下还附有注解，说明道：

^① 黑船，室町末期至江户末期对欧美各国来航日本舰船之称；锁国时代尤指大型的外国舰船。——译者

此项报告称为传闻书，历年之传闻书以载于《华夷变态》等处者为多。其动机原为南蛮邪教事所引起云云。

但是有关鸦片战争的传闻书中，并非没有可视为对锁国的日本具有启蒙之意图的东西。

顺便一提，板泽武雄著有《荷兰传闻书研究》(昭和三十四年，吉川弘文馆《日荷文化关系史研究》收载)一文，但对这部《鸦片传闻书》只字未提。同氏还著有《荷兰传闻书研究·荷兰传闻书解题》一文，载于《日本古文化研究所报告》第三种(昭和十二年，日本古文化研究所出版，代表人黑板胜美)。此文收录了自正保元年(1644)到延享二年(1745)的荷兰传闻书158种，是加有附注的史料，但没有延享二年以后的东西，因此这部天保时期的《鸦片传闻书》没有被收录进去，而且也未见这部传闻书和其他的活字本。

这里要回到《鸦片传闻书》的话题上来。在第二回的1840年至1841年末的情况报告之后，有下述译者附言：

去年应交之件，因(船)返去而未呈交。此件于本年原封交来，
兹译出奉上。

而且，翻译并未全部完结，像是因为催促较紧，半途便提交了(译件)。结果是，“所余部分，近日即可奉上。谨此。”是该船当年未停靠长崎就返航了呢，还是停靠过了，但因忙乱而忘记了提交传闻书？事情无法确断。总之，去年之件原封携回，说是今年提交的就是此件。最后，译者还附加了辩解说：

日译特别传闻书上呈一事，因催促益紧，遂日夜奋力以赴。然上述之英吉利人日记(所称日记是指按年月日书写的事件经过记录)系以荷兰语听写并记为书面者，与通常之日译件不同。兼以必须秘密上呈，限于少数人以不泄露为准，故需慎密相商，因难以求速。故译出其半，先此呈送。仍有未竣部分。云云。

并附记有“寅七月”，署有“监督 大小译员 印”。这里的监督、高级译员、低级译员的姓名，抄写本上都略去了。

是否这只限于上述这份“传闻书”，尚不清楚。但从上引文句中看到，由于这是必须秘密上呈的，所以，要由少数人分担，在不致泄露的情况下进行翻译，故无法求速。这单纯是出自官府的保密方针呢，还是为了警戒事件本身会给一般人心带来相当影响呢？

这项传闻书的后面部分，也于“寅七月”提出。附言有云：“此系先前奉上译件之末(段)，兹经译出，特奉上。谨此。”还并列有责任译者的职衔“监督、大译员、书籍日译官员、小译员”。而在最后写道：“如上所陈，经雅加达首脑人物上报，并下达指示，兹特呈上。”并由该商馆馆长署名签字。下行还有“如上所陈，译为日文，并对原书(原文)有所增添，特此呈上”，然后具名“官员 大小译员 印”，但姓名都被略去。虽没有记上年月(或系抄写时遗漏了)，但从内容看，与寅年之次年进港船只携来的并无差别，所以是 1843 年报告的译文，相当于我国的天保十四年。

上述抄本 3 册是颇为详尽的情报记录，但由于翻译人员注意到这是“密件”，做到不使泄露，据此，我想这一抄本，是关系人于事后抄写的长崎长官府衙或江户幕府收到的报告。由此看来，可知当时我国当局得到了颇为详尽的有关鸦片战争的发生、战争的经过以迄战争结束的具体情报。

此外，我还收藏有以《广东日记》(1 册)为题的鸦片战争记事抄本。但内容与前述《鸦片传闻书》完全相同，只是因为抄写人不同，所以文字上可以看到些许出入。若说不同，那便是前述之《传闻书》中略去了“新旧两位商馆长”的名字，而《广东日记》则载有二人之名。并且前者的文中只记有“监督、大译员、书籍日译管理官员、小译员”的职衔；而在《广东日记》中，则并列写出了一连串 13 人的姓名。不过，《广东日记》方面约为前者记载分量的一半，终止于 1842 年 7 月后期提供的译文，由此以迄最后的媾和部分均未涉及。

9. 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展到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其结果是中国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为他们提供了加速中国殖民地化政策的法律根据。这一战事是因所谓“亚罗号事件”，而于1856年即安政三年9月开始的。英军借这一事件焚烧袭击了广州市街。关于这些事件，较为具体地将经过情况传入我国的文件是，翌年2月开始的、由长崎长官属下的审讯官永持享次郎携同侦查员，直接听取了荷兰商馆馆长敦克尔·克提俄斯(Donker Curtius)的谈话，缮写后向幕府提出的报告文书。这报告似乎已经征询了驻香港英方当局的解释。当时，英国国会中对这种强硬行径颇多非议，其中连科布登、格拉德斯顿等有力的政治家也都激烈攻击政府当局，纠纷终于发展到逼使下院解散的地步。当时(1857)马克思(在伦敦)也介入这个问题，在《纽约每日论坛》(1857年3月25日第4970号以及4月10日第4984号，均未署名)发表了文章，严厉揭露和抨击英国的对华政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5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但是，就我们日本人来说，特别注目的是这个商馆馆长谈话的后半部分，其中含有荷兰政府的指示，对我国幕府提出了重要劝告。

该馆长借口英国焚烧、侵袭广州事件，指摘幕府动辄采取轻视外国的自大自尊态度，这种情况在外交文书上也有所显示，引起了对手国家的不愉快。并且一味拘泥于小事而拖延谈判，这不符合世界一般外交常识。这未必引起像这次广州事件那样的大事情来。贵国虽不能说就像中国那样弱，但打破了太平，贵国并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娴熟于军事，所以劝告“关于此次清国之事，勿以事属他国事件而不予置理，望加明察，审慎对待，预有准备。”

这时恰逢哈里斯来航我国，强行要求面见老中，晋谒将军，呈递国书

等。国论对此众说纷纭，幕府处理困难，唯有迁延时日多方敷衍之一途。因此，幕府对荷兰商馆馆长的这项劝告颇为震惊，似乎有所反省。首席老中、总管外交事务的堀田正睦签注了意见说“万一炮声一响，挽回困难，故(中略)……迄今已有变法之举，并应严加规戒，制定长久对待之策”，将馆长的谈话报告书分送“评议所首席、海防负责官员、长崎长官、下田长官、箱馆长官”，并嘱“一如既往之措置，宜慎加析辨，务须深思熟虑，尽速调查呈报”，这样命其对这项劝告进行评议。此外，在我收藏的载有这份文件的抄本中，写有“安政四年，已2月24日即呈佐仓候(堀田正睦是佐仓藩主)，本件转评议所，副本转监督”。这一文件要“即呈”外交最高负责人堀田，可以认为这足以表明事件的重要性。

对此，松平近直(河内长官)、川路圣谟(左卫门尉)、水野忠德(筑后长官)等人联名呈报说“英人烧毁广州一事，遂照旨意(指堀田所附意见)已行评议，呈上记录。”并且说，“重蹈广州覆辙，事属难卜”，所以“变法之举，并严加规戒，制定长久之策实属可行。”评议者们呈报了这一意见。此后，即决意“变革迄今之法”(由锁国而友好通商)。于是有哈里斯的谒见将军、呈递国书、哈里斯在堀田府邸对幕府首脑们的演说、哈里斯在蕃书调所(江户时代幕府专设的洋学学校——译者)的寓居处与幕府要员(信浓长官井上清直、肥后长官岩瀬忠震)的对话(关于条约的具体细目问题的折冲交涉)等，出现了我国外交急转弯的局面。

另外，我的收藏中还有《墨夷使节对话书》抄写本3册，据载称，安政四年11月6日土岐赖旨(丹波长官)、川路圣谟(左卫门尉)、鹈殿长锐(民部少辅)、井上清直(信浓长官)、永井尚志(玄番头)等幕府要人，“日前(安政四年10月26日)于备中守(堀田正睦)宅中，聆听传达，同时涉及条款问题，垂询敝等众人。备中守指示后，仍听取详细意见。”这说明了在去哈里斯住宿的蕃书调所缔结条约之际，对海外各国的情形进行了咨询，详细听取了各种细事末节。

其后，自同年12月11日开始，到次年1月12日止，前后历经13回，

我方负责人井上(信浓长官)和岩瀬(肥后长官)前往蕃书调所,就哈里斯提出的条约草案一一详尽质疑对话,重复再三,进行研讨。详细记录这一情况的是所谓《对话书》,成为井上、岩瀬二人联名的报告文书。

前述及的荷兰商馆馆长克提俄斯的谈话报告,以及在那前后的公文函牍等,收录在我所藏的题为《外夷珍说杂记》也可以称作“幕末外国关系史料汇编”的抄本中(美浓版本 12 册,或为明治初期编辑、誊写的)。特别是这个谈话在《大日本古文书》中的《幕末外国关系文书》第 15(大正十一年,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和《幕末维新外交史料集成》(昭和十七年,维新史学会)等书中引用了它。《维新史料纲要》卷二(昭和十二年,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上,也在安政四年 2 月 24 日的条目中写道:“鉴于清英两国在广东(清国)的纷争,幕府有变革外交措施之必要,因命评议所首席、海防负责人及下田、长崎、箱馆各地区长官加以审议”,举出了有关此事的许多引用史料(抄本类)。当时这一冲击性的商馆馆长谈话似成为广被流传的东西了。

我所看到的将商馆馆长的谈话和堀田正睦的“意见”同时并载的文字之中,有内藤耻叟的《安政纪事》(见前)和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见前)。特别是在《安政纪事》中,于举出了商馆馆长谈话和堀田“意见”之后写道:“于此,贸易友善之议遂决,幕府中议论已定。”但是,幕府中的议论虽定,民间致力于国是之士的舆论却并未统一,各藩之间锁国攘夷的议论也莫衷一是,继续纷争。不过,幕府毕竟下了变革外交的决心。就这样,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点的“亚罗号事件”而开始的英国军队“广东烧掠”,遂成为迫使我国历史迈入新阶段的契机。

关于鸦片战争(第一次)问题,从作为被害者一方的中国立场出发写的读物,并传入我国以抄写本被广泛阅读的有《夷匪犯境录》(不分卷)。它是谁写的?通过什么途径传入我国的?如今尚不知晓。此书作为撰写鸦片战争的读物,在我国虽然知之者甚广,但在中国却并未得到流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鸦片战争》资料第 6 册所载“鸦片战争书目

线，并且处处有标注，并作了文字上的修订。4 册本上有“冥冥洞”的藏印，但究属何人藏印则不得而知。2 册本盖有“诚之馆藏书”以及“福山兵学校印”的朱印，原是备后^①福山藩校“诚之馆”的藏书。大概由于藩主阿部正弘一个时期曾是幕末的首席老中，也是关注对外关系并指挥这方面实务的人物，所以让藩校收藏这种书籍，使家臣进行研究。除了加注句读训点，在地名、人名之外，对官职名称也画了旁线，处处有标注和误字订正等等，这和前述 4 册本相同，但 2 册本有更多的送假名，并且标注也更加详细，错字脱落的改订也多。

还有，这部 2 册本对正文中出现的难解词语，在其旁或上方空白处给以种种解释，可以看出曾经认真仔细研读的痕迹。这好像是藩校的儒者或军事海防现役人员、研究人员等精读加注的。但是，把“冒昧”解释为“冒死”，“码头”解释为“市场”，“中堂”解释为“县令”等等之类，这是煞费苦心之下的错误，怪诞的注释也不少。

《夷匪犯境录》不是按年月顺序记述鸦片战争的发展过程，无序言，无跋文，也无编者的名字。它一开始就从 1840 年 7 月英国海陆军的进击部队指挥官联名向定海县令发出劝降书叙起，而且，其后的部分也主要是收录了战争中的文件、文告等资料，如上级政府当局的一切命令、地方官吏的报告、或负责部门各官员送呈皇帝(道光)的奏折、皇帝的谕示、官府的布告以及英军方面对地方居民发布的文告、中国人民志愿抗英者的檄文、英军与中国方面的来往公文、中国有识之士的“平夷献策”文等等。其间还处处夹杂了英军俘虏的口供、中国军事指挥官勇敢作战而献身的陈化成的传记以及登陆英兵暴行等记载。然而主要还是官方文件、文告的记录。可以据此而知其具体情况和演变过程。最后是以 1842 年的媾和条约为结束，但拙藏的 4 册本则缺少这一部分。

来自荷兰商馆馆长的报告，恐怕只为一部分当局人物及其关系人员

^① 备后，今广岛县部分地区。

活字印本”和“江户时代抄本(不分卷)”这样的印本和抄本两种。并加说明称：“对鸦片战争发生之叙述，我国抄写本多所流传，木刻活字本近来流传较少。”但是，所谓“发生之叙述”一语则有错误。因该书欠缺“事件发生”部分，而是骤然开始于英军向定海县令发出劝降文告，最后叙述到讲和条约。所以这个解说好像是没有细读该书内容而写就的。

《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大正三年)的“杂史”部分中记载有《夷匪犯境录》(安政四年出版)6册^①。《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昭和五年，静嘉堂文库，代表人诸桥辙次)的“杂史类”中，标出有《夷匪犯境录》，下面用小字写着“3卷，附《夷匪犯境见闻录》3卷”、“缺撰写人抄(本)”，册数成为6册(附带一提，此书为中村敬宇的旧藏)。这虽是抄写本，但如果它是以木刻活字本为依据的话，那么恐怕是从中国传来的鸦片战争的记录《犯境录》3卷，加上“附”有秋月种殷撰字样的把我国嘉永、安政年间与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文件辑录起来的所谓《犯境见闻录》3卷(是各不相同的两种)合并刊出(6册)的了。

10. 《夷匪犯境录》与《鸦片始末》

我收藏的《夷匪犯境录》的抄本二种之中，一种是4册本，一种是2册本。内容虽然相同，但4册本和2册本相比，末尾部分稍有欠缺。2册本用蝇头小字密集书写在薄纸上，册数虽只一半，但内容却稍多。最早原本是不分卷的抄写本，所以也有5册本《岩瀬文库》、3册本《尊经阁文库》等情况。且说拙藏的二种，都注有句读训点。地名、人名等画有旁

^① 在昭和三十一年修订的《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中，订正《夷匪犯境闻见录》为6卷，“安政四年印行(木刻活字，高锅藩版)”。高锅藩明伦堂刊行《夷匪犯境闻见录》(木刻活字本6卷)，是根据已故小汀利得旧藏本，于昭和四十九年作为《和刻本明清资料集》I，由汲古书院影印出版的。据长泽规矩也氏的解说，东京都中央图书馆(旧日比谷图书馆)所藏的特别收购文库中有校注本、校订本、异本及钞录本。还有野本理的《犯境录评注》(明治十七年抄)、渡边鷗舟的《读夷匪犯境录》，但都是抄写本，为已故中山久四郎氏的旧藏。

评“论”的，是斋藤馨（号竹堂，字子德）^①的《鸦片始末》（汉文1册）。该书有弘化元年（1844）6月斋藤拙堂（正谦）的跋语，其中有云：“叙事简括，远胜阅读汉、兰（荷兰或西语——译者）。立论尤为剀切”（原为汉文）。其次是同年9月平启（佐久间象山）的跋语：“当今天下之可畏者，莫大于外寇；而戎备要领，莫先于知彼。（中略）而世人昏愦，稔知此义者鲜矣。独子德对此勤勉有加，著为《鸦片始末》，藉为知彼之资。其识见之远，非仅能文之士所可比拟”（原为汉文），这是把此书视为知彼（外国）并探讨我（日本）军备的良书了。此外，还有弘化二年神田充的跋：“岂属他人之事耶！”（原为汉文），更附有同年村瀬聚的跋：“边防必须严整”（原为汉文）。皆都是以鸦片战争为借鉴，申述我国应严格加强防务。此书以这样的时势为背景，从而被广泛传抄。

安积艮斋在为竹堂的《读史赘议》撰写的序言（嘉永六年）上说：“学生（昌平黉的学生）时，著《鸦片始末》一卷，才名扬世”（原为汉文），这篇序言还讲到竹堂仅38岁便歿去，著书20余部。并说，造物者既赋此人以丰富之才，却又吝啬其寿。篠崎小竹在《竹堂文钞》（明治十二年刊行）的跋文（弘化元年）上说：“子德之文，才思洋溢，篇篇惊人。惊叹之余，殆生妒心”（原为汉文）。总之此人是一才子，或许因他富有文才，遂使此书蜚声于世。

依据《竹堂斋藤君年谱》（明治十二年出版《竹堂文钞》卷首所载，斋藤大三郎辑），《鸦片始末》是天保十四年（1843）他29岁在昌平黉的著作。翌年（弘化元年）他成为昌平黉的舍监。像上述各家跋文所见那样，自这时起，《鸦片始末》已是社会知名、流传开来的读物了。我认为是在《夷匪犯境录》传来以前稍早些时候编著的。之所以这样说，据我之见，是因为《鸦片始末》的最初部分，大致就是和前面介绍的天保年间日文本

^① 斋藤馨（1815—1852），生于陆前远田郡（今宫城县），还著有汉文西洋史书籍《蕃史》（1851），详见后述。

所知,而一般有识人士谅必是靠这部《犯境录》的辗转传抄,才对邻国发生的鸦片战争获知一些较为详细的具体情况。从吉田松阴于嘉永六年(1853)致长原武的信函中看到:“闻悉仆与足下共读《犯境录》,彼(佐分利定之助)亦欲与吾人为伍,唯望足下谅之。”(原为汉文)我要说,由此能够看出那种想通过集体阅读《犯境录》来了解鸦片战争的热心钻研态度。这里顺便一提,松阴早在弘化三年(1846)17岁,就已写出了手抄的《外夷小史》这一有关当时海外关系的传闻书(见于昭和十年,岩波版《松阴全集》第9卷),书中采录了天保十二年(1841)于长崎进港的清国船(丑二号船)携来的有关鸦片战争的传闻(在扬子江下游?地方的传闻)。只不过语焉不详,误记和误字也很多。又拙藏会泽正志斋的反耶稣教著作《息邪漫录》(抄本,嘉永五年写成)和《圣武记》一样,在谈及鸦片战争时都可看到多有引用《犯境录》的地方。在此以前,长山贯的《清英战记》(抄本4册,嘉永二年序。后文将述及)开卷也说:“顷者,予得见英匪《侵犯》及《犯境》等书”,显然指《侵犯事略》和《夷匪犯境录》而言。同为嘉永二年之著,并有序言的岭田枫江所编鸦片战争故事读物《海外新话》(刊印本5册,后将述及,松阴在他处曾抄录此书的“例言”和目录),其“例言”中也说:“本书之记事,以《夷匪犯境录》为本。”《犯境录》竟然如此广泛传播,那么,它究竟是何时传来我国的呢?我没有看到详知此事的史料,但《岩瀬文库图书目录》(昭和十一年,爱知县西尾市“岩瀬文库”)之中登载有嘉永元年(1848)抄本《夷匪犯境录略》1册,因此,此书传入我国恐是弘化年间(1844—1847年。——译者)的事吧!果尔,那么就是媾和条约《南京条约》刚刚批准后的事情了。

只是此书正如前面开始提到的那样,突然便从英军向定海县令送劝降书开始,这未免离奇。我认为,此前的部分大概是有所缺漏吧!

关于鸦片战争一事,从发端起,其全部经过直到媾和后的小骚扰为止,在我国予以简略整理,汇集成本并最后以“论曰”的形式加上自己的

解题”，广泛收集了国内外现存有关鸦片战争的史料，作出了解题。但对《夷匪犯境录》则仅举出了书名，作为“待访书籍”亦即目下正在探求中的书籍对待。这是由于只知道传入日本的这本书名，而在中国并未发现此书原件之故。我想，或许自始就没有在中国出版，而把原抄本带到了日本。^① 开始时在日本也还是以抄写本传抄的，桂湖村的《汉籍解题》（明治38年，明治书院）中列举《夷匪犯境闻见录》6卷，并称：

此书记录清朝道光年间英吉利侵犯清国南部之始末，命题如是。至于何人所编则不详。

并于最后附记说明有日刻本存在：“我国有安政四年，明伦堂藏印本”。然而，笠井助治在《近世藩校出版书籍研究》（昭和三十七年，吉川弘文馆）中举出了九州高锅藩明伦堂出版的《夷匪犯境见闻录》6卷本，并说：“藩主秋月种殷撰，安政四年出版”，并就其内容写道：

此系记叙明治维新前之嘉永、安政年间与各外国间之有关外交事件，并辑录有当时之外交文件，原为使诸生知晓海外各国之知识与时局之著述。

同样的6卷本是安政四年明伦堂刊出（只在标题上，有前者为“闻见录”后者为“见闻录”这样一个差别），可是，所作的解题内容却全然不同。而且在《汉籍解题》上有“何人编辑不详”一语，可是在《近世藩校出版书籍研究》上则是“藩主秋月种殷撰”，好像完全是另外一本书了。

看一看对目前已在中国佚失而在日本残存的中国昔日书籍目录并略加解说的《佚存书目》（服部宇之吉编纂，根据序言所说，是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执笔，昭和八年，文求堂、松云堂）则列有“夷匪犯境录3卷、夷匪犯境见闻录3卷”，并说“不著撰者姓名”，举出了“安政年间木刻

^① 顺便谈及，前述《鸦片战争书目解题》的“待访书籍”9册中列举有《王寅乍浦殉难录》道光刊本，在中国好像是稀见本，但我收藏中就有此书，是道光二十四年（弘化元年）出版，沈筠实辑。

《鸦片传闻书》相同的汉文本,我认为多半是依据《鸦片传闻书》或者同类东西(荷兰商馆馆长情报)写成的。书中的“论曰”可以看到那种贬低清国、偏袒英国的说法。

拙藏有《鸦片始末》三种。一种是前述的抄本(美浓纸,正文10张,跋2张);一种是昭和十二年仙台的伊势斋助“编辑兼发行兼印刷者”的石印本。这个石印本,除前述抄本中已见的斋藤拙堂(正谦)的跋文之外,还有“正谦又识”,据称:“传云禁止上梓,故使人抄录,将之插于架上”(原为汉文)。可知当时此书是禁止印行的。到了昭和十二年,才开始由同乡(仙台)的好像是竹堂崇拜者的伊势氏出版。该氏印行了《竹堂文钞》、《竹堂诗钞》等竹堂的著作10种。

另外的一种虽同为《鸦片始末》,却是夹杂了假名的日文抄本,是原汉文的日译本。国名、地名、人名旁边都分别画上了红线,是所有者热心阅读的。末页上记有“嘉永三年3月借自久保氏,抄成此书”。署名为“竹村胜礼”。同汉文本一起,它的日译本也以抄本形式传开。由此书的流传,可以看到我国有识之士对于鸦片战争关心的程度。

根据前述“年谱”,竹堂在文化十二年(1815)生于陆奥国远田郡,嘉永五年(1852)38岁殁于江户,在昌平黉就学,直到担任了舍监,是所谓汉学者。但是在《译洋书议》(《竹堂文钞》卷上)中,他提出:“不可断绝荷兰关系,亦即洋书仍须讲授”,“今之所谓儒者,无不对洋学茫无所知,一概欲以异端邪说禁之。”(原为汉文)他从有志于谋求海外知识出发而主张翻译洋书。被视为表现他这种志向的东西,有他所写的《蕃史》(外国史)1册。在该书的“凡例”之末,有他的假托署名“茫洋子”,可是,由于昌谷硕的“序言”(嘉永四年)指称:“我国翻译者,因无综述(西洋)大事之大手笔”,“斋藤子德因以发愤,涉猎诸史,摭拾大事,以为编年史,古今成败沿革之事迹一目了然。云云。”(原为汉文)这样一来,便使人知道了这是竹堂编的(子德是竹堂的字),是嘉永四年春(凡例上说)写的,以抄本相传。我收藏的也是旧抄本。以后,在明治十五年,竹中邦香所编《天香楼从

书》的第5、6册中收载了《蕃史》，此节见于滨野知三郎的《日本丛书目录》（昭和二年，六合馆，以后附载于《国书解题》中）。我没有看到这一印刷新本，但《丛书目录》中把编著者写成“斋藤拙堂”，则是“竹堂”之误。^①

以下愿就《蕃史》的内容略谈几句，借以窥视撰写《鸦片始末》的竹堂情况的一个方面。

11. 斋藤竹堂的《蕃史》及其他

《蕃史》一书卷首有昌谷硕的《蕃史序》，该序言说：“方今士大夫之视为先务者，商榷西洋人用兵之巧拙及器械利钝，以定防御之策是也。然往往不知其盛衰成败之始末及原由，凭空立言。故其说虽巧，其论虽伟，譬犹暗室求索，得之乎？未得乎？均属未知，岂不殆哉！此盖缘于既无综述彼土之史，我国译人又无综记其大事之著。斋藤子德由以发愤，涉猎诸史，摭拾其大事，成此编年史。古今成败沿革之迹遂一目了然。”（原为汉文）这样首先说明了竹堂撰写此书的动机。

意思是说，当时的人们都把急务集中在议论西洋战事方法和武器如何上了，据此来思考各种防御对策。由于不谙西洋诸国历史的来龙去脉，空泛的议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竹堂才发愤搜求西洋诸史料，撰写了此书。

昌谷硕继续写道：“人士倘以此篇（《蕃史》）为据，议论（时）世，而建时宜之策，则其说将臻确实，如揭明镜而照幽阴云。”（原为汉文）

如果说，这是他想为当时一般稍嫌架空的对外政策论展示一些多少有所根据的东西，而且又符合他的不满足的求知心才撰写了《蕃史》的

^① 《蕃史》好像也受到关心海外情况的部分有识之士的好评，安政元年11月，吉田松阴致其兄（杉梅太郎）的信函中说：“愿读斋藤竹堂之《蕃史》、（安积）良斋之《洋史（外）纪略》等，多所烦劳，特慰！”（昭和十年，《吉田松阴全集》第5卷）

又，安积良斋的《洋外纪略》（嘉永元年序，汉文）也是抄本，好像流传颇广，我也藏有抄本2种（1种是1册，1种3册，但是元治元年[1864年——译者]的抄本）。

话,那么可以说此书的用意仍和《鸦片始末》相同。

竹堂在此书的“凡例”中说:“外蕃(外国)之事散见于诸书,尚无综述之著,据此无以考察其沿革大事。余恒病之,辄涉猎西史,随读随录,逐年编次,令人可窥其一斑。”(原为汉文)又说:“西史之全书,我国尚无所传,故无由知悉其世系之详。今姑分为三纪,曰太古,曰新世界,曰革命。革命迄今,纪元未尝有变,则可以此为止。且西人之说何如,尚不得知。”(原为汉文)“凡例”的末尾有“嘉永辛亥(四年)孟春茫洋子识”。

“太古”中写的是,亚当和夏娃住在乐园里,叫作伊甸乐园。其时风和日丽,人无疾病。有四条河,叫作安达斯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各处多鱼,河岸树多,可以休憩,并且果类谷物也多,可以食用。鸟兽成群而不伤人。但亚当心境渐渐骄傲起来,不遵上天之教,地气因以改变,五谷不生,鸟兽伤人。于是男要耕稼,女要哺育,衣食之务从此开始。

接下来附有“论”,文曰:“据西人之说,天地不能自成,必有生之者,是谓造物主。天地既成,然后生亚当、夏娃。原有不食果实之禁,二人未从,遂受无限惩罚。造物主怜悯之,誓必自生人间,代赎其罪。此即三千余年后,教祖犹太降世并受磔刑而死之事也。”(原为汉文)文章并引用新井白石对此说的批判,以如下的格调评论道:“其说之夸张荒诞,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根据不足信。”(原为汉文)

接下来又入正文。文章写道,亚当的长子加印继嗣其后,大施教化,开始出现城邑(城镇村落)。人皆长寿,活数百岁。加印之后,划分为四世,以四金(金、银、铜、铁)分别配称各个时代。这时期出现器械百物。自亚当起,经 1650 年划作“太古”世界。后裔食尔的伊德(意即“铁之时代”)时候,有洪水之变。这时,罗墨吉斯之子诺亚有圣德,预知洪水,制造方舟得救。由此开始了“新世界”。

文章写道,洪水退后,世界又回到和平状态,这是“第二世界”,也称作“新世界”。诺亚有三子,皆有圣德,“分别成为西洋诸国之祖”。尔后,诺亚之孙尼模路多成为巴比伦国王,这是西洋君王的开端,在位 63 年。

其后延伸为波斯、希腊、罗马等王统谱系，世称“西洋四大君主”（叙述中夹有“评论”）。

其次是“革命”时代。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基督诞生纪元而言，始自犹太之女圣·玛利亚 16 岁，梦中经神告知身怀圣子，遂生无父之子。但不可思议的是文中只称“教祖”，不举耶稣或基督之名。由于其后西洋纪元未再变更，所以依此为据，用编年体的形式说明欧洲诸国的兴亡。另并触及莫卧儿和土耳其。最后结束于拿破仑死后 1840 年法兰西国王以皇帝之礼为他改葬一事。

以上全是用汉文写成的。我的手写本中“太古”、“新世界”约占纸数 10 张，而“革命”以后则约用去 60 张，并各加约半张左右的作者自己的评论“论曰”。

但这部《蕃史》不是竹堂直接阅读了荷兰语原书写成的，似是根据译书编述的。这一点由下述一语可以得知，即“凡例”中最后说“余将学读洋文，以期对此能有订正，唯尚无暇耳。”（原为汉文）

这是根据哪种译书撰写的？尚不详知，但“凡例”中曾说：“涉猎西史，随见随录”，由此可以推想是采撷自多种译书的。就我所见，至少“太古”和“新世界”部分，很多是将“嘉永元年新镌”的、山村昌永（兰学学者，曾经增订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此书的增订本现在仍以抄写本流传，我也藏有不完整本）以日文撰写的《西洋杂记》（刊印本 4 册，享和元年自序）卷一原样译成汉文的。大久保利谦在他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昭和二十八年、乾元社出版）中列举了《蕃史》。据称，此书虽用汉文写成，却与日文写的《洋外通览》3 册（弘化五年刊印，无是公子）以及《西洋小史》（抄写本 3 册，嘉永二年序，长山贯著）等书的结构轨迹大致相同；特别与《洋外通览》比较，文章大体一致，“或者作为《洋外通览》的汉译，虽不中，不远矣”。所以说：“《洋外通览》的著者‘无是公子’或即斋藤竹堂也未可知”。我手边没有《洋外通览》，不能做比较，对此不便发言，为谨慎计，特附记大久保氏的这一说法。

竹堂对海外的求知心，也具有好奇的成分。他的《竹堂诗钞》(明治26年，仙台伊势斋助发行兼印刷)卷下，收有“琉球竹枝”8首，“虾夷竹枝”10首，“荷兰竹枝”4首。这里举出“荷兰竹枝”中的一首以示一般：“楼台一片碧琉璃，夜色玲珑月且宜；琼筵无须借银烛，分明写出蟹行诗”(原为汉文)。

大沼枕山在《竹堂诗钞》的序(明治二十一年)中写道：“子德精于外国事情，故有甚多竹枝词，所咏之意明确，此集可胜尤洞。”(原为汉文)意在用竹堂的“外国竹枝”为例，称赞他的精通外国知识。但我认为这些竹枝词多半是模仿清朝尤洞的《外国竹枝词》(天明六年[1786年——译者]，奥田元继训点翻刻)。

又，小野湖山在《竹堂诗钞》的序(明治十五年)中，称赞竹堂的诗“体近古风，纵横自如”。(原为汉文)尤其是“咏泰西诸国之事，尤见其识力与学识”。(原为汉文)所说“咏泰西诸国之事”，谅是指《竹堂诗钞》所收“外国咏史”30首而言。诸如咏诺亚方舟；咏巴比伦国王统一西洋诸国；咏亚历山大大王扩展境域及于欧、非、亚三洲而“横扫东亚，自在驰骋”。更咏国王求得贤哲亚里士多德为师之事；但又咏亚里士多德受国王后嗣冷遇而像屈原一样投水自杀事(?)。哥伦布得到西班牙王妃的援助航驶美洲之事，以及俄国彼得大帝微服出访各国学得造船技术而归，由以航海事业兴盛，国威大张一事，也有咏诗。又对拿破仑的种种逸事逸话之类和美国独立时的华盛顿业绩等也有种种诗咏。对海外各国这样强烈关心的竹堂，为警戒、防卫的心情所驱使，谅必对鸦片战争也要加意搜寻其事迹，汇编成书。

《竹堂诗钞》还有咏陈化成、咏刘国标的诗，这些也可以说属于咏史。陈化成是鸦片战争时守卫上海防卫要冲吴淞炮台的老提督，他是当大部分守军中途逃离的情况下，战至最后阵亡而被宣称为勇敢之士的人。作为陈化成的护卫而不离陈身旁的刘国标(武进士)，当时背负陈化成的尸体现，匿于芦苇中，方得免落敌手。他并撰写了陈化成的殉难记，将其最后

状况流传于世。上海及其附近的文人咏此二人勇敢行为的诗被集为《表忠崇义集》，连同附录，全书3册。嘉庆四年经我国训点翻刻（“多气志楼藏板”），竹堂为作序言。其中有云：“松浦子重为余翻刻此集，俾藏之家塾”（原为汉文）。看起来，此书的训点者是谁，未说清楚，或许就是竹堂也未可知。只是，这里所说的松浦子重其人和竹堂是什么关系无从得知，但联系到竹堂撰写《鸦片始末》，大概也是为使其家塾（当时在江户下谷）塾生们习读而翻刻的吧！

上述内容均出自《竹堂诗钞》下卷，但上卷也有题为“闻英夷寇清，诗以记之”（原为汉文）的律诗。还有以“林子平五十年忌辰，诗以祭之”（原为汉文）为题的长诗。前者有句云：“海外之洲迹渺茫，忽闻西虏势腾骧”（原为汉文），后者的祭诗中也引入鸦片战争曰：“英贼迩来太猖獗”，“蚕食殆遍欧罗巴，南向欲吞支那国”，“胜败未决气氛恶，纷纭二京十三省”。（原为汉文）

这些都是“忽闻”鸦片战争而“胜败未决”时候的诗，可知这比写到讲和告成的《鸦片始末》要早。

且说，“闻英夷寇清”诗中有云“蛾眉解为三军帅”（原为汉文），林子平五十年祭诗中也有“一麾渡海女将军”，是说进攻的英军统帅是位女性。这大概是根据了当时流传的“传说”（或为清国船只带来的），而此事也被采入《鸦片始末》书中。据云，擒获“骁勇绝伦”的女酋，这是英国的第三公主（公主即王女），英国有公主三人，长女是“今主”（今日的国王）；二女是“副将”（或是相当于德川氏的副将军），在日本；第三女是“船将”（海军统帅）。现在擒获的是此人，“其人明眸秀眉，发漆黑，肤似雪，年仅十八岁”。（原为汉文）

文章一面说：“或谓并非真正英王之妹”，一面又说“蕃官（外国官员）即时驰函要求释还公主，果尔，则将夺占之土地全部奉还。倘有杀害之事，必将倾国大举压境，誓必报复云”，（原为汉文）文章又说，因此，清国方面派出的特命大臣伊里布和琦善同蕃官会谈，将释还之事上奏，仰请

许可。但在尚未降旨许可之时，便于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径行释放了。

《鸦片始末》按年逐月就战斗情况等做了具体的记述。但如以上所见，不可靠的传说也混入其间。在远离之国，但文化上又具有亲近感之国的“纷纭二京十三省”的重大事件上进行捕捉之时，虽是这样的传说，也许就被看作半属真实之事了。这段事，后来小说读物（《清英近世谈》等）也予采用。尤为甚者的是，把事情说成英军为救被俘的公主而议和，达成和议后拥其公主开拔回国云云。

生掳英女王之妹一事，不但见于小说读物，也见于明治十年代日本汉学学者写的清史中。在谈及此事之前，愿就与《鸦片始末》相同，较详汇集了鸦片战争纪录的佐藤椿园所著《海陆战防录》说几句。此书也载有生掳英王女之事。

12. 佐藤信渊《海陆战防录》、《存华挫狄论》

胜海舟的《开国起原》（明治二十四年序，宫内省藏版）书内，作为“支那骚乱概况”收录有佐藤椿园所著的《海陆战防录》，文中也记载了英王妹被捕事。我未见过此书的原本（大概是抄写本），仅是根据《开国起原》得知此书。作者佐藤椿园一般是以佐藤信渊知名，椿园是他的号。

幕末时期，片断的情报很多，尽管如此，连这种程度的内容，作为鸦片战争稍具系统的情报记录，都被视作代表性的（？）东西而被《开国起原》采录了。

这项纪录以“道光十七年（1837）英人载来鸦片二万七千箱”为开端，从“山东文臣黄爵文上书，请予禁止”起，记述了林则徐至广东上任，提取英人的鸦片付之一炬，从而开始了两国间的战争之事，按年月记录了各地战斗情况的变化。最后，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在南京“定和议之约”，在英船上举行两国议和成立的贺宴为结束。

《海陆战防录》中未载明所记录的年月,何时所写,语焉不详。相同于《鸦片始末》的语句也到处可见(例如叙述王妹奋战时两书都用“骁勇绝伦”一词),只是有日文与汉文的差别。同样的事情,二者说法有异。哪一本书是先写的不得而知,《战防录》或许是参考了《鸦片始末》撰写的也未可知。不过,《战防录》上写的是:“此女将,英国王之妹也。系(囚)于宁波府”。

开头的“山东文官黄爵文上书”。“文”和“之”字形相似,也许是抄写时出了错。但不管是文还是之,实际都错了,应该是黄爵滋。而且黄爵滋的出生地是江西,说成“山东”也不对头。只不过所谓“山东文官”,也许由于黄爵滋于道光十七年(1837)曾任山东乡试(文官考试)的考官。尽管如此,考官的任命是临时的,如果举示他的官职,应该是“鸿胪寺卿”(《清史稿》列传一六五及《清史列传》卷四一“大臣传续篇六”有黄爵滋的传)。

就内容的分量来看,则《战防录》方面似乎较多(日文与汉文无法比较,只同前述的《始末》日译文相比较)。只不过,此书是把荷兰传闻书和来自清国的情报混杂集成(这也是出于不得已),遣词用语前后也不统一,勿宁给人以编造的印象。例如,把上海用假名(日文字母——译者)写作“サンハイ”,有时又写汉字“上海”,写法纷乱。扬子江有时写作“扬子江”,有时则作“ヤッセキアン”。这拼音原是荷兰文译者的笔误也未可知,但无法确知其故。另外的荷兰传闻书中有“ヤンセーキアン”,这若是扬子江的标音(地方音)倒还贴切。《战防录》中把所有的“ン”都误为(?)“ツ”了。

再者,《战防录》中,对“シンキアンフライ”注释说,“似是镇江府之荷兰语”。其实这是镇江府的中国语音,所说“荷兰语”恐是指荷兰语发音之意。但这里提到了“荷兰语”,就透露了它是从荷兰语的传闻书译出来作为史料使用的。

《战防录》叙述了陈化成的事情。所说的“英人畏其威名,不欲妄自

接近上海,故对英人有不怕江南百万兵,只怕吴淞陈化成之语”,以及其对“英人(再)攻定海”所加的注释“与清方交换公主之地也”,都是原样采用了清国方面的传闻。其后又写道:“钦差大臣裕谦殉难以死,城失守。英人复得‘(テインヘイ)’城”。前面“定海”用汉字,后面忽然用“テインヘイ”(“ヘイ”是海ハイ的地方讹音),将同一地名用字母发音表示,显示了对史料的生吞活剥、杂糅拼凑的痕迹。“慈谿”一词又写汉字,又写“(ツェーケー)”也是同一情况。

由这一点来看,内容的正确与否姑置不论(因这属于原据史料本身的问题),至少就记述上说(行文造句),《鸦片始末》虽也有着全部是汉文的关系,但它毕竟比较系统完整。

佐藤信渊是一位涉猎面广、精力充沛的学者,从江户末期的天明^①年间到嘉永初年(嘉永三年歿,82岁。也有另说)著作极多,有人传称达205部共563卷(见昭和十八年,地平社“国学大系”本《佐藤信渊集》书中安津素彦所作“解说”)。但内容蔓延冗长、反复出现,重复的东西很多,而且自己也认为所著书中有可疑者。也有人认为这般大的著作数量难属真实(见森铣三《佐藤信渊——疑问人物》,昭和十七年,今日问题出版社)。

盐谷世弘(宕阴)在信渊的《经济要录》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融斋佐藤翁广涉经典,尤究数算,钻研农政、水利、兵制、火术(炮术)。少壮时周游天下,亲身验其所学。后为二三诸侯所召,为之经略国务,皆著实绩,非空言也。”(原为汉文)佐藤似乎特别专长于农政问题(有《经济要录》等著)。作为农政的根本,他研究了《禹贡》(中国古典《书经》中的一篇),撰写有汉文《禹贡集览》二卷(文政十二年叙述)。话虽如此,仍是就有关《禹贡》语句,汇集古来中国诸家学者之注释而成的作品。这种作品中国甚多,加以利用并抄录成篇自无不可。他还提出了独自的农耕法和水利

^① 天明是光格天皇朝的年号,1781年至1789年。——译者

法，研究土质。为使生产旺盛而着眼于搞活流通。将整个国内行政分为6府，制定了展示各府职责的行政改革方案。提倡社会政策，各地设立小学校、广济院、医疗院、慈幼院、游儿场、教育所（一万石上下的程度设一所或二所，或以二十所的样子为限）（见《垂统秘录》），又强调管理商人，实行由政府统一管辖物价的财政政策（见《物价余论》）。此外，还有关于天文历象及火炮战术的著作，这当是利用了他通过研究兰学而得到的西洋科学技术。

关于财政政策，他引用中国古书上见到的大禹、伊尹、管仲之说很多。另外对近世从荷兰传来的西方天文学也表现了热情。文化二年（1805）他在长崎曾手抄司马江汉的《兰学大道编》，这有大正九年用凸版印刷（报效义会刊）的“真迹”，我也藏有此件。书中已经看得到哥白尼的地动说和太阳黑点的说明图。让人感到，由于他吸收了这样的知识，所以在他的《天柱记》（文政八年[1825]）和《镕造化育论》（天保十三年[1842]）中，作为农政的根基，以育化万物之太阳为中心，热情宣扬西方天文学知识。

信渊师从兰学家宇田川槐园，可以视作他用功学习兰学的一面。他也利用山村昌永的《西洋杂记》等，写了日文的《西洋列国史略》（文化五年序，我的藏本是天保八年抄写本三册，有“松浦藏书”朱印）。关于这部《西洋列国史略》，大久保利谦对它的撰写过程及内容做了颇为详细的解说（见《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但是，作为日本人撰写的最早的西洋通史（比《蕃史》早），此书被视作划时代之作。

信渊曾说：“余不晓荷语，故不能阅读荷兰书籍”（《存华挫狄论》卷一），又说：“曾师从槐园宇田川先生（兰学学者），且与亡友山村昌永（兰学学者）共聆西洋诸史内容”（《列国史略》“叙言”），可见《西洋列国史略》是从槐园与昌永听到了荷兰文的西洋史内容而撰写的。和撰写了《鸦片始末》之后又撰写《蕃史》的斋藤竹堂一样，信渊也以《海陆战防录》及《存华挫狄论》（后将述及）记述了鸦片战争的情报之外，又撰写了《西

洋列国史略》。终归是对当时的西洋诸国状况进行了研究，多少具备了一些知识。而鸦片战争的意义已经使人痛切感到，拥有大炮和军舰这种强大海军力量的西洋，正在逐步对东洋进行侵略。

信渊的著作中有《存华挫狄论》5卷(嘉永二年序)，以稀少的手写本流传，我未见过这种写本。只是，泷本诚一编辑的《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下卷(昭和二年，岩波书店)以及《日本武学大系》22《佐藤信渊武学集》上卷(昭和十七年，岩波书店)都收录了它。据该书的解说推定，这是应原伊势津城主、和泉长官藤堂(高猷)的咨询，论述海防之策以备上呈的东西；后加改写，成为《存华挫狄论》。文章虽是问答体的形式，内容则是信渊一人唱的独角戏。

所谓“存华挫狄”，是说“存中华，挫夷狄”。该书卷末说，中国虽败于鸦片战争，但愿“满清君臣卧薪尝胆，济贫恤亡，上下同劳苦，练兵数年，以起复仇之义兵，挞伐英夷，全力逐之；俾使东洋无其遗类，庶能永为本邦之西部屏障。此即著述《存华挫狄论》之主旨也。”所以，此书的第4卷、第5卷几乎全是对鸦片战争的记述。从事情的开端、经过及议和，一直叙述到和议后广东居民及定海民众的反英运动。这一记述的最后说：“以上为航庵道人所记今年入港荷兰船只之传说”。所谓今年，由于此书载有嘉永二年(1849)的“序”，所以是在当年或者此前执笔的。

在《存华挫狄论》(卷四)中，有一段大致与《海陆战防录》相同的文字叙述活捉英王妹一事：“内有女将一人，骁勇绝伦，打倒四五人，折断七八支枪，清兵虽披靡散倒，终将此女生擒(中略)。此女将即英王之妹，遂囚禁于宁波府。此事详见《水陆战法录》。”《水陆战法录》是在此前撰写的，即是说，那时已经详述了这件事。

又他的《防海余论》(弘化四年[1847]，收录于《家学全集》)也谈及鸦片战争的事情说：“此一会战，详见《水陆战法录》。”并在《防海余论目录》中列举《水陆战法录》7卷，自做解题说：“我国与西洋夷狄尚无交战之事，无从论其优劣。然自天保十一年(1840)起，清国数十次战役皆大败，军

力不能与之抗争，终至纳银割地以求和，方得幸免。兹录清英水陆战役数十次之战法，从而评之。”

《水陆战法录》未被《家学全集》采录，这当是因为它属于“编者手头搜集之其他兵书，不列入本集”。但是，“不列入本集”的东西中，编者举出有《水陆战防录》活版8册。所谓活版指的是木活字版吧？^{①②③}

《存华挫狄论》中，在记述生擒英王妹事件之后附有“椿园氏曰”的评语，这是《海陆战防录》中所没有的。评语认为“此王女乃一绝大奇货”，并斥责“庸臣”伊里布等未能以此女为人质将和议推向于己有利之境，而不待君王之命遂轻易释之。

信渊的著作中，特别在二次大战时备受称赞的有《宇内混同秘策》一书。所谓“宇内混同”是“世界统一”之意。他写道：“我皇大国乃大地之上最早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根本一旦有序，则全世界应悉为（我）郡县，万国之君应皆为（我）臣仆。”（相当于序说的《混同大论》）这样陈述了统一世界的秘策（？），而为了统一世界，“必先自吞并支那国肇始，（中略）故本书先详述攫取支那国之方略”。于是叙述了侵略中国大陆的具体方针。要仿效在满洲崛起的清朝迅速统一中国的故智，以先侵入满洲为前提，从青森出发，急遣水师由桦太岛（库页岛——译者）北部进攻黑龙江。并从沼垂（越后^④的海滨）和金泽^⑤急率水师渡海，攻占满洲的南边沿海各州。别出一师登陆朝鲜半岛，至辽阳会合，以迫北京。更由

① 或者明治年代就已出版了信渊的各种著作，其中也许有此书，尚不详知。但我藏有被认为是幕末时候的抄写本，美浓纸8卷中收入了“水战法”和“陆战法”。此卷的最后有“嘉永元年五月端午日 椿园佐藤信渊 玄海甫述”。可见是嘉永元年成书的。现今此书也收录于《日本武学人系 23 佐藤信渊武学集》中卷（昭和十八年，岩波书店）。

② 试以《开国起原》收录的《海陆战防录》与《水陆战法录》相比较，则可明白这是摄其要点而原样缩小了的东西。但在《水陆战法录》方面，每一段落都缀以“椿园氏曰”的相当长的文字评论，即加上了所谓“战法”评论。《海陆战防录》则一概省略了这一评论文字。

③ 在信渊的著作目录中，之所以看不到《海陆战防录》，或许由于认为这是别的什么人将《水陆战法录》加以摘要，略去其评论文字而集成的东西了。

④ 越后，今新潟县。——译者

⑤ 金泽，位于今石川县。——译者

九州诸港进军，直驱江南、浙江等地。以兵法战术家自命的信渊，就攻略次序详尽细密地做了纸上谈兵，淋漓尽致发挥其妄想。

信渊这一侵略大陆的妄想战略同“八紘一宇”^①是一致的。在大战时期中他被一部分“皇道派”学者捧为先觉的、雄伟的(?)思想家。“国学大系”版本的《佐藤信渊集》解说者也是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我以前在某旧书店中偶然买到的书籍中有中岛九郎著的《佐藤信渊的思想》(昭和十六年，北海出版社)，书上盖有“东京预防拘禁所”的藏书图章。根据《广辞苑》的解释，所谓“预防拘禁”是指“刑期届满后仍无悔改之意者，为预防其犯罪，处以继续拘留。太平洋战争中施用于思想犯。”但尽管昭和的“思想犯”须读此书，可是信渊那种思想又能起什么作用，不过倒可以说它是一件说明大战时期政治思想状况的纪念品。

《混同秘策》的思想也就是《存华挫狄论》的内容，正如前面所引述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中国，应再度“练兵数年，以起复仇之义兵，讨伐英夷，大加破除，俾使东洋无其遗类，庶能永为本邦之西部屏障。”(重点系著者所加)最初作为统一世界的第一步先征服中国的思想，到此发生了显著的退化(?)而成为“存华”，期待着它“永为本邦之西部屏障”了。

《混同大论》的末尾有文政六年(1823)的纪年，《存华挫狄论》是嘉永二年(1849)写的。这之间历经 25 年的岁月，其间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实成为契机，使信渊神乎其神的妄想产生了急速的大转弯。就年代来说，化政时期^②的沉睡痴梦被那伴随鸦片战争教训以俱来的弘化、嘉永时期(1844—1854)的外国军舰来航所唤醒，一变而入于现实，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突变所使然吧！

^① 八紘即八荒，八紘一宇意谓世界一家，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帝国主义用为进行侵略的口号。——译者

^② 指文化年间(1804—1818)和文政年间(1818—1830)。——译者

13. 鸦片战争异闻

生掳英王妹的事情当然应是根据清国方面的情报而来的,但我未曾直接见过它所根据的东西(著述或者传闻书),大概仅是根据了当时的传闻吧!这件事在清末人的随笔中也出现过,那就是,在《清朝野史大观》12卷(1921年,上海中华书局)的卷四《清朝史料》中,以“英女被擒”为题,载称:“舟山群岛者,浙江沿海之门户也,道光二十年,英兵陷之。其兵舰复窜赴各口(港口)。有驶至余姚县者,胶沙不能行,乡勇(地方兵)聚而攻之,擒一英女询之,知为英王第三女也。”(原为汉文。引文据该书第206页。——译者)此文续称,当时该地官吏若能用和平之手段以羁縻之,假以礼貌,使不失其王女之贵重,而后要挟议和,则我国主权或不致十分受损,而当时官吏不省。此文附述了这一意见,而这正和《存华挫狄论》的“椿园氏曰”论旨相同。

这部《清朝野史大观》引用了很多史传、史话及笔记,是民国成立后编纂的,卷首虽列有许多引用书目,但并未就各个记事一一说明出处。因此,“英女被擒”这一记事根据何书而来,无法详知。或者,收载这一记事的书籍当时也传到了我国,《鸦片始末》和《海陆战防录》(以及《存华挫狄论》)都是以此为根据的也未可知。

在余姚俘获英军中的公主一事,似乎很快就成了清国街头巷尾的话题,作为鸦片战争史料被人颇多引用的江上蹇叟(夏燮)所著《中西纪事》中也载有此事。《中西纪事》24卷,似是经历了颇长的时日才编定的。我所藏的此书是同治七年(1868)木活字刊印的所谓“定本”。有道光三十年(1850)的“原序”、咸丰九年(1859)的“次叙”、同治四年(1865)的“定本”说明序(第三次序)。犹如原序所说:“爰蒐辑邸抄、文报,旁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原为汉文。引文据该书。——译者)这是收集了当时种种情报之类的东西据以编述的,局部的问题姑置不论,全面来看,

不能不说史料的价值相当高。编者夏燮是个官员(后任江西的知县),当时收集这些情报资料大概比较方便。他在说明“定本”的序中提到魏源的《海国图志》时说“同年魏默深”,可知他和魏源是同年举人及第,是同时代人,并且同样对英国的侵略“裂眦怀愤”(原序)而编述此书。

《中西纪事》卷五有云:“伯麦(Bremer,攻略定海的英海军司令官)踞定海数月,闻抚事(停战协定)定,辄听洋艘四出游奕(航游)。行至余姚,有土人(当地人)诱其五桅大船搁浅于内滩中,获白人数名,内西妇一人,装饰甚盛,有传其外洋之公主者(外国的王女),伊相(钦差大臣伊里布)闻之,飞檄余姚县,设供帐(接待)委员送入粤(广东)。”(原为汉文。引文据俞泰生(樗园退叟)辑夏燮《中西纪事》。——译者)

这里只说有人传说这“夷妇”是外国的公主(王女),钦差大臣伊里布护送去广东。至于该女是英海军的统帅啦,又该女怎样战斗啦,这等事情都没有说。不仅如此,而且还说明当时的海军司令官是伯麦,所以,当时是有捕获王女这样的传闻,逐渐添枝添叶就成了以后那样的说法了。

实际上这“夷妇”是英军的武装运输船 Kite 号船长(海军少校道格拉斯[Lieutenant Douglas])的夫人诺贝尔(Noble)。关于这位“夷妇”被捕的情况,麦克菲逊所著《在华两年》(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中有详细记载。又关于在此前后英船触礁之事,中国乡勇袭击和虏获船员之事等,前面所引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参考了《筹办夷务始末》以及外国人的著书,作了相当详细的考证。

明治十年代,有汉学学者撰的汉文体清朝史。如增田贡(岳阳)的《清史览要》6 卷(明治十年)和佐藤楚材(牧山)的《清朝史略》12 卷(明治十四年)。但记述鸦片战争之处,与竹堂的《鸦片始末》一样,二书都有英女王之妹被生擒的记载。

《清史览要》与其说是编年体,不如称为系年体的形式。先列出年代,然后记录在此年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卷四的道光二十年,首先标记了陈化成为江南提督。这一项目下稍微详述了陈化成致力于沿岸防备

的状况。其次标记了“英人围宁波，将军(?)伊里布战而擒其女酋。”(原为汉文)这一项目下稍稍详述了女酋被擒的状况。据称，在余姚，“英舰胶止于沙，乡勇集而攻之，有女酋挺身战斗，手斩数人。乡勇一人挥枪自后撞击，女酋负伤，众因得擒之。并获二十余人。女酋，彼国王之第三女也。”“英将致书余姚县令云，如还王女，愿还侵地。往广东，欲请命，不报。遂至京师请和。帝命钦差大臣琦善赴广东，与之议。”(原为汉文)这最后部分在《鸦片始末》中是说，伊里布和琦善同“蕃官”举行会议，将释还之事上奏皇帝并待命，但在降旨之前径行释放。这里有出入，但大体则相同。

《清朝史略》方面，关于王妹奋战和被捕在文字上虽略有变化，但几乎大部分是照抄了《鸦片始末》的文章。这部《清朝史略》在卷首列出了引用书目，其中有竹堂的《鸦片始末》，看来多半是利用了此书。因为它在栏外标注着“或云，擒获公主系属讹说”(原为汉文)，这一点，《鸦片始末》也有“或云，此非真正之英王妹”。所以判断正文是抄袭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刊本而外，我还藏有以《汉史沿略》为题，用汉文记述中国史概略的稿本，但这份稿本缺第1册和第2册，只存第3册(唐、宋)和第4册(元、明、清)，是个不完全的稿本。第4册的最后，以“皇叔醇亲王之子载湉入宫继位，改元光绪”(原为汉文)而结束。是一部叙至光绪帝即位(1875)的中国史。是用毛笔在“东京师范学校”印刷的线格纸上写的，以朱笔作的返点和送假名。栏外有对内容简单概括的题示。并到处附贴着字笺，有删除，有改正，可见是一部预期要出版的底稿本。对于各个时代，首先是揭示帝王之名，然后不是记载该帝王时代发生的主要事件，而是简略记载了话题性质的事情。可以说是王代记的类型。例如“清纪”的最后写道：“宣宗皇帝旻宁，改元道光”(原为汉文)，接下来就是：“以魏源为中书舍人，帝览其试卷，手批嘉赏”(原为汉文)，栏外则标有“赏魏源”的题示。在道光这一时期中，栏外题示有“获美女”的一

段,正文说:“英人攻宁波,大将(?)伊里布赴援。偶遇潮,潮退而英舰胶于沙。乡勇沈贞等获其女酋,英人请还其王女。上命钦差大臣琦善赴广东,与伊里布计议,返还王女。英人仍不退,上命二人免官,和议亦破”。(原为汉文)

这和《鸦片始末》的记述大致相同,只是《始末》书中没有“乡勇沈贞等”乡勇的姓名,而且前引《览要》、《史略》各书也未见乡勇的姓名,所以恐是根据了其他书籍的。

前面说过,我手头的这个稿本,只有第3、4册,没见过第1册,无法得知《汉史沿略》出自何人之手。不过,此书终结于光绪的改元亦即明治八年,据石井研堂所著的《明治事物起原》(昭和十一年改订版,春阳堂)载称,东京师范学校是明治五年在昌平黉旧址上创设的。校内设有“编成局”编集教科书,我想此稿恐怕是该校教科书的底稿吧!那么,此稿大概是明治十年(1877)前后写的了。

到了明治二十年代,生擒王妹之事好像已不为人所信了。明治二十一年出版了用厚纸板作封皮、活字印刷的《清英鸦片之骚乱》一册(编集发行者是东京府平民、清水市次郎),此书几乎原封不动地(99%以上)抄自岭田枫江根据《夷匪犯境录》改写的小说读物《海外新话》5卷(嘉永二年,木版),只是标示的题目有改变,用的是活字。《犯境录》和《新话》全都未写生擒王妹之事,所以此书也没有这一记事。

明治二十七年出版的松井广吉(柏軒)著《英清鸦片战史》一册(博文馆发行),是历史书,不是小说。由于根据英国方面的史料,该书写道:“女皇本无皇妹,假令有妹,亦无轻使外出作战被擒之理。”又说“我国汉学者(例如佐藤楚材——原书注)中往往有相信此说而在他们写成的清史中确实载入此事的,因此,下面举示其叙述生擒经过最简单的一例以博一笑。”于是将竹堂的《鸦片始末》的这段记述日译介绍后写道:

“上为斋藤馨《鸦片始末》的日译文,但方今其他诸书有更多记述

者，甚且不少插有就擒之图，毕竟仅属无稽之妄言而已。”叙述到此终了。^①

松井柏轩说“不少插有就擒之图”，就我所见，《清英近世谈》木版5卷(嘉永三年，早野惠)这部读物小说中，在叙说王妹奋战的地方插入了通占两页的“陈化成擒将军公主图”。这里冒出了陈化成，当然是虚构。结果是，陈化成在余姚县迎战王妹，二人混战一起，船底破穿，二人一同落海。士卒拥上，生擒王妹。送往上海城，连同警护的番兵数百人监禁起来。因为这是小说著者在《鸦片始末》中(?)发现此事，把它说得更加有趣，编成了戏剧性的东西。

《海外新话拾遗》5卷(嘉永二年，种菜翁)也是同样性质的小说读物，它把勇将王妹的奋战情况说成为“神变万化，轻盈巧妙之处犹如春天的蝴蝶戏花，秋天的红叶迎风翻飞。”并说，“终为清兵擒获”。而且插入了通占二页的《女将勇战之图》。

这部《海外新话拾遗》，在它的“例言”中写道：“枫江岭田氏所著《海外新话》中记载之事件，全系就《夷匪犯境录》、《侵犯事略》等书采择编集而成。话虽如此，并非大小事件均无遗漏，故摭拾其脱落之处，著为此篇。”所以说，《拾遗》一书加进了生擒王妹的故事，或是因为《新话》一书漏掉(?)了这段具有轰动效应的故事，而作为小说读物的好材料，又从

^① 另外，顺便一谈，这里提到的《英清鸦片战史》，作为《英人强卖鸦片记》8卷，经清朝汤睿(字觉顿，广东番禺人)于光绪年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翻译石印出版。我未目睹此书，但现今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所藏一事，记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鸦片战争》(1954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第6册，并收录了此书。只是光有“日本人撰”字样，未将著者松井吉广的姓名记入。不过，拿译本与《英清鸦片战史》对照一看，便知是根据这本书译的。

《英人强卖鸦片记》的解题中说：“此书本是日本人原著，撰者已不详，译笔甚劣，特别是外国人名，由英文译成日文，由日文翻成中文，离原音太远，多不可解。如英王乔治译作‘其摇其’，英领事义律译作‘贤利哑兹托’等是。内容大概是参考英方记载，所以对于英方的行动，叙述较详，书中所记俄罗斯人在此役中对中国的帮助，为他书不经见的材料。书中记载错误很多，如说道光帝因战败而出奔奉天，其尤显著。至其议论，对于中国的鄙视，也可表示晚清时一些日本人因变法较早，而竟自狂妄起来的态度。”(引文据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新1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第513页。——译者)

《鸦片始末》(?)中采撷过来了。

顺便一提,佐村八郎的《国书解题》(明治三十三年,六合馆)中,在这些我国当时出版的鸦片战争小说读物之中只列举了《海外新话拾遗》,并作解题说,此书“系记述英法诸国最近到达(?)支那地域而开展种种关系之事实(?)。但既已有岭田枫江其人据《夷匪犯境录》、《侵犯事略》等书著为《海外新话》,记述了清英两国关系始末,故本书称作补遗,拾集其脱佚。本《拾遗》系嘉永二年己酉之作。”可以说这是个糊里糊涂的解题,特别是起首部分语无伦次,后半部分则仅是照抄该书的“例言”而已。

《海外余话》(嘉永四年,醉梦痴人)5卷木活字本,掺杂了片假名,没有插图。有人将此书改为平假名,一如其他各书那样在卷首以及文中多处加上插图,改名为《海外实录》5卷木版(安政元年,卖柑居士序,安政二年发行)。此书的卷头插图有《英吉利国王妹阿岱》的图像,这里冠上了名字阿岱。此女是英军的主将,口称:“我乃大西洋英吉利帝国第二王阿岱,此次为查究广东恶逆之罪,奉敕命赴该国。”添枝加叶发展成了更加离奇的虚构了。并且最后主将阿岱和副将义律(Elliott,实有其人)均为林则徐所生擒,但被清道光帝赦返本国。

结尾是,英吉利“感于道光皇帝之情,永为清国属国,年年献贡物,汉土威风大震遐迩。清朝皇世万万年,皇基永固。”

总之,夷匪怎么也敌不过中国,这是此类小说读物的一贯主题。

14. 岭田枫江《海外新话》及其他

有如前述,我收集的幕末问世的以小说读物形式描写鸦片战争的书籍有《海外新话》、《海外新话拾遗》、《海外余话》、以及把用片假名写成的《余话》改写为平假名并加入插图的《海外实录》,还有《清英近世谈》。所有这些都是嘉永年间刊印发行的(唯有改题本《实录》是安政二年刊行)。《鸦片始末》不许刊行,到了昭和才开始印行。这些鸦片战争的小说读物

在当时也像是不能大量出版的。

在这些书中,最早出版的《海外新话》的著者,因为没有得到官方准许而出版,便被判刑监禁。出狱后仍被剥夺了居住江户、京都和大阪的权利(禁住三都),这恐怕对以后的书也产生了影响吧。《清英近世谈》在它的封面内印着“印数限 200 册,禁止出售,分送同好”。《海外新话拾遗》也在封面内印有“禁止出售”。《海外余话》,我的藏本虽然封面内是白纸未动,但在本文的最后却缀上了“是徒然之雨月,独醉乐于一梦”来打马虎眼;署名也用了“醉梦痴人”。将此书用平假名写成的《海外实录》也还是在封面内印上了“禁止销售”。

以上各书,我想就最早的《海外新话》说明其样式形体,从而便可得知这种小说读物的大概,因为其他各书都追随了《新话》的样式形体。并且想说一说《新话》的著者岭田枫江(隽)其人及其受罚情形。

《海外新话》,美浓纸,5 卷 5 册,最前面的“例言”中说:“此编之纪事,源于《夷匪犯境录》。然《犯境录》一书乃杂集南北各省将士奏议、策论及目击战斗所记而成,随获随集,故年月时日之次序,以《侵犯事略》为据;犹有误谬之处,则据他书改正。”又说:“《犯境录》之记载,始自道光二十年七月二日英夷攻陷定海县事件,是以对鸦片烟之流毒以及林则徐于广东颁布严厉禁令终于招致夷人侵犯之事,亦即对此滥觞尚乏记载。今且根据《经世文编》、《隐忧录》、《乍浦集咏》、《清(原文如此)武记》等书,将变乱缘由数端增载于前”,并列举了所依据、参考的各书,但大体上还是采用的《犯境录》所载各地的战斗报告和该书中可以看到的一些插话部分,不过作为读物而作了可增加兴趣的处理。

再者,“例言”中还指出,“至于行文之体裁如《盛衰记》、《太平记》等皆沿用我皇国古来军籍中之套语,为使童蒙亦可一读并易于记诵”,所以写得平易有趣,还为汉字附加了注音。

为了有助读者理解,在卷首有《英吉利国纪略》一节,虽然简略但涉及英国地理、历史、生产、贸易、学校、风俗、军备(船舰、火炮)及其侵略政

策。最后的结语说，“有志于海防之士不可因其为西洋僻域之夷人而蔑视此事。”还刊载了“舆地略图”(即世界地图)。图上以红色表示英国所领各地。其次是“清国略图”，与“夷人侵犯有关”的清国府县名称都用红点表示。再其后有“英将戎装图”、“步兵军装正面图”、“步兵军装侧面图”、“英国大军船图”、“蒸汽船图”等等绘图。接下来是本文，由“黄爵兹就鸦片烟流毒上书事”开始了第1卷。到第5卷的最后，以“关于两军亲善和约条目”为终结。在本文中到处可见占通二页的插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

在《新话》以后问世的把鸦片战争给读物化了的各书，都接受了《新话》这样的形式，只有《拾遗》是木活字，附假名，没有卷头画和插图。把这本《拾遗》用平假名写成的《海外实录》，也采用了《新话》的格式。

《海外新话》的著者岭田枫江由于所谓未经“学问所”许可便径直出版而受到处分。岭田受到江户地方长官远山左卫门尉的传讯，勒令烧毁印版，使之绝版，并被处监禁。关于这件事和处分问题，担任江户西城守卫的纪伊长官筒井与远山左卫门尉之间彼此于往来书信上引据了“出版方针”。对此宫武外骨所著的《笔祸史》(大正十五年改订增补，成光馆)中有记载。从这些往来书简的表面上看，是因为未经“学问所”审阅而获罪的，在筒井回复远山的信上有这样的话：

《海外新话》一书纯属以假名书写之《夷匪犯境录》，此节业已奉告。将异教邪说改换为自己之著作，乃不同于前函略述之著作(前文列举有儒书、佛书、神书、医书、诗歌集)。此类日汉合写之书物，缘于体裁之故，亦不许出版。经慎加评议，兹已决定，此书属于不准刊行之物。

这是幕府评议后作出的裁决，终归是未能说清理由。我想大概是担心涉及时局，影响人心吧？宫武外骨写道：“根据上述意旨，著述者岭田右五郎(枫江)受监禁处分。嘉永三年10月此案落实”。又在书页的栏

外注有：“本案之事，所谓《市内取缔类集》的手抄本中也有记载。该项记载末尾称，其后，有木刻师名为熊五郎者，因密刻此书重版发行而判罪云云。”这也说明该书的需求颇为不小吧！

关于岭田枫江，五弓雪窗（久文）所著《事实文编》（明治四十四年，国书刊行会）第4集收录了重城保撰写的《枫江岭田翁寿碑铭》。据此可以大致知其人品和经历。关仪一郎与关义直所著《近世汉学者传记著作大事典》（昭和十八年，井田书店）中也载有他的简单传记和著作（引用了《佐藤一斋和他的门人》、《枫江遗文》）。但较为详细地传述枫江这一人物及其事迹的，是枫江的门人明石吉五郎所著的《岭田枫江》（大正八年，发行人千叶弥次马）。这本书若从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角度着眼，不能说十分完善，但因为是枫江的门人直接著述的（回忆枫江的内容等也被收入在内），所以枫江的人品作风都被很好地记述下来，就史料说，涉及面也很宽。

如前所述，官武外骨仅简单说“受监押处分，予以结案”。而明石吉五郎的《岭田枫江》则说：“先生在狱整二年，（中略）渐至嘉永四年春，被赦重睹青天白日。然而同时接到所谓禁居三都的通知。这种禁居三都是一种预防戒令，凡对幕府政令怀抱不满，行动稍触忌讳者，大都罹此祸害。”又说：“这和明治十四五年左右，政府为取缔主张自由民权的壮士而实施集会条例及保安条例同出一辙。”

所谓禁居三都，是一项从出狱时起三整年内剥夺居住江户、京都、大阪三地权利的法令。

下面一事也是《笔祸史》中没有写的，据《岭田枫江》所载，枫江入狱的同时，受枫江委托为《海外新话》绘制插图的画师也受牵连，同样被捕入狱。而且，画师终于死在狱中。连画师都因自己而受牵连投狱，并且瘐死狱中，这使枫江极为痛心。《岭田枫江》的作者说：“为时数载，仍时常听到先生谈及此事，门弟子无不潸然泪下，屡屡为之沾襟。”

今天看来，可以说这完全是难以想象的苛酷刑罚，英国和清国之间

发生了战争，竟连一个日本庶民、插图画师也为之遭受意外的灾难。但另一面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幕府对鸦片战争怀有的非同寻常的紧张感和警戒心。

枫江因被禁居三都而离开了江户，前往房总^①并在房总定居下来。自那以后，他便在房总各处从事教育事业，受到当地人们的景仰。明治十六年在67岁时歿于千叶县夷隅郡。《岭田枫江》一书的著者明石吉五郎，也是这期间一个受教于枫江的人；这本《岭田枫江》主要也是为宣扬作为教育者的枫江的人格、事迹而撰写的。

岭田氏世代为丹后^②田边藩主牧野氏的家臣。枫江是父亲矩俊的次子，是父亲在江户执勤时生于藩邸的。就是说，他因为是武士，也许不知道会牵连上这样的治安条例。枫江亲笔留下的履历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嘉永二己酉岁十二月，因印行著述《海外新话》受地方长官远山左卫门尉传讯。审讯期间，由双亲监管。

嘉永三戌年十月二日因上述之事，老中户田大人下颁监禁命令。

嘉永四亥年正月十三日接赦免命令。同年四月十三日，因往年退役后，持身放荡不改，故提出申请，请求脱离关系（申请断绝主从、父子关系，申请脱离子女关系）。

安政二卯年正月十八日，因已革心改意，获准断绝关系之申请。
(引自《岭田枫江》)

因为“禁住三都”，所以才提出了断绝关系的申请吧！这申请被批准后，他重新出仕于田边藩府，担任军事改革的调查任务。这因为提到军事，当时主要是“海防”自不待言，枫江早就对这方面具有相当的心得。

《岭田枫江》引用了小野湖山的《枫江渔长岭田隽小传》，其中有云：

^① 房总，指安房、上总和下总，相当于今千叶县南部。——译者

^② 丹后，旧国名，位于今京都府北部。——译者

“士德(枫江字)早岁学枪剑,习兵法(中略)迅即慨然有筹海(海防)之志。大炮巨舰之制造,攻守利害之说,力求究明,乃荷兰学学者之流”。(原为汉文)

枫江最初从学于佐藤一斋之门,后又从学于林复斋(名輝,任大学头^①,后美使培理来航时他代表幕府与培里进行外交折冲),也做复斋的代讲人,作为讲座费常收到各藩诸侯的谢金(见《岭田枫江》所述枫江的谈话),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汉学学者。他从梁川星岩学汉诗,与大沼枕山、小野湖山、远山云如被人并称为“星门四杰”(据《岭田枫江》载称,星岩及上述诸人都与枫江唱和或频繁引用枫江的赠诗),所以,作为汉诗人也应该说是位相当出色的人物。不过,天保十年1月起到天保十二年12月止,这三年之间据说他又从箕作阮甫研究兰学(见《岭田枫江》)。据此可见这时候他既已“有筹海之志”,又十分通晓了海外情况,可以说,他之所以把《犯境录》改写为平易的、谈说战争故事的《海外新话》,归根到底是为“筹海之志”发出启蒙议论。《新话》的卷头载有长诗,从诗中也可觉察到他在指出应以清国的战败作为我国的前鉴。“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严整以待方无恐”(原为汉文),幕府或许认为这书能动摇人心,而且是对幕府的一种批评吧?

15. 《清英战记》问题以及《圣武记》的翻刻与荷风《下谷丛话》

不是小说读物而把鸦片战争从开始、经过到讲和,用假名混合文字写成的纪录著作,有长山贯的《清英战记》抄写本4册。此书没有印行,是以抄写本流转的。抄写本现在好像也稀少了。我所藏的本子上盖有“今关天彭之印”。今关天彭已于数年前亡故^②,以汉诗人知名,而且很早

^① 大学头,大学寮(大学堂)之长官,江户幕府时代管辖一切学问所。林氏世代袭任此职。——译者

^② 今关天彭(1891—1970),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而知名。——译者

就翻译出版过中国戏曲集(《支那戏曲集》),还有《近代支那学艺》、《东洋画论集成》及其他著作。尤其我在旧高中时读过的《支那人文学讲话》(?),作为中国学的入门书教人以很多东西,迄今尚留有记忆。后来曾有两次在友人处见过此人,为了我的著述事情还接到过他的明信片。

《清英战记》卷首有嘉永元年朝川同斋(麌)的序文,写道:“顷者,长山子甫著《清英战记》,记其(鸦片战争)缘由,共2卷。欲使读者知彼忠臣义士之节,奸吏赃竖之罪,及英夷桀暴狡黠之情,俾有所警醒戒惧也。”(原为汉文)接着有嘉永二年的自序说:“彼(英)辈已吞香港,盘踞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等港口,岂仅欲使之成为牛皮(?)之地耶!余尝读西书,知彼贪饕无厌。初则卑辞以求通商,既已通商则筑城置兵,以俟可乘之隙。南海比比诸国之被吞并者,皆出自此策,实属可惧而可恶也。(中略)噫!清国已讲和,仅塞其凶贪耳,将来何以处之!其凶焰恐未能止于斯焉。”(原为汉文)这口气是说,日本也要警戒。

所以,朝川同斋才在序言中说,这部《清英战记》是为“使人警醒戒惧”而写的。

此书卷末有东条琴台(耕)于嘉永二年的跋,跋语中说:“友人长山甫尝习修远西横书文字之学,深识清、夷之势态,故托词庚子清英之战,评论其得失。”(原为汉文)而此书的前言说:“顷者,以海防之策咨访诸员众司,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懵懵懂懂,无脚踏实地之议,等等。”(原为汉文)意思是说,长山甫学得遥远西方的蟹行文字,深知清、英情事,因此,此书是脚踏实地的著作。

长山甫另外还著有《海防私议》和《海防私议补遗》,均被《海防史料丛书》所采录(未看到),我想也都是作为海防之策的参考而撰写的。但是,既然琴台说著者曾研修横书文字,那么这书就应该有其独到之处的说法,然而看一看《清英战记》,几乎找不到像是采自横书文字史料的地方。

举例说,送给定海知县的伯麦文书并非译自荷兰文(或英文),而是

将《夷匪犯境录》的汉译文原样不动地夹杂假名写下来的。其他地方的伯麦书函，也是原样采录了《犯境录》的中文译文。

《清英战记》中相当于前言的地方这样说：“余顷见英匪《侵犯》（指《侵犯事略》）及《犯境》（指《夷匪犯境录》）等书，记载清国边患之概略，然所记仅一时之公文，时人之谈话及自身所见之情事，故叙次混淆难辨。兹按年月叙之，以国字书之。”

《海外新话》也说它“源于《夷匪犯境录》”，但是“至于年月时日之序，则以《侵犯事略》为据”。这部《清英战记》也是以《侵犯事略》和《夷匪犯境录》为原本撰写的鸦片战争概况，书中还插入了“火轮船图”、“沿海图”、“定海县图”等精绘彩图。

长山贯的著作除了我所藏的而外，还有《炮家须知》1册（安政三年刊行）和《铳战纪谈》4册（文久二年刊行）等。他像是一位枪炮及其使用方法的研究家。《铳战纪谈》有大沼枕山的序。此书多被我国军记类书和笔记类书所引用，是一部研究使用枪炮作战的日本战争的书。《炮家须知》还对火药配合法、大炮铸造法和装置等插入了图解，说明很详细。但书中说，由于是从荷兰书译述的，“每项皆尽量由西书抄出，丝毫不加臆测。话虽如此，此卷原以应急之用为主，文词力求去其烦冗，更臻简短，以便携带，云云。”长山贯号樗园，被尊为江户儒者，但其详细传记尚不得知。吴秀三的《箕作阮甫》（大正三年，大日本图书；昭和六年，思文阁重印）书中，在记述幕末时期撰写的西洋史时，把长山贯的《西洋小史》和前述佐藤信渊的《西洋列国史略》、斋藤竹堂的《蕃史》放在一起列举出来。他说《西洋小史》是“三本薄书，上卷和中卷写西洋各国的史略，下卷写欧洲各国对东方的侵略”。并对笔者长山贯注释说：“名贯，字子一，片山兼山之孙，朝川善庵之甥（此字兼作侄与甥解——译者），载于安政六年出版的《书画荟粹》”。前曾提及，朝川同斋为《清英战记》作了序言，而同斋是善庵的养子，必然会考虑到贯和善庵的关系。因为善庵是片山兼山的亲生子，贯如果说他是兼山之孙，那就应是善庵之兄弟或姊妹之子了。

魏源的《圣武记》在日本已被翻刻，前面已经提到，但都是部分翻刻。现在，笔者藏有三种，一种是称作《他山之石》的木活字五册本中收录了它，该书的第一、第二册是《圣武记》。第一册收录了“国朝抚绥西藏记”上下、“西藏后记”、“廓尔喀附记”、“附录澳门月报”，第二册收录了“康熙乾隆俄罗斯盟聘记”、“乾隆征缅甸记”、“入缅路程”、“乾隆征抚安南记”、“嘉庆东南靖海记”。

《他山之石》因为是木活字本，没有训点，也没有序言；编刊者也不明，也未载刊行年月。但是，安政元年11月27日吉田松阴致其长兄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话：“海滨之行购得《他山之石》一部，《地学正宗》一部，此亦亟欲一读者”（见吉田库三编《松阴先生遗著》中的“书牍杂辑”）。由此想到，这是嘉永时候刊行的吧？

就《他山之石》所收各书来看，仍旧是为供海防之用而编集的，都是使人知晓海外状况的内容。《圣武记》之外，第3册收入了杨炳南的《海录》，第4册收入了汪文泰的《英吉利考略》、焦循的《荡寇记》、徐鲲的《炮考》，第5册收入了蒋友仁译的《地球图说》（阮元序）。

另一种翻刻题为《圣武记附录》，原本的卷一一“武事余记”（兵制、兵饷），卷一二的“武事余记”（掌故、考证），卷一三的“武事余记”（事功、杂述），卷一四的“武事余记”（议武5篇）各自成为一册。共为4册木活字本，无训点。此书只收载了魏源的“圣武纪叙”，而无翻刻者序言，也无刊行纪年，恐怕仍是嘉永时候的吧。我的藏本上盖有“周防国^①明伦馆图书印”。

还有一种翻刻的题为《圣武纪采要》，上、中、下3册本。嘉永三年的新版上有“夕阳楼藏梓”。这书和前述二书不同，有训点，记有“尾张^②鹫津监校”姓名，卷首在魏源的原叙前面，有鹫津于“夕阳楼无人处”写的序

^① 周防，位于今山口县东部。——译者

^② 尾张，位于今爱知县西部。——译者

言。可知此书是鹫津监(毅堂)^①训点刊行的。

其内容是前述木活字本《圣武记附录》中的第4册“武事余记”(议武五篇),单独加以训点,分成了3册。上卷为“城守篇”、“水守篇”;中卷为“防苗篇”、“军政篇”、“军储篇”;下卷仍为“军储篇”。卷首的序言说:“孙子以火攻为下策,然而方今防御英夷之术除火攻外则无可措手”。并说:“顷者,予自一权贵家借览《圣武记》,凡14卷,清人魏源所撰述。(中略)盖道光壬寅鸦片之变,魏源适逢其会。清国军政之得失,英夷入侵之情状,皆其耳目所能及,是以能详其机宜,谙其形势。然则海防之策,优于是篇者未之有也。予乃抄而付梓,题为《圣武记采要》,以之问世。”(原为汉文)

意思是说,原书是亲身经历鸦片战争的魏源所著,是目下议论纷纷的海防策的最佳参考书。但是,这部《圣武记采要》从始就是未得到官方许可而出版的,结果被勒令绝版,上缴了版木。前面引用的宫武外骨的《笔祸史》中,也把它作为“出版年代不详的图书”,说“绝版图书,或未见实物,或虽见实物但出版年代不详者统列如下”。其所举12种图书中就有《圣武记采要》。

在《维新史料纲要》卷一中可以看到,嘉永三年5月“幕府谕示海防系统各员司,不得泄漏机密,并禁止传播市间有关海防之妄议”。《圣武记采要》之所以被勒令绝版,看来也还是因为与幕府的政策相抵触的缘故。

永井荷风^②著有《下谷丛话》一书(大正十五年,春阳堂),描写幕末时期居住于江户下谷的汉诗诗人,其中详细记述了鹫津毅堂的事情。对于《圣武记》,他说:

鹫津毅堂因忧虑边海武备,镌刻了题为《圣武记采要》一书。此书是清道光二十六年内阁中书舍人魏源所著《圣武记》十四卷的拔

^① 鹫津毅堂(1825—1882),名宣光,幕末和明治前期的汉学家。——译者

^② 永井荷风(1879—1959),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著名作家,其母是汉学家鹫津宣光(毅堂)之女。——译者

萃。我曾在坊间旧书肆中搜求毅堂的《采要》，但无所获，因览读其原本《圣武记》。(中略)《圣武记》成书之始是道光二十二年，二年后加以补缀，及至道光二十六年，又重加增订，时当我国弘化三年。因此，此书可以说是当时输入我国新书中的最新者。

关于毅堂的《采要》受到幕府禁止一事，他说：

毅堂将《圣武记》拔萃而板刻付印一事，触犯了幕府的忌讳。幕府禁止世人对海防妄加议论而骚动人心，也正是这年五月的事情。毅堂为了躲避地方官衙的追究，离江户去房州，暂以铃木松塘之名隐匿居东洋渔舍。

荷风并且“在坊间旧书肆中购得名为金森慎德者的手录《温故新闻记》若干卷”，发现其中有关于毅堂的一则记事。他介绍了这一记事，大致的意思是：

《圣武记采要》一案，归(江户)北町奉行所^①办理。去年(嘉永三年)12月17日业已发出传唤。此案是，在(江户)牛込区通寺町的松源寺与人同住的浪人^②鹫津郁太郎(毅堂之名)出版《圣武记采要》一书，以印版在神田区松永町的半次郎处印刷。后因该书堆积日多，而外面追查风声甚紧，郁太郎遂未交付印刷租房费用，弃置印版而逃。为此，半次郎将印版等物送缴奉行所。郁太郎的下落虽经查究，但毫无眉目。去年末，半次郎被传唤三次，今春也被传唤三次。今日(2月14日)以“印刷人半次郎罚款三千文”结案。毅堂因行踪隐匿，无法查究，仅对印刷人进行了多次审讯，结果以缴纳罚款了结。

永井荷风何以对毅堂之事进行了这样详细的调查和记述？原来，荷风的母亲名恒，是毅堂的长女。毅堂是荷风的外祖父。而且荷风的父亲永井禾原又是毅堂的门弟子。

^① 町奉行所：江户时代街区行政机构。——译者

^② 浪人：当时指离开主家、失去俸禄的武士。——译者

此外，毅堂于庆应三年担任了尾张藩的督学，掌管学政。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前藩主德川庆胜策划维新。明治初他成为东北某县的权知事^①。后来转为司法官，任大书记官。他还是学士院会员。这些情况详见《下谷丛话》。

以后，《下谷丛话》出了修订版（昭和十四年，富山房），但书中以日文字母译读汉文的方法收进了初版未予刊录的《圣武记采要》卷首所载毅堂序言，并且触及到初版所未见到的关于岭田枫江的《海外新话》及著者所罹灾难。

16. 《云南新话》与“太平天国”读物

前面列举了把鸦片战争写成我国小说读物的幕末刊本数种，并加上了简单说明。但其间省略了一种，因为它也与鸦片战争有关，这里加以补充。

这一种，并不是以鸦片战争为直接中心话题，而是日后谈的性质，写的是“太平天国”掀起反清革命的事情。它作了这样的虚构，即在鸦片战争后与清国贸易的英国，看到太平军声势凌厉，终非清军所能击败，“纵令居心叵测”而派出大军支援清国，但清、英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就是题为《云南新话》一书。美浓纸一半大小的一册，卷首有彩印的清国地图。正文中也处处加进了浅色的插图画。在封面题签《云南新话》之旁，记有小字“一位石灰商人之故事”，封面内也有副题“一位唐土石灰商人之故事”，是嘉永七年（1854）新镌。

所谓“石灰商人之故事”是当时的传闻书籍中把“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传说成石灰商人朱华（字元晔，号天德）。这个石灰商人是明朝的后裔，为恢复明朝天下率农民与清军作战，作为传说流传到我国。《云南新

^① 权知事，协助知事掌管县内行政事务的奏任官。在没有知事的府县，其职责与知事同。
——译者

话》的正文中并未出现“石灰商”其人，但可知此书是以这样的传说为根据的。

此书的开始部分是记述在鸦片战争中清国败北，国势衰微，奸臣酷吏当道，私欲横流，农民备受虐待。于是以一位叫做朱彬的明末后裔、世代受村人尊敬的人为主谋，农民群集反抗官府，从此发端。不久朱彬被推戴为云南王，并且有二股强盗集团入伙，势力日益强大。清朝派出大军进攻也被击溃。云南王的军队乘胜攻陷广西、贵州二省，并且攻入四川、江西。所向无敌，“不出数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江西六省数千里之地悉属云南王所有”，于是，“如今便欲进军攻占南京府”。正当这时“英国前于道光二十一年与清国交战，如其愿而获胜，终于占领福建、宁波、浙江、广东等要港，掠数州之地，设肆交易。今见后明之军节节胜利，清国处境窘迫，不知居心何在，竟以清国之援军为名，发军舰七十余艘，战卒八万余骑杀到”，援助清军。但是云南王的军队攻陷了南京。“狼狈之英军，东倒西踏，连遭打击，不及喘息……，遗弃数千门大炮。尚未立足，便纷纷落荒。在福建府亦不能抵挡。暂欲退回本国，遂向港口撤去，但不知不觉抵达港口之时，后明之猛将范文虎已将战舰数千排列港口，以火船火攻英国军舰，海城闻知，亦将少数残余英舰焚烧，英军败回本国。”小说至此告终。最后，有作者的附记：“前面所著之《云南新话》，乃将明帝后裔举兵讨伐清朝，直至英夷率大军出援清军，而清、英两军均败走南京之事著为前编一册付梓。至于天长地久之胜利，清、明两方孰能竟其大功，则委之于近刻之后编，定当著以备览。文好堂主人志。”

这是一本文好堂主人写的附日文假名著作。至于它的后编是否刊行了，尚无所闻。太平军的入城南京是嘉庆六年3月（旧历2月）的事情，此书是嘉庆七年刊行的，所以只叙说到太平军攻陷南京，大概因为当时我国情报（有也不确实）还没有传来，所以才在此处搁笔。大概准备要写后编的。

另外，这部小说叙及英军帮助清军同太平军作战，这样的传说大概

是有的。但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传说,当时也在流传。我藏有嘉永六年培理来航当时的传闻和问答形式的记述手写本数种,其中竟达三种之多都有这样的记载:

传说近日唐土(中国)明末(后裔)起兵,与清朝作战方酣云。英吉利援明,战斗激烈云。美利坚乘隙,欲攫取日本云。

这些记载有的是在浦贺接待美国使节的人员与力^①樋口多太郎传出来的。但是人们知道,当时我国尤其受美舰的来航刺激,各种传说、臆测本来就已纷纷四起了。

描写“太平天国”革命的幕末小说读物,除前述《云南新话》外还有数种。但是这些书中全部都不见“太平天国”这一国号,也不见其领导人洪秀全(或洪秀泉)的名字,而是一概变成朱氏这一明朝帝王之姓。自然至少就不会谈起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宗旨的起义集团了。任何读物都主要说成是明王朝的后裔朱氏揭竿而起,反对清朝,图谋恢复明朝这样一种叛乱的军事暴动,并在各地同清军交战。大都是以军事记述或军事记谈一类的战斗争夺为中心的读物。

这些小说,大半都是根据当时(嘉永年间)从福建及其他地方的唐船和从朝鲜等地传到长崎的传闻写的。这种传说在我收藏的以《清朝骚乱传闻书》为题的抄写本中也有嘉永六年2月的2种,同年4月的2种,同年6月的1种。这6月的一份是对马宗氏的家臣从朝鲜翻译官听到后报告幕府的,稍稍接近真实,但也是一份简单的情报,是一份被各种手抄本所转录的东西,而其他各种则几乎都是一些添枝加叶的离奇谣传而已。不过,一致的地方是前面提及的都说主导者是明朝后裔朱氏,是一个企图恢复明朝的暴动集团。这些小说中只有前述6月的一种把主谋者写成“洪姓”,但同样也说是为了恢复明朝。

太平军的进入南京,前面已经提到是嘉永六年3月(旧历2月)。但

^① 与力,一种中级武士。——译者

是，我所收藏的这些传闻书中都还没有讲到南京建都，所以我想那是根据以后传来的风闻写的，像《云南新话》就说到后明朱氏占据南京的事，其他小说读物中也谈到这一点。

这些读物在后明朱氏暴动并同清军会战这一点上虽都相同，但其情节的安排，事情的进程和登场的人物等，则完全是与史实无关的任意虚构。不过，其中有个名叫洪武龙的强人，说是指挥后明军的武将，清军被他打败。多数读物都记述了此事。这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传闻书之一把主谋说成为“洪姓”之故，它们就加以采用，进而造出“武龙”这个强大的人物来。但是在这个场合，也一律以明代的后裔朱氏（称为天德）为主，他是帝王，而洪武龙便成为他的辅佐将军。还有一人，是名叫李伯玉的能使妖术的女子。她也是后明军的勇将，到处打败清军。主将朱氏之外，洪武龙和李伯玉之所以都在《清明军谈》、《鞑靼胜败记》、《外邦太平记》等书中登场，我以为是由于所据资料的来源相同。

这里列举一下我所收藏的这些小说读物的刊本：《云南新话》（嘉永七年）之外，《清明军谈》美浓版5册（嘉永七年序）、《鞑靼胜败记》美浓版5册（无刊行纪年，被视为前书的后编）、《新说明清会战记》美浓版5册（嘉永七年刊行）、《外邦太平记》美浓版5册（嘉永七年序）、《满清纪事》美浓版5册（无名散人序，纪年缺）、《清贼异闻》美浓版5册（有青卫山人的“附言”，无纪年）。

这些书都和先前列举的描述鸦片战争的小说读物类型相同，卷首绘有地图和登场人物肖像，正文中也到处可见双联页的绘画插图。杂以平假名，汉字有注音。其中《清明军谈》卷首的“例言”有下面一段文字：

一、此编根据中国人提供之文告。其文载称，朱氏名华，字元晔，四川石灰商，自建年号为天德，于广东各州募兵，浙江妖妇李氏率兵加入。

.....

一、据其本宗之稟状称，朱氏自称大元帅、天德帝。洪武龙于广州郎山有寨，助朱氏。（略）

一、石灰商之前回，为乾隆、嘉庆、道光三帝各代治乱之记述，意在叙明朱氏之兴起非一朝一夕之事也。（略）

这里说“为乾隆、嘉庆、道光三帝各代治乱之记述”，但这并不是“石灰商之前回”写的，而是在第3卷里。是把道光朝代发生的鸦片战争，从开端至讲和，以“清英会战”为题写成了完全独立的一章。

在《鞑靼胜败记》一书里，和《云南新话》同样写成清国方面请求英国援助，不但有沿岸港口屯驻的英军，还从英国本土运来援军，但都被击溃。

另外，洪武龙、李伯玉想必是我国小说家任意添加的人物。但认为它多少也有所根据，那就是在来航长崎的清国贸易船只传来的嘉永六年2月的传闻书（收载于前述拙藏《清朝骚乱传闻书》）中，可以看到有：“贼寨名叫朗山”、“贼首之中有妇人一名、僧人一名，施妖术”。

《清明军谈》一书的最后结尾是说，朱元晔率领洪武龙（大元帅）、李伯玉（副将），重新攻陷南京，以此处为王都，称天德帝。“改变满清之风俗服装，恢复大明之政”，所以“中华立分为二，大体未酿成骚乱”。随后，在这里附加好像是广告的文字说：

由此，鞑靼也在北方起事，攻袭大清旧国原在满洲之都城，直至攻入宁古塔、黑龙江，归属天德帝。又英吉利援清出战，亦因慑于武龙之智勇、李伯玉之妖术而降于后明。清主咸丰爷亲执铁钺，数度大战不利，直至北京燕都被攻陷。有趣之异闻珍说，忠臣节妇事迹，神佛灵验等方方面面之现今中华情况，将毫不遗漏详尽加以记述，作为后编出版。

这是说，北方的鞑靼（蒙古？）也起事，呼应南方的天德军，攻袭清朝旧国满洲，英吉利也投降后明。这恐怕也是原封采自嘉永六年向长崎镇台提出的报告书中所说的话（汉文）：“拥元晔为朱新王也，诸港英夷亦属

焉。秋八月，清主咸丰爷亲征之，不克。鞑靼亦起兵于北方，檄声言助朱氏。袭清之旧都据之，进略宁古岛云云。”（《清朝骚乱传闻书》收载）

《鞑靼胜败记》，是以上述汉文传闻书为主体，加上种种枝叶使故事复杂起来的一本书。但从《清明军谈》书尾附记的话来推测，则可以说是它的续编。

《清明军谈》的卷首“例言”末尾署有“青卫主人识”字样。又封面内有“青卫塾藏”字样，并且卷末的识语预告有续刻，那么《鞑靼胜败记》就是承接这一预告而写的了。所以，《胜败记》被看作是《军谈》的续编。但是前面谈到的《清贼异闻》也有“附言”，文末也署有“青卫散人述”。这样说来，《清贼异闻》也可以说是《清明军谈》的续编之续了。不过，青卫主人（或青卫散人）是何许人？尚不详知。谈不出确切情况，所以这里只附记了一些推测。

但是，《清贼异闻》和其他小说不同，它是以清军的最后得胜及平定局势而结尾的。朱氏占据的南京终于也在清军的激烈攻击下陷落，“大清天下重奏太平”。

此书的首页有目次，目次之后有“附言”。

“附言”说：

后明朱天德（帝）自起事以来，前后历时五年而灭亡，大清遂唱太平。

接下来又说：

然该国仍有名为小刀会之奸贼，横行于数国之间。为此，官兵虽屡屡追捕，未能灭除。是以据闻尚未臻于四海静谧，此或中华官吏柔弱之所致欤！且彼贼徒坐大，其事实尚不详。海外之习俗风气仅凭书籍阅知，吾人不临彼土则不能察其细密，唯止于论评而已。青卫散人述。

所说太平天国军起事后历时 5 年就灭亡了，是不妥之词。应该说是

前后达十五六年才灭亡的。这部小说想是嘉永末年或是安政初年写的，约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的初期。

但是，文中所说“小刀会”仍在数国之间横行一点，其他小说中都未见到。

“小刀会”被看作是明朝灭亡以来，潜在于民间的反清组织“天地会”（又名“三合会”）的一个支派。它不是标榜基督教教义的，只在“反清”这一点上和“太平天国”一致。太平军崛起的初期，人们认为也吸收了这个“天地会”系统的反清组织，太平军侵入江、浙一带时，从广东、福建、浙江各地集中到上海的“小刀会”党徒和该地的会党结合起来，太平军进入南京城不久，他们就与之呼应，终于在嘉永六年（1853）8月（旧历）占领了上海县城，^①（领导者是广东省潮州人刘丽川）。接着谋求南京“太平天国”的合作和援助。但是，由于派出的密使途中被捕，没有成功。上海主力军陷于孤立，一年又五个月就失败了。作为同“太平天国”的反清革命联翩起事的“小刀会”造反，由于地域上两者也接近的关系^②，所以当时很快就传到我国，大概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下节想要谈的《满清纪事》，就是以“小刀会故事”为副题的。

此外，关于“小刀会”占领上海一事，《同治上海县志》卷一的“历代兵事”项中做了详细记述。又黄诠释所著《枭林小史》（1935年，上海通社《上海掌故丛书》收载），记录了他作为目击者整理出来的见闻。这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传述了真相的东西。

我所见到的近人写的文章，徐蔚南的《上海小刀会乱事的始末》（1937年3月《逸经》第26期），可以认为是整理得很好的记述。^③

^① 虏获了清朝的苏松太道台吴健彰，杀了上海知县袁视德。

^② 上海及附近的嘉定、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6县迅被占领，更有西上袭击太仓之势，地理上自很接近。

^③ 另外出版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对“小刀会”的关系史料广加收录（也搜集了《北华捷报》的记事等外人方面的资料）。书页过千，此书的“上海小刀会起义综叙”一章，就小刀会的活动及其历史社会背景等做了综合的归纳整理。

又该期《逸经》同时还刊载了简又文译自 1853 年 9 月及 10 月 1 日《北华捷报》上发表的牧师 Yates(晏玛太)写的《小刀会占据上海目击记》和牧师 Roberts(罗孝全)写的《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

17. “小刀会”和小说《满清纪事》

“小刀会”起事的情报，似是进入长崎港的清国船只传到我国的。《嘉永明治年间录》(明治十六年，吉野真保编)第 3 卷中就收录有这种情报。

这是安政元年(嘉永七年)闰 7 月“开入长崎港的清国船只对该国骚乱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情报上，“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的姓名赫然出现。这正是前面所举《清朝骚乱传闻书》收录的嘉永六年各种传闻中所没有看到的。而且这个传说比起前一年的传说具体得多，可以说客观的地方较多。但是，提到“洪、杨二贼预制木偶人，呼为天德帝，至表尊敬。兵马之进退祈之木偶人，循其显示，以为决断。毕竟亦有妖术，云云”等，这种地方是原封采用了谣言。虽然有这样的例外，但大体上说，看法是具体的，现实的。这里试看下面的引文：

兹呈报当时(现今之意)清国骚乱之状。敬悉垂询之旨，骚乱自道光三十年顷趋于激烈，广西、广东无类(赖)贼徒相聚。有名洪秀全、杨秀清者二人为首，同类与日以增，胁从者亦不少。或二三千人一股，或四五千人一股，各处扰乱，乃至袭击官府，攻占城郭。使用大炮、地雷火器等，颇通军略。据闻多能齐心相处。此辈一律结发，头缠红巾，故官军称之为红巾贼或长发贼。

昨丑年二三月顷，江南之扬州、镇江、南京三地贼势尤大，聚集四五万人，夺占三座城郭，官员战死者不少。渐致邻县官军纷纷出动，京都(北京)派出钦差大臣，至十月，扬州迅得收复。贼党皆逃集镇江、南京坚守。官军围之，切断两地通路。南京为明太祖建都之

地，若能占据至关要害之处，当可迅即攻下。（中略）

此外，尚有另一种贼人，称为小刀会，据传系福建之贼。素日混迹于良民群中，为谋生计遍历市间，一有暗号便集聚一处，劫夺民财。彼等之汇合各自暗带小刀，任谁接头皆以小刀为符契。但不屠城池，不占州邑；只夺财宝，遂即散至各方。嘉庆、道光之际各省既已有此贼类。据闻不断扩展，近日其势益盛，已于去岁八月以三千余人攻入上海县，劫掠官军，县令亦遭袭击云。（下略）

闰七月 王氏船主·江星禽(畜)

十二家·杨少堂(棠)

在这份报告书的最后，另纸列有：“上述骚动之州郡有广西、广东、江南、扬州、镇江、南京、福建、上海、湖南、湖北、武昌、九江、满洲（原文如此）、苏州”等语。末尾并有：“上述各节系来朝之唐人所传，兹谨日译呈上。”可见这是来航的清国船只传来的当时情报，由船主向长崎官厅提出，由翻译人员译成日文的。

取材于“小刀会”的我国小说读物，无疑是根据这种传到长崎的传说。尤其南京被反政府方面所占据，又加当时上海县城（不包括租界地区）被占的消息，在我国也引起相当大的震动。读物作家抢先采用了这一消息。但是，对于具体的状况经过并不详知，只是些酌情虚构的东西，特别是些属于以攻防战斗为主体的军事记述。

《满清纪事》的封面内的中央用大字写有“满清纪事”，右首写着“小刀会话”，左首是“金圣阁梓”。“金圣阁”是何处的书店？因为版权页上没有注明，无从得知，或许是从七十回本《水浒传》的编订者金圣叹取来的假托之名。这部《满清纪事》小说的主人公是“洪秀泉”，这是其他小说中看不到的。当时“洪秀全”也写作“洪秀泉”（全与泉音通）。即使在中国，当时有关“太平天国”的纪录文书中，也常常出现“洪秀泉”。尤其官方的文书，如王先谦的《咸丰东华录》等就写作“洪秀泉”。据说这是因为对清朝来说他是个逆贼，故意避免称呼他的本名之故。

在《满清纪事》中，洪秀泉是“小刀会”的首领（这不是史实，其实“小刀会”的首领是前面提到的刘丽川）。另外，同党的杨秀荣（以秀泉的父亲之弟的身份出场）我想实是杨秀清（仅次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实力人物，后来，因和洪秀全争夺“天国”的领导权被杀）的稍加变形的名字。

但是，这部小说的内容完全是虚构的。作者有自序，大意说：“阴历十月中旬，秋雨阵阵，正是寂寞凄凉之时，我草屋檐下，有人暂避阵雨，寂然伫立。呼请入室，款待以茶，相与畅谈。语及此人旅居长崎时得知的唐土人士传闻很多，这恰是我之所好，足资消遣。俄顷，响起晚钟，其人惊起告辞。我再三挽留，甚至劝他留宿，但被谢绝。别时由包中取书物一卷赠我，说是此即刊载近日该地珍奇佳话之书。事后阅读，全是惊人的奇闻珍说。深以与其独自一人读而乐之，莫如令世人众皆读之。但该书全用汉文撰成，爰为之改写为今之假名日文”等等。当然，这定是编造之词，末尾署有“无名散人”，没有纪年。

自序之后排列了这本小说主要上场人物的肖像画，每页着色。分别是：“小刀会总主将洪秀泉”、“小刀会第二栋梁杨秀荣”、“小刀会魁首苏意”、“处州刺史、吕伯之智臣朱韦，后为小刀会军师”、“腾越县主邓顺，后入小刀会者”、“云龙山大盗赵角，后加入小刀会者”。每个肖像都附这样的说明。正文中各卷也都时有占二页通版的绘画插入。

卷一的头一章和第2章虽然分别题为“大清太平小刀会贼众之滥觞”和“洪秀泉之生平”，但是，在它的描述中全然看不到今日所传“小刀会”和洪秀全的史实经历痕迹，是虚构的。

这部小说的梗概是说，扬州甘泉县有个所谓侠客洪全忠，是个无赖之徒。后来成了强盗，不久，被捕处刑。他的年幼独子叫洪秀泉，由于有这样一个作恶多端被捕判刑的父亲，受到近邻人们的耻笑鄙视，由此生恨，决心要当一国之主，向侮辱自己的人报仇雪恨。这时，有位老者苏意，自身也有这份志愿。但因年已老迈无望，想要秀泉继

承此志，遂把南蛮之人传授他的幻术教给秀泉。并告知他有所谓“小刀会”同道结伙帮会，还将当作同伙符契的小刀给了他。这样，秀泉学会了幻术，用以惩罚恶人，反抗官府。此外，杨秀荣及其他有力的同志参加了“小刀会”，同官军屡屡交战。大都是军师朱韦指挥作战。最后，在云南临南县（？）石屏城固守。北京官军前往攻打，但失败退走。小说到此终结。

在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像其他读物那样全都以恢复明朝这一大义名分为主题的痕迹，只不过是和官军展开的攻防战罢了。

如果就全部内容稍做研究，那么这部小说的依据就是本节开始所说的“进入长崎之清国船只对该国骚乱情况的报告”（或同类的东西），似是由此得到启示而撰写成书的。

在这份情报中，毫未提及扰乱各地的集团是反清扶明的政治集团。像“小刀会”，只被说成是单纯的抢财盗物集团同官军交战，完全不见什么大义名分，只是争夺天下的交战。

再者，该小说中之所以说主人公洪秀泉施展幻术，想必是得自上述情报中所说“毕竟亦有妖术”的启示。

于是，小说写到洪秀泉的老师苏意死时，说秀泉“亲手削木，制成老师的木像”，向木像祈祷。每逢带领党徒归来，都向此木偶举拜，“立下结义誓言”。所写的这种情况恰恰符合前面提及的情报所说“洪、杨二贼预制木偶人……至表尊敬，兵马之进退祈之木偶人，云云。”

从这样一些地方看，可以说小说《满清纪事》，是用前述情报书为底子编造成书的。

与这部小说《满清纪事》相同，有一本也用《满清纪事》为标题的记述“太平天国”之事的书，此书为木活字本一册，用汉文写的。原是一份清国人的笔写纪录。写这份记录的人，在培里舰队服务，嘉永七年1月来航我国时亲自传来这一记录。开始以抄写本流传，后在安政初期，以木活字本印行。但在内容上它和小说《满清纪事》并无关系。

这另一种的《满清纪事》，是从“太平天国”的发端叙起，最后讲到1853年(嘉永六年)占领南京，在南京的建都经过，以及一面定都南京，一面又在各地和清军继续作战到同年7、8月间的情况。是一部按年月日作出的具体纪录。今日看来，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史料性质的纪录。

18. 《满清纪事》与《粤匪大略》

还有一种《满清纪事》，不是小说读物，而是事实经过的记录，是以当时的传闻为根据的。今日看来，作为史料也有可参考之处。尤其因为它收录了其他史料中罕见的太平军或其同系统起义集团的种种檄文和布告，中国的研究者也常常加以引用。

这本书也是从鸦片战争败北开始，记述了根据和约实行宁波、上海、福州、厦门、香港开港。接下来是夷人在各地设立耶稣教会等。尤其广东地方，社会不安，强盗横行。这时候，洪秀泉(这本《满清纪事》也写作洪秀泉)在香港经由英国牧师接受了耶稣教，阅读圣经。夷人让他在广西传道。冯云山(后为太平天国领导人之一)也在澳门入了基督教，并回广西传道。有人曾以用耶稣教蛊惑人心为由向官府告发他们，官府想逮捕他们。洪、冯就纠合乡民抗拒官兵，终于在道光二十八年(?)揭起反旗，这一反官府集团渐次壮大，清廷派出讨伐之师，但未能取胜。

洪秀泉等率领乡民蓄髮(废除满清的强制留辫)易服(将满清服制改为明朝服制)，禁止掠夺百姓，法律严整，行军有纪，宗旨在于恢复明朝，专与满清为敌。奋勇直前，犹如楚霸王项羽那样破釜沉舟(决死而不后退)。在运用机谋上，仿效汉朝光武帝的揭起中兴之旗，云云。

有如上述，此书叙述了太平军的军规严整，奋勇直前的状况，记载了在各地与清军交战及奇谋袭击之情景，并分别记入了年月日。

起义军曾一时止于广西永安。咸丰二年(嘉永五年)离该地围桂林，

忽然又撤围而进入湖南省。沿途攻陷各都邑，围起了长沙；但中途又撤围而攻陷洞庭湖的岳州。随后攻占湖北省的汉阳。于是攻入汉口，占据武昌。由此乘二千余艘船只顺扬子江南下，破九江、安庆、芜湖，终于攻陷了南京。洪秀泉修复了明朝的旧宫殿，居住其中。住处内外挂有二副对联。书中这样叙述之后，还收载了对联的文句：

其一：独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气象

单心报国除清外域异衣冠

其二：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

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

这对联颇为吉田松阴所喜爱。安政二年他把这本《满清纪事》翻译成《清朝咸丰乱记》(明治四十二年，吉田库三编，民友社出版部《松阴先生遗著》第二编)时，就将对联载在书前。^①

这本《满清纪事》的最后部分也有讲到“小刀会”起义的地方，但是把“小刀会”的事情作为追加补充一般的东西对待，主旨始终是以太平军活动贯穿全局。不过，它记述了1853年2月太平军进入南京并建都(称为“天京”)于此，直讲到是年7、8月间各地交战状况而告终。它所记述的事情，虽然同今日中国的详密研究(中国已出版了种种研究书籍，现在南京有“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很多文物史料，还出版了这些文物史料的图录)并不一致，但可以说是最早传来我国的一本有关太平天国革命进展稍近真相的具体全貌之书。

另外，和《满清纪事》大体同时从中国传来我国(经由何种渠道不详)的还有《粤匪大略》一册(安政元年，长崎绿天山房，训点日本刻板)。书中称道光三十年(1850)“于浔州桂平县之金田墟，逆匪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胡以洸(晃)、范莲德、罗亚旺等结为‘拜上帝会’，

^① 《太平天国史料》(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本)中“天地会文书”里面“万大洪晓谕”也在开头刊载了后面的一联，但“直扫”变成了“直到”。

自称太平王，遂择十月起事。”（原为汉文）记载了洪秀全、杨秀清等在道光三十年十月于金田举兵号称太平王的事情。《满清纪事》一书并未记述金田开始起事一节，像结成“拜上帝会”那样的事也没有写。我要说，从这一点看，《粤匪大略》一书是出自更加通晓真相者之手的。

并且，该书逐年逐月记录了各地的攻防战斗，最后终结于：“咸丰四年正月，钦差大臣胜保攻占山东临清州，贼匪（太平军）复逃山东高唐州，该城终于失陷，此乃五月之事。”（原为汉文）因此，这是截至咸丰四年（1854）五月的记录。

翻刻者在此书的序言中说道：“阅此书方悉事之始末，而知海内俗书之伪”（原为汉文）。我想这或许是意在指摘坊间小说读物的荒唐无稽吧！

我认为通过以上《满清纪事》和《粤匪大略》二书，我国在嘉永、安政期间便知道了太平天国颇为具体的情况了。

《粤匪大略》原是中国书籍，是由中国输入我国的。这一点，可由它的前半部分与现在南京图书馆所藏《粤西桂林守城记》（见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的抄写本文章一致而得知。

但是，《粤匪大略》汇集成书后，可能在中国并未流传，因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的《太平天国史料》（1950年，开明书店；1955年中华书局重刊）中，是根据日本刊行的抄写本收录了此书的。

《满清纪事》一书的原手稿本，是由著者自己带来日本的。该书也未在中国流传，后来逆输入的。嘉永七年，培理作为美国使节航抵浦贺时，在香港雇用的汉文秘书，负责撰拟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汉文文书（据说要提出英文、荷兰文和汉文等三种国书），并代替翻译用汉文笔谈的广东人罗森（字向乔），随来我国。回航时仍在香港下船。《满清纪事》便是他带来的自己的手稿。关于此事，从罗森回国后向香港月刊杂志《遐迩贯珍》投寄的《日本日记》（1854年11月—1855年1月）一稿中可知。另外我收藏的以《金川游记》为题的笔写本（“若树文库”旧藏印）中有罗森和日

本人某某(隐名)的问答笔谈,其中也提到此事。

并且,我现在收藏有《日本日记》抄写本一册,而且,《大日本古文书》的“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也作为附录之一(大正二年,东京帝国大学编集兼发行)根据当时的抄写本收载了它。^①

关于《遐迩贯珍》前面也曾略略谈到过,并介绍了吉田松阴和幕府的外交长官岩瀬忠震(肥后守)等人见过此件。在幕府的海防部门担任外交事务的川路圣謨,于安政元年作为俄国使节接待人员出差下田,在他的《下田日记》中也说:

担当美国人携来的《遐迩贯珍》一书之抄写。

一个幕府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竟然担当这份香港出版的汉文杂志(英人传教士编辑)的抄写工作,这说明当时是如何把它作为海外知识来源而倍加重视的。川路还这样写道:

此书系唐土香港所出,英人编辑。1册15文,按月出售。一如世界之传闻书,不以横写文字而以汉文独将所谓西洋新闻报纸(俗称荷兰传闻书——原注)中有益之事写出。横滨订约之时(吾人)狼狈无措。须知桅杆虽高不如望远镜,可以眺望四方,此杂志远比日本人之传闻详细(其细节为人人所欲知)。

《遐迩贯珍》受到这样的重视,成为当时的外交当局和一部分有识之士的瞩目所在。该刊所载的《日本日记》(该杂志编者写的前言中只提到“一唐人”的“所见所闻”,没有罗森的署名。但根据内容可以明白是罗森、字向乔写的东西)也是有关当局和好事者争相抄写,备于手头之物。

《日本日记》中写道:

有名平山谦二郎者,其人纯厚博学,来问中国治乱之端,余示以平日所记之事及治安之策。(原为汉文)

^① 据说“现在觅寻原本”《遐迩贯珍》是不可能的事情。

平山谦二郎是幕府的密探人员，当时是接待美使部门人员之一，《日本日记》中收载了他写的书信：

据称，昨日因接待事务，尚无暇详读，故拟将册子借回，意欲通读一遍，日后拟送还横滨会馆（罗森之宿舍）。是故，余与之。读毕乃送还，并有函复我，意谓（中略）顷者，承蒙惠借南京纪事及治安策二册子，熟读数回，始悉中国治安之况，并知罗向乔学术之纯正。云云。（原为汉文）

就这样，平山借回了罗森（向乔）写的“中国治乱记录”（南京纪事），想到要抄下它来。开始是辗转传抄，后来不知何人用木活字印行，这时候就加上了《满清纪事》的标题。

前面已略提到，吉田松阴于安政二年，以《清朝咸丰乱记》为题，把它翻译出来。但说：“原书不知何人所著，亦无书名。”可知松阴依据的是当时流传的抄写本。而且木活字本印行的时候，才开始有了《满清纪事》这个标题，这一点凭下面一事可知：该书第一页的起始处印有标题《满清纪事》，其下用小字体作了行间小注说“此编原无标题，世人或称为《满清纪事》，今姑从之。”（原为汉文）

再者，在无名氏的《金川游记》中所见到的与罗森笔谈，可以说暴露了当时日本识者对太平天国的知识程度。某某就“清朝之乱”频频提问：“太平王小刀会是何姓名？”罗森回答：“洪秀全即太平王也，非小刀会”；问：“其势如何，已取南京乎？”答：“今已失去南京”；问：“美利坚援太平王乎？”答：“不援，亦不恶之”；问：“英夷援清乎？”答：“两不援，各夷自卫而已”；问：“天道今将谁属？”答：“未可知也。”等等。

这位罗森的诗作及书法皆佳，因此，在当时我国官员和儒者之间似乎颇有好评。他们之间互相赠答的诗也见于《日本日记》。还有许多人得到他题诗的扇面，《日本日记》说他在一个月当中竟题写了 500 多把扇面。

然而他的“南京纪事”，亦即《满清纪事》，后来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出版的《中国近世秘史》第二编（扪虱谈虎客编，上海广智书局），才根据东京帝国图书馆收藏的署名为“洪”的抄本，予以收载，是被逆输入中国的。而在它的编辑过程中，字句却颇多窜改。这关系到了内容，人名等自然也出了错误。^①这个窜改本仍被中国的太平天国研究者作为史料利用，也出了错误。关于此节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过，因为已做过论述考证（即《“满清纪事”及其著者——关于我国所传的太平天国》），本书收录），这里从略。

19. 《外邦太平记》与《新说明清交战记》

作为描写“太平天国”反清斗争的小说读物，下面打算谈一谈《外邦太平记》和《新说明清交战记》的内容。

《外邦太平记》卷首有“甲寅（嘉永七年即安政元年）立秋”纪年的“磐上轩主人”写的汉文序言。汉文甚怪，最后说：

其示劝惩于儿女辈，助成世教之一，玩味不置，亦皆幸也，云。

（原文）

接下来是双联页的彩色地图“唐土皇舆之全图”、“京师总图”。其次有“大清元帅吴阵友”、“咸丰帝后宫刘辉”、“大清奸臣宁武曲”、“明末勇臣函光”、“鞑靼勇将丁金虎”的绘像。再次是“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尊亲之宝”、“天子之宝”等夸张文字的大朱印，究作何解，难以判明。正文中各卷都分别有二至三幅双联页的插图。

书中由标题为“北京城中议军事”、“官军进发石头城（南京）”的章回开始，接着有“李白玉妖术潜敌阵”、“洪武龙智破官军”之类的章回。和

^① 例如天地会一派的檄文中，有的署名万大洪，《中国近世秘史》改为“万岁洪”，如果说“万岁洪”那就成为天王洪秀全了。

前面说过的一样，“李白玉”和“洪武龙”十分活跃，和来犯的清军展开激战。最后，以北京的大军压境，柳天宠（南京军的武将）向洪武龙发出紧急报告而告终。不过，小说末尾加上了如下的附言：

且说，尔后吴阵友（清军大将）与洪武龙两雄斗智，一决胜败。护明军一度败于吴阵友手下。天德王诸将战死之后，仍以仅少之士卒进行防卫之战，但终于大败。天德王元晔只身隐匿。至于借明末勇臣之助雪耻复仇并统一大明之后话，请看下回。

由此可见，作者把结局预计为明（？）的统一。但是没有听说这部小说有后编出版，即使出版了的话，明代统一之说也不合理。

这部小说的第一回，题为“北京城中议军事”，它写道：

明之末世子孙姓朱名华，字元晔，流落民间。其性宽仁，器度大方。恰逢时机来临，清朝制度不正，民不相从，怀恨在心者甚众。据此，朱元晔、李白玉等人制定谋略，攻浙江。江西鄱阳湖之战，胜赵元宗，势如破竹，直围应天府（南京）石头城，城将大惊，弃城而逃。因此，明将进入石头城空城，军威大振。故各地纷纷降服，其数难以枚举，恰似蚁集，势力迅称三十万云。顷者，咸丰三年五月，元晔受推即位，尊为天德帝，改年号为天德元年。（下略）

所以说，这像是得到太平军占据南京的传闻后写的。太平军进入南京是咸丰三年（嘉庆六年），而这部小说的撰写时间，据序言的纪年是“甲寅”，即进入南京的翌年。中国的新闻竟如此迅速，于第二年就在我国出版了小说读物而流传开来，其反应之快速令人惊叹。或者可以看作是，在由培理来航激起的时代剧变中，这正是敏感的国民感觉的表现之一吧！

但是，连这部小说也没有说反清军的领袖是洪秀全，而说成明朝后裔朱元晔。说朱元晔即位天德帝，是根据前一年即嘉庆六年的传闻（见

于前记《清朝扰乱传闻书》等)。不光是《外邦太平记》，其他像前述的小说也都很快陆续出版，这反映了捕捉此种新闻的传闻书在我国激起的波纹所具冲击性和扩散性。

《新说明清交战记》也是完全虚构的，但冠以“新说”二字，或者是强调其“特别”意义上的虚构。所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其他小说中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这部小说把明末指挥反清军的郑成功(母亲是日本人)一派的子孙结合在内。另外，这部小说将南昌而不是南京说成是明(?)都，这和其他小说不同。

小说卷首彩印了双联页的清国地图及出场人物彩印肖像绘(4页)，各卷的正文中也时有插图，这和其他小说类型相同。

封面内标题的右方印有“嘉永七年甲寅仲秋新镌”，左方为“禁买卖”，其下为“山丰轩”，这恐怕是出版书店假托之名。

卷首的清国地图上，明(?)军攻略之处涂淡红色，有如下的说明：

清国划为二京十八省，所谓省相等于日本这五畿七道，□□□□之内(填入文字)省之符号也。府为诸侯之城池也，明之末(裔)兴起以湖南省南昌府(用湖南省换称古名之江西省，本文有注)为临时之都，建年号为天德。迄至此时，明之略地(地图上)分别着色。今后归属明朝之地将于后编制图，务求详尽(中略)。此刻明(?)所据有之地凡四十八国，并有四岛，其里数较日本国土尤为广大。

在这个地图上，除攻略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而外，属于江南省(?)的镇江和安庆也被攻略。属江苏省的南京一直画到北方，未加攻略。

在正文之前，有相当于作者序言的文字如下：

此文乃某人之设想，急需予编述，故文章不遑修饰，误字亦多，仓促成稿。(中略)书名亦由《明末群记》改为《交战记》，其故在于书商，编者无自由。困于生计，徒唤奈何！左亦需钱，右亦需钱之我，

独能不媚时尚乎？！话虽如此，就衰世形势之传闻，杂乱记其梗概，由此以引致看官关心时势。（下略）

意思是说，受托编述此书是事出突然。开始定名《明末群记》，根据书店的意思改题为《交战记》。本是为了稿酬才写，但也不是不趋附“时尚”，读者也必须留心时势才行。可知，当时书店竞相出版可以了解（？）时势的书物。这段文字的最后，有“编者铃成再记”字样，铃成是何等人物？不知其详。

试看此书的内容，起头是清国败于鸦片战争：

国威下落，外为诸国所轻侮，内则万民不顺从。（中略）文官、武官耽于享乐，武备不修，人民荒怠。（中略）社会甚不平静，政道日渐衰微。各处强盗蜂起，焚烧屠杀，劫财夺女，而官府柔弱，知而不加追捕。既已不恤下情，黎民涂炭更甚，不分男女老少，贤与不肖，无不怨恨于上。

这样首先说明了具有发生叛乱的社会可能性的时代特征。由于是这样的形势，福建省露霜县（？）出现了一位女豪杰叫东花娘。她聚众举兵，成为再兴明朝的主导者，而且在湖南省寻访到明朝后裔（福王庶子）、现为农民的朱鸟，带归福建。与清军屡屡交战，要使朱鸟再兴明王朝。并且，为帮助东花娘再兴明朝而同清军以及野心勃勃援助清军的英国军队迭次交火的还有元帅甘照、勇臣郑天麟等。其后将根据地由福建移到江西南昌，在这里筑起都城成为明的国都。建年号为天德元年，朱鸟即位，册封各功臣。清大军（加上英军）压境，来攻此城。小说到此结束。末尾有作者的附言：

作者曰，上述各节系就传闻原状，按腹稿编述者，错误遗漏不少……缺落之多不遑枚举，此皆出于不失时机，仓促急就，以至于斯。（下略）

这和前面说的话相同。

《新说明清交战记》把郑成功的子孙结合作为讲说的主线,这和以前所列举的各种读物不同。开始写的是,把东花娘的出生跟地方上为纪念郑成功的自杀之母建立的“操塚”结上了因缘关系。

东花娘的母亲方氏是美女,因而被福建军门(原注称军门与日本的“探题”相同)强夺,但脱身后投水,漂浮到竖有石碑“操塚”之处。这座“操塚”,是昔日郑成功之母投河自尽,尸体漂浮到此,当地人把她埋葬于此,并建立了这一石碑。方氏漂到此处,在“操塚”石碑前祷告时,石碑倒地。出现了所谓方氏此时怀孕的“奇事”,而方氏生下的婴儿便是东花娘。此书卷首的肖像绘第一位是“再兴大明国之魁首东花娘”,还有“再兴大明之英勇功臣、当今国姓爷郑天麟”,以及“再兴大明之大元帅起龙先生甘照”。

东花娘完全是虚构的,郑天麟在小说中是郑成功的子孙,甘照是郑成功部将甘辉的子孙。郑成功及其部将甘辉,是当明末崇祯皇帝因李自成反乱而在北京缢死(1644)后,在南方拥护明朝正统并始终抵抗清军的人物。《新说明清交战记》的作者把郑成功和甘辉的子孙推出了台:郑天麟、甘照听到东花娘揭起兴明的旗帜,为了支援福建的东花娘,便从台湾驰往参加。

郑成功反抗入侵的清军而屡经战斗,曾进袭南京而遭失败,最后退至台湾,以此为根据地坚持抵抗到底(其父郑芝龙中途投降清朝)。其母为日本人(田川氏),也因为有这种关系,故曾向德川幕府请求援兵。他的名声早已为日本人所知。尤其正德五年(1715)在大阪竹本座(剧院)上演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国性爷交战》一剧,他成了主人公“和藤内”(甘辉也作为他的异母姊锦祥女之夫登场),此剧连续演出超过三年,声誉惊人,博得人人喝彩,他成了众所周知的英雄。所以,《新说明清交战记》才利用了它。

甘辉是郑成功麾下一位勇敢武将,这见于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康熙十年序)卷一一中。但他又是一位有谋略的将官,这虽然也见于作为南明史(拥戴被逐离北京、逃至南方的明朝后裔的反清抵抗史)史料的清朝徐鼒所著《小腆纪年附考》(20卷,咸丰十一年序)(但将甘辉写成甘

（辉）。然而郑成功攻袭南京之时，甘辉“马蹶被获，曰我甘国公头可断，志不可易也，戟手骂不绝，遂遇害。”（原为汉文，同书卷一九。引文据中华书局1957年版——译者。）传说是这样壮烈就义的。①

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将明末反清斗争很快传来我国的《明清斗记》（10卷，宽文元年序，长崎居民前园增武辑稿），也大体相同地说，甘辉与清军交战败北，被擒投狱，自碎其头而死。其后很久，享保十年（1725）另外出版的小说《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19卷，著[译]者不详）中，以“函辉”之名出场。他劝郑成功赶走大冤（台湾）的荷兰军队，以该地为根据地。他并且亲去台湾与荷兰军交涉，使之归从郑成功。但在担任思明州（福建省厦门之古名）总督时，因成功的叔父投降清军而败退，援救了成功的夫人林氏及其子锦舍，自己出海而逃。书中是如此描述的，《新说明清交战记》似是受了它的启示。

另外一点是，《新说明清交战记》之所以使作为甘辉之子孙的甘照，伴随作为郑成功之子孙的郑天麟一起登场，使他作为反清军的元帅活跃着，也许是因为受到了木村蒹葭堂训点校刊的郑居仲著《郑成功传》（上下2卷，明和八年序）的暗示吧？因为在这一《郑成功传》的翻刻本中，甘辉之名以其他史料所见不到的程度屡屡出现并活跃着。

另外，《新说明清交战记》的作者似是一位读书家，他引用了《清俗记闻》及《荆楚岁时记》等，对地名及职名也加上了注解。

20. “太平天国”传说与大盐平八郎

关于取材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幕府末期我国出版的各种小说读物，已经分别作了简略的考察。但是，不以小说读物形式而以历史考证（？）

① 出版更早的《小腆记年附考》所列参考书中，举出有江日升著《台湾外记》（康熙四十三年陈祈永序，30卷），是一部史传小说体的书。它也写作甘辉（辉与辉同），在他最后誓骂清将而被杀的地方，文章大致相同（但《台湾外记》则写作南京败退后，甘辉在崇明被捕身死。）。

形式出现的令人瞩目的作品，在大正年代颇多尝试。这里愿作为一个插话来介绍。我认为这也是为中日关系史增添色彩的一个侧面。

我藏有一本叫做《南京秘史》的40余页的小册子。这本《南京秘史》标有副题“所谓长发贼的真相”。所说“长发贼”，不待说是指“太平天国”集团而言。小册子的版权页印有昭和十九年“大亚细亚建设社”发行。

根据序言所说，这是上年《大亚细亚》杂志发表的“史谈庄主人”井口寅次的文章之再刊登。另外还附加了一篇，即把昭和十九年该杂志刊载的牧常春所作《大盐平八郎论》一并重刊了。

观其内容，与以前读过的石崎东国的《大盐平八郎》（大正十年《中央史坛》，尔后收入大正十三年雄山阁《国史上的疑问人物》）相同，大体上是原封抄录这篇的，只是文章稍许变得缓和些，考据所引的文字等简略了些。

关于大盐平八郎与该叛乱事件的关系，早在明治四十年代，历史学家幸田成友（曾任《大阪市史》编纂主任）根据有说服力的各种史料（尽管未一一列举记录文书类的书名和出处），详加组织研究了事情的经纬，著书出版（即明治四十二年，东亚堂书房版，后加修订，昭和十七年创元社出版的《大盐平八郎》）。另外，森鸥外也获得了一册以传说史料为主的《大阪大盐平八郎纪录集》美浓版抄本（有黑色官印27个之多）。他以幸田成友研究过的“史实”为补充，在大正初年撰写了史传小说《大盐平八郎》，作为附录还添上了“年谱”等（见鸥外全集刊行会的《鸥外全集》第4卷）。

《南京秘史》所说的“真相”，自是拿前述石崎东国所著《大盐平八郎》中写的事情作为“真相”来使用的；幸田和鸥外等人书中的记述作为“假相”被否定了。

所谓的“真相”主要是说，大盐平八郎和养子格之助在动乱事件后，离开大阪逃往天草，由天草又转至长崎。在长崎结识了清国的反官府集团“上帝会”的干部、亡命于长崎的周云山。周云山就是后来成为“太平

“天国”领袖之一的冯云山(南王),由他带领渡海来到清国(福建)。然后,代替“上帝会”的首领朱九涛,使他让出首领地位。平八郎把格之助安排在“上帝会”的首领地位上,自己居于背后。不久,就指挥起“太平天国”的革命活动了。而且,格之助其人就是洪秀全。

这书引用的考据史料是些古怪的碑文、传闻记录,或将中国传来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记事粗枝大叶地加以引用,全是些凭鲁莽粗暴的推测,进行信口开河的荒唐议论,便结论为“信实”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这是大盐的崇拜者尊敬大盐之为人,赞同他的起兵造反动机,并对其挫折深表同情,于痛惜之余所做的心态发泄。正如井上哲次郎以《洗心洞札记》为中心,对大盐思想所作的分析评论所说:“中斋(大盐)反对幕府的苛政(对挣扎于饥馑之中的大阪庶民不采取任何对策),揭起造反之旗。如从他为穷民利益而献身这一点来看,他几似一个社会主义之人。然而,他固然不具有今日之所谓社会主义思想,但也并非不具有王(阳明)学结果的一视同仁之平等主义倾向。(中略)是故,中斋之暴举自然而然合乎社会主义。”(见明治三十三年富山房版《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森鸥外也在他的《大盐平八郎》附录中指称“平八郎的思想是尚未觉悟的社会主义”。看到大盐的这种造反动机同“太平天国”军的起事动因颇具共通之处,而想让大盐的思想和行为在大陆上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再生;在惋惜这一非常脆弱的、为时仅只一天便遭挫败的大盐造反雄图(?)的情况下,演出了这场使之越海实现的大戏剧。

不过,大盐是为了饥饿的穷民而崛起,对无道的官府和残忍的富豪进行反抗、掠夺、放火,是为“救民”而向官府、豪绅“抗议”的举兵起义,并不是夺取政治上的统治机构中枢权力的革命。从它的崛起“檄文”中也能看得明白:“我等一致,心中绝无篡夺国家之念”。与此相反,洪秀全则是具有“篡夺天下国家”的欲念(?)而起事的,是以敌视并打倒清朝统治权力机构的民族主义政治革命为企图而行动的。组织农民军(开始是矿山工人),同清朝国家军队在各地展开殊死战斗,建立独自的政权,持续

达 15 年,故两者的崛起宗旨自始就不相同。

有人写过一本叫做《成吉思汗者源义经也》的书(大正十三年,小谷部全一郎著,富山房出版),说源义经自杀于衣川是伪设之计,实则渡往虾夷(北海道古称——译者),又复渡往大陆,自古以来有很多人写过这一传说记录,而小谷部则一举使义经作为成吉思汗再生。这种对不幸英雄人物的同情与爱惜也使大盐平八郎在大陆上再生,成为席卷中国大陆十五六省的英雄,使其养子格之助登上“天王”之位,组织成英雄变身谈。小说读物作家等是以完全不同的立场表达思想来演成历史剧。对此,我以前曾以“变身历史剧”为题在某杂志上发表过短文,现在想稍作具体记述并加以探讨。

天保八年(1837)2 月 19 日举兵失败的大盐父子,一度想逃往大和路,但因见警戒森严,遂转道向河内方面逃走,结果又返回到大阪。这是 24 日夜间。潜藏在油挂町(今名韧下街)美吉屋五郎兵卫家里。五郎兵卫是做毛巾布生意的(也有人说印染花布的),多年出入大盐家,生活上常蒙帮助,打扮为僧人的大盐父子突然来求救,就将他们藏在后面贮物的小屋里。后来被发现了,当 4 月 27 日捕人的衙役前来搜捕的时候,大盐在屋内燃火自焚。在烧死的尸体中一起发现格之助(也有人说他被平八郎刺死)。幸田著的《大盐平八郎》是这样写的;井上哲次郎和森鸥外描写的大盐父子最后情况也如此。

大盐事件发生的当时,在大阪引起很大震动是可以想象的,自会出现种种记录这一事件的抄写本(掺杂了传说)。^① 幸田所引用的文献中虽然几乎没有提到石崎东国所著的《大盐平八郎传》(大正九年,大鎧閣出版),但它是出色的作品,它列举和研究了很多引用书(杂有传说)和报告

^① 例如《马琴日记钞》(明治四十四年飨庭莹村编,文会堂书店)中,天保八年 7 月 19 日条目中有:“大盐一案归属江户审判”一语。对此,芳贺矢一附加了解释说“关于此事之传说情况甚多,并有《大阪暴动录》、《天保日记》、《实事譚》、《青天霹雳》等著作问世”。“加之像近来出版的幸田成友所著《大盐平八郎》做了精密的调查与考证,云云。”

书,做了绵密的、“年谱”式的记述。最后部分标记着“先生父子自焚说”有如下的一段:

须臾,屋内轰然有爆炸声,随之有烈火由室中冒出。众人望火惶惑不知所措。不久火熄,搜寻火中得二尸。细察乃僧人,全身烧毁,面貌难辨。二尸俯伏,怀中有往来通行证,一曰天龙寺僧雷门,一曰观永。人以为雷门即先生,观永即其子尚志(格之助最早之名)。据此,认为天下殉身之先生父子同被捕获。然世人不信,或谓遁往九州,或云遨游中国。

石崎氏所说的大盐指导“太平天国”革命,可能是由此而发展成的。但是他写的这本《大盐平八郎传》还从未触及“太平天国”问题。

我不是想要特别研究大盐事件,不过偶尔看看现在所藏的三部抄写本。一部是美浓半截版大的题为《浪花大盐骚动记》的小型本。该书最后的跋语记有“天保十三年10月上旬书”,内容是大盐崛起时的檄文,出击时的阵容布置,放火焚烧的街道名,当时散发的同党绘像和履历记录,幕府张贴的公告等,搜集了史料性文献的大概。

另一本是美浓版一册,封面题签为《浪花芦》。开卷起始有“天保庚子(十一年)冬十一月”山田成伦(醒斋)所写《大盐逆谋实记序》(卷尾写着《大盐骚乱传闻》)。序言说,小仓正房其人“近日摭拾逆贼大盐之事,集而成书”。从序言的纪年看,约当乱发后的第三年。

还有一部是美浓版三册本,未记题名,卷首收录了“丁酉(天保八年)初秋,于浪花寓所白龙识”的长篇自序。大盐之乱是2月,父子自尽是3月27日,而这序言是7月写的,看来是事件后仅四五个月时记录编集的。其中有云:“余游历之际,适居浪花。寓居之暇,笔记其(大盐之乱)始末,参考其实事,成书前后拾卷,题曰《天保乱记》,云云”。拙藏之书,据此白龙笔记所说,是“并将诸家之藏书及老人之谈话等尽予载入”的一部书,是另外加入了一些参考史料的东西。只是,拙藏的抄写本像是按

原始稿本抄的，卷别没有分开。还有白龙其人是否真像序言所说的是个寓居大阪的游历者吗？甚觉奇怪。

且说，前面所引幸田氏所说大盐父子在美吉屋隐匿处放火自焚被发现尸体一节，在白龙的《天保乱记》中是这样说的：

平八郎也已通体烧毁，面部难辨倒于地。怀中有往来通行证，不知何以未烧毁。抽出观看，系天龙寺发出之证，有雷门字样者应是平八郎，观永字样者当是格之助，二人皆已剃发。

又《大盐逆谋实记》(《大盐骚乱传闻》)方面虽然稍稍简单，但大体写的是相同情况：

平八郎俯伏倒地，怀中有通行证，丝毫无损，取出观看，乃名为天龙寺之寺庙发出，有申年(天保七年)之年号月日。名为雷门者当是平八郎，名为观永者当是格之助，两人剃发模样。

幸田叙述平八郎向美吉屋求救时也说：“着灰色布僧衣腰挎短刀者二人”。平八郎和格之助返回大阪时业已剃发一事，诸人记载一致。只不过幸田氏的《大盐平八郎》一书未写此事(想是单纯作为传说才未列举)。烧死的平八郎怀中有天龙寺发给的往来通行证，上载“雷门”、“观永”名字，这样就给变身剧的演出者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成为设想变身的起点。《南京秘史》的著者，从这件事情着手，说美吉屋五郎兵卫家这时恰巧留宿的实是雷门、观永二位游僧。但二人“被断定为大盐父子，不容分说，以火攻杀死二僧，又将人形难辨之尸体分解，从而平息此一事件。”

这是石崎东国氏已经说过的事情，原封未动地被《南京秘史》采用了。

大盐举兵发难是天保八年2月19日，隐藏在美吉屋五郎兵卫处被袭击而自杀是3月27日(鷗外的年谱也这样说)，这说明乱后一个月以上都不知道首谋者的踪迹。前述《浪花大盐骚动记》中记载的“火焚街道

地名”，计有天满方面 48 条街（村一个）；上町方面 47 条街；北船场方面 24 条街；总街数达 118 条。火攻房屋 3611 所；按灶数计为 12490 所；出租空房 1168 所；库房 223 所；锅炉房 415 所；进行这样巨大规模破坏的骚乱首谋者竟然历时一月有余未能捕获，甚至连去向都无所知，难怪幕府方面的大阪负责人和当地长官焦躁万分。拼命搜捕自不待说，与此同时，街头巷尾当然也谣传纷起。

有的传说大盐父子藏在摩耶山，已经前往搜捕；有的说他们乘船去了竹岛（日本海中一孤岛，位于隐岐岛和朝鲜之间），渡海去朝鲜了；有说他们施展基督教妖术，蛰居深山幽谷中，吞云餐霞以生；有说已经自杀，被同伙悄悄埋葬了也未可知，因此，山野中无主的新坟被发掘检验；有的说已派人到外地远处去搜寻；有的说，高野山向来不管多恶的人进去了就出不来，所以正派人进山探查隐秘。有的还说吉野山里的十津川 24 村，自从昔日拥护大塔宫（1334—1336 年建武中兴时，后醍醐天皇皇子护良亲王的官号——译者）以来，至今也还藏匿着逃亡罪人。该村很怪，派去的差役捕快不容易到达等等。种种议论、传说都记入了前述《天保乱记》。

这些议论和传说原封不动地被石崎东国《大盐平八郎传》采用了，然后说：

大盐事件愈益陷入迷宫。这大阪行政官署对幕府暴露出了自己的无能。慢说市内，连近郊近乡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纷传着无根据的消息，什么在甲山再度起义啦，要从天满袭来啦等等。人民不安于业，市内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大盐事件越拖越下不了台，影响到政府的威信。正当此际，恰好常出入大盐家的印染商阿波座的五郎兵卫家逗留有可疑的人，不容分说便断定是大盐父子，在立即捕拿的借口下焚烧了隐藏处。屋中的天龙寺云游僧雷门、永观（观永？）二人被烧死，径直拿来当作烧毁的大盐父子尸骨示众，并发出布告，了结这一事件。但没有一人相信此事。一般人都认为大盐必

定活着；也有人说上了美国船；去了小笠原岛的传说也经久不息。此时大盐先生逃往肥前天草，并由该地到长崎，遂搭商船到支那（清国）亡命去了。

另外，关于大盐去欧洲的传说，石崎氏引用了大阪城东龙渊寺在明治二十三年10月建立的秋篠昭足碑文（书写者是秋篠的女婿奥并继、号菱地）。碑文中写道：

翁讳昭定，（略）冒称秋篠氏，住大阪。天保八年丁酉春，大盐平八郎做乱，翁为大盐姻戚，是以夙与其谋。及败，大盐父子及其徒十二人遁往河内，隐土窟中。自尽者七人。乃泛海遁肥前天草。居岁余，更航抵清国。久之大盐父子又避迹欧罗巴洲。翁与其徒三人还长崎，以医为业，往来于天草岛原之间。（原为汉文）

但是，石崎氏介绍了否定大盐父子去欧洲的奥并继遗孀（秋篠氏第四女，活至明治三十年）口述记录如下：

搜索大盐等人一事，以染坊屋五郎兵卫家烧死僧侣二人告一段落。乘此机会，大盐父子及秋篠等人一度落脚九州。父（秋篠氏）隐匿于姻戚即天草地带的村长长冈行之助家中，也住过长崎之崇福寺，在该寺，与清国商人周某过从甚密。趁其归国之际，大盐等人随同航渡清国，前往黄檗山。经过数年已可回国，但因有碍难之事，大盐父子无意返回。故只其余三人返回长崎。此时据闻大盐有去欧洲之说。

石崎氏随后继续写道：“大盐先生欧罗巴之行，成为一时话题。然而实则未去欧洲，仅只停留在中國内地。”石崎认为，崇福寺是明朝灭亡时黄檗的僧人超然越海来到长崎建立的，大盐父子是在崇福寺僧人的斡旋下渡海首先来到福建黄檗山的。

顺便一提，大盐父子逃往外国的传说，不仅只是大阪方面的说法。

川路圣謨^①在所著《游艺园随笔》(明治三十九年,吉川弘文馆《百家说林》续篇中收载)中说,2月24日听到林大学头谈及叛乱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特别感到极大的惊愕,只觉得“出了不小的事件”。26日一进城(当时川路氏是财政监察审计官),看到当日由大阪来江户城的信使,请示镇压方法及各种事务的处理原则。当老中们离开以后,听骏河守矢部(财政长官,原任大阪西区长官)说到大阪城已经陷落,伊贺守堀(西区长官)已经逃往京都,山城守迹部(东区长官)被炮轰掉了脑袋等等传说。川路轻视地写道:

平八郎者浪人而已,白昼之中便诉诸自焚,其难成大事者,明矣。

这样,他认为由于太平之世不做武事锻炼,以至像平家之人^②那样闻水鸟之声便惊骇不已。但是,文章稍后又说:

大盐平八郎二十七日于大阪油悬街美浓屋五郎兵卫家中,与其子格之助一同自杀烧死,此节业已报来。面部等已烧毁,疑事也。

这是对烧死的尸体面目难辨坦率提出了疑问。

又渡边华山致江川太郎左卫门的信中有一节说:

房州传说,口间村当地人出海捕鱼,见前述之美国船上有大盐云云,特以奉闻。此非所谓好奇之传说,乃一学生名为渡边公平(当时就读于圣堂学塾——原注)往游该地所闻。画师狩野宗得传说此事,医师佐藤元晦因闻此事(由谁)并加传说,故流布甚广,难以充耳不闻,是故火速探知。虚实尚未判清,谨以奉闻,藉供揆度实否。
(昭和二十九年,户羽山瀚编《江川坦庵全集》)^③

^① 川路圣謨(1801—1868),江户末期幕府臣僚,负责财政及海防、外交等工作。——译者

^② 平家,指日本古代散文体叙事诗名著《平家物语》中描写的,由荣华到没落的平氏家族。——译者

^③ 华山此信还收载于《华山全集》中(昭和十六年,铃木清节编,华山丛书出版会)。

这封信中记有“十月廿九日”，但未记年代。文中的美国船若是马礼逊号的话，则是天保八年6月的事情（根据明治十七年外务省记录局编纂《外交志稿》），就史实说，既然3月间大盐已在火中自焚身亡，到了6月却还有这种传说，而且华山也一面说“此非所谓好奇之传说”，一面对大盐在美国船上的事情也显露半信半疑的样子，大盐下落不明，有如进入迷宫，此情遍及全国。

原来华山或于大盐持有特别之关注也未可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天保五年时，三河^①的田原藩为了改革该藩财政，聘请大藏永常担当产业指导者，而称许永常的学识并加以推荐的就是当时作为耆老顾问的渡边华山。这位大藏永常久居大阪，似是熟知大盐。石崎氏的《大盐平八郎传》中曾说：“大藏永常是先生的老友”。而永常的研究家早川孝太郎所写的《大藏永常》（昭和十八年，山冈书店）中就收录有大盐致永常的长篇书翰，信中详细谈到了自己辞官退职后的身边琐事和心境。又天保八年（？）7月间，永常从田原寄给骏河^②的田中藩石井氏的信中也提到：“承询大平（大盐平八郎）书函之事，手中有一件云”，又说：“我妻去过彼宅，与盐氏（大盐氏）甚为熟识”等（见早川氏所著《大藏永常》）。尤其早川氏也说过，永常之妻（大阪人）似乎是大盐的亲戚。

从上述大盐与永常的关系来看，华山大概也会通过永常而闻悉大盐的事情。

藤田东湖的《浪华骚扰记事》（明治四十二年，菊池谦二郎编《东湖全集》收载）对大盐事件做了直叙，可以说很生动。据该书称，韭山的地方官江川太郎左卫门因为负有海防责任的关系，为使大盐等“不易乘船出海，隐入大岛、八丈岛等”，秘密嘱他的同门剑客、充当地方小吏的斋藤弥九郎，可以逮捕也可以就地杀死大盐等。并派他去大阪探明平八郎的行

^① 三河，位于今爱知县东部。——译者

^② 骏河，位于今静冈县中部。——译者

踪动向，搜索京畿之地。东湖的记事便是直接从斋藤弥九郎口述中听写下来的。^① 这一点，大盐动乱的参与者、老早就跟大盐有着亲密关系而后来参与了事件镇压的玉石雕匠本多为助，就曾在上阵帮凶时听到持有江川的委派文件的弥九郎关照说：“这次的任务，就是弥补本城长官和地区长官向江户上级提出的报告，因为它与事实有出入。”并且还提到长官们胆小怕事，先遣队迟迟不前等等。可以看出这是可信性较大的一些记述。但是，弥九郎寻觅平八郎未遇而归。到了江户，听说大阪城长官已经报告了平八郎父子烧死的事情。但是，东湖在记事中这样结论说：“烧死的形体虽看不出与平八郎有何差异。但匿藏平八郎之居民无法辨识。据说定与平八郎相异，但知而不言。弥九郎也对此怀疑。”（据年谱所说，这是天保八年4月间写的）

另外，《南京秘史》附载的牧常春氏的《大盐平八郎论》中，对于大盐父子的逃离大阪提出了更为活灵活现的看法，他说：

逃离大阪的最佳手段是大盐使大阪市内燃起大火。以往的习惯是，大阪一遇大火，众人便争先恐后携带家财用物登上泊于市内四通八达河流上的大小船只逃命。（中略）大盐早已着眼于此，乘了预先准备的船只，由安治川河口经濑户内海，（中略）幕吏衙役们惯以大和、纪州等地为主，拼命搜索山岭地区。大盐根据其职务阅历，想象着那种疲于奔命的搜寻，面露着会心的微笑，安抵长崎的情景便已宛然在目了。

假如大盐逃离大阪并越海抵达清国的话，则牧氏自有理由把这样考虑的逃离方法和情景想象为“宛然在目”。

^① 古见一夫的《江川太郎左卫门》（昭和五年，国民文学社）中说：“当风闻大阪参与大盐事件的残党进入江川自己支配下的甲斐地方时，江川曾与助手斋藤弥九郎扮作刀剑商人亲自前往巡查”。

21. 对洪秀全的各种描述

关于大盐在长崎和周云山(后称冯云山)相遇,并和他同渡清国一节,石崎东国这样写道:

于此,成为问题的乃是大盐先生父子投靠之号称清商的周氏一行。周某是何等人?在吾等曾经阅读过的杂书中,记忆中大藏永常的著作《崎阳记》提到过此事。

于是便援引了所谓不甚确切的“记忆中大藏永常的著作”《崎阳记》(我没听说过永常的《崎阳记》,而且稍稍查过永常的著作,但未发现此书):

最近,有来游长崎之广东人周秀才者,号云山,通西方医术,并精于《易经》。与此人相遇,余受益极大,谓其倘有久住日本希望,当荐之于诸侯。但据云山说,往年加入天地会,在地方传教中被捕,必死无疑,逃遁后装扮商人,装载书籍亡命日本已有多日。

石崎接着叙及当时清国南部的宗教骚乱。叛乱此伏彼起,有“白莲会”、“天理教”匪之乱,接下来是“天地会”匪之乱。而“天地会”在传教中,以劫掠嫌疑的罪名遭到官府的讨伐。主要人物被斩首,其他四散逃走。周云山当时是一头目,所以亡命日本。随后,“天地会”解散,其残党聚集于先前已经成立的“上帝会”,并把它加强了。石崎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四海皆为兄弟的“天地会”,进一步树立了上帝而成为新的东西。据说这“上帝会”原是广东人朱九涛于道光初年在“天地会”成立前后创建的。

石崎氏自己游历清国时,曾从“广东通”王文泰(据说是日本人)听到过关于“上帝会”的趣闻,因此把这些谈说“作为所依据的传说之语”置于文章之前:

据说某日有三位卜者访问“上帝会”,一人为洪秀全,一人为冯

云山，另一人唯独称做“东海伟人”，原来是洪、冯二人的老师。冯氏因为是“天地会”的亡命者，原与朱君（九涛）相识，所以将二人做了介绍后便说，今日之来非别事，吾辈久居东海仙乡，深修“天地教”后归国，此即我师“东海伟人”。若为同一之道竭忠尽力，则请同“东海伟人”当场进行问答，胜者自应作为教主，统率“上帝会”，如何？

于是朱九涛与称为“东海伟人”者，首先就道教，其次从禅道到仙术，然后就王道霸道之事以至于上帝（即耶稣教——原注），进行了历时三天的问答：

其结果，缘于“东海伟人”一一就学理与实践驳倒对方，朱君终于屈服，将“上帝会”让与“东海伟人”。朱君遂下郎山（似指上帝会的根据地）隐去。

说这段话的时候，“东海伟人”若是日本人的话，那会是谁？岂不是说有一位奇异的人物存在着吗？石崎谈论此刻之事，特别是对这话做了如下的随意解释和发挥：十年前听友人说这段话的时候，觉得多半像是一种小说中的东西（然而据说迄今尚未见到此种小说）。这位亡友的谈话根据何在？“因未加深究而感遗憾”，谎言乎？真实乎？以暧昧不明之事作根据，只能说：“然而，吾等仅能记忆如此之谈话片断，依为本篇要点，此所以应致谢忱者。”“因为人不可大胆妄语，但吾等则认为‘东海伟人’正是‘大盐先生’，而冯涛山则是自长崎同行的周云山的假名。其结果，洪秀全理应说成是大盐格之助。”（着重号为增田所加）这是何等大胆随意的思维啊！

据说洪秀全在传说的某处“上帝会”专门进行过研修，对此，中国历史家介绍其生涯说，洪秀全乃是广东花县人，嘉庆十七年生。父母早亡，成为孤儿，四方游学，天资豪迈，身体魁梧，有才学，以占卜为业。与同乡冯云山同投“上帝会”，得其术而成为教主。由于洪秀全自幼父母去世，游学于四方，虽然生于花县中，但几至谁

也不知其人。

洪秀全的出身不明，几乎谁也不知其人，采取这一论述方法，便可不费周章暗中把大盐格之助安排上去了。

上面所举有关洪秀全的记述，出自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18卷，附记4卷，同治九年刻本10册。后改题为《平定粤寇记略》，内容文字略有修订，光绪元年再刻）“附记”卷中的“贼名记”，大体上原封未动。《粤匪纪略》中是这样说的：

首逆洪秀全原籍广东花县，嘉庆十七年壬申生。身（《粤寇》中为“体状”）肥痴，略识字。父国游，与母均早死。秀全博饮无赖（石崎氏说“天资豪迈，身体魁梧”），算命卖卜为生。先是广东奸民朱九涛倡“上帝会”，秀全及同邑冯云山踵而（《粤寇》中无此文词）师之。后以秀全为教主，云云。（原为汉文，与《粤寇纪略》文字略有不同）

《粤匪纪略》是清朝方面的著述，视“叛逆者”洪秀全及其一派为“逆贼”自属当然。但是，由于是当时从广东山村中突然崛起的既无官位（秀全此前曾应试科举屡屡落第不中），又不知名的叛乱首谋者，除了秀全的近亲而外，人们一般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这倒合乎实情。清朝军方当然会派出奸细，会从俘虏口中打探情报，但毕竟只能达到传说程度，而且情报也分歧不一。

《粤匪纪略》是杜文澜（浙江省秀水人）任湖北盐运使时受湖广总督官文（旗人，号秀峰）之命编纂的。所依据的资料是清军（讨伐部队）上奏文书中的情报。然而，讨伐部队多吃败仗，不仅难以充分掌握反叛军各个集团的内情，而且也难免将看起来于本军有利的粉饰和捏造混淆其间。

石崎氏的说法源于《粤匪纪略》，仅是转述而已，所以认为秀全的出身来历不明。但是经过近来的调查研究，对于洪秀全的血统、家族关系、青少年时代的状况等等，都已有了详细了解。

尤其是洪秀全的族弟(小洪秀全 9 岁)洪仁玕(“太平天国”后期最有力量的领袖),自少年时代便同秀全有着亲密关系。在他未投奔南京前,尚受在广东传教的瑞典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保护时,韩山文依据他谈过的情况和送来的文件(记录),用英文写成了 *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1854 年香港出版,又在《北华捷报》上连载过),后来,简又文把它译为中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这样,对于洪秀全的家族关系及其为人以及初期行动(也包括冯云山的事情),大体可知其详了。这本《太平天国起义记》也收录在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中(1935 年,商务印书馆),又于重印 1854 年版英文原本时并载出版(1935 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此外,青木富太郎以《洪秀全的幻想》为标题,参考了简氏所译的《起义记》(人名、地名等)把香港版的原本译为日文出版(1941 年,生活社)。

这里,所谓洪秀全的“幻想”(Vision)一词,中国译为“异梦”。尽管如此,我要谈谈洪秀全的神灵附体状态的问题。洪秀全于道光十七年(1837)在广州第三次应试落榜时,突然病倒(有落第打击的因素在内),雇轿抬回故乡,病卧 40 日不省人事。这期间陷入一种精神异常错乱状态,不断向父兄吐露,自己升至穹苍受到金发黑袍老人的启示,战恶魔、驱邪神,承天命而为王者等等。其父其兄认为他恶鬼附体,召来术士驱鬼,又请医生诊治,均不见效。但约经 40 天,此种精神异常忽然告愈,恢复了常人状态。后来,偶尔把藏在箱底曾在广州街头得自传教者梁发散发的《劝世良言》翻出一读,发现书中很多和他往年大病时在异常精神世界中的见闻相符。终于,他皈依了基督教(新教),也向众人传道。对于那时异常的精神错乱经历,作为 Vision 在《起义记》书中作了种种的记述。

简又文在 1935 年底还访问过洪秀全的故乡(花县官禄布),看到了洪家的宗谱(一族的血统系谱)等,发表了在该地调查的种种史实报告《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1936 年《逸经》第 2 期),同时

还摄得很多照片。与此不同，罗香林也于 1936 年春访问、调查了洪秀全故乡，以血统问题为主，撰写了《太平天国洪天王家世考》（1937 年《广州学报》第 1 卷第 2 期）。根据以上的报告，来自传闻（或清军方面的情报）的冒名等说并非事实，而洪家出身，其先祖（详见前述报告书）是从嘉应州（今梅县）移来的一族（客家），开垦山村荒地，以农业与畜牧为生。

若就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们的单行本著作而言，有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946 年，商务印书馆），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1957 年，中华书局），简又文的《清史洪秀全载记》增订本（1967 年，简氏猛进书局）等等，大致上也把有关洪秀全的出身诸史料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尤其是，简又文的巨著《太平天国全史》3 册、2318 页（1962 年，简氏猛进书局）的上册第一章“天王洪秀全之出身”（达 43 页），广采史料加以考证，且又亲身踏临秀全的出生地进行调查，加上了笔录的同族、故老口述的内容，最为详细。

现在若将其特点加以简单概述，则秀全生于 1814 年。父镜扬，祖父国游，长兄仁发，次兄仁达。18 岁时充村塾教师，其后三次进省应试秀才均落第。当时在广州街头得到基督教传教士散发的传教书《劝世良言》（此书现在中国已不得见，台湾《学生书局》于 1965 年据美国哈佛大学所藏广州刊本影印出版。而且卷首还有题为《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的邓嗣禹所撰长篇解说），以后受此书的引导加入了基督教（据说未受洗礼）。与同乡友人冯云山结成“拜上帝会”，开始了传教活动。此书是在广州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设“伦敦会”（“伦敦传教士协会”的分会）受洗的广东人梁发（梁阿发）所写的布道书之一。梁发帮助马礼逊传道。

我国明治初期和中期根据当时清廷方面的书籍所写的中国史乃至清朝史，大体即是以《粤匪纪略》等为主要材料，例如佐藤楚材（牧山）的《清朝史略》（12 册，明治十四年）卷八中有：

秀全原籍广东花县，年四十余岁，长须蜂目（这有出入），面阔，

身痴肥，略识字。父名国游，与母均早死。素即饮博无赖，以卜算游江湘之间（中略，此处加进采自《盾鼻随闻录》的词句，后将述及）。先是有奸民朱九涛者，倡上帝会邪教，亦名三点会（三点会是“天地会”的同系一派——增田）。秀全及同邑冯云山师之。旋以秀全为教主，云云。（原为汉文）

这是原样采自《粤匪纪略》的。

石村贞一与河野通之合编的《最近支那史》4册（明治三十二年）卷二下，有如下的一段话：

秀全广东花县人，略识字，演卜为业。先是奸民朱九涛倡上帝会，秀全与同邑冯云山同往师之，挟其术游广西，居鹏化山，云云。
(原为汉文)

这也是原样采自《粤匪纪略》的。

曾根俊虎的《清国近世乱志》，洋装活字本共242页（明治十二年，日就社），可以说是我国人士撰写的最早一本“太平天国史”（副岛种臣校阅），它的“例言”开首说：

此书与《清史揽要》、《元明清史略》以及其他我国当时上梓之书稍有不同，即如序言所称，本书之编纂不独依据清国之书，更博采外国人之记事与实地之见闻。

话虽如此，但关于洪秀全的出身问题，大体上仍还是照抄《粤匪纪略》的记载：

其人（洪秀全）身躯长大，有雄姿，豪迈博学。嘉庆十七年生于广东花县，夙别父母，贫苦困学，流落四方，其间结识同志，以演卜游于江湘之间。先是有广东人名朱九涛者倡上帝之教，秀全及其同邑之冯云山等师之，九涛死后，其徒皆推秀全为教主。

石崎氏是利用了我国这些明治初期或中期撰写的中国史乃至清朝

史呢，还是直接采自杜文澜的《粤匪纪略》呢？对此尚不详知，但前面援引的他对洪秀全的描述之后，又接着说：

如上所述，太平天国建立者洪秀全之出生，仅知其为广东花县人，无人知其来历。以长发异容之风，飘然与冯云山以卖卜而流转至此。彼之生年为嘉庆十七年，即我国文化九年。大盐革命时恰为26岁，故与格之助同年。固不能以其为同年而谓为同一人，但飘然卖卜于广东各地之长发异容浪人，此一时代、此一地点为数绝非甚多。若以此种情况复与“天地会”亡命者（周云山）与其师一同来自东海仙乡之师的传说相综合，则就时代、人物而论认作是大盐先生父子诚属适当。（着重号为增田所加）

这是多么杂乱随意的思维方法！

于是，在中国书籍中的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竟被坚信洪秀全即是大盐格之助的石崎氏所否定，他认为：“终因躲避鸦片战争，三人（大盐父子与周云山）以卖卜由福州漂至广东，夺得‘上帝会’，谅属事实。”石崎并对“上帝会”加上了如下的随意解释：

上帝会乃以道教为基础，附加耶稣教而成者，极其浅薄之教。为使有根有据，周云山遂迎纳大盐先生。大盐先生素奉阳明之说，其修养所至，通道教，精禅学，深谙耶稣教。故于教义问答时胜朱九涛，此自不待言，但并不为此而欲自充上帝会之教主。然而当此时代人情全起变化之场合，应采取之教导方法属道教乎？经学乎？宗教乎？先生有鉴于此，同意以上帝会为全耶稣教（？），将传教布道之法授予作为洪秀全的格之助及作为冯云山的周秀才。此事恐属确凿无疑。（着重号为增田所加）

朱九涛是当时“天地会”的一个头目，这可从清军派出的讨伐部队奏文中得知。“天地会”与基督教的“上帝会”性质相异，把创立（？）“天地会”的所谓朱九涛说成重新组织“上帝会”是不经之谈，不过是传说而已。

“天地会”(有过“三点会”、“三合会”等组织名称上的变更)本身,是明朝灭亡后以“复明”这一民族主义思想为依据结合起来的南方反清(反官府)秘密组织。也有人说其首倡者是郑成功(陶成章《教会源流考》,1942年,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收载)。但原来是秘密组织,而且各地有分支组织(各有各的头目,并且名称也各异),种种说法见于各种史料。石崎氏所说“天地会”是清末道光初年朱九涛创立的,根据何在?无法判清。这位陶成章与鲁迅是同乡友人,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当时与秘密组织“天地会”也有联系,所以稔知它的内情。只是此人于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便在领导权的争夺中被主流派(?)暗杀。

“天地会”的起源有种种说法(有说郑成功死后从康熙时代开始的,有说从雍正时开始的),接触到各种史料(连伦敦博物馆所藏的中国文献也在内),并经过详细研究的作品有萧一山的《天地会起源考》(1935年,“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发行《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所收)。但是,对于确定性的创始年代则未得出结论,大体推定为康熙或雍正时期。这是由于以反清为出发点的组织散于各地,各有各的头目,其中也有盗贼化的集团。后来“太平天国”军崛起时,虽然在“反清”这一点上联合起来的团体很多,但组织力量薄弱的集团也有被清军收买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收载于《太平天国史事考》)对各地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提出了种种情况,并加以详细考证。

关于朱九涛,我所看到的有谢兴尧的《老万山与朱九涛考》(1938年《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所收)和罗尔纲的《朱九涛考》(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所收)。后者论及了《粤匪纪略》的记载。洪秀全与朱九涛二人,分属“拜上帝会”和“天地会”,是不同派别的首领,二者并无关系。为何《粤匪纪略》采用了洪秀全师事朱九涛这样的记载呢?作者具体论证了这一错误的来源。要点是,朱九涛称为“太平王”是出自(太平军方面的)俘虏口供,清军幕僚为向清政府作报告提

出来的。罗尔纲的此项考证分析，检阅了清军的各种报告，是用绵密细致的方法进行的。并且考证出来朱九涛是假名，其本名为邱昌道。又咸丰元年(太平天国元年，1851年)朱九涛的组织中枢在湖南省被破坏，清政府命令讨伐部队逮捕朱九涛。咸丰五年(太平天国五年，1855年)朱在湖南省(郴州)被捕。此节是根据讨伐军的各种报告作出的记述。

明治初期我国撰写的中国史中，与《粤匪纪略》的记载不同，有写作洪秀全继洪德元(而非朱九涛)之后当教主的。

增田贡的6卷本《清史摘要》(明治十年)卷四有如下记载：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年四十余，有韬略，粗识字，不知其姓。先前入教会(添丁会)，及德元(前文有‘原有一添丁会，教主名洪德元’)死，遂冒用洪姓，代之为教主。更依附天主教，自称耶稣之弟，天父(耶)火华之第二子。云云。(原为汉文)

增田贡的《满清史略》2卷(明治十三年)也对洪秀全做了几乎相同的记载。

石村贞一编《元明清史略》5册(明治十年)卷五有云：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年四十余，长须蜂目，面阔身肥，略识字。不知其姓。前已入教会(添丁教会)，及德元死(与前文同，‘原有一添丁会，教首名为洪德元’)冒洪姓，代之为教首，又附天主教，自称耶稣之弟，天父(耶)火华之第二子。云云。(原为汉文)

两书文字大体相同，但与被认为是依据《粤匪纪略》的前述《清朝史略》及《最近支那史》不同之处在于认为洪秀全不是继朱九涛之后，而是继洪德元之后，(也继承了洪姓)成为教首。再者，不是“天地会”或“上帝会”，而为“添丁会”。这一点应认为是“天地会”的地方讹音。

上述两书所记洪德元和洪秀全的教首更迭，以及在那前后的记叙文章像《粤匪纪略》的附记三“逆迹记”中，也作为传闻有所记载，但被看作是出自另外的来源。

这些文字所据原本被认为是樗园退叟编的《盾鼻随闻录》。樗园退叟是和太平军交战的清军随营文书(例言称:“随营襄办文案,驱驰五省云云”)汗塗的假名。这部《盾鼻随闻录》,是文久二年乘“千岁丸”渡海抵达上海的高杉晋作和中牟田仓之助等一行在当地得到的抄写本中的一种,恐怕我国传来《盾鼻随闻录》就是那时开始的吧。现在,《岩瀬文库图书目录》(“岩瀬文库”在爱知县西尾市)中登载有此书的文久甲子(1864年)抄本二册。它开始是以抄写本知名,维新前后经训点翻刻(无出版纪年),分上、中、下三册在我国出版。下面谈谈这部《盾鼻随闻录》。

22. 《盾鼻随闻录》的问题及有关太平天国的杂记

《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中说: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四十余岁,长须蜂目,面阔身肥,略识字。不知其姓,或谓姓郑。道光二十五年至广西,投身会教,适洪德元(前文有‘原有所谓添弟会者,教首洪德元’)病故,遂冒姓洪,代充教首。(中略)又附会天主教,自称耶稣之弟,天父(耶)火华之第二子。云云。(原为汉文)

这段《盾鼻随闻录》的记述,与前引《清史揽要》、《元明清史略》两书的记述相比较,文字简直完全相同。《揽要》、《史略》都是用汉文写的,所以,说它们是把《随闻录》的文章原样转抄的也未尝不可,这和《清朝史略》、《最近支那史》之于《粤匪纪略》的情况一样。

可以认为,《盾鼻随闻录》在日本训点翻印后,虽在稍广的范围内为一般人所阅读,但如前所述,此书谅是文久二年(1862)4月到7月间乘幕府的贸易船“千岁丸”驶至上海的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日比野辉宽等人最早带回我国的。在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大正5年,民友社版《东行先生遗文》所收载)中列举的“中牟田抄写的书”里就有《盾鼻随闻录》,并且该书名上打有○记,这一○记的注释称:“委托抄写者于长崎”。

因为是“抄写的书”，可知是在上海笔抄后带回来的。抄写的原本是刊印本还是手写本则不清楚（恐是手写本），但中村孝也的《中牟田仓之助传》（前引）中列举了中牟田在上海买到的地图、书籍名称，其中有“长发贼著述书抄写本十三册”，恐怕这之中就有《随闻录》。

日比野辉宽在他的《赘疣录》（昭和二十一年，全国书房发行的《文久二年上海日记》收载）中，叙述了当时在上海直接目睹和听说的“太平天国”之乱及各地庶民离散等情况之后，也说：“凡关贼人之事，均详见余抄写之《盾鼻随闻录》，此处唯记近日之事。”可知日比野同中牟田一样也抄写丁该书而归。

对于截至当时鲜为日本所知的所谓“长发贼”，经他们航达上海才开始有了实地见闻，因此他们抄写了记述当时状况相当具体的这些著述，作为资料携归。除《随闻录》之外，在“中牟田所抄书”中还有《天理要论》、《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天命诏旨书》、《资政新篇》等有关“太平天国”文件。

高杉的《上海掩留日录》（《游清五录》中）5月7日条中写道：

拂晓小铳轰鸣于陆上，皆云，是长毛贼与支那人交火之声，余以为此言若实，将可得睹实战，暗自喜悦。

又5月10日条记曰：“黄昏荷兰人来告曰，长发贼到上海三里外之地，明朝必可听炮声。官人（幕府官员）闻之大惊，余却喜焉。”同月16日条记有“今晚又听炮声”。

6月7日条记载（幕府）官员巡视城之外郭时高杉一起陪同，“有小寺颇破落，为贼之所破云”。接着来到孔子庙。一看，“贼变以来，英人居之，变为军营。殿堂中兵卒枕铳炮卧，观之不胜慨叹也！”

他们抵达上海时，恰好租界区域安全无虞，但郊外的太平军正待机以动（那时忠王李秀成已在苏州布阵，准备攻取上海），所以搭乘“千岁丸”航抵上海的人们能够记录这一类的情报，而且把“太平天国”方面的

各种资料携归传播。

《盾鼻随闻录》是何时在日本刻印出版的？未见纪年。正文之末有“浪华伊藤之幹校”，因此，当是此人训点的，但出版者则不详。同时携归的书籍中可以看到（在高杉的记录中也可见到）谢介鹤的《金陵癸甲摭谈》二册经加训点并标注日语读音，封面内页记有：“明治二己巳年季冬，浪华书肆，二书堂梓”。版权页有“伊贺 高见猪之介校点”，由此可见，《随闻录》当是与此大体同时，或在其前后和刻（指在日本刻印出版——译者）的。

我藏有《随闻录》和刻本二部。该版在封面内页都有“盾鼻随闻录”，卷首有编者“樗园退叟氏自述”的“例言”，其次是咸丰甲寅（四年）仲秋姚际云的序言，卷一至卷八都有标题。其卷一《粤寇纪略》中，先引用了添弟会首领洪德元死后继嗣其后的洪秀全的传略，但相当于版权页的最后一页（封底内页）有一部是白纸，另一部仅有“和汉洋书籍所，近江国大津升屋町小川仪平”。至于校点者，则在正文末尾记有“浪华，伊藤之幹”，销售者“大津，小川仪平”，由此看来，此书当是关西方面刊行的。再者，前述《金陵癸甲摭谈》，在《享保以后大阪出版书籍目录》（昭和十一年，大阪图书出版业组合）中虽记载有“申请”和“许可”的年月，但未见《盾鼻随闻录》在这类的书籍出版目录上刊载，或许是最初点校者未经申报而自行刊出的。

就版本书志来说，《盾鼻随闻录》的咸丰最初版本现在好像已无流传（据说清朝方面和太平天国方面都禁止此书）。“太平天国”的研究者谢兴尧在《盾鼻随闻录跋》（1938年“北京瑶斋丛刻”本，《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收载）中开头说：

此书是咸丰时代的作品，但流传甚少。其木刻本已经不易见到。从版本上讲，可以说几已成为孤本。今日得见者若非抄写本，便是日本印本的一种。（原为中文）

现在，《太平天国资料目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太平天国》附录，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列有《盾鼻随闻录》8卷，北京图书馆

所藏咸丰九年(1859)抄写本1册之外,还举出光绪元年(1875)2册本的汪堃自刻本,有“谢兴尧藏”字样。大概是谢氏写了“今日得见者若非抄写本便是日本印本的一种”以后,才得到汪堃的自刻再刊本的吧。这部光绪元年刊的《盾鼻随闻录》铅印收录于1952年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太平天国》第4册中(与北京图书馆所藏咸丰抄本对照稍有出入)。如前所述,携至日本的抄本是文久二年(1862)的抄本,又前面提及的“岩瀬文库”所藏抄本,是文久四年(1864)初(2月改年号为“元治”)的抄本,都是光绪元年(明治八年)刊本以前的抄写本。由此可知,高杉等在上海得到的此书乃是根据咸丰刻本或其抄写本誊写的。只是今天,我看到的光绪元年的再刊本,《东洋文库》的藤田剑峰(丰八)氏旧藏书中有3部,全都是同一版本。不过《东洋文库》的《藤田文库目录》(昭和五年)把该书的著者误为俞秦生,这是很大的错误。

《盾鼻随闻录》的例言中写道:

余需次桂林,奉委随营,襄办文案,驱驰五省,因将目击躬亲之事编辑成帙。贼窜东省后,业经引疾。抄稟探报,传闻异词概不登入。(原为汉文。引文据该书例言。——译者)

意思是说在桂林候补,被任命到军营去任文案之职,以后随同与太平军交战的清军军营驱驰于五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太平军入山东后,即托病辞官。记录的是报告书,传闻的街谈巷议概不采用云云。但汪堃性格孤僻,任四川永宁道员时曾被学政何绍基弹劾,又被总督黄宗汉(何之姻戚)免职。为此怀恨于心,书中记述了何氏一家妇女被太平军淫辱等不应有的事情,极尽侮辱之词。此外对平常怀有怨恨的长官也多所诬言,因此,当何桂清任两江总督时下令此书毁版云。这是薛福成在他的《庸庵笔记》(光绪二十八年刊)中写的(卷三《盾鼻随闻录当毁》)。然而,进行个人攻击虽是不道德的,但直述亲身见闻的珍贵史料,则具有参考价值。谢兴尧的《随闻录跋》即作如是说。

不过,罗尔纲在《一部太平天国的禁书》(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所收)文章中,引用了名为《劫余灰录》的抄写本,论及该书是“太平天国”的禁书之事,并采用了那篇自称所记是亲身目击的例言,对书中记述的内容详加分析研究,考证出该书是捏造,断言该书不可用为“太平天国”的史料。这一批判考证过于琐细,这里省略不谈。由于清朝方面和“太平天国”方面都列《盾鼻随闻录》为禁书,所以才看不到该书的流传(南京图书馆藏有题名改为《钞报随闻录》,在同治二年刊行的本子)。就在这种状态下,该书在我国维新前后翻刻出版,这从“太平天国”的书志方面上来说当是应予特别记述的。

刚才说到书志的岔路上去了,让我们再回到大盐平八郎与“太平天国”关系这个正题上来吧。

我们认为最使人怀疑的问题是,大盐怎样成了像石崎氏所说的“最精通耶稣教的人”。就是说,这位阳明学者的大盐是怎样同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石崎氏解释这一点说:“大盐先生通晓基督教一事,曾与水野军记、丰田贡事件当时的研究有关,自不待论。”石崎并且引用《大盐传》(何人著?)说:

水野军记事件(这是水野军记死后的事件——增田)结案后,检查被没收的妖书,皆为隐语记载之物。自长官以至众人均皆一字不解,唯独平八郎朗读一遍,详释其义,犹如素稔其文者。时人叹服,称其神明。

又在谈到叛乱后长期不知大盐父子的踪迹时说(前述手写本《大盐乱记》也援引了此事):

或谓(大盐)自所获书物中习悟基督教妙术,蛰伏深山幽谷之中,吞云饮霞为生,此类传说甚多……。

于是石崎氏牵强附会地推测说:“如此,大盐先生精通耶稣教不言自明。洪秀全、冯云山所诵习者(大盐的耶稣学说?),自是先生所绍述。”

文政年间在京、阪一带发生的“基督教邪教徒事件”，是以接受水野军记的“基督教”邪门妖术传授的丰田贡（女）为“主犯”的，据说审判此案是大盐在任时的三大功绩之一（幸田氏语）。还说大盐因此而顿时名声鹊起。但是，他果真是丰田贡一伙的吗？真是基督教徒吗？幸田氏认为是个疑问。他们祷念“耶稣、玛利亚、天堂”咒语，做洗礼，还秘密持有“天帝如来”的画像，这些事情都见于记录（口供）中。据他们的口供称，他们搞“下神”念咒、祈祷以敛财聚物，据知是一种阴阳师的行为，或者是它的变形。

大盐在审讯过程中，能从这样的“基督徒”身上获得多少基督教知识乃至修养呢？这大有疑问。勿宁说这是一种滑稽的看法。在当时的状况下，从开始就是当作“妖教”审讯和判决的，不会考虑什么学习研究基督教教义和修养的必要性，仅仅从彼等的行为本身即“妖教”这一先入观点出发加以审讯，就足够进行判决了。

另外，大盐对于这一事件的裁决（判决书）一般说是相当流传于世的东西，《史籍集览》的“史料丛书”（六）（明治十六年）也收录了它。我收藏的前述3册本手写本中也作为附录收载了它。另外我还收藏有这一判决书的单行薄本手写本1册（题为《基督教行邪法者刑罪制书》）。即使从这些东西来看，也找不到有基督教教义与修养的询问痕迹。今天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至少从大盐对丰田贡一伙的判决上来看，不能说他是“最精通耶稣教的人”。石崎氏还说研究了“没收的彼等之妖教书”一节，这连影子也找不到。尤其是“妖教书”到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是问题。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也被西洋人称做“太平基督教”（Taiping Christianity），被视做一种特别的东西。最初指称洪秀全在广州教会学习基督教的美国牧师罗孝全（L. J. Roberts），后来访问并逗留于天京（南京），目睹了“太平天国”的情形。但离开南京后，则就“太平天国”的宗教指出“是把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罗尔纲

增订本《太平天国史稿》中所引 C. A. Tesns 的 Historic Shanghai(历史上的上海——译者)。但是,罗尔纲认为上帝教(洪秀全等初期的“拜上帝会”派)“是根据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改造成为当时中国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又根据了基督教的某些宗教仪式,作为组织革命群众的方法。”他说,上帝教

首先把当时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土地平分等反封建的朴素的平等思想,和基督教义中某些平等的思想结合起来,制造了一个“革命的上帝”。它认为,天下人不论任何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皇帝和人民是平等的。它用天上的上帝打击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地上的皇帝。这就破坏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等级精神。上帝教又利用基督教的上帝打击了地主阶级用来压制农民的一切封建迷信和权威——从孔子到阎罗王——把农民从旧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略)上帝教又进一步把基督教教义中某些平等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把想象的“天国”搬到地下来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平等自由的“太平天国”。(原为中文)(前引罗尔纲著书,据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00 页。——译者)

罗尔纲还认为上帝教包含了宗教的迷信和革命思想两个部分,在初期,迷信部分起了极大的组织作用,但是不久,南京建都为“天京”的时候,它对“天国”内部的团结则起了反作用,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天父下凡附体于自己)为口实,要想篡夺洪秀全的权力、地位,洪秀全则说杨秀清的“逆谋自天泄露”(其反叛由天泄露)而杀了杨秀清。“洪、杨冲突的结果,完全拆穿了天父天兄的迷信的假面目,这就更使群众对宗教感到冷淡。”(原为中文。据该书第 102 页。——译者)把“太平天国”的宗教方面基本上看作是为了革命目的的假面具性质的东西——即政治上团结的手段。

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问题，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中、下三册（1958年，简氏猛进书屋）的下册里有《宗教考》，分为“洪秀全个人的宗教”、“太平基督教”、“外人对太平基督教之观感”三篇，用了488页的篇幅展开了详细的论述。简氏认为，基督教若从历史观点来看，总是随时代、环境的变化经历着种种变化。“吾人既不能否认基督教自然演变进化之机能，也不能取消中国信徒自由改造之天权，更不能抹煞当时确有变化之事实与成果，自不能不承认其为一特种特式的基督教”。这样的前提一建立，结论自然要规定为：“‘太平基督教’是于基督教历史中在中国演化而成的一流派。”（引文据该书第1738—1739、1743页。——译者）

罗氏为了揭示他们的宗教迷信性质，谈到东王杨秀清（原来是在山上烧过炭的山村农民，一个在作战指挥上具有天才手腕的悍雄）想取代天王洪秀全的地位，反而被洪秀全所杀的事情。洪秀全察觉了杨秀清的军事政变计划，马上密诏出击各地的诸王开到“天京”。最先开进南京城的北王韦正（昌辉），出其不意直袭杨秀清，将他杀了。据说不仅杨秀清本人，还杀害了他的整个家族及其统率的部队官兵达2万人。这是咸丰六年（1856）八、九月间的事情（史料上的月日说法不一）。于是就成为韦正取代杨秀清掌握“天京”的实权来压迫天王了。在韦之后回到“天京”的翼王石达开和韦正一样，老早就憎恶杨秀清的专横，但是现在他指责韦正屠杀秀清的全体家属和所统率大批将士。于是，韦正要杀石达开。石达开单身偷偷以绳坠城逃至安庆，韦正又将留在城内的石达开全部家属杀害了（同年9月20日左右）。逃出“天京”的石达开在安徽集结部队，要冲入“天京”。洪秀全知悉石达开的大军即将迫临，便与之呼应纠合在京的反韦正派袭杀了韦正，将首级送给当时驻扎宁国（安徽省）的石达开验证（11月前后）。不久，率大军进入“天京”的石达开被授予了主宰“天国”之权，但是仅仅8个多月，他便率部下将士离开“天京”，向安徽方面出击，从此未归“天京”。在洪秀全的左右，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是

他的异母兄长，石与二人不和，而洪秀全也担心石达开会像以前杨秀清和韦正那样成为凌驾于天王之上的存在。石达开看到周围这种空气，自己便抽身而去了。

如上所述，“太平天国”（亦即中央政府内）拥有实力的诸王争权斗争引起的内讧连续不断，当初起义时的干部将军相继损失（南王冯云山与西王萧朝贵已经阵亡），内部瓦解景象日甚。石达开走后，支撑“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年轻的同乡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授予了王号），他们原为广西的贫农和雇农。李秀成于“天京”陷落后被捕，他写的供状（是否全属秀成自己的供述尚被怀疑）上也说：“因翼王（石达开）与安王、福王三人不和，（翼王）出天京远走，军民之心散乱”、“是的，朝中（太平朝廷）掌管无人，外无（独当一面的）勇将……”（原为汉文）^①已经如实道出了瓦解的景象。对于这样的内讧，石崎氏只是将原因归结为洪秀全是日本人加以简单说明：

东王杨（秀）清有意颠覆王位而自立，（洪秀全）遂使韦昌辉杀之。其后，韦昌辉又为（洪秀全）所杀。此虽创业之际（？）常有之事，然实为彼等因得知洪氏为日本人始反叛者。^②（着重号为增田所加）

而且石崎氏不谈这些“天国”内部领导人之间凄惨的争权斗争促使“天国”的弱化，反而说：

铲除此等叛将，并未如何削弱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依然虎踞金陵（南京），西控荆楚，北联青齐（？），地方数千里，带甲者百万，强首悍将星罗棋布。连破曾国藩、左宗棠、刘铭传等军于各地，官军一蹶不振。

^① 据罗尔纲《李自成自述原稿注》：“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怨（怨），被忌抑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译者

^② 始终把洪秀全牵强附会地解释为日本人（大盐格之助）。不过当最早起义的军事指挥者离去后，秀全亲近的两个异母兄长掌握了权力，而这两个异母兄长是日本人还是日本人同中国人的混血呢？石崎氏对此未置一词。可以说这是因为石崎依据的《粤匪纪略》以及当时日本采用此书写成的中国史中都未提及两位兄长之故。

现在且看，在《宽永小说》的一段叙述中有这样的记载：

国姓爷集合人众，困守高砂郡（指台湾）城池。此际，请求日本出兵支援，献来各种珍品，经由长崎长官上陈此由。上方（德川家光）考虑，如不支援，焉有好评。为此，遂召来御三家（纪伊、尾张、水户三藩主）及扫部头（老中井伊直孝）等面商。

当时，作为幕府将军近亲的三家藩主，都向家光申请自愿担当主将出征，但井伊直孝施加阻拦。他认为“支援之事必劳而无功，甚无必要。”“此后，仍有种种方案”，但是，“扫部头反对，当然决定不予支援，所献物品亦由长崎退还”。

这部《续史籍集览》本的《宽永小说》中，有林信笃（凤冈）于“享保三年”的跋语，跋语说：“据称此书所述，均为宽永年代中（家光之）近臣永井（日向守）、松平（伊贺守）、柳生（但马守）、佐久间（将监）^①等人所语，但与吾祖道春（林罗山）侍座幕府时所闻各节略有出入，确否难断。”（原为汉文）。并且说：“将此重新书写，奉献幕下，以备披览。”（原为汉文）

但是，现今这部《续史籍集览》本的《宽永小说》中的这篇跋语，是就本文的中途（约当前半部分的末尾）议论的，而前引国姓爷请求支援云云一段是出在后半部分，亦即在跋文之后出现的，所以说，这一部分可能是对所谓“林道春所闻各节”与近臣所说内容的异同详略加以校订之外的部分。也就是说，这是以后有人追加上的部分也未可知。尽管如此，大体上确有被传说的这样一种事实（？）谅必无误，只不过传闻是后来加以笔录的东西，与事实多少有所不侔也在所难免。举例说，上文所说国姓爷（郑成功），在这个场合乃是其父郑芝龙的事情。这一差错，正如《台湾郑氏记事》（文政十一年刊行）的著者川口长孺（水户藩的国史总裁）所早已指出的那样，根据《华夷变态》（后述）收录的内容，便可了解郑芝龙所派使者通过长崎长官向幕府提出的求援文书（郑成功提出要求是以后

^① 将监，近卫府法官。——译者

的事)。

《宽永小说》所说亲藩三家申请出兵,他处也有这一记述。《通航一览》(卷二一二)的《郑氏求援兵附传说》一项中有:

大明日益纷乱,福建郑芝龙扶立天子一族之唐王为帝,与鞑靼交战。胜负虽尚未卜,但缘于大敌当前,乃与下属崔芝谋商,以商人林高为使径直抵达长崎(按林高来长崎为正保二年12月——原注),请求日本出兵支援,但大猷院阁下(指家光)怀疑其虚实,未予许可。

这是引用了《南龙君遗事》(南龙君即纪州侯德川赖宣),说是德川家光心存疑问,未予准许。另外关于这一点,成岛司直(幕府上层儒者,掌图书部门)所撰《大猷院阁下实记》(收载于《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40卷)卷六五正保三年10月项中称:“世间所传,郑芝龙乞求援兵时,下交三家计议,尾张、纪伊、水户三卿均请率兵出援,未得允准。然而,《南龙公谱略》载称,赖宣卿认为若国家派出援兵无功而返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永世之害。如我师出建功,虽获得其地,亦等同废物,于国无益,反贻后日之患。莫如不允所请。”还说:“家人宜知《谱略》,对此不可有怀疑”,这样重视自己记录的《南龙公谱略》的史料价值,信赖其记载,不仅是批判“世上所传”的《宽永小说》之类的说法,而且是极力予以斥责。

但是另一方面,至今也还留有可以证明幕府内部也作了出兵准备的文件。稻叶君山(岩吉)在其《清朝全史》(大正三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上卷“明末清初时期日本的地位”一篇中引用了《宽永小说》的记载,论及幕府对出兵的不积极。但他同时又引用了载有当年板仓重宗(京都所司代^①)给他侄儿重矩的书信《富田文书》(福岛市,富田等弘所藏),说道:

^① 京都所司代,江户幕府时期之官职,执勤于京都,掌管有关朝廷、公家政务,审理近畿诉讼,监督京都、伏见、奈良之町奉行(当地长官)。——译者

“幕府定是明确向亲信的藩主板仓重宗发出了某种出师命令，重宗据此才向其侄主水佑重矩透露这一内部意向的。”还在明治二十四年，小仓秀贯就已引用了这个《富田文书》在《史学杂志》上发表了“德川家光侵略支那的企图”一文。辻善之助也在《增订海外交通史话》(昭和五年，内外书籍株式会社)中，肯定了“德川家光的侵略支那雄图”，并以此作为书中的一个题目。

现在将《富田文书》中谈及出师之处列举如下(《清朝全史》引用的词句稍有误写或误排的字，因此以《海外交通史话》所载文字为依据，该书刊出了这一文件的影印件)：

- 一、乘船发往大明，准备攻取城阵，务须随时待命进军。
- 一、长期做好准备。
- 一、出发之前，须加固护城濠沟。
- 一、日军名额中，大将方面，主将一人，副将十人。
- 一、名额中知行取^①十人，计俸禄一百万石。
- 一、(略)
- 一、由总知行取起，每一万石辖乘马者一人，下级武士三人至五人。(据辻善之助计算，以上兵力超过二万人。—增田)
- 一、攻取大明者可予增加，议定后上报。
- 一、出发大明一事如无其他变化，乘渡之舟不得毁坏。先此通知，阅后此信请焚毁。

阅读之后，此项书信要付之一炬，这样的指示道出了计划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只是这一文书并无花押；而且虽经指示烧毁但却遗留下来，从这一点看，谅是抄写的而不是原件。不过，即便是抄写的，我认为存在有这样的文件一事，也绝非全无根据的虚构之词。

但是，幕府应郑芝龙的请求，在秘密作出兵准备的同时，在阁内讨论

^① 知行取，领取俸禄的武士。——译者

时则对郑芝龙的请求书存在疑问。要向长崎派出使者的时候,福州已经陷落,以福州为根据地的唐王偕同郑芝龙退走的情报也传到长崎。幕府由于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遂中止出兵,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各藩侯,目前在《通航一览》(卷二一二)中收录了这一通知函件。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辅佐唐王(隆武帝)所据的福州被清军攻陷的消息,对于我国似乎也是很大的冲击。这一点,可于前述《大猷院阁下实记》卷六五(正保三年10月条目)的下述一节窥知:

此次来自长崎之紧急报告,传来福州明军战败、明主灭亡消息。兹将对待欲来我国之外国船只办法传知松平秀就(长门守)、松平新太郎光政、松平赖重(右京大夫)、松平忠英(阿波守)、松平光晟(安艺守)、伊达秀宗(远江守)、松平直政(出羽守)、细川光尚(肥后守)、锅岛胜茂(信浓守)、立花忠茂(左近将监)、有马忠赖(中务少辅)等人之家臣;小松利常卿(中纳言)、松平光长(越后守)、松平光久(萨摩守)、森继(内记长)、京极高广(丹后守)等人之家臣亦一律传达。

沿海各藩也都传达了警戒指令。因为昔日鞑靼“元”寇袭击我国,镰仓幕府曾为之惊愕,这次也是鞑靼的“清”攻击“大明”,明朝的末裔所占据点中国东南沿岸福州已经陷落,所以幕府对于“外国船只欲来我国时之处理办法”尽早下手做出安排,由此可知,明朝的灭亡给我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冲击。起初是“大明”的都城北京被清军攻陷,崇祯皇帝自杀。随后是,在各地拥立的明朝朱氏末裔中,福王所据的南京陷落,鲁王所据的绍兴也被攻陷而走舟山。另一方面唐王据有福州稍得喘息。舟山与福州也是来航我国长崎的贸易船只的据点,成为我国同中国的连结点,关系至深。舟山是个孤立之岛,鲁王不过是占据该地山寨的抵抗势力。福州是大陆的一隅,唐王即位并改元隆武,成为帝王。现今其居城陷落,据说隆武帝逃出(后被清军擒获杀害),由此对我国投下的冲击波当然极大。

除在福建拥立唐王的郑芝龙等人向我国请求援兵之外,据有浙东(绍兴——舟山)拥戴鲁王的一派也向我国求援,此节见于中国遗存下来的记载,那就是黄宗羲(梨洲)的《日本乞师纪》,记载了黄孝卿(舟山的实权人物黄斌卿之弟)偕同鲁王的侍御冯京第为请求援兵(乞师)来到长崎而未成功。但是,在我国的《华夷变态》等著作中却找不到能清楚证明这件事的文件。最好是双方的记载大体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若非如此,仅凭单方面情况就认定为事实,则是很危险的。可以说,如不履行这样的征引手续,就超不出推测乃至穿凿附会的地步。然而对于“乞师日本”一事,确有种种试图推测乃至穿凿的,其所恃根据即是黄宗羲的《日本乞师纪》。

黄孝卿和冯京第乞师日本的年月,史料(中国有多种)记载纷乱,《日本乞师纪》作鲁王三年(日本庆安元年),在日本的记录中则找不到明确的说法。但是在中国,《日本乞师纪》(《行朝录》所收载,后又收载于《荆驼逸史》及《梨洲遗著汇刊》)的记述似乎被作为事实原封接受。南明史诸史料中属于清末时期编印的徐鼒著《小腆纪年附考》的记事(第16卷)以及他的《小腆纪传》(列传)等也不例外。被认为是清初康熙时代著作(多半以抄写本流传,清末才有刊印)的温睿临《南疆逸史》、翁州老民《海东逸史》、邵廷采《东南纪事》等,在其“冯京第”列传中,也可看到从《日本乞师纪》中原样采用的内容。没有“列传”一项的左尹非人所著《鲁春秋》(监国纪)及《东南纪事》的正文中也可以看到这一情况。或者说,其根据与其说是《乞师纪》,不如说是和《乞师纪》同样来源的传闻(?),也未可知。总之,叙说的是同样的事情,但记述的内容我们看起来却稍觉可疑。

举例说,前述各书“列传”中提到的冯京第(《东南纪事》对冯京第的事情付之“阙如”,在王翊传中才看到冯的事迹)乞师日本一事,大致都是依据《乞师纪》(或者说依据与它相同来源的资料)。据称,冯京第偕同黄孝卿,为了要求早就同往来于日本的崔芝相亲近(甚至亲如父

子)的“撒斯玛王”^①(萨摩藩主)做出支援许诺,作为乞师的使者来到“长崎岛”。正值当时日本同西洋人(葡萄牙人?)的战争刚刚得到解决,不许该使者上岸。“撒斯玛王”听到长崎不许冯京第等上岸,认为“是我国之耻辱”,便向大将军(德川将军)商量,决定发送各岛的罪人,并送洪武钱 30 万(也有说 10 万的)支援。然而长崎有妓院,孝卿泡在妓院时,为乞师而来的这种事情好像忘诸脑后,因此被日本人所蔑视,出兵之意也就消失了。各书的记载如是说(虽然也有若干出入)。

所记述的这种情况,作为事实看来有些离奇,尽管如此,冯京第和黄孝卿来到日本一节,虽然不见于日本的记录,但实有其事也未可知。张煌言(苍水)的《奇零集》中,也有以“送黄金吾(黄孝卿)冯侍郎(京第)乞师日本”为题的诗,谅必不会拿全然子虚乌有的事情来赋诗。张煌言是和郑成功一同指挥攻打清军占据之南京的武人学者,后来被捕时拒绝投降而被杀,其墓志铭(附载于《张苍水集》中)是黄宗羲撰写的,而不会是《乞师纪》作者黄宗羲以后之人摹仿《乞师纪》记述的。

另外,张煌言的《张苍水集》(《奇零集》也在其内)系清朝的禁书,几乎无人知晓,是清末反清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为做反清革命宣传而印行了它,现在有 1959 年中华书局的版本。

在《乞师纪》中看到的东西,而在《华夷变态》中也能约略看到迹象的,是携带佛教经典前来乞师而遭失败的记载。该记载称,因为日本人重视佛典,由日本返回的僧人湛微向鲁王的水师将帅阮进建议,说持佛经前往乞师定可成功。于是,阮进便以其弟澄波将军阮美为使者,偕同湛微于“己丑(庆安二年)之冬”携经典出发。但是,湛微前曾自称“金狮子尊者”,因涉嫌与天主教有关而被捕,是被从日本驱逐出来的人。这次由于该僧再次伴同使者前来,又遭逐归,乞师失败,经典原封携回。

^① 萨摩的日语读为 Satsuma。——译者

与此稍为相符的文件见于《华夷变态》(卷一)中,但和乞师之事没有关系。那是“大明鲁王致长崎长官之函件译文”,是末尾署有“监国鲁王四年(相当庆安二年)十月□日”的信函。但是,没有原文,只是日译文,文曰:“(前略)金狮子尊者自日本来,求赐佛与经。因具观音像一尊,一切经一部,加派使者二人渡航日本,以弘扬佛法,云云”,随后对这一函件做了如下的说明,是后来把传闻加上去的:

金狮子乃中国僧人,往来于长崎。在锅岛地区内建寺而居。返归明朝,伪借朝廷之名自森官(森官指郑成功,这里出来郑成功实属可笑,谅是传闻之误)得到一切经,回至日本售与诸侯。其伪被暴露后自锅岛被逐回国,传闻于彼方被监禁。

在日本记录中看到的“金狮子尊者”的情况,是在中国结合了乞师而被传说的呢?或是这与乞师之事无关的在日本的传说呢?此点甚难确定。《小腆纪年附考》等书则认为是为乞师而来的。

现在《四明丛书》第二集(张寿镛编,民国二十三年刊行)中有《冯王(冯京第、王翊)两侍郎墓录》一卷,将该墓碑铭文全都当作全祖望(谢山)所撰而收录在内。但这果真是出自全祖望之手的吗?令人置疑。我认为怕是后人假托其名之作(汇集了全祖望诗、文的《四部丛刊》本的《鮚埼亭集》就没有收载)。像日本乞师问题,铭文也只是综合采纳了各种记录而成,大致和《日本乞师纪》内容相同,字句相同之处也屡有所见。

另一方面,还有全祖望传写黄宗羲生涯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四部丛刊》本《鮚埼亭集》卷一一收载),这无疑是出自全祖望之手,它常被引用。可是,这《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说,黄宗羲自己虽然没有说出,而实际上是他自己作为冯京第的副使向日本乞师去过长崎的。还作了注释:“是冯公第二次乞师事”(原为汉文)。这件事在前述冯京第墓碑文中全未提及,如果同是全祖望撰写的,这一点理应是一

致的。全祖望对此事还自夸说：“诸家亦未有言公（黄宗羲）曾东行者”（原为汉文），“事经百年（指黄死后）始考得之。”（原为汉文。引文据《鮚埼亭集》卷一一。——译者）。这都是前述冯京第碑文上毫未触及的。从这一点看，说它不是出自祖望而是出自他人之手并不悖理。

不拘如何，祖望的黄宗羲乞师说，是他最早说出来的，然而此说的根据则甚为薄弱，一般都不予置信（《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未采此说）。但近人梁启超等也有信之者，关于这些，下面一章将稍加具体记述。

在日本方面，除前述郑芝龙之外，郑芝龙之子郑成功、郑成功之子郑经（锦舍）等人的求援函件都收录于《华夷变态》之中。下面也对这部《华夷变态》以及颇多利用了此书而编成的《通航一览》（“唐国部”）稍加触及。

24. 乞师颠末

前面提到，《日本乞师纪》说，最初系周崔芝向撒斯玛王联系，乞求援兵，（德川）将军许诺出兵。这个周崔芝的名字在其他书中，例如凌雪纂修的《南天痕》（同治年跋，宣统二年活字版）卷二四“列传”三七中作周鹤芝，《南疆逸史》（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抄写本刊印的中华书局活字版，1976年“大安”影印）卷五三“列传”四九中也作周鹤芝。后者被认为是前者的增订本（著者温睿临），两者相同不足为奇。《小腆纪年附考》和《小腆纪传》也作周鹤芝，该《纪年》的“考”说“按崔为鹤字之讹，俗略鹤为崔”。但我们从《乞师纪》，作周崔芝。

那么这里我们且引一段《乞师纪》中周崔芝与乞师一事有关的叙述：

周崔芝号九京，福清之榕潭人，少读书未成，去海为盗。其人饶机智，侪辈听其指挥。尝往来日本，以善射闻名。交结撒斯玛王，情同父子。（中略）乙酉秋，思文皇帝（隆武）提升之为水军都督（此前

为黄华关把总),以黄斌卿之副将职位驻舟山。(原为汉文)^①

关于援兵问题有以下的记述:

是冬,崔芝遣人到撒斯玛,诉中国之丧乱,请借一旅之兵。(中略)将军慨然与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皆由其本国余资中取用即足,可供大军在华数年之用。(原为汉文)^②

此段记述的真伪姑且不论,考虑崔芝大致是何时的人,又于何时乞求日本派遣援兵,首先当然要举出《乞师纪》记载的“乙酉”之秋及冬。“乙酉”者,据《小腆纪年附考》的校点者(1957年中华书局本)注为1645年,是我国的正保二年。

崔芝携来我国的请求援兵书翰二通,收录于《华夷变态》。正如近藤重藏早就指出的那样,其中一通收载于《续善邻国宝记》及《续善邻国宝外记》(二者均为《改定史籍集览》及《续群书类从》所收)。这二通书翰都未写收件人姓名,但末尾记有“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这是我国的正保二年乙酉。《乞师纪》和《南疆逸史》的纪年一致,并且,《华夷变态》等收载的书翰中提到“改元为隆武,(中略)芝封爵为肃虏将军,任水师先锋都督”(原为汉文),这也和《乞师纪》与《南疆逸史》的记载一致。肃虏将军是黄斌卿的事情,他被隆武皇帝封为肃虏伯。

持崔芝这一书翰前来的人,据《华夷变态》所载书翰的末尾记有“专差参将林高”(原为汉文)一语(在《续善邻国宝记》和《续善邻国宝外记》中为“专差参将高齐”)。中国方面的《乞师纪》和《逸史》中,则不见书翰持送者名,只是记有:“约定明年四月(将军)发兵三万,(中略)待中国之使臣至。崔芝大喜。(中略)以参谋林籥舞为使,期于4月11日东行。”

^① 《行朝录》卷一载:“周鹤芝,号九元,福清之榕潭人,少读书不成,去而为盗于海,其人饶机智,侪辈皆听其指挥,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乙酉秋,思文皇帝隆武皇帝加永军都督,副黄斌卿驻舟山”。——译者

^② 《行朝录》卷一载:“其冬,鹤芝遣人至撒斯玛,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大将军慨然与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之余财,足以供大兵中华数年之用。”——译者

籥舞将解维(启航),斌卿止之。”(原为汉文)正保二年作为崔芝的使者携送乞师书翰的参将林高(或高齐),和打算翌年4月为迎接日本军队而东行(日本)的参谋林籥舞是同一人呢?或是另一人?情形不明。姓名相异,谅是另外一人吧。

此外,中国方面看不到“林高”之名,但“林籥舞”之名却还见于其他中国方面的记录中。《南疆逸史》卷五三的“列传”周鹤芝项中提到的武将是他,作为崔芝的客卿的参将是他,还有,当郑芝龙想要投降官军时,籥舞曾进言八不可而未被听从等等。《小腆纪年》中可以看到,丁亥(1674年)正月,周崔芝克复海口时,使参谋林籥舞、总兵赵牧守之云云。

关于崔芝发出的书翰内容,虽是措词婉转的文章,但要害是“乞师”。其中的一通说,“乞借三千之师”;另一通说“请兵三千”。同样要求出兵三千人,而写着“请兵三千”的信中说:“虏(清兵)之长技以箭为先,芝(崔芝)军乏坚甲,是以每战辄受其伤。伏思日(本)之甲,天下共羨,御弓矢,如金如石”,并要求“恳请允准芝以平价购买(甲)二百领”。(原为汉文)即是说,三千兵和二百领甲,这就是崔芝向日本要求的东西。但是,《乞师纪》及《逸史》都没有举出如此具体的兵员和武器数字。

崔芝的这位使者所携的求援书翰被带到了长崎,《华夷变态》举出了上述二通书翰后,说明道:

右为崔芝书翰二通,林高持来长崎,转往江户,以备呈览者中。
春斋(林春胜)于(家光)御前读之。

也许像《乞师纪》及《逸史》所说的那样,是先到萨摩,然后经正式途径向长崎长官提出,再送往江户幕府。但在我方则找不到这样的记载,或者《乞师纪》及《逸史》是单凭传闻记述的也未可知。

《华夷变态》说,使者林高留在长崎,书翰被转往幕府。松平信纲(伊豆守)、井伊直孝(扫部头)等研究了书翰内容,通过长崎长官通知林高说:“率尔奉告,经禀报(将军),所请不准。”并且说,“速速通知林高回

国”。这件给林高的通知书是林春斋亲笔所写(汉文),收载于《华夷变态》中。

崔芝以他的参谋林籥舞为迎接日本军队的使者,原想在乙酉的翌年(正保三年)派遣他到日本去。而临到出发之际,被黄斌卿阻止住了。这是前面提到过的《乞师纪》中所说的话。该书还说,后来,又过了一年,“丁亥(正保四年)3月,崔芝克复海口、镇东(福建省福清县)二城,使其义子林皋(根据《华夷变态》的记载,时间相差两年。林皋和林高是同一人吧?因为皋和高同音,文字上有时也互相通用)随安昌王至日本乞师,未得要领而归”。(原为汉文)《乞师纪》还特别记述了第二年戊子(庆安元年),经御史冯京第向黄斌卿建议,斌卿使其弟孝卿与京第一同被派往长崎,但该王(长崎长官)不许登陆云云。

兹将以上所述《乞师纪》中有关乞师问题的记载再作一概括:

(一) 乙酉(正保二年)冬,周崔芝派人至萨摩,诉说中国之动乱,乞求借师“一旅”。

(二) 翌年丙辰(正保三年)崔芝以参谋林籥舞为使者,意欲启航迎接日本军队,但正值此际,为黄斌卿所制止。

(三) 又翌年丁亥(正保四年)三月,崔芝使其义子林皋(林高?)随安昌王往日本乞师,未得要领而归。

(四) 又翌年戊子(庆安元年)冯京第、黄孝卿来长崎乞师,未许上岸。黄孝卿沉湎妓院,遂失信用。援兵告吹,领得洪武钱(军资)十万。

(五) 又翌年己丑(庆安二年)冬,僧人湛微自日本归,向荡湖伯阮进说,若以普陀山的藏经为献品去乞师,必能成功。阮进以其弟澄波将军阮美为使者(《南疆逸史》卷五三“列传”四九“周鹤芝”条中说,当时以冯京第为使者,阮美为副使)派往长崎。然而,同行的湛微曾自称金狮子尊者,被视为西方天主教徒潜入而遭逮捕,但因是僧人,遂被驱逐出境。阮美知受骗,乘船载经而归。

以上为《乞师纪》记载的五次日本乞师经过，但对此可否照直信为事实，则还是疑问。今日看来，总不免觉得是些事后记述的不确实的传闻。例如前面也曾援引过《乞师纪》所说的“将军慨然与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皆由其本国余资中取用即足。可供大军在华数年之用。”（原为汉文）这就令人怀疑。书中随后还说：“由长崎岛至东京三千余里之驰道、桥梁、驿递、公馆均重加修葺，以待中国之使臣至。”（原为汉文）实在让人感到是夸大其辞。看一看日本方面的史料《华夷变态》便知，幕府根据所有从长崎提出的报告，向长崎长官发出指令，在长崎进行交涉和解决。对于可以说是来自败者的乞师的使者，竟然郑重到以修理道路、桥梁，整顿驿舍和公馆的程度来迎接，这从常识上讲也不可想象。实际是在《华夷变态》中可以看到对于崔芝的书翰，就其字句提出了一系列的严厉追问，在夸示我国威严的同时，还一一指责了对方字句使用的无礼。所以，《乞师纪》的以上那种记载，毕竟不能说都是事实。

《乞师纪》被认为是仕于浙东鲁王的黄宗羲所撰，所以就乞师来说也是以鲁王支配下的情况为主。而对南方福建隆武朝的事情，连对乞师的情况也难免疏于记载。隆武帝部下郑芝龙致我国的乞师函件，在《乞师纪》上看不到，但却收载于《华夷变态》中。隆武二年（正保三年）八月十三日，“隆武帝使者黄征明渡海至日本求援，郑芝龙有书翰数通，致日本正京皇帝者二通，致上将军者三通，致长崎王者三通，各有进献物品。”这是《华夷变态》做的说明，但未记载这些书翰的原文。不过该文提到了黄征明“因受海上鞑靼人之阻，未能来朝。故以小舟，命载使者及芝龙书翰与献物，连同征明之书翰抵达长崎。同年10月自长崎急趋江户。老中将其意呈禀（将军）。先考（林春胜）于御前诵读（其函）。”幕府首脑秘密就其书翰反复进行了评议，关于此事记载说：

经数日之评议。尾张、纪伊两位大咨议亦来江户出席，由春斋口读该书翰，因适逢阿部对马守值月班，书函由彼保管，每日收提，每次亲封，不准示人，故不能抄写。然因每日侍奉评议之席，故先考

(春斋)亲笔书其大概旨趣如上。

这样记下了大体的内容。现在将其要点简略录示如下：

一、正保丙戌三年10月，大师平虏侯郑芝龙向正京皇帝进函二通。一通附录有隆武皇帝之敕旨。(中略)旨在求借劲旅。以前虽谓五千(由此可见,请求了三千之后似乎又请求五千,现在该函无流传)但其数难胜敌人,意冀更多之数。附敕书并献上礼物。

一、该人向正京皇帝致呈之副件,及皇帝亲制之敕书,系命兵部侍郎黄征明赉送以求借劲旅,云云。

一、该人致将军之函件三通中,二通专申借兵之事,并附陈使者之舟楫遭遇风波之事。一通乃芝龙为妻子之事,索求日本童女十人,奴仆十人;又为小儿(或指成功之弟七左卫门?)之事,其母思子,请求来唐(中)国。(中略)(芝)龙之子(成功)来大明业已十六年,娶妻(为芝龙)生孙。唐王(隆武)亲切赐准驸马礼遇,封忠孝伯,率十余万人。母以子贵,其母亦封夫人,云云。(下略)

一、该人致长崎王函件三通。其中二通为借兵事,一通为其妻子事。以上三通与致上将军之函均不做文字回答。(下略)

一、唐王使者黄征明送呈正京皇帝函中,专写借兵之事。
(下略)

当时黄征明的使者携来的郑芝龙书翰,收件人写的是“正京皇帝”、“上将军”、“长崎王”,这里日本分别指的是何人?需要问明。又给“正京皇帝”或“上将军”的函件中一些字句也需一一问清。这些具体诘问的地方,以《此次难题》为题收录在《华夷变态》中。据该书载称,这项诘问函件经派“丰后(国)府内(地方)的城主日根(织部正^①)及内藤庄兵卫为上使,前往长崎,向黄征明使者面告幕府旨意,令使者归国。若使者另有所

^① 织部正,管辖纺织、印染部门的首长。——译者

陈，则妥为听取，回府呈报。”在此以前，文中已经谈到：“此次求援可否允办？经数日评议后，认为援之则规模甚大。”所以，已大体决定不派援兵，因此，要想让使者传达“幕府旨意”。但是，确实的决定还没有做出，这一点，从“若使者另有所陈”，要好好听取，回到幕府陈报云云，就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可以看出有这样一种用意，即根据情况也可答应派遣援兵的请求。这件事，前面引用的《宽永小说》及《富田家文书》就可以证实。

派黄征明到日本一事，虽不见于《乞师纪》，但在中国的其他史料中却可以看到。记录了据有福建的隆武朝事迹的《思文大纪》卷八有如下叙述：

平彝侯郑芝龙议借倭兵，以图恢复，上（隆武）许之。以黄征明
为正使，给一品服色，升枢□（原缺）职衔，荣其行也。（原为汉文。
引文据《痛史》第6种，第4页。——译者）

据此可知，郑芝龙提出建议，隆武帝许之，派黄征明去日本。《乞师纪》中虽未载此事，但说它实有其事当不为过。只不过，当黄征明的使者滞留长崎，幕府对策尚未确实决定下来的时候，如前所述福州陷落、隆武帝逃亡的情报便传到长崎，派遣援兵一事便作罢论了。关于此事，《华夷变态》作了如下记述：

同年十月十七日，自长崎发出之十月四日函件送达（幕府）。据
称，8月下旬鞑靼人攻闽中，破山海关（仙霞关？），大明人不及战而
降。（中略）此函既到，据此，派遣织部正、庄左卫门赴长崎事作罢。
指示山崎权八郎（长崎长官）命译员告知征明使者，福州既败，支援
无法执行。进献之物品俱不接受，可令归国。

先是，冯京第的事情在中国遗留的史料中一再出现，然而在我国记录中却全然见不到。冯京第和黄孝卿被派遣去日本一事，最终经舟山的

实力人物黄斌卿许可而记入中国的史料中。黄斌卿之名虽然是一闪而过,但我要指出,在《华夷变态》上看到了他。

这封书信的内容未予记载,只把封面的文字写了出来。最初的一行是“大明中兴隆武己丑季夏吉旦”,其次在封面的中央部位上方有印,下方横写“济世法王”,其次有两行字:

钦命总理招讨大师夷虏侯黄斌卿书

爵下参将石器□賚挂

所缺□之字有注云:“忘其一字”。谅必是黄斌卿的书信,由其部下参将名为石器□者携来。但其内容文字或其大意的说明均无只字述及,这在《华夷变态》所收其他书信中,尚属前所未见之例。或许因其未作为正式函件送达幕府也未可知。

这里所记年代隆武己丑(1649),一般说是在隆武的根据地福州已经陷落,隆武早已逃走之后。《华夷变态》中对此也加有“隆武己丑可疑”的注,并说:“明帝于丁亥改隆武为永历,然则黄斌卿不用永历年号,犹守隆武年号耶?”(原为汉文)

所说隆武己丑,相当于我国庆安二年。在《乞师纪》中,冯京第和黄孝卿由黄斌卿许可,来长崎乞师的时间是上一年的戊子,亦即庆安元年。如果以此作为冯京第、黄孝卿携来的书信封面的话,那么就有一年的差异。也许是冯京第、黄孝卿来后的第二年,黄斌卿又派遣了另一使者王某?或者是王某任意利用了黄斌卿之名来乞师?确实的情况尚不清楚。

总之,我方记载的史料中见不到冯京第的名字。但是,同时我要指出的是,在我方的记录中,纵然一闪而过但却遗留有下令派遣冯京第的黄斌卿的名字。

为向日本乞师而做了使节,但却不得要领而归。这是《乞师纪》对冯京第的记述。冯本人记述日本乞师的著作,则有《浮海记》流传。《南疆逸史》的“凡例”中,就把冯京第《浮海记》作为专述“鲁监国事迹”的史料,

同《日本乞师纪》等一起列举出来。《南天痕》一书的“例言”中,在谈及“专述鲁监国事迹”的史料时,同样把冯京第《浮海记》同《日本乞师纪》等书一起列举出来。

谢国桢所著《晚明史籍考》20卷(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图书馆)采用明末有关史籍千余种,就其主要者,转录了原本的序、跋等,做了细密的考察及解题。作为有关这方面研究史料的入门书,它对我们大有裨益。但该书第12卷中所载《浮海记》,只谈到:“明慈谿冯京第跻仲撰。跻仲于鲁王监国时为兵部右侍郎,尝至日本乞师,著有《浮海记》。舟山陷,死之。”(原为汉文。引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译者)对于《浮海记》的内容则未加介绍,也未加考证。好像谢氏也没有直接看到《浮海记》。

现在,《四明丛书》(前已提到)第98—100册中,收载有《冯侍郎遗书》(8卷,附录3卷),但这一《遗书》中也没有《浮海记》,仅传书名而已,真可算是虚幻之著了。倘若冯自撰的《浮海记》能够原样流传下来,想必可以稍稍具体地知道一些冯的乞师真相(?),而现在可以说只是臆测在扩散。

我所看到的书籍中有旧抄本(湖南王礼培旧藏)的影印《浮海记》(1971年,台湾世界书局),附载于也是旧抄本影印的钱秉镫著《所知录》中。这一《浮海记》的原抄本上署名为“黑甜道人张麟白著”,遍觅书内却不见冯京第之名。誊本的抄写者在书尾附记说:“此书题款为黑甜老人张麟白撰,然遍查鲁之诸臣,无张麟白其人。阅日本乞师一节,始知为徐孚远所作,隐其名而问世者也。”(原为汉文)卷首的高阳李宗侗所作解题,也接受此说称:“张系化名,实即赴日乞师之徐孚远也。”(原为汉文)如此而已,另外未加考证。关于徐孚远,恰巧在《明史》中发现其名(卷二七七“列传”第一六五陈子龙文中),《小腆纪传》(卷四一“列传”三四)中有稍详细的传记。但未见有赴日乞师一事。说不定这是誊本抄者的判断错误,或是信口开河。

这一《浮海记》记述了黄斌卿、周崔芝、吴钟峦等据有舟山岛的事情，以及郑芝龙、郑鸿達、郑成功等人略传及其互相关系。最后说鲁王用湛微之言，以阮美为副使持藏经赴日本乞师，记述了在《乞师纪》后半部所见到的同样内容。

正文中也未见有冯京第之名，但是有的地方却让人认为像是冯京第记述的，那就是，鲁王最初不予许可，而阮进则意在必行，于是就“以一干练(有力)之大臣为正使，以其弟澄波将军阮美为副(使)。众推大宗伯吴钟峦前往。吴公(钟峦)老矣，且须从小卿中选择。经众议非余不可，遂加二品之服，赐袍带，王亲赐宴饯送云云。”

文中以后说到船向长崎进发，船停之后，“阮美之船亦到，问以风浪之威如何，彼曰不甚凶恶，方知因余之舟中诵藏经而有以致之也”、“是日，余唤通事一人上船”、“意欲迎余上岸”等等。这些话中的“余”，定是《浮海记》的作者了。

这和《南疆逸史》的“周鹤芝”项所说以冯京第为正使、阮美为副使前去乞师的记述正相吻合。但是，在《浮海记》中看到，湛微与阮美一起同行，而湛微曾因自称金狮子尊者一事败露，后被视为西洋天主教徒而遭放逐云云，这是和《乞师纪》同样的记载，可是在《乞师纪》中所见冯京第与黄孝卿同赴长崎的记载，在《浮海记》中却找不到。

前面引用过的《思文大纪》，是以福建为中心的隆武(思文皇帝)时代的记述，而另有一部以同为明之后裔但占据浙东与之处于稍稍对立关系的鲁王(未登帝位而称监国)为中心的记述政情历史著作《鲁春秋》(不分卷《适园丛书》本)。在该书中，永历五年(鲁监国六年)辛卯(1651年)即我国庆安四年，得见下面的记载：

秋七月，乞粟(粮食)于日本，其国王(指谁不明)许振疾航饷(食粮)数千斛。(原为汉文)

并有下述记事补充说明：

先是，丁亥（正保四年），周藩安昌王以监国命乞师日本。（中略）既至长吉（长崎）岛，岛通事以权衡报源（德川）将军。（中略）诸生凌士弘与诸生冯京第以周阁部张肯堂书及肃卤（肃虏伯）黄斌卿血书往。适天主教四舟失风，漂入界，而源将军方整兵拒防，但接济军需慰所请，此乞粟为监国第三往矣。（原为汉文。以上引文据《适园丛书》第一集，第517页。——译者）

这说明，不求出兵，而代以军需援助为慰，而且这次（庆安四年）秋7月的乞粟是监国（钱鲁王）的第三次。乞师不行，代以请求军需援助为慰，真正的主要目的是借兵，这当是第三次了。

但在《乞师纪》中，丁亥（正保四年）之年是崔芝派其义子林皋作为安昌王的随员前往日本，黄斌卿派遣冯京第和黄孝卿赴日则是翌年的戊子（庆安元年），比《鲁春秋》的这一记载晚了一年。可以说，这也是在各史料之间，在大体被视为基本资料之间，彼此显示出纪年纷乱而且记述有异的一例。这或许是事后追记传闻所造成的。所以说，在依靠所有一切史料记述的基础上，唯有实际经过探索推测，把各种可以视为史实痕迹的东西一并记下之外，别无他法。

顺便一提，在《鲁春秋》中发现有永历三年乙丑（庆安二年）的记载说：“冬十一月，遣太常卿任甲御史余图南，往日本通好。”（原为汉文）所称余图南为通好而来日本一事，由于寡闻在日本方面的史料中没有找到。不过，这大概也是说明那时通好之船（实是乞师船？）频频前来我国的一个例证吧。

25. 萨摩、倭寇与中国（明）

周崔芝（或周鹤芝）来往日本，“与撒斯玛王结父子之交”，这在《乞师纪》及其他中国史料中均有所见，已如前述，但这是出于崔芝的自我宣传呢，还是传闻者夸张了的以兴趣为中心的记述呢？尽管这样考虑，但对

于崔芝或类似崔芝的人物，亦即当时中国从事海盗贸易的人同萨摩之间的关系，恐也不能完全当作无根无叶的虚妄之谈而不屑一顾。现在愿就这些情况将我自己的些许穿凿记述如下。

根据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列传”四九，崔芝“年几四十”的时候，“见天下将乱，慨然”把自己迄至该时的海盗似的“不义事”打上句号，“请于朝”，“授黄华关把总(队长)，讥(稽)察商船。”(原为汉文。引文据《南疆逸史》卷五三。——译者)

那么，当时的海盗崔芝拥有多大的势力呢？对此，《思文大纪》卷七有以下的记载：

“左都御史张肯堂，疏荐崔芝善于用(航)海，有船五十多号(只)，有兵二千余名。乞(隆武帝)释罪图功，置臣标下。上从之。”
(原为汉文。引文据《痛史》第6种，第9页。——译者)

由此看来，崔芝是一个支配着甚多船只，手下有很多兵卒的海盗首领，归顺后隶属于御史张肯堂麾下。

照《南疆逸史》说的那样，如果崔芝是在40岁上下时候结束海盗生涯入于仕途，那么他来往萨摩当是在此之前了。但像《乞师纪》和《逸史》所说，他派使者向萨摩藩主“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若是在“乙酉”(正保二年)之冬的话，从那时往回推算，大约是30余岁或20余岁时来往于萨摩的，想必是元和、宽永时期。在中国，隆武在福州即帝位是乙酉，因此，约当其前的万历末期至崇祯时期。

到了这个时期，应该说倭寇活动大体上已趋衰退，但其余波尚存。据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民国二十三年，哈佛燕京学社)所说，元和二年(1616)曾袭福建(引《福建通志》)；元和四年广东揭阳被袭(引《广东通志》)。当然，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与中国沿海海盗集团的混成组织。中国的海盗(著名者有王直、徐海、陈东等)常充当向导，劫掠沿海各地，施暴肆虐。中国为取缔而伤脑筋，海盗集团与中国的官军作战，却具有不

亚于对手的巨大威力。支持南明隆武帝、掌握着左右隆武朝实权的郑芝龙(成功之父),原来也是海盗,而崔芝与郑芝龙同助隆武,是芝龙的得力部将。

如此看来,所说崔芝来往日本,自会使人想到当时他是在起所谓倭寇余波作用的人物。说到和萨摩的关系,看一看郑舜功的《日本一鉴》,可知萨摩原是倭寇的一个根据地。

《日本一鉴》四册(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我收藏的本子未记出版社或出版者),大概是明朝嘉靖三十四至三十六年(1555—1557年)作为明之使者来日本的郑舜功(目的是为向日本当局提出倭寇取缔办法)所编著,根据相当多的史料和调查写成的。也有涉及日本各方面的指南记述,还采用了各种日本地图。尤为令人瞩目的是,他根据自己调查作出的有关倭寇记述。在该书的《穷河话海》卷四“风土”项里,他这样记述说:

萨摩之夷居商者多,今为寇(倭寇)者众,土夷扫部(倭寇人名)嘉靖丙辰(35年)胁从徐海(海盗人名,为倭寇向导)入寇矣。又高洲地方(卷六“被虏”项中为高洲注音曰“倭音太佳自”),二十年来流逋潜处于其间,本洲(高洲?)民居约百家,我(中国)民之被驱虏(俘虏)为夷奴(日本的奴隶)者约二三百人,多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边氓也。(原为汉文。引文据该书“穷河话海”卷四“风土”。——译者)

数字之类能否在任何地方都作为事实予以信任,这即使是个疑问,但是就这一记事来看,萨摩自足利^①末期起,就已有很多福建方面的人被倭寇掳掠流落寓居于此。即便和倭寇没有关系,也可以想到,既已有很多同乡人居住萨摩,或与其子孙沾亲带故,福建方面的人众就会来往萨摩的。而崔芝是福建(福清)人,《乞师纪》及《南疆逸史》都有这一记载,

^① 足利时代,即室町时代(1392—1573年)。——译者

那么海盗崔芝的所谓“来往萨摩”或许和这样的倭寇子孙有某种关系也未可知。

而且,当时他们一面从事交易(秘密贸易),以此作为对外公开的宗旨,实际则倏忽之间又成了海盗,把劫夺他人船上货物视为一般奉行的模式,时而做海盗,时而又以贸易者的面貌来往。

此外,关于《日本一鉴》的编著者郑舜功,《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有记载说:“初者,倭僧清授随侍郎杨宜所派郑舜臣至宁波”。(原为汉文)这部《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原是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的手写本,于民国二十一年影印的,实与明朝徐学聚编集的《国朝典汇》(天启四年序)卷一六九“兵部”三三“日本”之项是同一内容。对于这一点,为该影印本撰写跋语的柳诒徵已予指出。不过,《国朝典汇》是从“洪武二年”起逐年记述,继之为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嘉靖,而《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则稍稍加上了“自嘉靖元年云云”的前文,然后突如其来地从“嘉靖三十一年”述起,就是说,记述的是倭寇为害特别剧烈的时代。最后结束于“隆庆二年”(《典汇》也止于“隆庆二年”)。《国朝典汇》明版,收藏于内阁文库(我复印了它的“日本”之项),现在有台湾“学生书局”的影印本(4册)。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及《国朝典汇》的“兵部”“日本”之项所说侍郎杨宜派往日本使者郑舜臣与《日本一鉴》的编者郑舜功当是同一个人。《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三)作郑舜功,有如下记载:

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外)哨探(夷情)者,至丰后岛,岛主亦遣僧清授附舟前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诸岛夷众,义镇(大友氏)等实不知。”(原为汉文。据该书。——译者)

又黄遵宪(明治初期驻日本的清国外交官)的《日本国志》(光绪二十三年自序)卷五《邻交志》(二)作郑舜功,并说:

宏(弘)治元年(日本年号,相当嘉靖三十四年)明总督杨宜遣郑舜功至日本肥前平户(?),见大友义镇,诘之曰,通好久矣,何扰吾边

疆，虔刘(劫掠)吾民，果是贼民，亟见禁戢。义镇以闻将军义辉，(义辉)命诸将会议云云。(原为汉文，引文据该书。——译者)

黄遵宪究竟根据何书作如是记述，虽然并未详说，但是，它和日本方面的史料(就我所知)大体相同。我想指出，这一史料的根据是香西成资的《南海治乱记》(宽文三年跋，明治十六年《史籍集览》所收)卷五《豫州能岛氏侵大明国记》，这里为“郑舜侯”，并这样说：

大内义隆逆亡之后，丰前、筑前由大友义镇治理。方此之时，大明王有玺书赠日本国王曰：“中华与日本以勘合相通事已久，近曾失此交好，绝来聘，且比年倭之贼船屡侵大明边境。希禁其剽掠，以得众民之安宁。故以书谕之，今复睦旧好之时，即幸而已。”

大明之使节郑舜侯者，抵临博多津。其时，因丰后之大友义镇统领西州，遂视之为日本国王，呈其玺书于义镇，并述其意。义镇曰：“所谓日本国王者，乃王畿之君也。吾领此西州之地，守其藩屏而已，并非国王。然今者日本乃系战国，诸州之豪族不遵王命，故不能上达朝廷。又且吾邦日日治理兵备，守其疆域，共争雌雄，不遑出兵他邦。是以(犯境剽掠)乃海岛群贼所为也，朝廷晓谕无限，加以制止”，三使(疑为“天使”，在《日本一鉴》中，郑舜功自称天使)闻此而归。

上面是《南海治乱记》的记述，但我认为它传述了日本如何处理郑舜功来使的真相，或者说近乎真相。就全体来看，可以说《日本一鉴》有如前述《明史》一样，把它说成是“出海哨探夷情”。关于这方面的记述，虽然有其他各书中所见不到的详细部分，但是，对于禁止倭寇问题的交涉等，则未加具体记述。

前述《一鉴》中有关萨摩的记述，也是以舜功当时到日本所做种种倭寇调查、“哨探”的结果为基础的，现在尽管不能全部予以肯定，但总可以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期间的事实。

谈到当时萨摩同中国(东南地区)的交通,九州的西南端、萨摩的“坊津”作为日明贸易的要津似甚繁荣。明人茅元仪的《武备志》(天启元年即1621年序)卷二三一“四夷”《日本考》(二)“津要”项中记述日本的要津如下:

国有三津,皆商舶所聚,通海之江(? 疑为口之误)也。西海道有坊津(萨摩州所属——原注)、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属——原注)、洞津(伊势州所属——原注)三津。唯坊津为总路,客船往返必由(经由);花旭塔津为中津,(中略)洞津为末津。(下略)(引文据该书。——译者)

由此可见,当时萨摩的坊津是从中国(东南地方)渡航日本的“总路”。先到坊津,由此或航“花旭塔津”,或航“洞津”。但也有自浙江的宁波和舟山经五岛抵“花旭塔津”的航线,所以称“坊津”为“总路”,主要是就东南的浙江、福建或从广西、广东方面渡航日本这一情况而言的(当时经琉球赴萨摩者甚多,因此,萨摩与明的关系大抵以琉球为中继地,同时它又起着中间人作用)。

只是,在《武备志》以前,载有嘉靖四十年(1561)序言的郑若曾所著《日本图纂》(收录于《郑开阳杂著》中)一书中有“日本入寇图”,在“萨摩州”处注有“倭寇至闽、广总路”的说明;在“五岛”处注有“倭寇至直、浙、山东总路”的说明。还在“对马”处作了“倭寇至朝鲜、辽东总路”的注明。由这些总路分开,注上了“从此入泉、漳”、“从此入福、兴”、“从此入宁波”、“从此入钱塘江”、“从此入扬子江”等,标出了中国沿海各地的入侵地点。这里《武备志》所说的三要津,当是离开了倭寇问题而就一般交通贸易而言的。

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出于取缔需要,把唐船入港限定在长崎一港,而在此之前坊津作为对明贸易的中心,曾一时繁荣起来,海外的珍奇货物集聚于此。对此,川岛元次郎的《与唐船相关联的坊津之盛衰》(大

正十五年,平凡社发行,《南国史话》所收)做了记述。这是前往坊津做了调查,并加以考证的著作。

川岛氏记述了访问往昔的坊津贸易家鸟原扫部助的子孙鸟原英治及目睹他所收藏的古文献的事情。那文献是,注有天正十二年11月9日,由岛津义久署名,发给“天神丸”“船头鸟原扫部助”的琉球贸易许可朱印状。这方面的研究家川岛氏(著有《德川初期的海外贸易家》、《朱印船贸易史》)说它是“德川幕府授予航驶异国贸易船朱印状的先驱”。尤其这份朱印状,系以记明船名、船头姓名作为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这位船头鸟原扫部助通称为喜右卫门,大规模经营驳船业,也往琉球方面行船。这位扫部助(喜右卫门)谅必早就因为有了驳船贸易实绩的关系,庆长五年就航驶明国,前往北京。北京之行的原因是,岛津义弘命他将朝鲜战役中被俘(作为人质)并由岛津义弘带回的明将茅国科送还中国。他率领百余船夫由坊津启航,载茅国科先至福州,再由该地送至北京。据说明神宗召见了扫部助,并盛宴款待之(据川岛氏记载)。其实,岛津久通的《征韩录》(宽文十一年)以及得能通昭的《西藩野史》(宝历十年?)都有记载。

上面所说送还在朝鲜俘掳的茅国科一事,也见于《南浦文集》。以南浦为号的文之和尚,在庆长至元和期间为萨摩藩主岛津氏(义久、义弘、家久)所重用,像是特别负责对外文书方面的任务。

记述南浦的作品(谈不上研究)有森庆造(大狂)的《南浦文之和尚》一书(大正七年成寅堂出版)。《南浦文集》(庆安二年刊,拙藏是这一庆安刊的精写本,有“渡边千秋”之藏印。又明治三十九年出版的《萨摩丛书》第2册中也予收载)收入的文字中有代萨摩藩主撰写的各种文件。诸如《呈大明天使书》、《与大明商客》、《与大明奕吾子》、《与大明福建军门书》、《与蛮君书》、《答蛮君书》、《答南蛮船主书》、《寄吕宋国船主书》、《答安南国书》、《答琉球国王书》、《签琉球国三司官书》、《答中山王书》等均录在内。看了这些文件,任谁都会明白当时的萨摩与中国、琉球以及

南方诸国通商贸易状况，也能理解它殷切盼望同各国通商贸易的兴旺，在这种情况下，崔芝等人也受到萨摩相迎，就不足为奇了。

川岛氏所说在朝鲜之役被萨摩军掳获并带回的明将茅国科（渭滨）一事，也见于《南浦文集》。并且还提出以过后送还茅国科为理由，谋求更新明与萨摩的通商贸易。

《文集》卷上所收《书于义弘谱系图之旁》一文中，叙述义弘父子在朝鲜与明朝大军交战之事时说：

大明诸将以数百万之军攻我泗州之城（萨军所据）。义弘父子胸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故亲提三尺（之剑），直进入百万之军，（明）军一时瓦解。（中略）于是有参谋大夫龙涯者，求和议于我军中。（中略）终应参谋之求，以大明之将茅渭滨为质，载之俱归日本。（原为汉文）

又卷中的“吊战亡文”也记有此事：

大明之诸军，矢竭弦绝，终乞降于我。我获其将茅国科为质，载之随全师而归。（原为汉文）

对于以后送还茅国科一事，该中卷收载的《呈大明天使书》中说（此信开头是“日本国萨摩州刺史藤原家久，谨上书大明国天使两老大人钧座下”）：

前者，华人茅国科在朝鲜与日本三四年，吾人恭敬皇朝（指明朝）之余，派船并差喜右卫门尉送之还中华之地，未审国科是否康健，今每令人思及。（原为汉文）

在希望中国船舶来航萨摩繁荣贸易交往的文件中，这是叙述明和萨摩之间关系深厚的一段文字。这里所说的喜右卫门尉，据川岛说是鸟原扫部助。前面所引川岛氏所说朝鲜之役被俘的茅国科被送还云云，没有说明史料来源，看来恐是依据《南浦文集》以及《征韩录》、《西藩野史》的

记载了。

先前援引的《日本一鉴》中《穷河话海》卷四“风土”篇的萨摩部分，记载有“土夷扫部嘉靖丙辰胁从徐海入寇”，这里所说“扫部”是指这个“鸟原扫部助”(喜右卫门)吗？或因此人有了名声，才将“扫部”和他的姓氏结合在一起，眼下虽还提不出确实的史料，但总之这件事可以说旁证了萨摩当时就拥有强有力的海外贸易家。所谓崔芝来往日本，“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之交”，当具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关系吧！这就是开始时所说的我的穿凿。

这里还有一点，关于萨摩和倭寇的关系问题不可忽略的是，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嘉靖四十一年序)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中，对于作为倭寇的指挥者并与王直、徐海齐名的陈东，做了这样的说明：“此萨摩州君之弟，掌书记酋也，其部下多萨摩人。”(原为汉文。引文据原书。——译者)。

26. 朝鲜战役中的萨摩和中国(明)

关于萨摩同中国(明朝)的关系问题，从现在遗存的史料出发，只能做到追踪其约略痕迹的程度。关联着丰臣秀吉的出兵朝鲜，特别是在以当时岛津军队动向为中心撰写的书籍中，岛津久通所著《征韩录》(宽文十一年)中也可以看到痕迹。我最初查阅的是“内閣文庫”藏书《征韩录》(原为“浅草文库”藏)。尔后，该书收录于《岛津史料集》(昭和四十一年，第2期《战国史料丛书》6)中，据悉是依据岛津久光的旧藏手抄本，加上校注刊行的。

《征韩录》中有林春斋的序言。编著者岛津久通的祖父忠长，是随从岛津义弘的军队参加朝鲜之役的人。春斋也说，“其述事之正，记录之实，岂寻常街谈巷议所可比耶！”(原为汉文)总之应该看到，这部《征韩录》作为史料的可信性颇高。而其中有不少关于萨摩同中国(明)关系的

地方。

不过，《征韩录》（《西藩野史》也一样）记载了鸟原喜右卫门以大船两艘为护卫，把在朝鲜之役作为人质带来日本的茅国科送还中国，北京明神宗接见并设盛大之宴云云，这果属真实之事吗？对此，我曾查阅《明实录》，但没有看见神宗接见日本鸟原的记载。只是诸葛亮的《两朝平攘录》（万历三十四年序）中云：

（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自宁波之昌国卫来倭船一只，送茅国科。钦命暂允归朝。大旗一面书‘平倭奏凯’四大字。日本王致邢经略函一封，致福建巡抚金学曾函一封。各馈赠（倭）刀枪、马甲、金盔，俱盛以箱。舟中有倭将一人，倭兵五六十人，钦命之外尚有漳州等地人二三十，带回原籍。是日九山风吹，一夜闻进定海关，地方受惊扰而闭户。鲁游击审明（其事），打发（上路）。见浙江军门，将官欲杀倭以立功，然军门不许。遂设宴款（待）。军门令以银牌、综帽、牛羊犒赏之……军门遣人送往福建梅花所。会同金省吾自家发落（自己设法启航）。八月小汛至，打发（出发）回国。（原为汉文）

由此可见，送回了茅国科的这一行人，从宁波经定海赴福建梅花所，并从该地返回日本。那么，就不是北京的神宗而是浙江的军门（领兵总督）款待他们的。或者所谓到北京受到神宗的款待，是鸟原喜右卫门的话被夸大而传开的？！

岛津义弘同明将茅国器军队对阵时，有一妇女持一笺自义弘阵营来到明方，被巡逻兵捕获带到国器处，乃是郭国安写的信。国器将信送交参谋史世用。于是

世用雀跃大喜称，郭国安者华人也。吾昔因故航渡日本，于萨摩州名为坊津之处与国安聚会时曾与亲密交谈。今幸彼在义弘营下，吾兵以国安为谋，欲破和营（日本阵营）极易。尤因有待国安相

告底细，世用即以一笺相认，托朝鲜商人送国安。不久国安亦有复笺，大致谓，吾今在朝鲜，居岛津义弘军营中，云云。

这是《征韩录》的记载。

《征韩录》上说，史世用与萨摩军中的郭国安计谋，想要破萨摩军，但结果郭国安帮助了岛津的作战谋划，获得大胜。

中国的《武备志》和《两朝平攘录》也记载了一妇女从岛津军营拿着郭国安信笺（原文为“一纸”）来到明将茅国器的军营一事，而《征韩录》（以及被认为依据它写成的《西藩野史》）引用了《武备志》和《两朝平攘录》的记载，可以看作是依据该两书而写成的。例如《武备志》卷二三九“朝鲜考”中有云：“逻骑得一妇，自倭营来，怀中出一纸……赞画诸葛绣解，曰：此郭国安也，以语参谋史世用，世用跃然曰，郭国安华人也，往与共在日本，誓自效于本朝（明），兹可以闻矣，乃谋诇之”。（引文据该书原文。——译者）

《两朝平攘录》虽然叙述比较简略，但却是同样的记述。《征韩录》对这部分的记述则是完全照搬的。

关于郭国安（理心），《西藩野史》（宝历年序）卷一三中作为“传说”有如下的记述：

理心明汾阳人，名郭国安、光禹。为赴试至京，因误期而返。有航渡日本之船，光禹欲一睹日本，因乘之。文禄二年抵萨州京，时年二十三岁。义久公留之居萨州，以汾阳为姓，赠名为理心。为治书翰往来，与大慈寺一僧人同随军中。理心子孙为汾阳茂右卫门。

看来郭国安及其子孙后裔在朝鲜之役后也仍旧归化萨摩了。在此之前（天正十九年），也在萨摩为义久所用的许仪后（据说是在广东连船带人一起被劫虏的）向中国密报关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消息的文书上（万历二十年带来），郭国安就是联署人。此事见于明刊《全浙兵制考》的附录《近报倭警》中。（后述）

对于《征韩录》中所说：“因故航渡日本，于萨摩州名为坊津之处与国安聚会云云”的明军参谋史世用，明朝的《两朝平攘录》(卷五“日本”下)加注说：

武进人，(嘉靖)二十六年经福建军门介绍至邢经略(《征韩录》中称为‘主将刑玠’)麾下，三月间启乘，下茅(国器)营。

看来原是在福建一带活动的人，因此在这期间去过萨摩。

关于萨摩和福建方面的关系问题，在记述周崔芝事迹时已经谈过，《西藩野史》(卷一三)也有如下的记述：

(文禄)三年甲午春，太阁(指丰臣秀吉。——译者)命龙伯公(义弘父义久，朝鲜之役因年老未出征)致书福建，使通和平之意，先是小西(行长)之使内藤(飞驒守)入明未归，不知和平之虚实，故由萨州向福建致微意以探问。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许豫，复文述息兵养民之意，并另呈一函，意皆同。龙伯公将二者献呈(太阁)。

对此，书中还加注称：“接，二书函发还龙伯公，今犹存云。”第一次朝鲜战役时，秀吉为事件善后议和而探试明方意向，当时曾命岛津义久与福建官署通函，因此可以说，岛津氏与福建方面早有关系。

关联着朝鲜之役的另一件显示萨摩和中国(明)之间关系的事情是，明军方面的随军翻译孙次郎。此事也见于《征韩录》。孙次郎原生于南京，名叫张昂。“然于十五岁丧母，为恐继母鸩毒(毒害)，只身逃日本，为萨州颖娃郡民原地方之土民所抚养，以度年月。天正十六年闻知继母讣讯，又回南京。因曾在日本度过岁月，此次遂被召为通事。”

而且，据《征韩录》说，萨摩军队的寺泽(志摩守)从孙次郎口中打听到明方诸将对于明军在泗川大败于义弘的评论。当时孙次郎告知他关于茅国器战败的五条评论。这个本为南京人张昂的孙次郎是怎样来到萨摩并受到土著居民抚养的，书中没有记述。但他作为两军交涉时的翻译从军于明方，与郭国安为担任书函工作而从军于萨摩方面是相似的。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在朝鲜战役中的两军交涉时，他们是带有某种幕后任务的人物。

在《筹海图编》中，把向导倭寇的陈东说成是“为萨摩州君之弟掌管书记”的，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在我国认为这是讹传。

松下见林(西峰)的《异称日本传》(元禄元年自序)也在它的卷八转录了焦竑所著《国朝献征录》(卷五七)中收载的茅坤《胡公宗宪剿徐海本末》一文。对文中所说“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酋”(原为汉文。引文据该书原文。——译者)部分加了注释说：“所谓萨摩王者非也，乃萨摩守也”(原为汉文)，并且说：“所谓萨摩守之弟者，其名不详。”(原为汉文)

饭田忠彦的《野史》(嘉永四年自序)卷二八二《外国传》(明上)中也援引了《献征录》的同一个地方说：“(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原为汉文)，并注释说：“按在我国诸书中尚不详知其人”。(原为汉文)

所谓萨摩王弟一语，意不明确，想是讹传。但细加思考，也并非全无根据之言。也许是指岛津义久之弟义弘而言吧？！或者是拟托义弘？前面也曾说过，侯继高的《全浙兵制考》(明万历刊)的附录《近报倭警》，亦即近来的倭寇警报之意(此处是指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在它的“陈日本入寇之由”项中，可以看到“关白(指丰臣秀吉。——译者)稍知其意(前文提到萨摩君尊重明国之事)，命萨摩君之弟武库(义弘)领兵云云”。(原为汉文)

这份《近报倭警》是万历十九年(天正十九年)当时住在萨摩的许仪后与郭国安联名写的报告，委托乘中国船归国的朱均旺带回(未写收件人名，只把对方写为“清台”)，万历二十年(文禄元年)二月到达中国。从“倭寇”以最为凶猛之势袭扰中国沿岸各地的嘉靖三十一四十年代算起，这已是 20 多年之后的事情了，时间上略有出入。依据《岛津氏系谱略》(岛津齐兴)，义弘生于天文四年(1535)，《筹海图编》所述陈东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各地倭寇入侵，是在嘉靖三十四、三十五年(1555—1556)间，义弘已是 20 岁的一代人。果尔，则把“萨摩君之弟”看

作义弘，大体上有理由说这在可能范围之内。不过，这毕竟不是可以出自我个人推理的事情。

“萨摩王之弟”在那些与倭寇保持着关系的海盗中大概具有特殊的权威吧，所以徐海也托陈东代他当上书记。茅坤的《胡公宗宪剿徐海本末》中，说徐海

出所故掠中国货物千余金，赂王弟，诈请（陈）东代署（代被任用为）书记。（引文据《国朝献征录》卷五七，第48页。——译者）

这里说的是“诈”，所以虽是徐海欺骗陈东之计，也还是接受了。总之，是向“萨摩王之弟”献媚的。

《异称日本传》引用这一部分的时候，变成了“诈请东付罪书记”，而明刊《献征录》则作“诈请东代署书记”。《异称日本传》把“代署”当作“付罪”想是因为字形相似，在原稿阶段(?)抄错的吧！而编者松下见林却对这被视为有误的“付罪”加注说：“请东托以书记事罪之也”，说了一句语义难懂的话。

《异称日本传》广泛汇集了自古以来见于中国及朝鲜文献(127部)中有关日本的记载，据说历时30余年编纂而成(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三)。这可以说是一部提供了极大方便的编著，但也有这种错误。而且训点方面也有个别不尽可靠之处。它从《武备志》“日本考”(二)援引的“津要”部分，对“贸易用银金铜钱、凭经纪名曰乃隔依理”所加训点后半部分就有错误。这是由于不明白“经纪”(掮客)这个词的意义，所以出了错。这一点，北慎言(静卢)在他的《梅园日记》(弘化二年刊)里已经指出过。我手边没有《异称日本传》的原刊本(曾看见过)。因为是依据了《改定史籍集览》本和物集高见的《皇学丛书》本，所以都将“凭经纪名”训点错了。

顺便一提，《皇学丛书》本中，在《胡公宗宪剿徐海本末》的栏外，为“徐海”二字加注说：“江苏省之沧州、徐州二府”。我要说，这是不知道作

为倭寇的向导和指挥者而与王直并驾齐驱的最著名的徐海之故,把他搞成了地名,乃是极大错误。

《异称日本传》中所引茅坤的《胡公宗宪剿徐海本末》,是研究倭寇的重要史料,它具体记述了总督胡宗宪对王直、徐海、陈东、叶麻这些与倭寇相勾结、引导和指挥倭寇的强有力的海盗首领们,采取怎样的谋略加以驾驭,而终将之剿灭的。《明史·文苑传三》中可以看到,茅坤(鹿门)“雅好谈兵,(中略)倭事方急,胡宗宪延之幕中,与筹兵事”(原为汉文。引文据《明史》卷二八七。——译者),是一位协助胡宗宪在对倭寇战略上出谋划策的人物。这篇记述他们剿灭海盗始末的文章,虽然并非没有特别颂扬胡宗宪的部分,但它首先当是和实际情况相去不太远的记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在“史部”的“传记类”存目六里列有此书,并说:“皆所亲见,故叙述特详”(原为汉文。引自该书。——译者)

前面提及的《全浙兵制考》附录《近报倭警》,是秀吉出兵朝鲜的情报,但在靠近前面些,就有记述当时萨摩住有中国人的地方,这在其他书中几乎找不到。就在许仪后的话中,我们看到:

辛未年(隆庆五年、元龟二年)过广东,连船被据(掠),幸以小道(医卜?)为日本萨摩之君所喜,得苟存性命。每以(中国之)奸徒引倭寇扰我大国(明),虏掠商(人)渔(民),变卖(其)财货,而愁苦万状!乙酉年(天正十三年),后(许仪后自称)等向萨摩之君惶恐哀告,诛陈和吾、钱少峰(等)十余(贼)首,没其妻子。余贼走入柬埔寨、暹罗、吕宋等地。是以寇船稍息。丁亥年(天正十五年),关白破萨摩、肥前、肥后,寇船暗出(海)。后(许仪后)随萨摩君入觐,冒死泣诉于关白,乃下令斩(贼)首解京,仍有二贼首在逃未获。是以至今海上升平。

……唐人之久居日本者,皆属贼寇之党,谅无一人肯言其真(此处指丰臣秀吉出兵)。且皆市肆村居,不谙国事,更无一人肯言其真……。(原为汉文)

由此可见，在秀吉时期居住萨摩的中国人，除许仪后和郭国安外还有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中国人还成为“倭寇”的向导，出没于中国沿海地方。此外，许仪后于辛未年（1571）连船被虏，是写这份密报送回中国的万历十九年（1591）的20年以前。逗留萨摩都已20年了，这期间见闻了日本的各种情况，并时时委托来日本的中国船主向本国通报日本情况。许仪后这份关于秀吉出兵的情报，甚至像是上报到了中央，万历二十二年礼部郎中何乔远的奏折上就有“万历十九年，中国被掠人许仪（后）所寄内地书”，云云。这见于《明史》（卷三二〇《列传》第二〇八，《外国一》“朝鲜”）。

27. 郑成功与“国姓爷”

《征韩录》和《西藩野史》书中写着，鸟原喜右卫门将茅国科送还中国，经福建省到达北京，受到当时的神宗皇帝的款待云云，作为事实是可疑的（中国方面的记录中未见此说）。像《两朝平攘录》所说到达了福建省的梅花所，则是事实。前节我们也曾说过，这大概是夸大其词而流传开的吧！即使查阅《明实录》，也未见到有去北京谒见神宗的痕迹。我这样说，是因为迄今没有听到过像《征韩录》及《西藩野史》那样的说法。为想用中国的史料来确证一下，从《明史》起，我查阅了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王鸿绪的《明史稿》、夏燮的《明通鉴》、陈鹤与陈克家的《明纪》等，都找不到那样的记载。为谨慎起见，最后还查阅了《明神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仍未能发现那样的记载。

但要再说一句，我想补充说明《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八的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处，作为由“兵部”上奏的浙江巡抚刘元霖的报告中所述的一段事情，那就是：

哨获乌尾异船一只，官役华夷一千人，审得千总（武官名称）毛

国科(毛与茅同音)蒙游击(武官名称)茅国器差委倭营(日本军营)用间。今有执政(德川)家康令倭酋觅船送归,及先年被虏人口,并将贼首(支持协助倭寇者的首领)季(李)州等十一人绑送与科(茅国科)带回,正罪合行(指季州等十一人?)。

下面继续写道:

“福建巡抚查审归结,其被虏民兵各取原籍亲邻里甲保结收管,从之”。(引文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八。——译者)

这份“兵部”的上奏,用当时的公文用语写成,也有颇难读懂的地方,大体上的意思读如上述。所说差往倭营做间谍(原文为“差委倭营用间”)一事,根据《两朝平攘录》与《武备志》的说法是,茅国科等持带劝和檄文来到日本军营,这时,明军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就这样,茅国科等和日本军队一起退走,被带到日本。

此外,就《明神宗实录》的记述来看,对送还茅国科而前来的倭人处理情况,没有作任何叙述,只是说,“兵部”上奏了来自浙江巡抚的报告,以及对福建巡抚的指示。即便就此而论,当必须把《两朝平攘录》和《武备志》的记述,亦即把带到了福建省的梅花所视为事实吧。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对前节的补充,即撰述朝鲜之役的中国史书,由《明实录》起,以至《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稿》、《明通鉴》、《明纪》等(以及《两朝平攘录》),都把萨摩的“岛津”按原发音写成了“石曼子”。^①

日军分为三路(三方面),对东路占据蔚山的“清正”、西路占据栗林的“行长”,按他们的名字分别写为清正、行长(未写加藤、小西这一姓氏),可是却将居于中路占据泗州的写成“石曼子”。这和前面“清正”、“行长”的写法不一致(按“石曼子”即“岛津”,是姓不是名。——译者)。

其例可举《明史》(卷三二〇)“外国传一”(朝鲜)的下列说法:

^① 岛津的日语读音为 Shimazu。——译者

时倭亦分三窟，东路则清正据蔚山。西路则行长据栗林、曳桥，建砦数重。中路则石曼子，据泗州。（引文据《明史》卷三二〇。
——译者）

在《两朝平攘录》中，则写作“石曼子”或“石曼子义弘”。

这一情况的出现，或许由于当时在中国（明）岛津氏自朝鲜之役以前就以“石曼子”（Shimazu）知名了，而清正和行长等人是在朝鲜之役人们才开始知道他们的名字。无论如何，“石曼子”与“清正”、“行长”并列出现读来总有奇异之感。

我所看到的书中，只有茅元仪的《武备志》（卷二三九，“四夷”一七“朝鲜考”）是将“清正”、“行长”、“义弘”分别按同样方式书写的。《两朝平攘录》有地方出现“石曼子”，有地方出现“岛津”，这大概是由于凑集史料汇编而成的关系。我觉得特别严重的是《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九，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条）中的一段话：

各倭将悉力西援行长，总兵陈璘即身先将士，鼓众大战，铳死大倭将石曼子，又生擒一部将。（原为汉文。引文据《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九。——译者）

这里所说的“大倭将石曼子”和“清正”、“行长”并列，是分别作为东路、西路和中路的总帅描述的，可见是指岛津义弘。这一部分是记录派遣军总指挥者邢玠的报告。《明实录》也照录了各部及派遣军的报告，不能说是经过甄别的史料（例如有时写为“毛国器”，有时又写为“茅国器”）。纵然称作“实录”，可是这部《实录》书的记载如果说是因为属于素材汇集，就无批判地把它们一律原样作为事实采纳，则不能不说这是危险的。

流传的《明实录》都是庞大的手写本，可以说是通篇内容尚未缜密整理的不统一的刊本，而且在传抄之间还产生了种种脱落及错误。现在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正文 596 卷的诸种抄本汇集校勘，

出版了《明神宗实录校勘记》(6册,1967年),与各手写本比较,文字出入颇多。

以上用不少笔墨叙述了明末据有福建,拥立明朝末裔隆武帝,反抗强大清军的入侵,并向我国乞求援兵的郑芝龙的事迹,又研究了其部将周崔芝向撒斯玛王乞援兵的《日本乞师纪》等记载,还探讨了周崔芝和萨摩的关系,进而上溯到朝鲜之役明朝同萨摩的关系。现在再回到正题,愿就郑成功(以前虽有所触及)的问题稍作叙述。

郑成功由于是郑芝龙在平户时和日本女子所生的混血儿,也就是说有一半日本血统;又由于郑成功拥立明朝后裔,在父亲郑芝龙降清军后,也始终守护明朝,据台湾而不屈,坚持了我国武士道伦理基础的“忠义”,遂受到德川末期我国学者文人特殊的尊敬。另一方面,近松门左卫门^①的《国性爷交战》的戏剧异常走红,庶民之中也都普遍赞扬该剧中的郑成功即和藤内。

文政年间,奉水户藩主之命,由该藩国史总裁川口长孺编写的《台湾郑氏纪事》3卷,是经过周密准备,引用许多史料,具体研究郑氏一家的反清运动,用编年体(汉文)写成的。还有奉平户藩主之命,由其儒医朝川鼎(善庵)撰写的《郑将军成功传》(汉文,嘉永三年刊)。这篇文章原来是作为碑文撰写的(《传》末有“命鼎作之传,勒石于千里滨,以存古迹”之语),但实际用于刻碑则过长,后来更由儒臣叶山高行(铠轩)撰文(嘉永五年)刻碑,立于千里滨(据说靠近郑成功降生地河内浦)。这一碑文收载于平户人菅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明治二十五年)及其附载的《平户贸易史》中。斋藤正谦(拙堂)选取了山田长政、滨田弥兵卫和郑成功三位在海外活动的人,撰写了《海外异传》(嘉永三年)。斋藤在此书中论述说:“郑大木(成功)慷慨倡义,招颓日于虞渊(日入之所),以孤兵当勃

^①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江户中期净琉璃及歌舞伎脚本作者。作品甚多,《国性爷交战》是其代表作之一(净琉璃是三弦伴奏的一种说唱艺术)。——译者

兴之敌，百折不挠，有我中将(正成)^①之风。及其子孙奉正统于一隅数十年，亦与楠氏相似。盖孕有我东方精华故耶？！”（原为汉文）。由此可知当时人士称赞郑成功的理由所在。

对于近松的《国性爷交战》，水谷逢吟氏说过这样的话（大正十一年《大近松全集》第3卷《国性爷交战》解说）：“在演剧史上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珍贵记录。那就是，它的演出从正德五年11月第一日开场，直至享保二年2月落幕，跨经三年，为期长达十七个月（享保元年有闰正月），天天上座踊跃。这种例子极为罕见。”

所谓“国性爷”，是根据郑成功受明隆武帝之赐，姓明朝的皇姓“朱”而被称作“国姓”（也称朱成功），近松这时虽写作“国性”，但如依据史实则应作“国姓”；所谓“爷”，在中国是附于姓名之下表示尊敬的称呼。

据水谷说，《国性爷》一剧在尔后（初次演出结束的3年后）享保五年正月第2次上演，享保十六年5月第3次、宽延三年7月第4次上演，以后也反复演出，任何时候都大为成功。因此，对各方面起了广泛影响。“净琉璃和歌舞伎自不待言，从读本、画册、小说、歌谣、绘画起，直到玩具、偶人、点心、衣服的花样都应用上了”。可知郑成功这位“国性爷”在我国庶民中间也受到了压倒一切的欢迎。

水谷氏说，由于《国性爷交战》异常受人欢迎，近松又于享保二年写出了《国性爷日后之战》，于享保七年写出了《唐船话今国性爷》。还有纪海音创作了《倾城国性爷》，锦文流也创出了名为《国仙野战功日记》^②的文弥节（净琉璃的一派。——译者）脚本。

这些都是剧本，而据水谷说，画册读物也有很多“国性爷”之类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其硕的《国性爷明朝太平记》及《国性爷御前军谈》，八文字屋自笑的《风流倾性^③爷群谈》等，还要举出石田玉山的《国性爷忠义

^① 楠正成，即楠木正成（1294—1336），南北朝时武将，长期被宣传为忠臣的榜样。——译者

^② 国仙野，即国性爷，两者日语读音相同。——译者

^③ 倾性，为“倾城”之讹。——译者

传》和墨亭雪丸的《国性爷交战》等。

水谷氏还引用《南水漫游拾遗》说,《国性爷交战》中的“楼门”一段,由长崎的翻译者名叫周文二右卫门的人译成了中文,并举示其开始的一段是:“话说老一官既已再来唐山,要攻打满洲里,兴复明祚,招募义旗士,一夜陪从老娘,同和藤内到五常军甘辉住领的狮子城下。云云。”

“东洋文库”所藏《国性爷交战》的竹本筑后椽^① 7行 90 页大本正本(原本),于昭和四十七年由“日本古典文学刊行会”重印,并附有堤精二的解题册子。根据这一解题册子的说法,除了水谷氏所举各书外,小说中尚有闲乐子的《今和藤内唐土船》,绘图小说有黑色封皮的《国性爷交战》,是鸟居清满配画。黄色封皮的通俗小说有伊庭可笑创作的《石千屋繁昌》^②(天明二年),合卷本有东西庵南北的《国性爷倭谈》(文化十二年)。其他立意使用“国性爷”的东西很多。

清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顺治十五年序)卷七六《郑芝龙受抚》中,对于郑芝龙直到他投降的事情都有详细记述。另外,花村看行侍者的《谈往》中,也以“飞黄始末”为题略加详细记载。《谈往》也是明末清初之作。它在记述郑芝龙的末尾说:“不久归投本朝,赴盛京。”《谈往》谈的是明朝遗民的往事,大致是崇祯时代的轶闻 27 条,《四库全书提要》的“史部”“存目”中,也采有此书并做了解题,现在收载于类书《说铃》。《谈往》中说郑芝龙号“飞黄”,《郑成功传》(后述)中也说“字飞黄”,但《武经开宗》中则作“飞虹”,《华夷变态》也作“飞虹”。《台湾外记》及《小腆纪传》则作“飞皇”。

《武经开宗》是明末之书,据称是“莆田黄献臣辑著”,有崇祯九年四月的序言,宽文元年我国训点翻刻(7 册)。看来是郑芝龙未投降清军之前尚在南海武威正盛之时出版的。此书是解说战法、战术,并对武器、阵

^① 竹本筑后椽,即竹本义太夫,江户中期著名艺人,本名竹本五郎兵卫,上方净琉璃一派“义太夫节”的开山祖师。——译者

^② 石千屋,即日语“国姓爷”的谐音。——译者

法加以图示的《武经》。其中有“古今名将”卷，列举了周、春秋、战国以来直到明末的著名武将，附有略传。在明朝的最末列举了郑芝龙，这里把郑芝龙的号作为“飞虹”，说他被今上（崇祯）“累拜三省总戎大将军，行大都督事，授任南澳总兵”。并且他“养兵十年，未费公家一粟”。这是他在南海威力最盛的时候。但是，尔后郑芝龙投降了攻打福建的清军，所以被列入《小腆纪传》（卷六三）的“贰臣传”和《清史列传》（卷八〇）的“逆臣传”中。

前面说过，有关郑成功及其一生的研究，有水戸藩的川口长孺编集的上、中、下三卷本《台湾郑氏纪事》（文政十一年）一书。此书广泛搜集并考订了明清关系诸史料以及我国遗留的有关史料，用汉文按编年体写成，始自庆长十七年（万历四十年）郑芝龙和称为祖官的人来谒幕府（骏府）^①，迄至元禄十三年（康熙三十九年）清主下诏将郑成功及其子郑经（歿于台湾）归葬其故乡福建省南安。

长孺在此书的最后说：“事皆根据诸书，必期其确实。而如行文则荟萃错综，力加删润，以求有序。虽专系于郑氏，亦旁及明末之事，凡八十有余年间，治乱盛衰兴废之由，天命人心去就之机，概可略而观之云。”（原为汉文）这使读者能够窥知此书编纂的主旨。

前述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卷一三）中也采列了此书，并加了解题。可以说此书是江户时代日本所编有关郑氏研究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文献。

且说，《台湾郑氏纪事》的篇首，先援引诸书对台湾这块土地加以说明，其次在编年的开端引用了我国史料《武德大成记》、《国史》、《武德编年集成》等，说道：“庆长十七年，明之郑芝龙及祖官来骏府晋谒幕府，幕府亲切问以外国之事。芝龙献药品。”（原为汉文）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方面诸史料中没有见到。接下来，文章引用《郑成功传》说：“芝龙字飞黄”，又引用《武

^① 骏府，今静冈市。德川幕府首任将军家康隐居于此。——译者

经开宗》及《华夷变态》说：“后号飞虹将军”。父名绍祖，是泉州（福建）太守蔡善继（《郑成功传》中作叶善继）的库吏，芝龙是他的长子。“生而容姿秀丽，稍长，胆识才略过人，时人或以戚继光拟之。颇具文才，吹弹歌舞无所不解。”（原为汉文）这段叙述引用的是《郑成功传》、《谈往》。郑芝龙一度失爱于父绍祖，绍祖怒而逐之。芝龙逃到海船中来，船正要扬帆出航，他恳求船上巨商带他出海，终于来到日本。时年18岁，住肥前之平户^①，称为平户老一官。以后屡乘商船往来日本。这些叙述引用了《谈往》、《郑成功传》、《南塾集》、《华夷变态》、《琉球志略》、《长崎夜话草》等。

该书庆长七年（天启元年）条目中说，“先是南海盗起”，其魁首是颜振泉（《郑成功传》作颜思齐。）振泉称“日本甲螺”（甲螺是头目的意思。谅是“头目”的发音 *Kashira* 转讹为“甲螺”），率领我边民占据台湾地方，与群盗分为10塞，保有这一地方。芝龙与其弟芝虎都参加了振泉之党，劫夺了暹罗货船4艘，芝龙富冠10塞。不久振泉死去，受群盗之推，芝龙成为魁首，纵横于海上。这是援引《谈往》、《郑成功传》、《明史纪事本末》等书的叙述。此后在掠夺之中日益富裕，明兵也难以御抗，遂起招抚之议。芝龙由于前受蔡善继之恩，蔡劝其投降，芝龙终于接受其劝。这是引用了《明史纪事本末》、《郑成功传》所述。

庆长七年的条目中还引用了《郑成功传》和《田川七左卫门诉状》说，“初者，芝龙居平户，娶平户之士人田川氏之女为妻，生成功及其弟七左卫门。”以下还将继续就《台湾郑氏纪事》叙述郑芝龙的情况，但因提到了郑成功的诞生，所以现在暂时离开《郑氏纪事》，想就《郑氏纪事》所频频引用的《郑成功传》说几句。因为此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传写郑成功的有力史料之一。

藤原家孝著有名为《落粟物语》的随笔杂记一书，原以手写本（文政六年，麻生知俊）流传，后来，国书刊行会的《百家随笔》第一（大正六年）

^① 平户，位于今长崎县。

收载了它。此书是何时写的，尚不清楚。但从内容看，则有宽永年间德川家光赴京之事，还有安永九年春在仁和寺读经之事。大体是这一期间见闻的记录汇集，恐是安永末年或天明与宽政初期的作品。虽然都是记述公卿之间的事情，但其中对于郑成功则有一段是比较按史实写出的。根据何书所写尚是疑问，但细细检阅它的内容叙事，方知是把《郑成功传》大体原样移植为日文。

像在这部《落栗物语》中看到的那样，当时国人关于郑成功的知识除了片断的传说从长崎传来而外，能够稍稍将其人系统化，把时代、状况的变动一般传述出来的书，我想主要就是《郑成功传》吧！《郑成功传》于安永三年(1774)2月在我国(大阪)训点翻刻，《落栗物语》的作者当是看到了这个翻刻本。

据知，记述郑成功事迹的作品有黄宗羲的《赐姓始末》1卷。还有江日升(东旭)的《台湾外记》(康熙四十三年序)30卷，是“章回小说”体，描述了自郑芝龙出生至郑克塽归顺这63年间郑氏的兴衰。“闽人(福建人)谈闽事，详知始末，足备国史之采择。”(原为汉文，陈祈永的序言。)^①

但是在我国，可以说主要还是翻刻的《郑成功传》为人们所知。《郑成功传》2册的训点介绍者是大阪的木村孔恭(蒹葭堂)，是他依据手中的原本校刊的。这一翻刻本现在也偶尔见于旧书店的目录，我亦藏有一本。这一翻刻本问世以后，可以说我国的郑成功传记大都依据了此书。《台湾郑氏纪事》依据此书的地方也很多。在此书以前，我国刊行的相当详细地传述郑成功的作品有《明清斗记》。该书有宽文元年(1661)的序言(鵝飼信之)。书的内容虽是依据传到长崎的情报，大体上以史实为基础，但属于演义体的小说。不过这是郑成功在世时，开始占据台湾的一年出版的(关于《明清斗记》见后述)。

此外，长崎人西川如见的《长崎夜话草》(享保五年)也以《台湾事情

^① 该书江日升《自序》有“诚闽人说闽事，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焉”句，而并未见于陈序。——译者

及国姓爷故事》为题,记述了郑成功的大概情况。还有《明清斗记》也记有详细的情况。

木村兼葭堂翻译时所用的原本,现在收藏于“内阁文库”。这是兼葭堂死后,幕府接受其遗族提供的兼葭堂旧藏书中的一种。此书除盖有“兼葭堂藏书印”而外,还有“浅草文库”、“昌平坂学问所”、“日本政府图书”的藏书印。翻刻本略去了康熙四十一年二月著者郑亦邹(居仲)的原序(2篇),只刊载了日本人的序(金龙道人)和跋(芥川焕),所以从翻刻本上看不明白此书的由来。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里揭示了此书,但所根据的不是原本而是日本的翻刻本,只是照文转录了翻刻本的金龙道人序言。

根据著者郑亦邹的序言来说,《郑成功传》最早是《明季遂志录》的附录,板中心刻有“明季遂志录”,其下有小字“岛上附传”。“岛上”二字当是指台湾岛。根据这篇序言的说法,《明季遂志录》一书,系由《明季辨误》4卷、《江闽事略》6卷、《明余行国录》16卷、《明遗民录》1卷组成,外加《郑成功传》作为“附传”。

然而清朝的“军机处”所定“禁毁书目”中,有《明季遂志录》在内,所以此书一般未能流传。大概因此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中也未能登载原本。孙耀卿的《清代禁书知见录》中,列举了《明季遂志录》2卷(该书的一部分),由于是“旧抄本”,可知依然未看见原刊本。

谢国桢在《晚明史籍考》(卷二)中揭示《明季遂志录》时说:“日本内阁文库藏,岛上附传,仅附序录”,(原为汉文,引文据该书卷九,总计,南明史乘。——译者)好像《遂志录》一书在中国也几乎看不到。关于著者郑亦邹(居仲),谢氏在该解题中说“其情不详”。但一方面又在卷一三的《郑成功传》解题中援引了陈寿祺的《东越儒林后传》说:“著者居仲,漳州海澄人。顺治十三年举人。淡于仕进,乞假归。结庐白云山麓,为南屏文社”。(原为汉文,此段引文仍据该书。——译者)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说前后发生矛盾了。并且,下面还接着说:“就学者,远来自日本。日本

浪华(大阪)木孔恭世肃校此书”(原为汉文),由此看来,是就学于郑亦邹“南屏文社”的人将此书带到日本,又由木村蒹葭得到之后,进行校刊的了。果真如此吗? 所说“就学者远来自日本”,是《东越儒林后传》的记载呢,还是谢氏自己补充的呢? 我没有看到《东越儒林后传》,故难以判断。^①

著者把此书序言称作“征信序”,文中说:“明亡迄今垂六十载,人往风微,纵以笃道之君子,留意之人才,亦不能无误。”(原为汉文)然而,吾人“不能横历九州,与天下人相见”,因此,“唯足迹所至,不忘搜求。或远方之方正博闻之君子,与我同心者,幸赐邮筒(古时送信函筒。——译者)以教不逮。”(原为汉文)为了征信,亦即为了征得明亡之时情况的信实,甘心努力搜集史料,“然后退而定治其部居(按部归类。——译者)”。(原为汉文)这本书的记载应该说可信性是相当高的。

28. 《明清斗记》与郑成功传

前面稍稍提及,用杂有假名的日文详细撰写的关于郑成功活动的书籍,较早的是载有宽文元年(1661)序言的《明清斗记》(首卷图表很多,正文10卷),它比蒹葭堂翻刻的《郑成功传》早113年,但它是演义体,即采用了军事小说的形式,所以不免绘声绘色的描述之类。可是,将此书记述的内容当作史料来引用的也不少。这在《台湾郑氏纪事》以及近年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说到宽文元年,(清顺治十八年)那正是郑成功夺取荷兰人占据的台湾的一年,是把台湾完全变为根据地的一年。不过,这部《明清斗记》第10卷的最后,是以郑成功攻打荷兰军所据寨堡(安平城),正当敌军降服之前的记述而告终。可见此书采用了最新的情报,是根据当时的见闻写成的。

^① 引文据谢因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新1版,第474页。原文作“学者自远至”,而未作“日本”。——译者

具体说，此书卷首鵠饲信之（石斋）的序言末尾，署有“宽文改元辛丑黄钟上浣”，亦即“宽文元年 11 月上旬”写的。郑成功是 39 岁在台湾病死的，是此书写成的翌年（康熙元年）5 月，关于这一日期的记载，《郑成功传》、《台湾郑氏纪事》、《台湾外记》、《小腆纪年》（以及《小腆纪传》）等都一致，尽管其中《台湾外记》、《小腆纪事》记为 5 月 8 日（这情况想必是《纪年》根据了《外记》一书。《纪年》的编者在别的地方也说，以《明季南略》为根据的《台湾外记》的记载是可信的）。

虽说郑成功是因病死的，但对于死因也有种种说法。从各书中可见，他于 5 月 1 日患了感冒，但不顾病体，坐于胡床与部下议事；又登高台观察来自澎湖的舟楫，8 日便突然死去，因此有各种臆说传播。有的说，他一面谈着《太祖祖训》（据说隆武帝为之作了序文），一面说“我等有何面目见地下先帝（隆武）？”以双手抓破颜面（或掩面）气愤而死（《台湾外记》、《小腆纪年》等）；有的说是精神发狂，咬断手指而死（林时对《荷藩丛谈》、《清史稿》等）；有的则说是疟疾致死（入泽达吉《云庄随笔》、稻垣孙兵卫《郑成功》等），众说纷纭。

“台湾文献委员会”的医学博士（或许是日本学位，也引用了很多日本书籍）李腾岳在他的《郑成功的死因考》（1950 年《文献专刊》第 1 卷第 3 期《郑成功诞辰纪念特辑》收载）里，一方面介绍了这些说法，另一方面则广引多种文献史料（58 种）加以考察，并做出结论说：“他的发病起因于感冒，可推定为属于一种急性热性病（与台湾的不良风土有关系）。”（原为中文）

还要附记一点，李腾岳氏在引用许多史料的同时，还对郑成功的气质性格做了医学上的分析。诸如就希腊的液体病理学所说是胆汁质啦；就血型学上说是 O 型啦；就克雷奇默^①的精神病的观点来看，是冷酷的支配者，是自我主义者；在体型和类似精神病人的性格关系上看，则近于

^① 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 1888—1964），德国著名精神病学者。——译者

类似躁郁狂型。

考虑到传说中的郑成功的形象，是军法观念和伦理观念极强的人，对违令者斩，对犯错者严惩不贷，那么上述分析或能有某种参考意义。

再谈《明清斗记》。鵠饲石斋^①所写序言的纪年是宽文元年，由此看来，这是在成功猝死约半年之前。但是，此书的刊行是何时？是宽文元年还是二年？《明清斗记》卷尾只有“田中庄兵卫梓”而未记刊行年月。这是我所看到的“内閣文庫”本的情况（谅是初印或近乎初印本，题签字体与后印本不同。但“内閣文庫”也有一种后印本）。我自己所藏的是后印本，正文虽完全一样，但卷末既无“田中庄兵卫梓”，也无纪年。只是享保十年刊行的载有纪年的《通俗国姓爷忠义传》19卷（片假名带图本），末页有“书林田中庄兵卫、中村氏进七开板”。在“田中庄兵卫”的横额上有“洛阳五条桥装订”，由此始知，《明清斗记》的刊行者“田中庄兵卫”乃是京都的书店。

《明清斗记》的正文，开始处记述的是，在明朝元年，辅佐明朝始祖朱元璋创建“大明”国的功臣刘基（伯温）观察天文，预测出大明的兴盛；还预测出，经历280年将兴起以顺治为年号的清朝。接着是李自成灭明，不久清军入侵之类的记述，所以说，是大体上按照史实展开的故事。也描述了入侵的清军与拥立明朝末裔的将军在国内各地的交战，但很快就可以描写郑芝龙及郑成功的崛起并在各地的交战为主，展开了故事的叙述。最后，正如前面所说，以郑成功在本土失利，谋图占据台湾并攻打荷兰军而告终。

此书作者的所谓创作出版动机，是想把始终支持明朝、反抗入侵清军的郑成功英雄化，使之扬名传世，这从作者把郑成功的军队称“官军”一事也可以看出。再者，像该书那样依据相当多的史实，对郑成功的事迹加以描述，令人想到它依据的关于当时情况的详细情报之处很多。

^① 鵠饲石斋（1615—1664），儒学者，著有《本朝编年小史》、《和汉珍书考》等。——译者

此书是怎样写成的呢？现在让我们看看鵠饲石斋的序言（是汉文，现在加假名写为下文）：

肥州长崎人前园增武，经人荐，顾余茅舍。谓余曰：近者，大明丧德，金瓯缺伤，而社稷屋矣（“屋”义不明，从字形看，系危或屈之误。一增田）。北虏乘衅奄有中州，国号大清，改元顺治。（中略）泉州有郑芝龙者，尝窜至我日本肥（州）松浦郡若干年，人呼平户一官。时方归本国，不忍坐视宗国之倾覆，（中略）倡义起兵，累奏捷功。不幸身陷虏庭，未能遂志，惜哉！男成功乃平户所产。（中略）深恨父之非运。（中略）乃躬率甲兵攻城略地，（中略）以将陷应天府（南京），一蹶退回。（中略）然其志未尝稍折，仍退寸进尺，欲达宿愿，可谓豪杰丈夫也。仆（增武）之父徐氏，明之漳州人，来住吾邦（日本）。于长崎生我，甫七岁丧父。所亲今在旧里，每岁商船开入长崎，则彼中华寇乱之见闻于家书中见示。又据商客谈说，一一札记，积有数册，倩人辑而成一部全书。于是言于本土之安抚君（指长崎行政长官）黑川氏、妻木氏；并远上京城（京都），言于佐州太守（佐渡藩主）牧野公。欲使此书广行天下。

然此书文笔鄙俚，事不完备；语言诘屈，事理不通。故来求君（鵠饲）斧削，欲以就简编。幸勿见拒。

前园增武就这样拜托鵠饲，鵠饲说：

记述此一明人之乱者，有《经国雄略》、《皇明纪事本末》、《明朝小史》等书，闻我邦亦有所传。然既已入于官府，世间不得见。宜待（中国）商客近期携来，参照并采用，庶几年月人地无误，文字与事故不悖。

这样，略示逡巡不决之意。增武本也觉得不无道理，但自己由远地而来，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书籍到手。于是就：

强请不已，累日始应其意。即用本稿，取舍各半；参证以《中兴

伟略》(此书已于正保三年,即此前15年在我国翻刻出版,见后述),旁及读书所摘,引喻以资所谈。

石斋特别继续说道:

又且附以《奥地备考》及《皇明帝系》、《诸葛亮八阵图》、《郑成功阵图》、《南北直(隶)图》、《多伽沙古岛图》^①,共十有一卷,题名曰《明清斗记》。(下略)

由此看来,《明清斗记》的撰成经过是,父亲为福建省漳州(郑氏的活动范围)人,自己生于长崎的前园增武,把得自中国乡里亲属与进入长崎的中国船舶的有关郑成功史料加以笔录,集结数册,持以托请京都的鵝饲石斋笔削编纂,俾能上梓付印。当然,只有我们完全相信石斋的序言,才能这样说。

我看到过的“内阁文库”本,书中没有《郑成功阵图》、《南北直图》、《多伽沙古岛图》,却另有《福建省郑芝龙系图》,所以不能说它是初印的完整本。我的藏本是后印的,正文虽然相同,但插图部分则大有差异,我想,可能是后来补入的吧!其起首是《奥地备考》,次有《天文缠度图》,为一与二的两面地球图,标出了北极南极,有赤道线与子午线,还有经纬度,并配有世界地图。再次的《天下总图》是中国全图,又次为中国分省地图,并列有《北直隶图》、《南直隶图》、《山西省图》、《山东省图》、《河南省图》、《陕西省图》、《浙江省图》、《江西省图》、《湖广省图》、《四川省图》、《福建省图》、《广东省图》、《广西省图》、《云南省图》、《贵州图》,还有《九边图》,亦即中国边境图。再次有《璇玑玉衡图》,即古代观察天文所使用的“浑天仪”图形。还有《夏禹治水图》,有《圣朝(明)帝王考》(附《诸王》)记述明朝各帝王的简略事迹。次为《诸葛亮八阵图》的布阵图式,更次为《北京城》、《南京城》的地形图和福建沿岸图,以及《大冤(台湾)城图》。

^① 多伽沙古(Takasago),指台湾。——译者

这些图绘当是为了给予当时一般对中国不熟悉的读者以启蒙和预备知识,被作为首卷的内容而置于正文之前。

关于前园增武其人,我还没看到详细介绍他的书,《长崎先民传》中也没有他。是否真名亦属可疑,增武二字也颇奇异。唯有西川如见的《长崎夜话草》中曾说:“至于叙述国姓爷乃智谋无双之将一事,委诸长崎人之《明清鬥记》云云”。莫非这是一个虚构人物?不得而知。

鵠饲信之(石斋)的传略则见于东条耕(琴台)的《先哲丛谈续编》(明治十六年刊)卷一中。据该书所述,他在元和元年生于江户神田。仅及弱冠便游学京都,受业于那波活所,寄寓该塾数年。以后,在油小路设塾教学,以史学知名于世。32岁时出仕于尼崎侯青山大膳亮,移居尼崎15年。万治三年46岁时辞官返回京都,与山崎闇斋、毛利贞斋等声价相若。宽文四年50岁;歿于堀河之茅舍。

石斋自从辞官居住京都后,就应书肆委托校订训点中国旧籍,俾便翻刻。这很受社会欢迎,而润笔之资就是他衣食所靠。《先哲丛谈续编》这样说,并且还列举了石斋训点翻刻的书籍,但未注卷数。可是大部分都卷帙浩繁。这里根据堤潮风的《近代名家著述目录》(文化八年)举示他的训刻书(并据关仪一郎、关义直的《近世汉学者传记著作大事典》加以补充),有《朱子语类大全》140卷、《武备志》100卷、《韩文》40卷、《柳文》36卷、《杜诗集注》24卷、《淮南鸿烈解》21卷、《四书大全》23卷、《万姓统谱》140卷、《历史纲鉴补》40卷等等;此外还有《白虎通》4卷、《风俗通义》4卷等。据此可知,石斋训点翻刻的书很多,尤其是把大部头的中国书籍介绍到我国来,不能不说他对这些书籍的普及有很大功绩。

石斋与明末流寓我国的陈元贊^①相善,石斋训点的书也与陈元贊“有关系”,这是今关天彭氏所说(见《流寓日本的明末诸士》,昭和六年《近代支那的学问艺术》所收载)。所谓有关系,是指训点书的选定呢,还是指

^① 陈元贊(1595—1671),1638年到日本,擅陶艺、书法和拳法。——译者

训点方法而言呢？则不清楚。石斋死后，经其遗子的恳请，陈元贊书写了石斋的墓志铭，现在尚存于京都圆光寺的后山（昭和三十七年，小松原涛《陈元贊研究》）。

前面已经说过，郑芝龙为抵抗清军的侵略而向我国乞求援兵一事，见于《华夷变态》。《华夷变态》中还收录有郑芝龙之子成功致（日本大）将军的书翰，以及成功之子郑经（锦舍）致长崎长官的书翰等。不过，将郑氏一族致我国的求援书翰，以及有关郑氏一族动态的当时情报加以系统整理的，是《通航一覽》卷二一二、二一三、二一四以3卷篇幅详加记载的《郑氏援兵请求书附传闻》。这些传闻引用了《台湾郑氏纪事》和《郑成功传》等书，并订正了其中的错误和不确实的部分，以“按语”形式插入有关各处。

关于郑成功，我国自明治以来也有种种传记及研究问世，诸如东正纯的《郑延平事略》（汉文），以及丸山正彦的《郑成功》，宫崎来城的《郑成功》（以上为明治时期刊行），馆森鸿的《郑成功传》（大正时期刊行），稻垣孙兵卫的《郑成功》（昭和十七年）等专书。又由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译者），清国将台湾割让我国，有关研究介绍台湾的地志及历史的书籍、杂志中，叙及郑成功的地方也不少。

同上述各书有别而我要特别加以叙述的是，匪石的《郑成功传》。匪石是明治年间侨居我国的清国人的笔名。当今，张泰谷的《笔名引得》（1971年，台湾“文海出版”）提出以“匪石”为笔名的有汪叔明和陈世宜，这人到底是哪一位尚不清楚。但此书于明治三十七年由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发行；冯自由的《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覽》（1965年《革命逸史》第3集收载）的“图书类”中也列有此书。

可以说，这是清末谋求反清革命的留学生对郑成功的坚决抵抗精神产生共鸣，鼓吹民族主义的作品。说郑成功不是世界的英雄却是中国的英雄！“与其崇拜世界的英雄，不如崇拜中国的英雄”！于此可见当时反清民族主义的强烈。

然而我要作为该书特色来叙述的是，该书说“作者之参考材料大半

取自日本书籍”(原为汉文)一事。尽管这原因大概是他们正在日本留学,见不到本国许多史料,但当时日本人写的、足以给予他们以激励和鼓舞的有关郑成功史料就摆在眼前,这才使他们受到激发。该书所举示的“参考材料”17种之中,丸山正彦的《郑成功》、宫崎来城的《郑成功》、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以及伊能嘉矩的《台湾志》等14种,都是出自日本人之手的史料。作为出自中国的史料,则只有郁永和的《伪郑记事》、申报馆本《台湾外记》、黄澄的《泣闽录》三种而已。

此书是中国留学生在当时反清革命浪潮中撰写的富于激情的郑成功评传,从考证和研究上看虽还不够完备,但这是在本国革命的现实状况中,怀抱着革命目标想要捕捉的郑成功形象,是郑成功精神的宣扬,可以说是一部具有特色的著作。尤其是依据日本史料撰写的,这从两国文化关系史的角度出发也值得一书。

我所看到过的近年出版的郑成功研究书籍中,首先就日本方面说,有稻垣孙兵卫(其外)氏的《郑成功》(昭和四年,台湾经世新报社)和石原道博氏的《郑成功》(昭和十七年,三省堂)。二者都掌握了很多史料,抓住了郑成功的各个方面,颇为详尽。前者或许因为是在台湾写的,有关的版图很多,关于在台湾的攻守战,除了历来的中国史料以外,还利用了许多外国史料(特别是芮思[Riess]的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吉国藤吉译《台湾岛史》)。后者更是综合了许多史料的研究成果,并区分为日本、朝鲜、中国、西方,举出了50种以上的参考文献。

中国出版的有余宗信编《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1937年,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此书采取了详尽的年谱形式,可供参考。

台湾是郑成功的最后根据地,尤其国民党政府移至该地以来,研究郑成功的人多了。1950年《文献专刊》杂志第1卷第3期出了“郑成功诞辰纪念特辑”,载有数篇考证文章。其中,李腾岳《郑成功的死因考》前已介绍。另外林熊祥、陈世庆编《赐姓成功事迹及明郑一代有关史实年表》,是将郑氏一家的事迹和有关史实合并记载的详尽年表。论证方面

有《郑成功征台述略》(毛一波)、《郑氏世系及人物考》(廖汉臣)等。还有《郑成功研究参考书目录》(赖翔云),分为中文、日文、西文,分别列出书名或编名以及编著者姓名。但刊出纪年则是西洋为西历,中国书、日本书为“清刊”、“民国刊”、“明治刊”、“大正刊”、“昭和刊”。虽然所列书名约达200种,但不免有驳杂之感。

黄典权的《郑成功史事研究》(197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虽是小册子,但卷首的有关照相图版较多,注释也较多。

丁履进的《延平世家》(1973年,台北正中书局),可以说是一本分为26章的章回体历史小说。它写出了郑氏四代的兴废始末,行文颇为忠实于史料。

吴法的《台湾历史札记》(1976年,香港“70年代杂志社”版)一面引用了有关记述郑芝龙、郑成功在台湾的诸书,一面根据自己的看法进行不少的考察。特别要提出来的是,他引用了荷兰的台湾长官科耶特(Coyett)的《被忽视的台湾》(*'t Verwaer loasde Formosa*, 1675)一书的记载,说郑成功部下有两个“黑人兵”中队,多是以前荷兰人带来当作奴隶使用的人。在中国各书中看到过郑成功麾下有“铁人”之说,即以铁甲武装的“装甲兵”部队,但说有“黑人部队”,则在其他书中几乎没有见过。也许其中有马来亚人吧?

现代编撰的有关台湾和郑成功的文献中,引用了很多关于荷兰和西班牙侵略台湾及郑成功恢复台湾的史料。记述详尽的有《台湾省通志》卷九的“革命志”“驱荷篇”。详细记述郑成功及其后裔反清抵抗史的还有该通志卷九的“革命志”“拒清篇”。这都是1970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的(主编李如和)。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的《郑氏史料》(初编,1962),有第1篇到第3篇,这是采取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的《明清史料》(原为政府保管的档案)有关郑氏部分编集的,可说是基础性质的郑氏史料。

第二部

日本开国与鸦片战争

从武家政治到天皇政治

在我稍加整理从古旧书展销会上和旧书店里偶然买到的抄本或笔录之类的东西时，发现有一份叫做《美利坚使节声明要旨》的手抄本。美浓纸二十几张，印有青色线条，对折后用纸捻订成。封皮（也同样印了线条）正中写着“美利坚使节声明要旨”，右方写着“安政戊午年，梅田源次郎先生致送上平主税君，明治十四年冬借自该君抄之”。左方写有“十津川，山崎村，玉田音吉用”。

安政戊午年是安政五年（1858），这时候大老井伊直弼兴起所谓“安政大狱”，而梅田源次郎（云滨）是首先被捕入狱的人自不待说。梅田的被捕有说是同年9月7日的（内藤耻叟的《安政纪事》），有说是9月8日的（岛田三郎的《开国始末》），总之，这份“声明要旨”是梅田云滨当年被捕之前送给大和十津川的志同道合者的情报之一种，后来到了明治时候，一位叫玉田的人抄写的。

今年是所谓“明治百年”，可以说，这类资料也展示出我国走向明治维新前夜所处复杂、紧迫气氛中的一个侧面。

正文开始处提到，“10月26日在备中守的府邸中，美利坚使节声明要旨”，并记有日期。那是安政四年的事情。12月26日^①(旧历)那一天，美大使哈里斯前往当时幕府的实权人物首席老中堀田正睦(备中守)府邸，滔滔不绝大谈世界形势。特别说到，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的英国，将乘余威逼迫日本也做鸦片贸易。如果不从，说不定要诉诸武力。威胁日本早日和美国缔结通商条约，使英国也得照办，才是上策云云。我在数年前所以买下这份抄本，也是由于认为它是可以窥知鸦片战争对日本影响的一种资料。

对于梅田云滨，还是在中学时候，就在书中读到或者听人说过他的诗句：“妻卧病床儿啼饥”，今天依然记得这诗的起首。这已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在岛田三郎的《开国始末》中读到逮捕梅田云滨等人的“大狱”的前后情况，只是记忆已模糊，别亦未加留意。

因此，赶忙搜寻手头藏书，发现有田中惣五郎的《明治维新运动人物考》一书，云滨之事也在其中。据云：

明治维新要由武家政治转向天皇政治，由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制，他是首倡此论的。

就是说，最早有此认识并想付诸实行的第一人是梅田云滨(源次郎)。尊王运动的先驱者有竹内式部和山县大貳，主张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本田利明、佐藤信渊，但试图在新时代中，把这两方面(天皇制和资本主义制)综合起来的则是梅田云滨。这是田中氏的说法。我不曾专门研究过幕末维新，这里对田中氏的这一见解也不能做出赞成或反对的表示。但查看一下田中氏所依据的云滨的书信，发现收信人大半不是各藩的志士，而是各地的庶民阶层。尽管其中也有地主、商人，但以初期资本主义的商人为多，可以指出，云滨曾经斡旋长州同各地商人之间的交易。田中氏并根据云滨与人往来的信件谈论十津川^②说：“使十津川组织为勤王的组

^① 原文如此，似为10月26日之误。——译者

^② 十津川，奈良县南部的河流，附近山村的乡土积极参加了幕末的尊王讨幕活动。——译者

织。一面通过大和的木材、矿物等贸易来开发产业，另方面想把这一乡之雄组织为(天皇的)亲兵。”因此，十津川的志同道合者频频造访云滨，相与“慷慨扼腕”。以上都是引自《十津川记事》的。从云滨处得知这份“声明要旨”的上平主税也是十津川乡土之一。

开国当时的种种记录

关于这份《美利坚使节声明要旨》，我认为它对于了解当时情况是颇为重要的资料。但是，它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为要查明这一点，想到也许在收载当时记录类的某些书籍中能见到它。一查手头的两三种书籍，看到木村芥舟编的《三十年史》中就收录了它。内藤耻叟的《安政纪事》中也有这同一要旨的概要，与《三十年史》所载，几乎一字一句都没有差别。木村芥舟是幕末的摄津守，任军舰长官。安政四年(丰前守)新见正兴等人为了日美条约的批准交换而作为使节前往美国，幕府派遣军舰咸临丸运送时，木村即是该舰总督。为这部《三十年史》写序言的福泽谕吉，当时被木村用为随从，得以首次出航海外。此书汇集当时的文件和记录甚多，十分方便，而从这份《美利坚使节声明要旨》也被收录在内一点看，我想这是在当时誊写之际，有关志士之间就获知此件了。

顺便一提，大隈重信的《开国大势史》也从《三十年史》(以及《外国事件书类杂纂》)中转载了这份“声明要旨”的全文，并在开首说：

此时，负通译之劳者荷兰人休斯坎也。此次会谈关系日本之开国至大，幸其要领笔记至今犹存，兹揭载之。

所加重点是《开国大势史》特意做的。

根据记录，哈里斯是为了修订培里缔结的条约而来日本的。他由下田抵江户谒见将军呈递国书，时为安政四年10月21日(旧历)。其后，26日他前往首席老中堀田正睦府邸，详说改订条约的必要和有利。福地源一郎(櫻痴)的《幕府衰亡论》对此事做了如下的叙述：

26 日前往堀田阁老府宅，演说约历 6 小时，论锁国之不利，说开国之必要。（中略）引证之实例远至西洋，近及清国，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之辩才发挥其说。聆听此种实际政治议论，姑不论堀田阁老，即就幕府之俊秀而言亦属有生以来初经之事，是以更为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如迷梦之初醒。（中略）可知，后来执开国之策为国是以应百难之精神，乃吃此哈里斯演说之一棒喝故也。

越前藩主松平庆永（春岳）的亲信中根师质（雪江）所著《昨梦纪事》，对当时的情况也有记述说：

10月21日。美利坚使节哈里斯获准进城（江户）到教堂礼拜。

同月26日。备中守堀田接待美国使节哈里斯于邸中。至于其情由，又经备中守阁下将该使书翰交下，故于此从略。试听当时莅会者日后之语则……。

下面接着记述了当时在场者的话，堀田只顾“眨眼叹气，畏缩不振。”并记述说，几乎无一人发言。这且不说，若从“其情由又经备中守阁下将该使书翰交下”一语来看，当时哈里斯的演说翻译记录好像分发给了各个有力诸侯。梅田云滨得到的“要旨”大概就是通过这个渠道。

情况被说成是哈里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幕府首脑们失魂丧胆，茫然不知所措。但哈里斯方面又是如何记述此事的呢？我手头虽没有考申萨编的《哈里斯日记》，但根据卡尔·柯罗用这些资料写成的《哈里斯传》（田坂长次郎译）的记述，哈里斯在蛰居下田的较长时日里，心中翻来覆去地琢磨问题，把当时要说的话，巨细无遗都写下来，准备得无懈可击，因此才能使演说滔滔不绝。然而，那时他的演说须译成荷兰语，然后再译成日本语，《哈里斯传》说花费了两个小时。并且从鸦片贸易问题说到英国和清国发生的战争，援引清国惨败之例，说明下次将要侵犯日本。当他讲到了防备这一着，希望先和美国通商贸易的时候，《哈里斯传》说：“提到这一日本涉外关系问题，老中堀田像深受触动，说这是日本幕府始

建以来的最重要问题。”

“声明要旨”的内容

这里谈谈《美利坚使节声明要旨》的内容。其内容被分解写成一个个短条，共整理为一百数十条。开始是“一、今日声明之事至关重要，总统尤认为兹事体大。”接下来是“一、陈述各节均皆出自恳切立意，伏请大君殿下（指将军）予以谅解，按上陈之意赐予听取。”然后述说合众国与他国不同，在东方素不占有领土，亦无意新在东方谋占领土。如此首先申明没有领土野心，大概是为以后提出英国怀有野心一事做伏线。又说蒸汽轮船的发明使世界各国交通发达，各国贸易尽皆兴盛起来，因此，西洋诸州到处臻于富裕。并且西方各国奉行世界一家之旨，凡妨害此旨拒绝与外国交往之国，即是世界一统的障碍，须予消除。为了一统，有请求者二，其一，于首都设公使，又名代办；其二，希望允许各国商品自由买卖。又说，英国谅必也想与日本交易，但是，“一、英国处心积虑欲与日本一战”，“其原委奉告如下”，于是讲述了英国领有东印度，俄国对此特别敏感、恐惧。俄国占据着萨哈林、阿穆尔，英国对此特别憎恶，原因是俄国一旦占领满洲及清国，英国领有的东印度就会被它侵占。无论如何都是将要发生英俄战争的形势。

战争一旦发生，英国对俄国的防卫将会特别困难。对英国来说，防卫手段将是重大问题。为此，英国处心积虑想占有萨哈林和虾夷地（北海道），英国所格外垂涎的与其说是毗连（大陆）的满洲，不如说是虾夷地。

清国于 18 年前和英国发生战争，丧失人命百万之众，战争中所有港口全部被英国攻占，并且南京也未幸免。这一战争的杂费姑且不论，为求讲和而赔偿英国的即达 500 万两白银。这固然只占清国全部战费的十分之一，但其他各项费用就难计其数了。此外，由于国家削弱，市面城

堡悉遭蹂躏。

今且英国与法国结合，向清国进行战争挑衅，前途尚难逆料。但眼下情况是不拘何事都须遵奉英、法之意旨，否则全国便将被英、法占领。

做了如上的陈述之后，便胁迫说：“一、今唯恳加意考虑所陈要旨。”并且说清国战乱根源之一是“鸦片”，由此提出了鸦片问题。30年前广东附近仅只一个地方，今天，吸用鸦片的人已达数百万，其耗费年平均约为3000万两。不仅如此，吸食鸦片将使身体变弱，这比其他毒品更甚。一旦使用上它，富者变贫，有才能者精神变萎靡，随时倒毙街头有如乞丐。迫于贫困而窃盗，干坏事，不顾死活的懒惰者将多起来。“声明”这样描述了鸦片的毒害。

如此大量的鸦片全由英国占领的东印度生产出来，给中国带来这样的毒害，而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但不嫌其害，丝毫不予禁止，反而以装备有火炮的坚固船只运送，至今仍在秘密贩卖。接着提出警告说：

“一、英人之于日本，以为亦与清国同样，必有嗜好鸦片者，意图远往”。并且指出：“一度吸用鸦片，则终身不能戒止。英人亦熟知此事，故希图亦向日本推广。其心底如此。”关于此节，“美国总统致意，为日本利益计，鸦片比战争更为危险。”并补充说，日本仅从书本中得知战争之苦，而没有实地经验，这应该说是幸事，但总统也希望战争仅限于作为书本中的东西，提供贵国汲取为知识。

英国的对日政策

哈里斯更进一步阐述了英国对日本的野心。他说，自己来日本之前，在香港曾面晤英国总督约翰·包令，他对派往日本的使者有所吩咐，将秘密谈话见告。

哈里斯说，我来贵国后，也曾四次收到包令的来信，其中披露英国对日政策令人吃惊。英国打算在日本数地泊靠英船，赊销本国的物品，作

为交换，则希望任意采购日本物品。它早就打算，这一希望若不被接受，便立即开战。然而，因眼下和清国的战争，使来航推迟。包令原来设想今年3月前来江户，但因与清国战争，遂受到拖延，而法国亦将一起前来。据最近的来信称，将有轮船50艘前来。如果和清国的战争结束，他们无疑定会立即来日。

斗胆奉告各位、各同仁，以供预先决定谈判之际所采取之方针等。

最后还说，“敝人考虑，除缔结贸易条约之外，别无其他办法，故特奉告。”

尔后，幕府走上开国之路的决心受到推动，翌年井伊直弼被任为大老，强行实施这一方针，对哈里斯提出的通商条约签了字。但因是未经敕许就由幕府先签了字，舆论日益沸腾，终于发生了“安政大狱”事件，梅田源次郎等被捕。

但是，锁国主义的日本走向开国一举，并非出自对世界大势有了觉悟的那种所谓开明思想的单纯理想主义。和我们相邻的大国清国，在西洋军舰和大炮面前瞬即溃败，其惨败的结果是被迫签订屈辱条约。开国之举正是有鉴于这样的事实，从国防和军事上的危机出发的，而从“声明要旨”来看，也能够理解此举。就这个意义讲，不能不说鸦片战争对我国的开国有着至大的关系。

在我国，很快就详知鸦片战争的情况了。可以视作比较正确些的消息，是从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处得到的。我手中也有题为《鸦片传闻书》的抄写本3册。虽然没有清楚写明年号，但内容则是记录了1838至1843年的详细情况。报告的终了处，记有“子七月”和“寅七月”，所以谅必是天保十一年至十三年的抄本。末尾署有作为报告人的商馆馆长之名（或单署“馆长”），另外连署有监督（目付）、大通译、小通译或书籍日译负责人（书物和解挂）等，因此可知是当局（长崎长官？）派出的人员。有的地方还附记说，这一日译书是经当局督促，日夜奋战完成的。

除了有关人员之外，这种书大概一般是不公开的（报告的末尾也写有此系机密之件，以不致泄漏为限度，由少数人译成，云云），在当时一般作为鸦片战争的纪录而传抄的东西，当是《夷匪犯境录》了。

此书是用中文写的，是从中国输入的，这一点一看便知。但在中国却至今没有听说过它。然而，在当时的日本，作为了解鸦片战争实际状况的资料，它几乎就是唯一的东西了！

我也有此书的抄写本二种（一种4册，一种2册）。其中的一种是给原文加上了训点符号和送假名，对难解的词语加了注释，对认为是误记、误写的地方一一做了订正，读得十分仔细。卷首盖有“诚之馆藏书”的大朱印。诚之馆乃是在堀田正睦以前任首席老中的福山藩主阿部正弘的藩属学校。

阿部是堀田之前的幕府实权人物，是通商开国派的巨头，这种资料一定经过了详细的研究。

根据这部《夷匪犯境录》，嘉永二年出版了一种用日文小说体撰写的《海外新话》5册（以及《拾遗》5册）。吉田松阴等人也读过《夷匪犯境录》及《海外新话》（包括《拾遗》），这见于他的书信集。

《满清纪事》及其著者

——关于我国所传的“太平天国”

关于清末兴起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消息，根据遗留至今的传闻书来看，从嘉永六年（咸丰三年，1853）2月（旧历）亦即从太平军占领南京并开始在该地建都起就频频传来我国。笔者所藏汇集这种传闻的作品有两种，一种是题为《清朝骚乱传闻书》的手抄本1册，它收录了5篇传闻，我想是幕末时期手写的。另一种是题为《唐山巷说》^①的手写本1册，收录了3篇，但这3篇每篇都和前述《清朝骚乱传闻书》中的3篇相同。只不过由于都是手抄的，所以字句多少有些出入。后者像是该书编者加意清抄的，字写得很好。

这种传闻书看来当时颇为流传，因为从嘉永末年到安政年代，我国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动乱为题材的虚构小说数种，但都是根据这种传闻书写成，只要读一读这些小说，此点便可了然。我以前于《在日本的清末小说》（1971年《野草》第2号）一文中写过此事。

为了了解清末“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我国最早是以何种形式流传，又怎样地被接受，我想对《清朝骚乱传闻书》的内容作如下介绍。

^① 唐山，日本古代对中国的称谓，与唐土同。——译者

首先着手从嘉永六年2月写的东西考察，计有2篇，都分别载明了各自消息的来源。

标题为《萨州藩某某致藩府中某某之书翰抄件》，有如下的记述：

在唐(中)国，不限广西、湖南、湖北三国(省)，凡属大国(省)，四年以前既已处处兴起大明余党。憎恶清朝之政，慷慨万民之苦，千方百计欲重振往昔大明之世，拥立大明军朱氏为三军大元帅。突然诉诸一战，战而获胜云。该三国(省)者，人众衣着容貌犹如古时，束发广袖。年号天德元年(我丑年也)，称为后大明。大将军朱姓，名虽不详，但皆呼天德朱将军。请为昔日之大将军！国(省)中无不为之喜悦。

但自去岁年中始，处处交战，乡民皆极困苦。加之二百余日旱魃为虐，谷不结实，农民忧心。水旱田地蝗虫肆虐，用尽各种灭蝗方法及秘方，田中仍不奏效，益加困苦。为此农民一致商谈，皆曰唯有诉之于天。经天德将军允许，于红色纸上书写恶蝗速速退去，系于谷物农作之上，立于水田旱地之中。另以清朝圣主之名及年号亦印于纸上，立于其他水田旱地之中，命令蝗虫速即退去，然不见效。而天德一方，一夜之间蝗虫退去。清朝圣主之名则毫无效验。以上所述，乡民亦在传说，清朝已延续二百余年，天意复立大明之时机已到，万众安居乐业。以上由该地唐人相告。荒增呈报。

癸丑二月

清朝咸丰三年 我国嘉永六年丑二月①

同为嘉永六年二月的报告中，有下面一段：

长崎医生栗山大须于该地交易所中秘密抄写之本年春季船舶带来的传闻书信，经该医生报送岛原藩藩医小川正彻，由岛原藩藩

① 在增井经夫的《太平天国》(昭和26年，岩波新书)中也根据《海外异说》抄本介绍了这一传闻。吉田松阴也在《清朝咸丰乱记》的附录中介绍了这一传闻的大要。

士佐久间仙藏传来，该传闻书信如下：

去年嘉永五壬子中国贼徒蜂起，到处骚扰，其缘起如次。广西省浔州府高平县有一富豪人家，系名为朱天德之石灰商人。因亏损之故，欲停止经营，怎奈所属同仁执意不肯，遂将早先存储之钱财按人分配，作为本金以谋生计。然山贼闻悉此事，贼众决定抢劫。朱某之近邻有德之人将此事相告。朱某问明日期，大摆宴席款待贼众，说道，汝等若要抢劫，我已做好防御准备，只恐殃及近邻，故特奉告，家中所有金银粮物，可随意取去。遂出酒食飨之。贼徒无法达其劫掠目的，又有酒食可享，因尽其兴，并感其德，反而谢罪退去。其时（其后？）便有往来。此事为官府所闻，朱某遭传唤审讯，以私通贼徒之由，致遭拷问。朱某始终不屈，被强行关入牢狱。以前所属同仁群集官府申诉其不实，但未得邀准，终至一同杀死县吏，又与山贼等共将朱某由狱中救出，带归山中，一同扶为栋梁。朱某原不同意，然时势所迫，事不得已，遂从众意。而乱之发端由此以起。贼寨位于广西内地名为郎山，四周约有千里，据守牢固。此山至为险峻，更属要害之地。道路难辨，而贼之进退出入则自如。且前临大河，讨伐尤难，唯弓矢铁炮可用。然贼首之中有一妇女、一僧人，能施妖术破除弓矢铁炮，炮声亦变，而失效用云。

广西一府向贼投降。其土地处理温和，制度宽松，地租减半，万事从轻惩罚，故降从者日众。其军力多少虽不详，但百官群臣与朝廷同。衣冠容貌改为前朝式样，倡导恢复大明。天德二年登位，然以天下尚未统一，不用皇帝之号。然其徒共推曰：请称天德王。其取民之财从轻，绝无暴戾行为。夜晚张贴通告于门户，收获一分而二，财主可允其自行提出受用，更准其自身缴往官仓。

风闻农田生出蝗虫，毁伤谷物，从贼者田中竖立尊奉天德之牌示，亦有尊奉咸丰之牌示者。而天德一方，蝗虫自然消退云。

当今有英明之主，上述贼徒不久便可讨伐治平，谨以奉知。

丑二月

同年四月朔日，琉球人自福建发出的报告中有下列记载：

当地自近年嘉永四辛亥起，广西省有兵乱，迄今尚未能制止。去年壬子七月，盗贼等攻袭湖南，十二月毙湖北之官兵数百人。今癸丑正月，安庆及江西省之九江府被陷。贼兵势盛，北京亦为之骚动，大小户门紧闭，逃往远方，言语难以描述，尊事何以筹办？！细致操心之处，已向赴苏州之商人住处去函，三月十五日难以到来。绣花绉绸八匹购齐。又三月四日贼兵窜入北京。山东、河南、陕西省亦各起烽火。然而钦差尚大臣、周大臣、直隶总督琦大臣，共率山东、河南、陕西残兵二十万人开向北京，防御□□。北京稍趋安定。上述兵乱海陆贼多，尤其于广东省及长乐县转（？）水乡遇山贼，抢去货箱五十个，经与贼首面谈，归还三十箱。自厦门运出之船只悉遭劫夺。兵乱情况简略奉告。将离福州，途程较远，但请勿悬念！

丑四月朔日

以上为琉球人自福州发寄之急信，谨此奉闻。

萨州藩某 专呈

府中某先生

除以上报告外，还收录有下面的一份汉文写的文字：

嘉永癸丑四月告长崎镇台告（可删去？）宦府牒曰：

去年壬子春，明朱氏后裔名华字元晔，蜀四川人。年仅二十四。发欲兴复先明之大志，乘道光爷之丧，不用清之正朔制度，更明律明服，建元天德，募兵于广东诸州，渐得十万矣。已而浙江妖妇李氏亦拥十万，袭杭州，杀府尹而应元晔。元晔会李氏定谋略，攻拔广东府及福建西湖，招抚清降将降卒，于是兵势日强大也。众既三十万，拥元晔为朱新王也。诸港英夷亦属焉。秋八月清主咸丰爷亲征之不克。鞑靼亦起兵于北方，檄声言助朱氏。袭清之旧都据之，进略

宁吉岛，清人降者日许多，诸府股票，京师戒严焉云。^①

以《唐山巷说》为题的另一书中也收载了此文，并在以上汉文之后，续写了下面一段日文解说，还对该文加上了批判：

一客，向我展示了据说是朝鲜人呈送长崎长官的一通书函。按此函决非朝鲜人所书，若是朝鲜人书信，不会用嘉永年号。而且‘告’字未加在“长崎”之上（《唐山巷说》书中是将‘告’字写在‘长崎镇台’下面），这就使文与事不相符合了。像这封书函的文体，恐怕是我国的擅长汉文者听说朝鲜呈长崎镇台之事而记下来的文字。而文章既非朝鲜人的口气，又非当今骚客所喜好的文体，有享保时候的遗风。恐怕是出自诸侯的藩士或者是好事的行医卜算者之手。内容虽然难以尽信，却可暂记于此，以广异闻（以下对文字有意见，从略）。有人说，这是留居朝鲜的日本三河人写给长崎镇台的。

深川氏云，去年子八月，英国船一艘航泊朝鲜一个月。其时，日本三河人某某正居留朝鲜，恳托送往日本。由朝鲜至对州，交官府发往长崎长官。此一情况虽有文字，但属世间未悉之秘说云云。

《清朝骚乱传闻书》中没有深川氏这一后记部分，我想这当是《唐山巷说》编者特别附加的吧？！但是这一后记中有“去年子八月”云云，那么就是癸丑年即嘉永六年之际了，可知是和“告长崎镇台”一文同年所写。或者是《骚乱传闻书》的编者删去了这一部分也未可知。

《清朝骚乱传闻书》的最后部分（该书原把这一部分置于最前，但它是“六年癸丑六月”记述的文件，比前述四通晚四个月或两个月，所以这里将其置于最后），是题为《宗对马守阁下呈送（幕府）值班报告》的下列一篇文字。所谓“值班”，是指幕府的老中、若年寄（仅次于老中的官职。——译者）每月一次轮番当值交替执行政务的值月班者，所以这可

^① 胜海舟编的《开国起原》中，作为“对州家臣之禀报”收录了这一传闻。吉田松阴也在《清朝咸丰乱记》的附录中介绍了这一传说的大要。

以说是对马的宗氏(的家臣)向幕府提出的报告：

近期，朝鲜国内翻译官员之间秘谈称，近年中国情势骚乱甚剧，自前年起更趋严重。最初传闻仅属盗贼作乱性质，今则演为以恢复先代为名，崛起于岳州、衡州等边地。据该国近日之传说，骚乱主谋者洪姓，党徒皆为中国人。禁止清朝惯例之辫发(别本亦作剃发)，恢复明朝旧制。尤以暴动崛起之处，财货妇女不犯，故所向各地庶民安堵，悉皆服从。泉(象?)州、道州、岳州相继被占；武昌、九江、安庆诸州陆续陷落，清军士兵死伤甚多。北京自始亦未予忽视，起辽东之官兵，向其他各方派出催促调兵遣将之使者不绝于途。但庶民穷困，财用匮乏，粮秣难继。因之，发生夺取富户钱财之事。又一说，苏州亦陷落，此等揭竿而起之斗争，其现今之势，渐次蔓延，骚动未已，谨将传闻奉告。

以上所陈，未经朝鲜当局，乃委托官员探听报来，确否难断。唯据传闻原意将该国动乱之说呈览，错误出入自所难免，唯乞原宥，谨此。

嘉永六年癸丑六月

宗对马守家臣

古川将监

佐须伊织^①

再者，《唐山巷说》中也收录了这篇文字，但字句多少有些不同。而且“嘉永六年癸丑六月”这一纪年，在《唐山巷说》中只记为“丑六月”。

这份宗对马守家臣的报告书中称“骚乱主谋者洪姓”，但前面所举4篇中都未见到有主谋者姓洪的记载，这当是首次记述了。只是所说的“洪”姓，是暗指洪秀全呢，还是也指洪大全呢？这一点含糊不清。联系到“以恢复先代为名”一语，我想莫不是指洪大全？但不管指的是谁，都

^① 胜海舟编的《开国起原》中，作为“对州家臣之禀报”收录了这一传闻。吉田松阴也在《清朝咸丰乱记》的附录中介绍了这一传说的大要。

未超出传闻的程度，不能断言这洪姓就是大全。洪大全倡“反清复明”之说，是号召一般人民进行革命的“天地会”（或“三合会”）首领，被人称为“天德王”。洪秀全则是“上帝会”（或“拜上帝会”）的首领，以“上帝”或“天父”作为指导革命的核心，并未特别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来号召人众，而且自称“太平王”，不称“天德王”，今日留传的当时各种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天地会”和“上帝会”最初是联合开始发动反清革命的，所以，两者虽然基本上有区别，但在基层或在接受其口号的一般庶民间的传闻中，实际上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对于洪大全这位“天地会”首领的真实性，人们也有种种疑问，但在传闻中，洪大全是栩栩如生的人，所以，前面所举我国流传的诸篇传闻中的“天德王”，并不是洪秀全，勿宁认为是指洪大全。在日本流传的这些早期传闻书中，“天德”将军、“天德”建元等语屡有所见，但任何传闻书中却未见有“天国”、“太平天国”字样。这就是说，任何传闻书都未提到以基督教主义为宗旨的反政府集团。

在我国最早流传的太平天国运动，像前述诸篇那样，都是当作“复明”或“后明”，或者把主动者当作朱氏即明的后裔来传说。任何传闻都是这样说的，而洪秀全等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理想所倡导的“上帝”、“天父”等等，则在我国没有见诸文字，我想这因为在当时对它颇不容易理解，如果以“复明”为目标，则能立即被理解（？），从而眼下便能抓住这一运动。因此，我国所流传的或者所捕捉的传闻，可以说大体上都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原因出自传者一方，不如说出自接受者一方。或者说，还由于关系到当时被禁止的邪教（基督教）问题，记述传闻的执笔者便有意删除，而只将易于理解的“复明”一说全面推出。

说到这位“天德王”洪大全，现在中国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之间也有种种说法。属于当时官方记录的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咸丰五年序），有“伪天德王洪大全传”（卷一“刷贼姓名”）。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同治四年序）中也记有“阵擒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卷一“咸丰二年二月条目”），两者都作“天德王洪大全”。还有在可称为当时民间的、或个人

的记录中，也能见到关于洪大全、天德的记载。

黄钧宰的《金壶遁墨》(咸丰四年—同治二年)中，有“洪大全”一项(卷一)曰：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龄能背诵十三经，粗解诗词。长而深自负，屡应童子试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时粤中盗贼横(行)，不下数十股。大全阴察之，无足语者。乃投洪逆(指洪秀全)，联宗谊。洪(秀全)亦亟加倚任，相与定营制，整军律。

也就是说，大全前往洪秀全处，成为兄弟关系，一起制定官制，整顿军律。但官兵攻打永安时他被擒，作为俘虏解送京师。这一说法和官方的记载相同。王韬的《艱窶余談》(同治十二年序)中，“洪逆顛末記”一项(卷六)也记有天德之事：

距金田数十里，有剧盜伪号天德。素在大黃江□劫行旅，拥众积货自雄，官军无如何。洪逆(秀全)遂往投之，奇洪逆状貌，与之歃血订盟，结生死交。然洪逆不肯为之下也。后独留天德守巢，而悉出劫。与官军遇，佯北引去，官军遂捣其巢焚之，天德歼焉。洪逆返兵，攻官军大胜之，出天德尸于灰烬，哭而瘞之。

王韬在此文后面加注说：“按《粤匪紀略》咸丰二年二月，官军收复永安州阵，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于市。此大略传闻异词，今姑仍之，而著其误。”据称天德是在永安被官军所杀，而《粤匪紀略》中又说天德被擒，押送到北京被处磔刑。这样，彼此的说法便有了出入，也就是说，当时官方发表的所谓天德被擒一节有不同的传闻。因此，关于洪大全才出现了子虚乌有之说。

这里有个情况需要注意，就上面两者的记述来看，黄钧宰方面虽然记述了洪大全的事情，但未触及天德称号之事；而王韬方面虽说到以天德为伪号的事情，但并没说这就是洪大全。两者都没有把洪大全与天德联系起来。这里也能看出子虚乌有说得以出现的一面。

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民国十一年序)(第5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说：

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引文据该书。——译者)

这里的意思是说，有人认为洪大全已在叛乱之初被广西地方长官捕杀，然而作者则认为，这是当时地方长官为了给自己邀功，暗中仿照洪秀全的名字而捏造的虚构人物云云。但梁氏并未拿出任何论据，只不过说“甚疑”啦，“恐是”啦。因此，笔者也有“甚疑”之处，认为这“恐是”梁启超依据了他的友人扪虱谈虎客(韩文举的假名)编辑的《中国近世秘史》(光绪三十四年序)的说法。因为梁启超阅读了此书的底稿，并为它作了序言，还受编者之托，为这部由各种笔记集萃编成的书取名为《近世中国秘史》(序言中提及)。而且在这本书中，编者也把梁启超称作“吾友饮冰室主人”。从这种关系来看，我想梁启超的洪大全“子虚乌有”之说，原是借重了扪虱谈虎客之说的。

上述《近世中国秘史》第二编中，收进了我前面所引黄钧宰《金壶遁墨》记述“洪大全”的全文，然后加上编者意见说：

以吾所闻于故老，实无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过一极寻常流辈。
(中略)说者谓，洪氏(秀全)初起，气势锐甚，官军莫敢撄其锋。赛尚阿督师久，惧谴责，乃捏造此人以欺朝廷。后世秉笔者多不察，辗转抄录，几成故实。(下略)

梁启超在他的《历史研究法》中所说的话，可以说是原样照搬了上述扪虱谈虎客所言。

但是，后来从清故宫保存的清廷军机处文件(档案)中，发现了洪大全被捕后的“口供”(自白书)。它作为重要资料，被各研究者利用和引用。其中有云：

我来到广西，洪秀全就叫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甲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为太平王。云云。

洪大全自己这样道出了他的地位和天德王的称号。不过，尽管有人（谢兴尧、萧一山等）径直把这一“口供”当作有力的资料，引为决定洪大全实有其人和他的地位不虚的论据，但也有人（罗尔纲、英国人林利等）视为伪作而认为不可信。说法分歧。

洪大全果真是子虚乌有的人物吗？或者虽然实有其人，但像扪虱谈虎客所说“不过一极寻常流辈”？还是像黄钧宰及王韬所说那样他和洪秀全同是太平天国的大人物呢？即便在中国的专门研究者中间，也议论纷纷，可以说是个今日尚无定论的谜一般的人物。这是因为资料太多，而对于其主要部分的真伪，在解释和判定上又有困难；而且也因为官方对“逆贼”作记载的方法与民间个人传闻记录的方法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①

像在《清国骚乱传闻书》中所见到的那样，太平天国有有关情报传来我

^① 关于洪大全是否有其人，以及在太平天国的位置如何，近来发表有种种考证；现就笔者手边的主要作品列举如下：

谢兴尧《天德王洪大全传》（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太平天国史事论丛》所收）。又该氏所著《道咸时代之反清运动与洪杨之清党》——太平天国前纪之一——（民国二十七年《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1辑收载）也有很多述及洪大全之处。

荣孟源《天地会领袖洪大全》（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金田起义百周年纪念——收载）

罗尔纲《洪大全考》（195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论文集第二集——收载）

此外，对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资料中的《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告示文》（其中出现“大明天德皇帝”字句）做过解说的萧一山，也对天德王洪大全做了详细考证。（民国24年，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印行《太平天国诏谕》收载）

《天德王之谜》——洪大全案之研究

《洪大全案之再研究》

上列二种均为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1962年，香港，简氏猛进书屋）第6章“驰驱八桂”的注释部分所收载。

《洪大全问题》

该文作为注释收载于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民国三十五年，商务印书馆）的咸丰二年四月七日条下。

国之初期,虽然把这场运动特别当作以军事上的经历和演变为主的事情,但却是传来了较为具体地逐年逐月加以记载的情况。《满清纪事》(最初原无这一标题)和《粤匪大略》即是如此。《满清纪事》开始以手写本流传,不久以美浓版木活字本一册刊行。但它没有刊出纪年,因此不清楚它是何时刊行的。也许是安政时期吧?!因为它的流传是在嘉永七年(即安政元年),此节容待后述。这个木活字本,在卷首虽然标题为《满清纪事》,但书内附注说:“此编本无标题,世或呼为满清纪事,今姑从之。”可知原来本无标题,是刊行之时才暂题为《满清纪事》的。而且这一木刻活字本也没有撰者的姓名。

《粤匪大略》为半纸版刊本一册,也没有撰者姓名。不过,在封面里页题有《粤匪大略》处的上方记有“咸丰四年甲寅夏五”。在卷首的绿天山房之序中,有“安政甲寅冬日”的纪年。从这个封面里页的“咸丰四年夏五(月)”同序言上的“安政甲寅冬日”的关系来看,此书的原本是在咸丰四年亦即 1855 年夏带到日本来的(是手抄本吧?)在这年冬天,加上返点和送假名予以翻刻。此书的日本刻本序言提到“长崎之互市相息已历三霜,甲寅之年夏帮初至,时带此书”。所以这一翻刻本恐是安政元年吧?!约从第二年起便成为一般流传的书了。序言中还说:“阅此始得识其始末,海内之俗书已知其为伪,(中略)详贼匪、官军之盛衰消沮。虽记事些少,看之足以知其略。海内诸士读一过,始可破其疑也。”与前面介绍过的传闻书相比较,此书更为具体而且形式完整。很明显,文章是出自有学识者之手。

文章始自“粤西山形奇怪,水势险急,故人心不循良者多,向称多盗之都(乡?)”。然后,从“(道光)二十九年以后,盗益猖獗,兵(官兵)益畏缩。即督剿之,大宪威令亦难行”起,到三十年“浔州桂平县之金田墟,即逆匪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胡以洸(晃?)、范连德、罗亚旺等结拜上帝会,自称太平王,竟择于十月内起事”止,记述了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昌辉)等人结成“拜上帝会”,于 10 月在金田

举兵之事。以后则逐年逐月记载各地的攻防战斗，而且出现了清军征讨指挥者周天爵、赛尚阿、达洪阿，以及向提军（荣）、乌都统（兰泰）、徐广缙、常大淳、陆建瀛等很多人名。但在最后，说到咸丰四年正月，钦差大臣胜保破山东临清州，“贼匪又窜至山东高唐州，城遂失陷。此五月事也。”由此可见，封面里页的“咸丰四年甲寅夏五”，或是因为内容到此为止之故才那样写的。

正如前面引用的序言所说，与以往的传闻书相比较，《粤匪大略》当然使“海内之俗书已知其为伪”。但序言所说“长崎之互市相息已历三霜，甲寅之年夏帮初至，时带此书”（重点为增田所加）则属可疑。因为据长崎县立图书馆收藏的（输入）书籍底帐记载，嘉永三年（庚戌）、同四年（辛亥）、同五年（壬子）、同六年（癸丑）都有中国船运来很多书籍（见大庭脩编《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籍研究》的“资料编”）。然而在这本《唐船携来书籍研究》的各资料编中均找不到《粤匪大略》的书名。它大概不是通过正式贸易渠道传来我国的吧！

笔者所藏《粤匪大略》有三种，两种是刊本，一种是抄本。刊本中的一种，是淡褐色的封皮，封皮里页贴有黄色纸，以大字纵题《粤匪大略》，在上方栏外以小字横记“咸丰四年甲寅夏五”。另外一种是淡青色封面，封面里页是白纸。另有扉页，这扉页上，用印刷上述黄色纸的相同木版印上了“粤匪大略”及“咸丰四年甲寅夏五”。扉页内面则有“安政甲寅冬日，绿天山房校刊”，分为二行，并加了围框。此书没有序言。但前一种则有以上曾引用过的序言，序言末记有“安政甲寅冬日书于长春绿天山房”（分为二行）。两者用的是同一木版，故两者的内容也相同。两者也没有最后的版权页。

拙藏抄本一册，末尾墨书“安政二年乙卯冬十月二十六日写毕”，盖有“滋蕙堂主”、“鸿雨渔史”二方朱印。另外像是收藏者辗转易手的缘故，还有“江州大津岩崎氏图书之记”、“湖南岩崎氏藏”的朱印以及“本山文库”的朱印，由此可知已故每日新闻社长本山彦一氏曾收藏过它。抄

本的抄写比刊印本晚一年，我想这或许是依样将刊印本照抄下来的吧！但在刊印本空格的地方，抄本却都填补满了。再加前面我曾谈及刊印本的序言有些可疑，所以它的刊行年月（安政甲寅）果真可信吗？从这一见地出发，或者也可以认为，最初抄本就未曾在我国流传？但眼下仅凭手中现有的资料则难以断定这一问题。

《粤匪大略》像是没有在中国流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1950年，开明书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中，也原样收载了它，但所根据的是张政娘所藏以日本刊印本为据的抄本。所做的注释说，“原书为本翻版石印本”，这说法有错误。因为编者并不知道当时日本还没有“石印本”。应当说是“木刊本”自不待言。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太平天国》附录编集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是这样说明《粤匪大略》的：“不著撰人名氏，（一）日本美浓纸抄本一册，张政娘藏；（二）开明版《史料》本491—499面，即据上本排印”。但将这一排印的《粤匪大略》与日本刊本加以比较，则文字有误记之处，尽管不多。刊本上的空格，排印本也照样空着，这是和拙藏抄本不同的地方。

一如上面介绍的那样，《粤匪大略》被认为在中国已经佚失，是把日本的抄本逆输入的。然而，《粤匪大略》的前半部，在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叫做《粤西桂林守城记》的无名氏笔记抄本（史料合订本）中却能见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第5册，1962年，中华书局。有“大安”的影印本）。根据该书的解说，《粤西桂林守城记》也见于《粤匪犯湖南纪略等史料》及《二、三、四、五、六年分事杂记》（南京图书馆藏抄本）中。所以就部分而言，《粤匪大略》当也是这些抄本的再抄，或是根据同源资料编录而成。

《满清纪事》木活本1册，它和《粤匪大略》不同，连序言也没有，而且没有句读训点，亦未署著者姓名。如前所述，所谓《满清纪事》，其注释谓，此乃临时标题。不过关于它的著者，胜海舟的《开国起原》上卷（明治

二十四年官内省藏版,现在有“原书房”的重印本)所载“支那骚乱概况”中收录的《满清纪事》,称为“广东罗森著”。又增井经夫氏的《太平天国》(昭和二十六年,岩波新书)的“日本有关太平天国著作目录”中,列有《满清纪事》,在以著者为罗森的同时,又加以说明道:“据说是广东罗森传来的,但也有认为是出自邦人之手的。”不过,开始我曾说过,木活本的《满清纪事》的标题下面注有“此编本无标题,世或呼为《满清纪事》,今姑从之。”它并没有记载著者之名。根据什么把它说成广东罗森所著?笔者早就对此怀有疑问。而且很想知道罗森其人到底是何等样的人物。

吉田松阴早于安政二年,就以《清国咸丰乱记》为题翻译(意译)了它(明治四十二年《松阴先生遗著》第二编中排印,后于昭和十年亦收入岩波版《吉田松阴全集》),所以那时候就已流传了。然而,松阴是根据这一活字本刊出以前(?)的抄本翻译的,所以它的“例言”中说“此记(指《清国咸丰乱记》)原本不知何人所著,又无书名。”这和本文前面引用的木活字本标题下的注释一致。可知松阴的《咸丰乱记》是依据木活字本以前的手写本翻译的,并且还没有所谓著者罗森之说。

笔者得知《满清纪事》,已是三十数年前的事情,是刚出学校不久的时候。当时我对太平天国问题多少有些兴趣。另外,就在那个时候,或者稍稍以前,我得到的扪虱谈虎客编的《近世中国秘史》二册(第一编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六版;第二编为宣统三年三月十版,均为上海广智书局发行)。该书第二编收录了这篇采自“日本帝国图书馆手抄本”的《满清纪事》,文后还加上了很长的评语,其中有云:“吾友披发生,往年观书上野图书馆所手录者,秋间检尘篋得之,余方辑《中国秘史》第二编,获此瓊宝喜可知也。”并且作为“此区区小册子,已为中土士人闻所未闻者”,举出了“徐广缙之外交也、洪氏初起之历史也、钱江之上书洪氏也、洪氏之檄告百姓也、太平国与外人之交涉也、张祥晋之请括宫中金器铸币也”等等史实(?),以示“中土士人闻所未闻之事例”(在当时也许有如此看法,但根据今天的研究,这已几乎不值一提)。而且这些情况官方书籍不

予刊载，或出于讳避而不敢披载者多矣，所以称“是书字字皆瓊宝，宁夸漫也”。

多半由于这一评语的赞词所致，我当年曾把《满清纪事》视作贵重史料，一度对《满清纪事》木活字本加以朱笔圈点，有过试加翻译的念头。但是，这个活字本好像也有误字和脱落字，而且行文古怪，读来困难，中途就放弃了这一念头。比起这个活字本来，《近世秘史》的《满清纪事》要容易读得多。这固然也有打了句点的关系，但文章处处改订得可以理解了，勿宁说它是改编本更为合适，让人感到，已几乎全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所说的“帝国图书馆手抄本”是否就是如此，或者在转抄过程中加上了若干日本人的手笔，也未可知。人们自然也会想到这一可能性，但毕竟改窜的地方太多，勿宁说是编者扪虱谈虎客（或者是披发生，披发生是罗普的假名，罗普曾在梁启超的《清议报》杂志上连载发表了他译为中文的东海散士所著《佳人之奇遇》）把原抄本适当修改成为易读之物，我认为有此种可能性。其理由是，从拙藏木活字本及《开国起原》，或者从松阴的译文来看，它们之间仅有少量的字句差异，而大体上则是一致的文章。然而与此相比较，《近世中国秘史》方面改订和增添的字句内容就多得多了，所以将其视作修改乃至改编亦非不可。

例如在起首处，木活字本和《开国起原》的记述，直到“山谷清涼，树木阴蔚，群峦叠翠，石澗飞泉”，和《近世中国秘史》本都相同。但在木活字本和《开国起原》中，接下来是“于此闲游打坐，正可敲棋琢句”12字，而在《近世中国秘史》本中则缩减为“於此晏坐”4字。下面数行后，《近世中国秘史》本添入了木活字本和《开国起原》中完全没有的“清国与吾仅隔一衣带水，而不知其近世历史可乎”一句。后面在木活字本和《开国起原》中有“中华地广人众云云”的地方，而在《近世中国秘史》中则作“清国地广人众云云”。前面先出现“清国与吾仅隔一衣带水”之句，这里把“中华”改为“清国”，是为了使此书像是日本人的著作。特别是《近世中国秘史》中，在“一衣带水”下面提出“不知其近世历史可乎”，（重点系增田所

加),而“近世历史”一词也完全是清朝最晚时期亡命日本的革命党,或维新党的语气。与其说是“帝国图书馆手钞本”,勿宁说是《近世中国秘史》编者添加的词句。

看一看记述洪秀全崛起的地方,木活字本和《开国起原》中有这样的内容:

时两广总督徐广缙,庸碌无才,专以夷务推辞,不办匪事,性傲乖张,残杀沈米义士,监毙梁友竹,拿捉潘镜泉,刻薄百姓士子,乱作威福,神人共愤,故广西之贼闻知而复聚焉。兹说会内之洪秀泉^①(《满清纪事》中皆作“洪秀泉”),自小素有胆略,结纳英豪。中年读(书),贫零郁郁而不得志。闻知番人教读,每月工银可有数元,故于廿八年到港,诣进郭士笠门,讲语上帝书理,心内明晰。番人因予工食,往广西而传道,寓某某乡,故入名于保良会内。

然而,在《近世中国秘史》中,文章则变得容易理解,它把“夷务”改为“外交”,“番人”改为“西人”,又把“某某乡”切实补上姓名,作为“胡以晃之村”:

时两广总督徐广缙,庸而又贪,专以外交藉口,不肯出兵办匪。性又乖张残忍,杀沈米义士,监毙梁友竹,怒捉潘镜泉,妄作威福,人人共愤,多有亡命西走者,故广西之乱党复盛。然乱党虽多,并无大志,唯洪秀全具胆略,结纳英雄。中岁家日落,抑郁不得志。闻西人传布耶稣教,遂于二十八年赴香港,诣英牧师郭士笠门受业。读上帝书,心有所得。西人令其传道,给以工食,寓于胡以晃之村,故得名保良会。(重点系增田所加,以示字句变更或增添部分。)

其次叙述冯云山事情的地方,木活字本及《开国起原》上说:

^① 洪秀全被写为洪秀泉,这在当时政府文书中屡见不鲜,其原因是,从当时政府(清朝)来说,洪秀全乃一叛乱之贼,不写其正当姓名,有意错写一字以示侮辱。《满清纪事》当也是采取了迎合政府文书的写法。

会内冯云山，亦因贫于澳门入教，赖番人工食。往（广）西教书，初年寓居黄宅，次年寓曾宅。有秀才张姓者，言他邪教，指其毁烂社坛庙宇而稟官。官即饬差拿黄曾二人及冯云山于狱，将黄曾二人押毙，冯云山用些小钱，贿嘱差房照顾，是以知县见他虽是邪教，并未滋出事端，故宽之而递解回花县。回家既久，难觅生涯，复往广西。官差查觉，再来弋获。适有兄弟好报不平，将来殴打。云云。

但在《近世中国秘史》中则作为：

冯云山亦于澳门入天主教，其时已返粤西，以训童子为业。初年寓居黄宅，次年寓居曾宅，常以其宗教说动人。有张秀才者，稟讦其邪言惑众。官即捕拿冯云山及黄曾二人于狱。黄曾皆监毙，云山以用贿得释，递解回花县原籍。不久又复西行，为贵县差役认出，索贿不满其欲，欲擒致之，乡人咸庇冯殴差。云云。（重点系变更之处）

可见，这些文字几乎都改订一过。

以上举出两处文字，作为彼此互异的示例；至于全部情况，大体也是这样。《近世中国秘史》的编者在文章末尾所加评赞说“已为中土士人闻所未闻者”，作为其例证可举“洪氏之檄告百姓”一文。在《满清纪事》中，它是“奉承天运太平国总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大洪”（重点系增田所加）发布的告示，而在《近世中国秘史》中，这个“万大洪”则变成了“万岁洪”。既称“万岁洪”，那就是指洪秀全了，因为秀全居于天王地位，被称为“万岁”。所以，后来这就被误为洪秀全的檄文了。例如，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民国 12 年，文明书局）“卷之十”就把它作为“天王檄文”引用了。罗邕、沈祖基编《太平天国诗文钞》（民国十七年自序）上册，也作为“檄文”并加注“时初建国”而引用。此外，《太平天国文钞》（上海达文书店）也从《太平天国轶史》中引用了同一内容，作为“天王（洪秀）全初建国檄文”。

这些引用的“檄文”不是来自《满清纪事》的原文，而全部转引自《近世中国秘史》，将这些“檄文”内容与《近世中国秘史》加以对照，便可明

白。“万岁洪”自不待说，告示的全文也都一样。《满清纪事》木活字本和《开国起原》刊出的檄文，在《近世中国秘史》中也被修改成颇为易读的文字了。举例说，在它的中间部分，木活字本作：

刻下大兵云集广西，已定长州（沙？）太平，将近江西等处，不得不先行晓谕，凡我百姓不必惊慌，农工商贾各安生业。富贵备办粮食，助吾之兵饷，多寡数目亲自报明，各给回借卷（券？），以凭日后清偿。尔等如有勇力者、智谋者，同心竭力，共成美举。俟承平之日，幸资（聿？）荣封，云云。

而在《近世中国秘史》中，这段文字则作：

刻下大兵云集，广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南一带，不得不先行晓谕，凡我百姓兄弟，不必惊慌。农工商贾，各安生业。富贵者须备办粮食助吾兵饷。多寡数目亲自报明，各给回券，以凭日后清偿。你等如有勇力者、智谋者，宜同心协力，共襄义举，俟太平之日，各予荣封。云云。（重点系表示相异之处）

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字有相当的改变和增添。前述《太平天国野史》和《太平天国诗文钞》所载的“檄文”，与《近世中国秘史》的文字完全相同，这分明是转录自《秘史》的。

这份“奉承天运太平国总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大洪”的告示，在《粤匪杂录》这部佚名的钞本（据称藏于常熟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也收载为“万大洪告示”，它和木活字本《满清纪事》一样写作“万大洪”。告示正文字句虽多少有所不同，但大体无差异。此事见于萧一山复印了大英博物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文献的《太平天国诏谕》（民国二十四年，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的解说部分。萧一山的复印件里就有这份万大洪的告示，尽管它欠缺前半部分，但在告示之后，有向“天地会”各支部（？）分送的符号。从开头的“奉承天运”一句来看，这个告示也是“天地会”一派的东西，首先这就说明万大洪并非洪秀全。这一大英博物馆收

藏的文告之后，作为“计开名职”，还以洪秀泉为首，依次列出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正、泰昌、石达开等领导人的名字，注有封号、职名、原籍、年龄。石达开之次写有“万大洪，封都督大元帅，东莞县人，年方卅二岁。此人身高，头大，眼大。”不能不认为万大洪实有其人。

从以上情况看，我国所传的《满清纪事》，系经《近世中国秘史》做了改动而又逆输入到中国，被当成太平天国的一种史料对待了。而且有错误的《满清纪事》也在中国的研究者中间被引用，作为考证资料使用（例如罗尔纲的《钱江考》等），这是我要指出的。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太平天国》附录出版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列有《满清纪事》并有如下的解说：

在扪虱谈虎客编《近世中国秘史》第2册，124至144面。书名《满清纪事》，实则全记太平革命。起林则徐烧鸦片、洪秀全利用宗教，至林凤翔北伐，上海小刀会起事。今按书中文字，及韩氏（扪虱谈虎客）评语，似出国人之手，而伪托日人所撰者。

据此可知，中国所传的《满清纪事》，仅只是《近世中国秘史》所载的《满清纪事》，被认为是伪托日本人所撰写的。

前面曾经说过，《满清纪事》的著者在我国被认为是罗森，或者这样传说。但是，《近世中国秘史》所收录的《满清纪事》的跋语说，“是书标名日本某著”，接着则是，“而察书中口吻，似出于吾粤人之手”、“岂本粤人成著，而日人攫取，为已有耶？抑咨询吾粤人，而撰述者耶？皆未可知。”这篇文章，对其著者语焉不详，我想正是因为受了《近世中国秘史》的迷惑。在日本，安政二年吉田松阴就已说过，“原本不知何人所著，又无书名”。但在《开国起源》中则作“广东罗森著”，并加上了书名《满清纪事》。这个书名可能是因袭木活字本的；但木活字本没有著者名，而《开国起源》却清清楚楚标为罗森著。

笔者老早就对此抱有“何所根据”的疑问。后来偶然得到一本叫作

《日本日记》的旧抄写本，阅读了此书，大致即可判断罗森其人便是《满清纪事》的著者。

《日本日记》原是在香港杂志《遐迩贯珍》(1854年11号起)连载(分3次)的“一唐人”逗留日本时的见闻，其开头有编者前言说：

《遐迩贯珍》数号，每记花旗国与日本相互和约之事，至第十号则载两国所议定约条之大意。今有一唐人为余平素知己之友，去年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与助立约之事，故将所见所闻，日逐详记，编成一帙，归而授余。兹特著于《贯珍》之中，以广读者之闻见，庶几耳目为之一新。但因于篇幅未便详叙。此月只印其三分之一，余待后续。(重点系增田所加)

《遐迩贯珍》于1853年(咸丰五年，嘉永六年)以麦都思为主笔，在香港发行。每月12—20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这一杂志当时也传到日本，现在还有特殊的图书馆一类的地方残留几册。我也有某氏赠给的来自某图书馆所藏《遐迩贯珍》抄写本的复写本。作为探察海外大事的情报来源，它被当时的幕府官员和识者所珍视。吉田松阴在他的《幽室文稿》中就写着，他曾在《遐迩贯珍》上读过中国翻译的《伊索寓言》。再者，松阴于安政四年9月致长原武的书信中也说，“拜领《遐迩贯珍》，特申谢忱！”先掌幕府海防、后任外国事务长官的岩瀬(肥后守)于安政五年4月致桥本左内的书信中也说：“拙藏有《遐迩贯珍》，倘欲一睹，赐知即奉上。并乞便中请示(指松平春岳)为荷！”(春岳文库藏)此信见于《桥本景岳全集》。虽然不知是通过何种渠道而来(荷兰船或唐船带来的？)由此可知日本也有少量输入。花旗国即美国，为同日本缔结亲善条约而来日的培里一行中有随行的“一唐人”，而他在日本的见闻记就是这部《日本日记》。其中可以看到山本文之助、堀达之助、合原操藏、名村五八郎等通译乃至笔谈的小吏姓名，以及林大学头、鹈殿民部少辅、伊泽美作守、井户对马守等幕府方面负责人的名字。文中有云：

有平山谦二郎者，其人纯厚博学。趋而问予中国治乱之端。予将平日记录之事及治安策视之。（重点系增田所加）

就是说，名为平山谦二郎者（平山是幕府的谍报人员），向这位“一唐人”探问中国治乱之事，他便把平日记录的情况和治安之策给平山观看。接着又说“其附来一信曰”，随即介绍了平山的长篇来信，其中有云：“昨日宴会之事，未遑详读。愿借册子携回一涉，下日完璧于横滨公馆云。予因与之。阅毕送返，亦答予书曰”、“（前略）顷者被视南京纪事及治安策二册子。熟读数回，始审中国治乱之由，且知罗向乔之学术淳正。云云。”（重点系增田所加）以上果真是平山谦二郎所写信笺的原样吗？“一唐人”不会加以修订乃至改写吗？平山将“一唐人”平日记下来的南京纪事和治安之策的两册子借回来，方才审知中国（若是平山书写的原信，这里会是“清国”二字吧！）治乱（这里也许会是“争乱”二字）之由，而且知道了罗向乔的学术造诣云云。所谓写中国治乱之事的南京纪事，乃名叫罗向乔的“一唐人”记录的，而把它借回来阅读，这事由此也已清楚。可以认为，在借回来的这段时间内，想到这是获知中国情况的难得资料，便把它抄写了下来，它也就是后来以“满清纪事”为题的木活字本的原稿本。

单就南京纪事而言，是否便是写的太平天国之事，光从字义上看是无法断定的。但是，由于被询问“中国治乱之端”，而平日又有所记录，遂将南京纪事提供了出来，而且当时南京乃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既然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从当时的状况说称为南京纪事，就不能不认为是写太平天国之事的。不过，罗向乔就是罗森这一点，在《日本日记》中并未明确写出来。

在《日本日记》中可以看到，请求这位“一唐人”即罗向乔题写扇面（字、诗）的日本人很多。他说“予或到公馆，每每多人请予录扇。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余柄。”还有的地方说“予于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总之，人们同他和诗酬答（赠答之诗也在《日本日记》中有种种记载），求他写扇面，很多从事公职的日本人将他包围了起来。有一个名叫根岸橘三郎的人，在所著《幕末开国新观》（昭和二年，博

文馆)里,介绍了《丑寅物附》^①。它虽未载明出处,但表明癸丑(1853年)、甲寅(1854年)前后,即培里来航时期,有“物附”讽刺了当时群情骚然的社会。其中对于“可怕的东西是……”这个点题,有人应答为:“与罗森做应答的腐儒”。由此大体可以看出,罗向乔就是罗森。

另外还有石野瑛氏校刊的《美利坚船渡来日记》(昭和七年“武相丛书”第1编),这是被认为在“嘉永七甲寅年春游日”“武州久良岐郡石川乡中村”的“石川和辅清宗”“写置者也”的抄写本。^②校刊者石野氏说:“石川和辅当时是中村的村长,接近幕府官吏的机会较多,故能写出此文。”文中关于罗森的记载称“该罗森又名向乔者,诗文精达,书法亦佳。”

^① 物附:日本杂俳之一种。由点题者提出“某种东西是……”或“做某种东西……”,由应答者补全下半句。按杂俳是日本游戏性质的“俳谐文学”总称。——译者

^② 石野瑛校《美利坚船渡来日记》(昭和七年,内外社)一书,是把石川氏藏本《美利坚船渡来日记》和添田氏藏本《美利坚船渡来日志》两种流传的抄本加以校刊。

石川氏藏本的2月13日条目中称:

“今次,异(外)船乘员之中有广东名为罗森之异(外)人,时时上岸,其容貌不同于美利坚人。毛发甚长,头顶之上留发少许,余悉剃去。所留之长发编组美丽,垂于脑后,乃唐土南国广东生者,当时同乘美利坚船。乘员中此种风俗之异人颇多,其中以此罗森又名向乔者诗文通达,书法亦佳。记其诗二三首。”并列举了署名“广东罗森”的诗:“群峭碧磨天,逍遙不计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诗末记有“春月题于横滨公馆”。此外还介绍了署名为“广东罗森”“广东向乔”的“甲寅春月于火船即事一首”、“题于横滨公馆”、“甲寅春月书于鲍丹火船上”、“甲寅春应人需书”、“甲寅春月醉中书”5首。并说,“此外,诗甚多,均略之。今次奉上之目录亦出自罗森之笔,万事皆用汉文,甚为便利”。

又添田氏藏本中有以下记载:“二月十八日异人上岸者中有清朝广东人,名为罗森向乔者二人(将同一人理解为二人),能诗文,擅书法,赋诗于横滨”。除了上述石川本的“群峭碧磨天云云”而外,还录有石川本中所未见过的“有客沧浪云云”的诗。其次还录有石川本中也收载的,作为“自清国乍浦港出帆,途经琉球之八重山海域于大洋中作”的长诗“甲寅春月于火船即事一首”,此诗末尾有“甲寅春月于火船即事一首”“书于横滨之馆 广东罗森”的署名。

添田氏继续说,“此诗实具清朝风韵,流露其人心中实情。韵法格调完美。即时之诗,按日本国今应为二月,问以何故月有异,罗森曰,因美利坚国用殷制建丑之历,故日本之正月约当其二月,与今日本施行之夏制建寅之历相差一月。罗森生于清国广东,暂时雇佣于美利坚国云。”

《未刊横滨开港史料》(昭和三十五年,神奈川县图书馆协会)中收载有题为《随闻积草》(副题《金驿日记》)的“嘉永七年”记录,谈及3月3日左右的罗森说:“罗森(清朝人)亦登岸,其诗书为众官员所欣赏,肯写扇面,我亦承其书诗扇面。”这位笔者也拿出扇面承蒙罗森大笔一挥。这道出了当时的罗森热潮。

还收录有“罗森”或“向乔”署名的诗数首(详见上页注②)。据此可以明白,罗向乔和罗森是同一人;向乔是他的字或号。以后不久,笔者偶然看到东京大学的《史料编纂所图书目录》,方知这个《日本日记》被收录为《大日本古文书》的“幕末外国关系文书”附录之一(大正二年,东京帝国大学)。其中以《美国使节随行清国人罗森日本日记》为标题,收录印刷了和拙藏抄写本《日本日记》相同的东西,并加了注释说:“嘉永六年12月15日起,至安政元年7月14日止,美国使节接待情况及其他日本见闻之件”,还注称:“此日记载于香港英华书院发行之《遐迩贯珍》,今因原本无法获得,故以向山笃所辑《蠹余一得》及《中村不能斋笔记》所收者为据。”

《大日本古文书》的编者,没有提示根据就把《日本日记》作为罗森的了,也就是说,南京纪事的作者当是罗森。

尔后,笔者又得到一册“嘉永甲寅七月十九日,克堂生写”的抄本《金川(神奈川)游记》。因为正文最后有“三月二十八日记”,所以我认为这是克堂生转抄自原本的。这个手写本的收藏印章是“若树文库”,想来原是林若吉氏所藏。其内容是,以幕府主管接待的对马守井户的“家臣身份”,从江户出发的一行三人,到达金川,参加接待美国使节,对此情况作了详细记录。文章的最后有:“今日拟与罗森笔谈,然众人求书,包围罗森,难以接近。终见隙而上,得与笔语,有如另纸所记。云云”。这另纸所记,开头是:

“嘉永甲寅二月晦日,(于)横滨接待馆见唐山之人罗森,席上笔谈,恨忽卒之间,不能覩缕。”

下面顺序将笔谈问答记录下来。但是这一部《金川游记》的作者姓名不详。因为最末后记有“绝密,请勿外泄,万万保密!”所以这份笔记没有理由写上自己的姓名。不过我想,作者匆遽之间从江户抵达金川,“早起束发,穿上纺绸外褂、纺绸衣服,新做的缎裙。某某先生从未有过这样的大化装”。他们赶往宾馆,“晋谒”这次主管接待的“井户对马守阁下”,以井

户的家臣身份列席对美使的接待。这样看来，作者或是旗本，^①或是同某藩有关系的儒者。此人同罗森的问答甚为有趣，其中有，作者写问：“请写姓名字号”；对方“乃出洋纸书曰，广东南海人罗森号向乔。”（重点系增田所加）这里由罗森自己讲出了向乔是他的号。据此，向乔与罗森的关系就一清二楚了。

且说，这份笔谈问答最初开始是

某（作者自称）抽腰扇，请曰愿写自作之诗。

就是说他也抽出腰扇，请罗森书写其自作的诗。随后写问道：“清朝今如何？”罗森则写道：“山本文之介他在何处？我要见他。”某问：“何故要见？”罗答：“他取去我书二本，我要取回。”某问：“何书？”罗答：“系我所作之书。”某“诺”（或为问者明白之意？），接下去插进了说明语“既而山本文之介至焉”。以下是罗森对文之介说：“初一日可交回我书”。此时某又以叙述文体记入自己的感想：“文之介点头去，盖彼不欲说清朝之乱，故顾左右言他也。”

然而在《日本日记》中，借走罗森“南京纪事”的记录和“治安策”的是平山谦二郎，而这里却成了山本文之介。也许平山、山本都曾分别借过？

某对“清朝之乱”即当时的太平天国事件热心打听，问：“太平王小刀会何姓名？”答：“洪秀泉即太平王也，非小刀会。”问：“其势如何，既取南京乎？”答：“今既失去南京。”问：“美利坚援太平王乎？”答：“不援亦不恶之”。又问：“英夷援清朝乎？”答：“两不援，各夷自卫而已。”问：“闻清朝皇帝遁朝鲜，然乎否？”答：“我尚未闻，你何闻也！”罗森面色慌张。“巷说耳，崎阳之人说如此”，某解释说长崎有这样的传闻。接着某又问：“太平王得志，复衣冠之旧文物乎否？”答：“能得志则复。”问：“成败之势如何？”答：“随天意。”又问：“天道今将属谁？”答：“未可知也。”对于“洪秀泉伪称朱明之后，然否乎？”的回答是“是也”；对“纪年号天德乎？”的回答是“既

^① 旗本，江户时代武士的一个等级，家禄1万石以下500石以上。——译者

故”。问：“今如何？”答：“今太平王当止（之？）”。

对于“太平王之外又有王乎？”的回答是“现闻有四王”。因为回答得不很清楚，提问者或许感到对方含糊敷衍，就再次询问：“欲闻清国之时情，子不欲说乎？”回答是“现今清朝有乱，我欲与你邦往以平乱，可乎？”这是装腔作势呢，还是文字上哪儿有了错误？不清楚。针对“子往美利坚避乱乎？请援乎？尽忠于清乎？随天意乎？”的提问，回答是“我志则欲平乱以建功，在夷船者亦避乱之一端也。”这也是装样子的大话。问“四王如何？”回答“记不真，但知洪秀泉为首也。”问“中国过半随贼乎？”则回答“以仁义乃可使民服”，语气漠然，亦似有支持太平天国之意。在回答“子数往来美利坚乎”时说：“我在其船不过三阅月也，但我不管其事，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义”。问“言语通乎否？”回答“我少言语，不过止能对答而已。”最后提问有“太平王信孔圣仁义之道乎？学美利坚乎？”回答则是空白。这是由于时间已到呢，还是问答难于顺利进行了呢？不得而知。

由上述情况看来，罗森像是稍通言语（英语），所以才被培里的使节团雇用，以备和日本人交谈时作为通译的辅佐（？），由他以笔谈来补充，然而正如他在问答中说的那样，好像只懂一点英语。

前面说过，《大日本古文书》的“幕末外国关系文书”附录之一中，也收载了名为《墨夷应接录》（内阁文库藏）的当时记录。从这记录看，使节团一行绕到箱馆（函馆古称。——译者），随意上岸。又从金川到箱馆的费用金额一万，要求林大学头支付。大学头诘问培理：“超出约定范围，岂非使节所不宜之事耶？”培理于是说：“向大学头申请用费之事，本应申报而未申报，此似全属译员之误。”“大学头曰，‘译员无误，有使节（于箱馆）确认之汉文为凭，该文已由箱馆转来，实即如此’，遂示以汉文。培理呈惶惑之状曰：‘此何故哉？决无虚假情事。仔细考虑，汉文若是罗森其人所书，则是罗森完全理解错误。其故乃在箱馆谈话之时，顺便提出由金川至箱馆航海所费开支约一万金。一万之数

如被理解为无所谓，则是罗森一旁听错此事，故尔写出上述汉文者也”。看来，罗森没有充分理解培理的话（英语），就写成汉文，在箱馆提示给日本方面了。他担任译员的辅佐工作，而英语又不太好，这从培理同林大学头的问答中一清二楚。

正如《日本日记》叙述的那样，罗森（号向乔）是“癸丑年十月二十三有某友，请余同往日本，共议条约。予卜之吉，十二月十五扬帆”，经琉球驶向日本，停泊于横滨，协助同日本官吏的接触。又挥毫书写诗、文，将南京纪事的记录向打听“清国治乱之事”的日本人展示，并经抄写遗留于日本。还同使节团一起前往箱馆，造访松前大夫勘解由的公馆。然后再度回航至下田。并赋诗酬答，书写扇面。然后又经琉球驶向中国，经宁波、福州、厦门，于7月14日返抵香港。

这个期间的《日记》，就是1854年11月至1855年正月投寄给《遐迩贯珍》的。

最后谈一谈在没有《满清纪事》这一标题前，经松阴根据手写本翻译的《清国咸丰乱记》。该书开头的“例言”中说：“今余特采其要旨，做此记述。自始即未按对译处理，故原文中之不重要处予以删削。又其难读之处，姑依其意、揣其意而述之。”换言之，即是意译。但与原文对照一阅，则虽然也有意译之处，但大致仍是依据原文逐句对译的。例言末尾，有“乙卯之春”的纪年，故可知是安政二年（1855。——译者）对译的。

《清朝咸丰乱记》收载于《松阴先生遗著》第二编（明治四十二年，吉田库三编）。据编者的解说称：“此书为安政二年乙卯，先生26岁著于野山狱中。原本是先生父兄（杉百合之助与民治）抄写，先生亲自校阅，并增入自撰前言二页（野山樵叟、山阴老樵均为先生之假号）、清国略图及特载云云一页（洪秀泉于城内揭示的联句，其事本书载述——原注），此即所谓窜改本，今已不存。”

该前言是影印版，一页为日文，一页为汉文。日文方面有如下的

记述：

“此书乃未定之原稿，纰缪不少，特予窜改，俾得粗看，虽欲使此书与略识丙丁之童子共享，然若无此意则将存置之矣。观者倘不哂笑其纰缪则大幸焉。乙卯五月念六 野山樵叟”。

用汉文写的前言则署“山阴老樵题”。例言之后插入《清国二京十八省略图》，其所以如此，有如“例言”的一项所说，“读此记述者，按其地理，始能知清国之大变乱。因于伊始即置二京十八省略图，幸希读者一一与之对照”，用意之深跃然纸上。正因为松阴将太平天国骚乱作为“清国之一大变乱”来重视，所以才动手翻译此书的。

“例言”中还有一项说：“朝鲜之传说，清商之口信，迅速传播天下，固未必非予记载不可，然今采其大要附记于兹者，仅欲对照此记（《咸丰乱记》），俾真伪详略臻于易知耳”。而且将开端就曾介绍过的《清朝骚乱传闻书》中的两篇加以扼要附载。我认为，这是因为松阴把以往的传闻书视为“伪”和“略”，而把《满清纪事》视为“真”和“详”。因此，他发现了翻译此书的意义。

吉田松阴在培理来航时，投身美舰企图航渡海外而未果，被捕之时是嘉永七年（1854年）。——译者），即安政元年3月。这一情况详见松阴被捕后于狱中记述的《回顾录》^①（明治十九年文求堂发行）。而翻译《清国咸丰乱记》则是翌安政二年，上述“前言”是5月写的。罗森所说将《南京纪事》借给了平山谦二郎或山本文之助是上年2月的事，就是说，一年后这本书就在既无作者名也无书名（松阴“例言”之语）的情况下，被一部分人传抄、阅读了。然而松阴好像并不知道这就是搭乘美舰的罗森所撰。可是，据《回顾录》载称，松阴在培理所乘旗舰“帕瓦坦”号上，请求培

^① 和刻2册本，“曾孙库三校，品川弥二郎序”。关于当时的吉田松阴事件，培理的《日本远征记》（有土屋乔雄、玉城峰的全译本，昭和十年、十一年，弘文庄）中也有相当详细的记载。

理载他去美是通过舰上译员卫三畏^①(美国人)交涉的。卫三畏和罗森一样是在广东被雇用的随行日语翻译(他因照顾漂流的日本人而学到了日语)。松阴在《回顾录》上说他“真正讲得流畅，毫无错误”，松阴还写道，通过卫三畏进行交涉时“余书写广东人罗森之名，说想见此人。卫三畏曰，见之何用，且今卧床而睡”。由此可见，关于罗森其人，松阴也已有所耳闻，当时罗森似是也在旗舰上而未能相会。倘若相会也许会以笔谈打听“清朝治乱之事”。

我曾以《清朝咸丰乱记》同《满清纪事》对照着稍稍阅读过，这勉强可以说是翻译。正像“例言”所说，“其难读之处姑依其意，揣其意而述之”，既有开始转抄时产生的错误，也确实有像松阴说的那种难读之处；但是，误译之处也不断出现。这是因为文章里有古典汉文中不太常见的词语。例如把“争取漏规，相殴于堂上”(重点系增田所加)译为“争相拿取钟表(前任知县和新任知县)在公堂上对打”。将“漏规”联想为漏刻(即漏壶)而译成了“钟表”。“漏规”也书作“陋规”，是指官吏以公用为名从民间强

^① 卫三畏精日语，当时引人注目，似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男子。在石野瑛氏所校的石川本《美利坚船渡来日记》中，还收入了卫三畏采蚌之类的画像。2月17日的条目中记述说：“每日登岸之异(外)人中有译员名卫三畏者，生于美国，有来由。与家人一同去国，移居清国乍浦(当是广东之误)，美利坚国王虽常召其返国，但自己不返，而令其弟返回本国以继家统。自己仍居乍浦。日本天保年中亦曾两度前来长崎。并有日本肥前地方三人，尾张地方三人曾于卫三畏家中作漂流之食客。此异人(之)言语与日本人相埒，平日戴眼镜。”

添田氏藏本《美利坚船渡来日志》也有与上述内容大体相同的记述。

塞缪尔·韦尔斯·威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国名为“卫三畏”，有关中国的著述很多。尤其是作为《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的著者和《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编辑者，是位有名的中国研究者。他是美国的传教士，以海外布道局成员的身份到广东，监督印刷出版事业。为要送还7名日本漂流民，他同乘“莫里逊”号船航来浦贺，但受到炮击而返回。在随培理担任翻译之后成为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也担任过代办。安政五年再次航抵日本，在长崎避暑，明治五年也曾到横滨避暑，又到过东京以追忆往事，以上有关卫三畏的略传见《西洋人名辞典》(岩波版)及小泽三郎的《居留中国耶稣教传教士卫三畏小传》(昭和十九年，亚细亚书房版《幕末明治耶稣教史研究》收载)。小泽氏此著比较详细。

广东人罗森在其《日本日记》开始部分说，“有某友，请予同往日本共议条约云云”(重点系增田所加)，我想，这位“某友”就是住在广东的卫三畏，他与罗森早有交往，罗森即是受卫三畏约请而同行的。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想。

制收敛钱财、收贿肥私而言。又“押毙”被译成“压死”，但“押”是拘押犯罪之人，是监禁之意，应该译作“在牢房中关押而死”，并不是压死。将“劫掠当铺”的“当铺”只译作“商店”，但理应是劫掠“质屋”（日语当铺。——译者）才对。这是由于不懂“当”的字义。再有，因为不知道事情经过，把洪秀全赴香港造访牧师时原文用的“到港”二字译成“到亚妈港”，就把香港和澳门混淆了。“广府”即“广州府知事”但被译作“总督（两广总督）”。不知何以搞错。

对于前面讲到的万大洪告示中的“万大洪”，特意加上注释作“秀泉”（即洪秀全），这也错了，误为洪秀全的檄文了。

以上只是就最初部分一瞥而查觉到的。在当时对于事件情况还不太清楚的条件下，作为只读过孔孟古典汉文的人，从整体来看可以说是一份热心的、过得去的翻译了。

山本 宪(梅崖)

关西大学与山本宪

在《关西大学七十年史》的《年表》里，可以看到明治二十八年处记有：“9月，新设别科，讲授读书、作文、数学、外语。”《年史》正文的记述是：

必须特别加以记述的是新设了别科。(中略)就某种意义说，即相当于今天的一般教养课程，讲授法律学的基础——读书与作文。讲师聘任了山本宪。

接下来，对“设置别科一事”做了注释，其中写道：

此外，当时聘为讲师的山本宪，号梅崖，在本校讲授过《山阳遗稿》、《近世名家文钞》。他曾参与大阪事件的阴谋，是应首领大井宪太郎之请起草过著名的“朝鲜自主檄”的忧国志士。来校执教时44岁。

就以上记载看，山本宪(梅崖)是关西大学前身“关西法律学校”草创时期的一位执教者，但再从近代中日关系史来看，也是当然必须谈及的人物。《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昭和十一年“黑龙会”出版部)载有颇

为详尽的山本宪的传记。

山本宪有署为“宪手录”的详细《年谱》(4卷),他去世后,由众门人于昭和六年以铅字刊印(非卖品),题为《梅崖先生年谱》。其门人(他在大阪开设汉学私塾,受教门人很多)画家菅楯彦在卷首凭回忆描绘了山本宪塾中的“讲学之状”。

《年谱》中的明治二十九年条下记有:“至8月中旬,有目疾,读书、执笔乃废。自客岁,至关西法律学校讲《文章轨范》,至是而止。”由此看来,山本宪执教于关西法律学校的别科,是从明治二十八年9月起至二十九年8月的一年间。

自幼好读史书

据《年谱》记载,山本宪嘉永五年(1852)生于高知县的高冈,昭和三年(1928)歿于冈山县的牛窗,享年77岁。

他自少小便习读汉籍,但“童心爱好史(书),而不好经(书),尤其好读《资治通鉴》”。这是他12岁左右的事,而早在10岁时,他就已“读毕《左传》、《史记》,阅读二十一史”,他“能读白文,即所谓无训点本”。并且说13岁时“予喜论时势”、“集录诸书有关时势者,深以为快”,可知他早已有志于历史与时事问题。后来他之反抗当时政府,成为自由民权斗士,可以说在其少年时代的读书倾向中已见萌芽。

14岁时,被土佐^①藩主山内容堂召见,作诗“金烛煌煌绮席前,岂图童子拜公颜”云云。翌年,“是岁,读《资治通鉴》,反复六次”,依旧倾心于史书。17岁读毕《二十二史》。

另一方面,那时各藩也在教授“洋学”(包括外语在内的西洋学术。——译者)。据《年谱》载称,明治元年山本宪17岁时,在高知的“开

^① 土佐,今高知县。——译者

成馆”学了“英学”，但他认为“英学不合我意，十余日即止”。不过，明治三年(19岁)他成为高知“致道馆”(专授汉学)的公费生(父为该馆助教)，为阅读老师当助手。可是翌年废藩置县，“致道馆”也停办，他们便首倡学习“英学”，请翻译局(县属?)教授开设英学课，并从庆应义塾聘来教师。首先学习“活贤勃斯”的语法，“未及旬日，便能自修，进而阅读地理史乘”，这方面也“超越同学，为众所称赞”，引以自负。

看一看他的《藏书目录》(冈山县立图书馆编)，汉籍虽占大部分，但卷末也有“洋书之部”，列有 *First Book in English Grammer ; Longman's New Reader , No .4; New National Readers (1 - 5) ; Ele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 New Physical Geography ; World We Live* (Manry's Geographical Series) 等，全部有 11 种英语书。所说“活贤勃斯”的语法，即上列的 *First Book in English Grammer*。

他于明治四年(20岁)到东京，进入以“洋学”为主，“汉学”为副的“育英义塾”。据《年谱》载，他在该塾一面助教汉学，一面向同塾的荷兰人 T. H. 雷艾学习“英国学”和“德国学”。他说：“雷艾喜地理学，而吾亦喜好地理学，是故每日英语课程辄授地理学。后来吾能谙知世界之地理形势，并有志于海外者，盖受雷艾之赐也。”在上述《藏书目录》中，也载有他在那时可能读过的英文地理学书籍。

他的“英国学”程度如何虽不详知，但据他说：“在塾之时，曾奉雷艾之命英译德川家康传记，由彼斧正。”其后，“在工部省时，曾受教师马尔卡姆之嘱，日译一英文小说。”

由电信技手到记者

明治七年(23岁)，为了生活而成为工部省的电信技手(技术官吏等級之一，位在技师之下。——译者)，翌年受命出差大阪，由那时起，他同大阪发生关系。在大阪，他供职于高丽桥电信局。他说：“予自幼仰慕丰

公(丰臣秀吉。——译者),遂有志安家于大阪,至此而来到大阪。闻木村长门守(江户初期武将木村重成。——译者)墓在若江,立即往吊”。翌年便将双亲自土佐接来大阪,于南农人町租房同住,在大阪定居。

明治十年(26岁),发生西南战争(指明治十年西乡隆盛叛乱。——译者),山本宪奉命出差战地,出入于田原坂附近的激战场,他记述说,“飞丸掠耳,伏死狼藉”。战地归来后仍在川口电信局和高丽桥电信局工作,但明治十一年辞去工部省电信技手职务。关于此事他说:“予空抱大志,不屑从事区区末技,乃辞而去职。”所说大志是指推进自由民权运动,为此他要当新闻记者,通过舆论来进行言论活动。辞去了工部省技手后,“欲于京都设新闻社”,虽多次往返于京都,但“事终未成”。

翌(明治十二)年,山本(28岁)进入“大阪新报社”。又过一年,自土佐娶妻。同年著《慷慨忧国论》,并在《大阪新报》上发表小说《重瓣樱花松之绿》(松之绿是日本旧歌曲的一种。——译者),据称“大博声价,为评书艺人所说谈”。

《松之绿》虽已无法看到,但《慷慨忧国论》现在国会图书馆中还有收藏。该书于明治十三年由大阪的中尾新助出版,为150余页的小本。作品洋溢着山本对自由民权的热望和慷慨的激情,由其同乡植木枝盛作序并校阅。山本在“例言”中说,“商之乡友枝盛氏,自行改正二三不满意处。”枝盛在“序言”中说:“篇中虽偶有小异论,然属促进民权之书,即为国家而庆,为自由而祝。”(原为汉文)其内容是,第1章“总论”,第2章“民权起源”,第3章“宜限制政府之权”,以下至第14章“宜避粗暴行事”而结束。山本在“例言”中说,“此书着意于劝导村人樵夫”,“故辞句不取高尚深远,而务求平凡通易,俾使任何人均易于通晓”。

山本宪的民权论

《总论》说,东洋的清国、土耳其、波斯(伊朗)等国,“人民权利日益遭

受剥夺，几至民不聊生之惨状”。与此相反，“其蕞尔小国一若法兰西、英吉利之诺尔曼族、撒克逊族之蛮民”，却由于“夙日欲收回人民之权利，致使数十百年间人民与政府兵戈相见，迭起不息（中略）终至得以制定国典，从而获致今日之富强。”又说：“尤其如北美合众国，原不过欧洲赤贫人民移居于此，时至今日竟富居世界之冠，此则大有其所以然者也！”于是进而指出“国权之消长源于民权之消长，民权不张，则国权无由弘扬”。这些看法都得力于他年青时候习读的世界史知识。

他说：“国家非君主之国家，乃人民之国家。人民非君主之人民，乃天下之人民。政府非君主之政府，乃人民之政府。”（第2章）而作为获得民权的手段，则“民权非君主所给与者，应是人民自政府手中恢复之物，为人民者无须谦让，必须速速讲求恢复之道！”（第2章）他认为，民权是人民固有之权，主张要尽速从君主和政府手中夺取回来。还激烈谴责压制人民的专制君主说：“原来，专制政府以压制待人民，习以为常，致使人民自行陷入卑屈怯懦状态，遂视君主为无限尊贵者。而政府利用此一弱点，愈益发展其势，乃至使人民贱如牛马（中略）君主拥有无上权威，压制人民以至天下为私。”接着说：“立法行政大权归于君主一人之手，对天下之事，君主无不以一己之意为是，渐生怠慢之心。（中略）举其权而委之宰相，遂使枢机为主。（中略）宰相亦别无顾虑，愈益为巩固自己地位，维系自己威福而擢拔私人居于枢要之地，（中略）其势力倍蓰于君主，藉以为恶，更甚于君主。”他认为如果不反对这种把君主与君权结合为一体的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则无人民幸福可言。“因此，不限制政府之权，则民权无由昌盛，人民丧失幸福，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第3章）并且强调，民权不是赐予的，而是人民向政府抗争获胜才能取得的，他这样说：

民权者，原为保护人民之自由，藉以实现人民之幸福，达致安居乐业之目的；原为粉碎政府之暴政，俾使成为不能为害人民自由之机器。意欲活用此一机器，民权则是人民必备反抗政府之工具。如

不具备能够反抗政府之工具，则其权利必常受蹂躏而不得伸张。
(第4章)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山本宪以及当时挺身而出的自由民权论者的行动原理。

前往冈山

明治十四年，冈山创办《稚儿新闻》，山本宪被邀请于当年3月移居冈山，成为该刊主干人物。但是这年冬天，《稚儿新闻》因触政府之忌而被停刊，直到第二年春，终于受到禁办处分。不过从这一年开始，他在冈山与小林樟雄相识，《年谱》上说他们“相约为自由党效力，商议另行创办一种报纸”。以后，小林成为山本宪的盟友。小林去世时(大正九年)山本为他撰写了碑文。小林是冈山人，从法国人学习法语多年，还研究过法国的法律。他运用这些知识，抗议当时我国藩阀政府束缚自由、压迫言论之事，呼吁建立国会，向当局提出建立国会建议书和代表农民请愿书。他是一位为自由民权运动奔走的人物。

《稚儿新闻》被禁后，《中国日日新闻》创刊问世，山本宪任主笔。《年谱》说，“是时，政府横暴益甚，演说会及联谊会屡被解散。3月，予等数人受罚，予被课罚金10日元”。又说：“受邀至备中笠岡(位于今冈山县西南端。——译者)，联谊会被解散，被课罚金12日元”。可见当时政府对言论集会干涉压迫之甚。《中国日日新闻》也是创刊不到一个月便停止，山本“与小林等谋求恢复而未成功”。

这时候山本生活穷困，辗转于友人家中。他说：“生计愈困则反抗政府之心愈切，憎恶政府暴戾之心情，炽烈所至虽冻馁而在所不计”。《年谱》中对当时国内政情有下列记述：

西南战争结束后，政府专横益甚。土佐之“立志社”首先崛起，其后成为“爱国社”。或建议召开国会，或请愿建立国会，一度建立

“国会期成同盟会”，旋又成为“自由党”。此时，“改进党”成立了，“九州改进党”成立了，“近畿自由党”进而更称“立宪政党”，各自根据其主张与政府对抗。政府先是宣言以明治二十三年为期召开国会，一面则根据集会条例限制志士，苛虐横暴，无所不至。被系狱或课罚款之志士接踵不绝。此即当时之形势。

这年11月，山本离冈山回大阪。正在“归大阪后生计尚无着落”之时，“越前^①自由党”的杉田定一等创办《北陆自由新闻》，邀请山本助编该报，遂去福井。但翌年该报便因资金罄竭而停办，山本又回大阪。

开设汉学塾于大阪

明治十六年（32岁），《年谱》说“因故去妇”。但没有说明婚变的原因。当时他同夫人一起前往在高知的夫人娘家，“奉告此事，得到应允”。于是，独自由高知返回大阪。他说“自是以后，予闭户家居，开塾（梅清处塾）授徒。因一家之故，不得不然。”从那时起，为了生计山本宪开始成为汉学塾教师，并且“闭门读书写作，足不出户者半载”。但是并未放弃政治改革的意念，他说：“偶以板垣总理（自由党总理）自欧洲归来，于中之岛自由亭演说，予立即往会。其意唯在于此”。所谓“其意唯在于此”者，当是指推进自由民权运动而言。

第二年遇火灾，移居城东的森村，但投身政治运动发表言论的志向却无论如何不能弃绝。应大阪《立宪政党新闻》邀请，半日在该社工作，半日在塾授徒。旋因自由党与立宪政党迄今的合作破裂，自由党员的山本便退出该社。随后，自由党于大阪设立“相辉馆”，他说：“予亦时常前往活动”，而且还“带党务使命”赴越前敦贺，游历备前、美作、伯耆、出云、石见、安艺、备后等地。

^① 越前，今福井县东部。——译者

“大阪事件”前夕情况

《年谱》的明治十七年(33岁)末尾处记述所谓“大阪事件”前夕的情况说：

小林樟雄在东京，自夏秋之交起，屡与法国公使帕提诺特相会，遂介绍板垣退助与有所约，谋朝鲜之自立。于是拟由后藤象次郎负责于朝鲜举事。据此，向法国政府请求借款百万法郎及军舰一艘。此时，法人将图安南(越南。——译者)，欣喜日本与中国于北方滋生事端。宰相茹费里之许诺报来。至此，小林将情况始末详细见告。盖其本意在于借朝鲜自立之举，又扩而大之以启日清两国之衅端；乘政府多事之际，倡导起义，颠覆政府。

由此可见，自由党的急进派为了尽快在日本建立自由民权社会，计划支援金玉均等的朝鲜独立运动，图谋举事，挑起视朝鲜为属国之清国与日本的纷争，使日本政府陷于混乱，以将其颠覆。为了便于实行，小林还联络了法国政府。但据《年谱》称：“当时此事属于极密，其详未传于世。与法国人往来书函皆存小林手中。”

《年谱》的明治十八年伊始，载有“1月5日予偶进入市内，为朝鲜事未及回家便直航土佐，征询党友意见。”这一年，清法之间围绕安南掀起战争。“清法二国交战争夺越南。小林樟雄在东京与法国公使有所谋议，又与库鲁赫将军互通书函。小林屡次寄予书信，告知其事”。《年谱》并未记述其具体情况，但经小林的催促，山本前往东京，被告知在朝鲜举事的具体计划后，山本当场表示赞成。《年谱》对这一经过的记述如下：

小林樟雄信至，请予急速赴东京。(中略)7日(7月)黄昏后至横滨，直入东京，与小林相见。小林见告，遣壮士若干赴朝鲜，刺杀身居要职之大臣，借此开启与清国之衅端，然后乘隙起义。(中略)予极表赞成。并问同谋者何人，答曰大井宪太郎、矶山清兵卫等。

予又问预定之程序如何，小林答曰，一旦资金备妥，机会成熟，即由矶山（曾在设于东京本所的自由党青年志士公寓“有一馆”任监督。——增田）率壮士直驱长崎，雇船航驶朝鲜，此事业已议定。予曰，大善！此事除二三主谋者外不可有丝毫泄露。时机若成熟，壮士出发时定要乘船由横滨至长崎。（中略）予遂草就于朝鲜举事之际所需发布之檄文一篇，并就资金之事进行讨论。18日登“新东京丸”。19日抵家。

山本宪虽对小林说，要从横滨出发，直航长崎，但事实是，正当要在大阪集合，向长崎进发时，首谋者在大阪被逮捕，发生了所谓“大阪事件”。

当时山本宪起草的檄文，以《告朝鲜自主檄》的名称收录于《年谱》中。檄文中写道：

日本义徒檄告宇内人士。朝鲜自主之邦也，李氏建国启土，本自为邦，莫仰他国干预。一朝清人藉其兵力夺为属邦，俾受封册，使奉朝贡，杀其国权，攘其自由。云云。

资金困难与被捕

关于“大阪事件”的颠末，下列各书都有详细记载，即关户觉藏编《东陲民权史》（明治三十六年，茨城县“养勇馆”）所收载的《大阪之狱》；坂垣退助监修《自由党史》（明治四十三年，东京“五车楼”）下卷第8编《反动的悲剧》；前述《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大井宪太郎一派的大阪事件”等。现在，从这些著作中，引用一段《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记述如下：

在朝鲜举事愈趋急迫之际，一篇旨在收揽人心的出色檄文实有预先准备妥当的必要。起草此文必须依靠汉文优秀之人，为此，便请来了大阪的汉学家山本宪号梅崖者。对他明示了举事计划，委请

他执笔。(中略)他精神振奋,当即快诺。纵然他平生抱独身主义、素食主义,安于淡泊生活,绝对排斥肉食,但此时却说:“写这种文章不鼓足精神写不成。第一,米酒!还要拜托,菜肴要章鱼和螃蟹!俺虽采素食主义,但从字面上看章鱼、螃蟹和虫都是一家(日文章鱼为‘蛸’。——译者),食虫当无碍于素食主义。”用章鱼、螃蟹下酒,大杯畅饮之际腹稿已成,挥笔写就了下面这篇雄浑淋漓的檄文。

接着引用了山本执笔的檄文,并指出“此一檄文更经小林译为英、法两种文字,并周密准备了送交外国各报社的办法”。以下的经过,这里特别引用该《志士记传》的一段文字来说明:

檄文由以告成,决死之壮士亦经矶山等人纠集成功。炸弹制造问题也解决了,武器也逐渐准备好。(中略)少壮有为的政客们也暗中或公开支援这一计划,同志之数迅达八十余名之多。

但将近执行这一部署时发现,至关重要的举事资金之筹措不如人意,大井、小林都为此奋起奔走。可是,对于当时自由党政客的行动,政府当局日夜注意不怠,一举一动都受到当局的监视。不待说,像抱有那样目的的行动需要非常的警戒,不可能将计划内容公开诉诸国民的敌忾心和侠义心,因此资金之募集更陷困难,时日白白逝去,尽快渡海之希望则陷于渺茫境地。

看来不能靠这样的方法去筹款,这只会贻误举事。因此,作为人们的最后手段,“既然是为了国家利益进行的大事,采取非常手段也是不得已”,便在神奈川县等地开始了强夺,“用这种手段强夺来的资金集中在大井手中”。同伙们一次、二次、三次将款项还有炸药、刀剑以及装炸药的罐子集中到大阪。其中第二次大阪队的景山(英子)等携送炸药时,山本宪也参加了。这样,“为了筹措资金,大井仍旧留在东京。干部小林、矶山等则陆续下到大阪,大阪成了执行组的策源地”。

然而由于资金的筹措还不如意(据《年谱》记载,山本宪也为筹措资

金造访了播州^①之赤穗的友人),终于袭击了有名的财主大和^②信贵山的千手院、大和高市郡的富豪农家和冈桥清三处。为了隐蔽矶山的行踪,还由新井章吾代他做统率,大家陆续从大阪向长崎出发,进行渡海的准备。据《年谱》记载,山本宪与大井、小林等一起,到梅田车站为新井、景山一行送行。

但是,当他们在长崎作渡海准备时,事情已被发觉,并开始了逮捕。被发觉的起因说法不一,或谓由于强夺茨城、千叶两县资金时下手的同伙被捕供出了情况;或谓自由党办事处的某人实是警察厅的密探,根据他的报告秘密进行了侦查,所以能同时加以逮捕。首先,大井和小林在大阪被捕,新井和景山在长崎被捕,同道 58 人全被关押于大阪的中之岛、堀川两监狱中。《年谱》上记载说,得知大井、小林被捕的消息后,山本也察觉到“捕吏必将来临”,于是足不出户地等待,终于在他塾中授课之时捕吏来了。

这一事件的预审历时约一年半,于明治二十年秋做出了判决,作为干部的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矶山清兵卫三人最重,判刑“监禁 6 年”;新井“监禁 5 年”。在干部以外,山本宪“监禁 1 年,监视 10 个月”。《年谱》上说,他是“以外患罪及违犯爆炸物取缔罚则而被鞫讯的”。

结识审判长井上操

《年谱》上记述了在狱中的种种情况。法庭上的情况已详见《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作为国事犯受到这样的处理已属颇为宽大了,这并不只是由于舆论对他们表示同情,从《年谱》上可见检察院长儿岛惟谦、审判长井上操也违反政府意图对他们做了宽大的判决。据称:“原来,儿岛与井上均皆有意以外患罪判处。适闻政府认为应依违犯爆炸物取缔

^① 播州,即播磨,今兵库县西南部。——译者

^② 大和,今奈良县。——译者

罚则处罚，拟命严判。而舆论方面悉皆同情志士，或驰函支持，或上书祈望宽大处理。23日夜，审判官举行会议，赶在政府命令之前做出判决，竟至彻夜未竟其功。(中略)盖审判官之心情皆不同于政府，悉欲从轻处分，故须赶在政府命令到来之前为之”。

那时的审判长是井上操，因此，山本宪刑满出狱后也同井上及其他狱方有关人员友好交往。据《年谱》载称，“予出狱后，与审判官井上操，堀川监狱医官长田宫之春，庶务长隔山利吉郎相交往，田宫、隔山并使其子入予门下学习”。所说出狱后仍有交往的井上操审判长，乃是关西法律学校的创立者之一，山本宪之所以能受关西法律学校的招聘，我想或许是由于井上操的推荐吧！然而，《年谱》上对此却未置一词。

另外，“大阪事件”的辩护人以星亨^①为首达17人，其中后来和关西大学有关的有涩川忠二郎(经营者之一)、砂川雄峻(理事)、森作太郎(评议员)。

山本宪出狱后仍然经营他的家塾，同时也和新闻事业维持着关系，曾为明治二十三年在神户创刊的《爱国新闻》写作；还担任过《东云新闻》的主笔，但“多属撰写论文，人不到社”。

是年开始召开帝国议会，山本宪感慨说：“俗辈彼此相庆而谓：不流血而得之。(中略)俗辈之如此畏血，又何足与言政治哉！自此以后，藩阀专恣未已；而庸人参政，时事日非”。翌年，自由党与改进党相联合，对此他说“予甚以为不可”。他认为现在的政党中，十年前的“欲推倒藩阀之士绝迹，世运日下”，“于此，予唯欲自政党之间摒迹引去。”

明治二十七年，日本终因朝鲜问题而与清国开战。《年谱》说“予致当局者意见书数次”，但却没有记载其具体内容等。

次年起在关西法律学校讲“文章轨范”。但第二年因眼疾而停止读

^① 星亨(1850—1901)，以为自由民权运动辩护而著名，后曾当选众议院议员、议长，参与创立立宪政友会。——译者

书、写作，亦不再去学校授课。

游历清国结识革新派

明治三十年春，眼疾痊愈，这年秋天，山本游览了清国。他自神户乘玄海丸，经釜山、仁川抵天津，入北京。转而又自上海沿扬子江而上，经苏州，游汉口。回航时泊南京，又返上海。于12月归国。山本把当时的旅行记题为《燕山楚水纪游》（汉文，上下二册），于明治三十一年出版（非卖品）。他这次旅行带了照相机，拍摄所到之处的景观，回国后，以此为基础委托友人画成写生画，处处用石版插入《燕山楚水纪游》之中。

山本在旅行中一直着和服。他观览了各地的名胜古迹，寄与历史的感怀，并论述了形势。尤其在上海同清国活跃于新闻界的革新派交往，相互畅谈时势。

当时在上海有古城贞吉、藤田丰八（剑峰）二人，分别在中国的《时务报》和《农学报》汉译日本报纸的报道和评论。通过这二人，山本认识了《农学报》的罗振玉和《时务报》的汪康年（穰卿），以及梁启超（任公）。章炳麟（太炎）也造访过他。汪康年还伴同张謇（季直）拜访他。山本和他们多方面交换意见，大体对他们的意见表示赞同。

《年谱》在明治三十年12月条下还记有：“清人嵇侃、汪有龄、康同文入予门下。由此，清人陆续入门”。

由于旅行清国而相识的关系，山本曾为翌年因“戊戌政变”而亡命我国的革新派进行奔走。明治三十一年条下记有“因客岁游清国，与清人交游稍广”、“与汪穰卿书信往来不绝”、“为清人罗振玉译书若干送上海”。

特别讲到“康孟卿来入门下，孟卿名有仪，广东人，康长素之从兄也。长素名有为，号南海，仕于清廷，从事革新”。下面又说：“9月23日，有清国政变之报。西太后不怿于清帝之锐意革新，遂幽禁之。流放工部尚书

张荫桓于新疆；林旭、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六人处斩。长素及梁任公、王少云来奔。任公名启超，最初字卓如，与予相识于上海；少云，名照”。

对于这次清国政变，山本虽未记述他做过何种策划，但《年谱》上说，“9月27日赴东京，为清国之事”。又说：“10月5日回阪，成立一会，称‘日清协和会’”，《年谱》继续说：“10月下旬，有康长素、王少云、梁任公到东京之消息。29日偕康孟卿赴东京，与三人相见”。可能是为了开展救援他们的运动，“7日予与山田俊卿、泉田次郎、加岛信成等设筵于备一亭，议‘日清协和会’之事。会晤之人甚多”。

《清议报》与“大同学校”

不久，梁启超等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明治三十一年）。在日华侨也创立了“大同学校”（明治三十二年），其时都和山本有联系，并曾谋求他的协助。《年谱》明治三十二年条下记载：“客岁冬，康孟卿赴横滨，发行《清议报》（代表人冯镜如，主笔梁启超。——增田），请予写稿”。现在查看当时的《清议报》，自第2号起连载有署名“梅崖山本宪”题为《论东亚事宜》的评论。而且第2号起，该刊末尾“本馆各地代派处”即列有“大阪市东区谷町1丁目梅清处塾山本先生”（但第3号以后去掉了“山本先生”字样）。总之，山本宪的私塾成了《清议报》的大阪代理销售处。

《年谱》还继续说：“广东人捐资，于横滨设‘大同学校’，教育清人。经孟卿介绍来请予任监督，予不能弃塾而他往，故辞”。为了教育清国人，华侨有志之士设立“大同学校”拟聘山本为监督一事，恰恰说明了山本在他们中间得到了信任。

此外，《清议报》第10号载有《大同学校开学记》的报道。该“大同学校”的第一届入学学生冯自由所写《革命逸史》初集（民国二十八年）中有

“横滨大同学校”，详细记述了该校的内容、内情。校长是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君勉)，名誉校长经恩请由犬养毅(前文部大臣)担任。据《清议报》的报道，建校典礼上除犬养外，还有大隈重信(前首相)以及高田早苗、望月小太郎、中西正树、柏原文太郎、平山周、宫崎寅藏等来宾 15 人。

明治三十二年 3 月 14 日，东京来电召山本进京。原来是外务书记官榎原陈政秉承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之意，拜托山本宪使康有为、梁启超、王照 3 人离开日本逃奔美国。外务省认为 3 人留居日本有害于邦交(据说是清国政府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要求。——增田)。因为山本和康孟卿有关系，所以要借山本之手来实现这一企图。但如俗语所说“穷鸟入网，猎人亦不忍杀之”，山本拒绝了外务省的要求，并通过孟卿将日本政府这一企图告知三人。三人因山本的见告而感欣喜，并约定前往美国。康有为持外务省所给 1.5 万日元先行出发(去了加拿大)，梁启超与王照则因日政府所给旅费数额少，便取消了此行。

上述情况是山本在《年谱》中所说。

明治三十三年，清国发生“义和团事件”，日本及英、俄、法、德、意等 8 国出兵，由天津进入北京。这时，据《年谱》说，山本曾“致书山县总理大臣、青木外务大臣，切论应实行维持清国之大计”，但其“切论”的具体内容则没有记述。

明治三十四年 11 月，《年谱》记有“梁启超嘱托翻译《政治泛论》”。 “受托”之后是否译成送给了梁启超，却情况不明。但自第二年 1 月(新历 2 月)起，梁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半月刊)，并连载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或许就是索要《政治泛论》的译稿作为梁所执笔的参考资料了。现在查找了《新民丛报》初期数号，但未见有山本宪所译该书之名。

另外，查看《山本文库图书目录》，山本的藏书中有《政治泛论》二种，一种是“美国伍德罗·威尔逊著、高田早苗译”，明治二十八年刊行，1 册。另一种是“美国乔治·H. 伊曼著，小林营智译”，明治十六年刊行第 1 卷上下 2 册。

冈山闲居

明治三十七年,山本迁移至冈山县牛窗居住。他说:“予再次至牛窗海潮浴以来,欲望迁居三年于兹”,“牛窗之地僻静临海,宜养身心”,可以说是为了保持健康而迁移该地的。另一理由似是因日俄战争开始,“人心浮动,学生新入塾者迅速减少”。

《年谱》在同年末尾处作为“追叙”载称:“数年来著书发表者有《燕山楚水纪游》、《东亚事宜》、《日本文典》”。“《东亚事宜》登载于横滨《清议报》,《日本文典》由清人于上海出版”。谈到“数年来来访之外人”,《年谱》称:有“清人蒋式惺、宋恕、汪康年、罗振玉、力均、王照、梁启超以下若干人。朝鲜人李斗镐、赵义渊以下若干人”。这说明山本宪在当时是与所谓“东亚问题”有关的知名人士。

《年谱》还记载了大正七年山本 67 岁时经朝鲜到哈尔滨的旅行。此外,定居牛窗后,还被邀请到以中国(日本地名,指本州西部,分为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 5 县。——译者)、四国、近畿为中心的各地去讲演,出席诗会、茶话会,垂钓为乐等等。晚年生活可以说是悠悠自适。这一《年谱》也于昭和二年 8 月停笔,谅必是病体衰弱,“病间手颤,书不成字”的缘故。终于在昭和三年 9 月歿于牛窗,享年 77 岁。根据遗言,他的藏书捐赠给冈山县立图书馆,至今还遗留有《山本文库图书目录》,但藏书则全部毁于战火。

纪行与咏史

现今“泊园文库”(关西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山本宪的《烟霞漫录》1 册(明治二十六年,发行人久保财三郎)和《梅清处咏史》1 册(昭和四年,发行人渡边得次郎),发行人都是山本宪的友人门生。《烟霞漫录》是山本在世时发行的,而《梅清处咏史》则是歿后周年发行的。

《烟霞漫录》是遨游赞岐^①小豆岛的寒霞溪时的纪行文(汉文),不过是只有28页的小册子。但是,在各页的栏外附有发行人(?)久保萝谷等数位文人的短评(汉文),末尾还加上了数人的感想与评论文字。其中就有藤泽南岳^②的赞辞说:“此篇结构周到,字句劲道,与山颜争秀千秋。可钦!可谢!云云”。(原为汉文)所说“可谢”是因为藤泽南岳出身于赞岐,想必是由于这层关系,“泊园文库”收藏了这本小册子。

《梅清处咏史》汇集了山本宪赋咏日本及中国历史人物的七言绝句,虽然称为咏史,却可以说是借诗的形式作出的短评性质的史论,自己对所咏内容加上了不少有如解说的感想乃至评论(汉文),所选择的中日人物从菅原道真、楠正成、诸葛亮、文天祥、方孝孺、林则徐、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名和长年、石田三成、加藤清正、由井正雪等人起,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共约一百数十名。不仅限于单一人物,而且还选择了史书或史实来咏赋,如“倭寇”、“读北条九世史”、“读伏见战记”、“读左传”、“读山阳外史”、“评汤武放诛”、“读下学迩言”、“评党争”、“评征韩役”、“评耶稣教”等,这些诗作也可以说是一种短小精悍的史论。

由此以观,如若举示山本宪的史论特色,那便是与一般的史观稍有不同,而是露骨地表现了根据自己好恶所决定的价值观。从中能够看到他所具有的一种反骨精神。例如,咏德川家康的诗:“旧谊如尘何自縻,一生事业厥唯己;钟铭诋毁术尤毒,开府且追承久遗”。另一首同是咏德川家康的诗:“黠詐谝漫似老狐,稟资残忍事矫诬;毕生只为身家计,旧谊新恩眼底无。”其笔下毫不留情。

与此具有对照意义的是咏石田三成的诗:“号召义故势初振,时运未济忽杀身;自古史家多曲笔,伪指佞竖诬忠臣。”咏大野治长的诗:“殉难

^① 赞岐,今香川县。——译者

^② 藤泽南岳(1842—1920),儒学学者。其父东啖(1794—1864)别号泊园,1824年在大阪设泊园书院,讲授儒学。1873年,南岳重新恢复泊园书院。——译者

捐躯报主恩，一门谁还意生存；古来壮烈如斯少，何事史家传伪言？！”并附说明道：“旧史每谓大公之人出于德川之世，误矣！”（原为汉文）

咏加藤清正的诗曰：“老贼（家康）百端加欺骗，甘心束手受羁縻；可怜好恶由私念，空拥大封何所为？！”对此诗的附言说：“清正、正则并为北厅（秀吉之正夫人浅野氏）之姻戚，然终生供家康颐使。身受大封国，而丝毫无益于主家（丰臣）。及至主家亡，封国被削除。其不知羞耻者如此！”

正如以上咏史诗中看到的那样，山本在《年谱》中也说：“予自幼仰慕丰公，故有居家大阪之志。”对于德川家康（依照山本所说，是凭借老狐般的狡诈）取代丰臣氏地位的愤慨之情随处可见，动辄表示憎恶。这样的看法是否公正姑且不说，但可以看作是山本宪性格或人性的本质表露。

评《日本外史》与评“清国革命”

山本宪对赖山阳所著《日本外史》赋诗评曰：“叙事概自胸臆来，齐东野语斯有哉！一篇健笔多欺瞒，威吓俗流漫炫才”，痛加抨击。在此咏史诗后，还附有长言：“明治维新以降，史乘中最为流行者山阳之《外史》是也。子成（山阳之字）挟其博学大才，正史、野乘几至无不涉猎。然赖氏《外史》不过一稗官小说耳，不可以史乘视之”，（原为汉文）说它不是史书而是历史小说，理由是“川越之役白昼之战也。本间某某以灯为帜与大导寺相搏而死。子成致平塚某某书曰，因灯帜甚妙，故更为夜战云。此乃叙说史实，岂可失实！子成竟依己意改昼为夜”。另外关于天王山之战，本来是堀尾茂助先从西道登上，伏兵以待；俟由东道攀登的松田太郎左卫门军队到来时一齐开枪，加以歼灭。而山阳却写成两军全从一条道上攀登，认为从头就摆出敌人枪箭待发的场面没有意思。这是歪曲事实的写法。贱岳之役亦然，余古湖周长也只1里有余，佐久间盛政晚间抵达湖之北，中川清秀的砦堡位于湖东，近在咫尺，却把它说成“沿湖南驰，

拂晓至岳麓”。本来从湖之北到岳之麓，即使徐徐而行，也不过只需一餐饭的时间。若是从日暮便南驰，拂晓之时就不知将到达何处了。这样反问之后，山本宪谴责说：“置地势于不顾竟至如是！”

最后，山本还针对《外史》在开卷处叹惜朝权归于武门而在记述德川处却又极口称赞霸权政府，指出其论点矛盾：“不知将何所适从？”并结束这一附言说：“然世人皆推称《外史》。维新之后，以《外史》课试官府人员，奇哉！”

山本宪对清末革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也抱同情，并为之尽力，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但康、梁实际是拥护清帝实行革新，并不是革命党，不过是改良派而已。姑且不论这与他的关系如何，但山本对汉人推倒满人的清朝一面表示赞同，一面却又反对革命后的共和制，而寄望于君主制。咏史之中有“评清国革命”，其诗如下：

天助华人倒满清，奚知他日酿兵争；惜乎空醉共和制，拥立明君镇四疆。

诗后的附言说：

满人之制为华人之辱，逐之固无可，正宜择立明君，乃其不然，遂致今日兵争不已。今日之形势几类李唐藩镇之跋扈，实将无有止境。此无他，空醉于共和制之故也。无有王者之威德以镇压之也。（原为汉文）

这是大正十年前后之作。以今日的眼光看，这毕竟反映了旧文化培育下“笃信孔子之道”的山本宪的时代局限性，无可奈何！

《论语我见》

山本少年时虽说不爱经书爱史书，但在他晚年倾注心血的却是《论语我见》（未刊行）。《年谱》明治四十四年（60岁）10月记有“《论语我见》

第二稿着手”,同四十五年记有“春来从事《论语我见》第二稿,炎日亦不停笔”。大正二年记有:“《论语我考》(见?)第三稿成。”大正三年11月有:“秋着手《论语我见》第四稿,新改体制也”。大正四年有“《论语我见》第五稿,12月28日完了”。大正十一年有“春《论语我见》第七稿成”。大正十二年1月有“从事《论语我见》修改及句读,26日毕”等等。同年12月,在“梅清处咏史”的跋文中有“不复入书斋从事《论语我见》”。此时胃病甚重,停止执笔。由以上情况可知,迁居牛窗后,在他晚年的若干年间一直从事《论语我见》的著述,但终于未能完成而逝世。

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不爱经书爱史书的山本宪,这样倾力于《论语》的诠释,想必仍是由于经办私塾、课授生徒的原因吧!《年谱》明治二十二年载有刑满释放归家后的翌年“印刷诗文揭题,以圣元(孔子纪元)为纪年”。明治三十八年,即迁居牛窗之年记有“自(明治)二十二年会集塾徒举行祭奠(祭祀孔子之仪式)以来,每年春秋上丁(之日)必照行,来牛窗后亦然”。如上所见,自其开塾授徒以来,尤其出狱后稍稍疏远“国事”以来,他已像个儒教之徒了。

诗为儒生之余技

《梅清处咏史》中,有山本宪的门人渡边得次郎撰写的“卷头语”,就山本咏史的特色作了解说,认为与其视为着重格调声律的诗,不如视作独特的史论。也许这是当时他们的一般看法。山本本来不长于诗,这并非他得意的方面。《年谱》上(明治二十八年“追叙”)也曾说:“予拙于诗,故平生不多作。(中略)二十一年出狱后屡屡陪同先父郊游,亦入吟社。而专务诗赋之事殆无可见。及先父歿,复慵于赋诗,因是一岁中几无诗作”。

渡边得次郎的“卷头语”中这样说:

“先生生于土佐佐川藩世儒之家,绍继父祖之业。虽以经学文章为务,但夙怀忧国慨世之志,周游四方,多交天下志士。以儒家而

能痛论时事者，非先生莫属，故其文章尤长于史论。先生之史论眼光犀利，论风卓拔，往往发前人所未发之说。然而于诗则自称视为儒生之余技，敢于不拘声律格调。若专以诗词观之，可议之处自多，故不可以诗人之诗论先生之诗。读此集宜以史论视之，徒以格调声律为议论，则非予所赞成。云云。”

自撰碑文及铭

《梅清处咏史》卷首的肖像后面，载有山本宪生前自书的碑文和铭，因为是自己刻了碑文留给后人作自传的，尽管文字很简略，亦愿最后作一介绍(原文无句点，后加)：

先生讳宪，字永弼，小字繁太郎，梅崖其号。土佐人。考讳琏，妣明神氏。年壮委身国事，系囚数年遭赦。开塾大阪，后迁居牛窗。嘉永五年闰二月十二日生，□□□□□□卒，葬于□□□□□□。先生笃信孔子道，忧世之念至死而不衰。尤恶耶稣教。为人清廉尚气节，不与世谐。铭曰

眇此微躯 埋在石下 千岁之后 有知我者
山本 宪自撰文又自铭

如予补足，则前缺八个字当为“昭和三年九月六日”；后缺的六个字当为“冈山县牛窗町”。

碑文之意是说，“壮年时候就委身于国事”，“忧世的念头到死不衰”，而且“为人清廉，崇尚气节，不随波逐流于世”，表示了自负自赞。但铭文说“千岁之后，有知我者”，这又吐露出一腔寂寥之感。从这里，我们好像听到了壮士垂老失意的声音。

〔追 记〕

一、据对上述墓碑文作了实地考查的旦菊男氏称，后半部分所缺 6

个字揣摩读为“太孺人之墓侧”，认为这是梅崖的门人渡边至德写入的，因为碑文的末行有：“昭和四年九月六日 大阪 渡边至德谨书”。

二、梅崖的遗族藏有小久保喜七的《追悼词》，其中有云“明治十四年故板垣伯创立自由党时，君亦与乡里之子弟一同参加之，尤与片冈健吉、中江兆民二君友善”，可见他是最早参加“自由党”的。

编者后记

以《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为题的本书，是以《书评》杂志上连载 28 篇的《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面》为中心编集而成的。已故增田涉先生原先打算何时结束此稿不得而知，但闲谈时说过，一到春天就要改译岩波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下》，因此，是想很快告一段落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本书可以说是前此发表的《“杂书”杂谈》（见《中国古典文学大系月报》18—34，以后收载于《中国古典文学欣赏》，平凡社版）的续篇，尽管它不是具有必要的完整结构、首尾衔接的文章。原来，正如先生在《“杂书”杂谈》的“余白追记”中说的那样，这些文章是想把“迄今凭兴之所至购求的散乱无序的东西整理一遍，从而也想把自己的知识整理起来”而写成的。所以本书的题名也用上了《“杂书”札记》，这样比较适宜也未可知。不过这次的分量较多，以内容为中心来考虑，遂标上了前面的新题名，而把《“杂书”札记》作为副题。

在“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面”而外，特别采录了“日本开国和鸦片战争”、“《满清纪事》及其著者”和“山本宪（梅崖）”3 篇。内容略有差别，但可以说都是同一性质的文章，亦即基本上说都是书志学的著述。这一点，也像先生所说的那样，研究资料的大部分属于先生个人所藏，这可以

说是一个特点。因此，先生所收集的藏书这件事情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先生的一项巨大业绩。这一庞大的藏书其后纳入关西大学图书馆，预计很快就会制成目录，作为增田文库供人使用。

我要说的是，先生只要有暇就逛古旧书店，上京的时候必定不只一次大逛神田的古旧书店街。本地的百货店等只要举办古旧书展，不拘何时他都不会放过。拿在手上的书若有一行是需要的，哪怕贵些也要买下来。过着俭朴生活的先生，把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用在了购书上。数年前我曾陪伴先生到仙台讲演，当时相当可观的一笔酬金，及至归来已经在神田全部变成了古旧书。已达古稀的先生在仙台逗留一周之后，又顺便在东京下车（说是在横滨女儿家里住），这一事情本身就是可惊的。不顾旅途疲劳，前往神田将酬金一股脑买了书，这不能不说这是相当的“书淫”。

先生善书法和篆刻，而且长久以来爱玩石。但晚年专注古书，并且是把兴趣集中在有关西学东渐的资料和近世日本同中国文化交流的“杂书”类上。有时即便我偶尔用话诱引，对于篆刻玩石的话题，他也不再那么兴致勃勃了。这或许由于老来心切之故也未可知。

先生为了检索自己手头没有收集到的有关资料，经常前往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关大图书馆等文库和图书馆。还听他说过，由伊藤漱平氏向导去过西尾的岩瀬文库。为了需要，他也涉足伊贺上野的藤堂氏崇广堂藏书库等地方文库。当我伴随他到仙台旅行时，日程上一有空闲，我们去游览平泉和山寺，但先生却由寺田隆信教授等向导去东北大学图书馆，显示出对各种藏书的兴趣。其后也是一有空暇就早早去了该馆。这样在坚持不懈的资料收集和检索的基础上，经过查证、研究而完成的，就是《“杂书”杂谈》和本书。特别是在本书中，触及并讲述了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等事件的消息如何传来我国，以及产生了怎样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影响。

单就这种需经长年累月的积累方能见效的研究而言，像《“杂书”杂谈》和本书这样的论著，不是年轻之辈容易写出来的。这也也不是可以简

单评价的。因此,我就曾当面说过,因为非先生写不了这种文章,所以还希望以后尽量多写下来。这样的话也被先生支吾而过。像松枝茂夫氏那样的笃学挚友对他的正当评价和率直的褒誉,先生也赧然地笑笑,一面却郑重而高兴地同我说过二三次:“那是松枝对我的褒奖!”事实上就在先生刚刚去世后,于庆应医院灵堂旁的休息室中,松枝茂夫又对我小声谈起关于先生生前那段旧话。在他写的《回忆增田涉先生种种》(载《文学》1977.5)中也说道:“钻研中国文学的卓越学者很多,但怕再不会出现增田涉这样的人才了。增田的著作中我最珍视的除了《鲁迅印象》外,就是《‘杂书’杂谈》这部书了,这是一部只有增田先生才能写出来的书。”

此外,增田在关西大学的同事堀正人撰写的《遇合联话(一)》(《日本古书通信》1977.5),在谈到《“杂书”杂谈》时说:“该氏搜集书籍的范围不只限于所从事的专门领域,而是广及诸多方面。能够显示该氏知识上、能量上的深厚蕴涵之一斑的作品,当是《‘杂书’杂谈》。……其搜集资料之广确实令人瞠目。”这位参与先生研究工作的堀氏,还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与自身血统有瓜葛的饶有趣味的话,倘若先生能够看到这篇文章,又该会多么高兴呢!思念及此,禁不住更为先生之死伤心!先生晚年的记忆力仍还是出众的,特别对专有名词记得牢。一谈到载有自己关心问题的文献、资料乃至杂书,他就话不绝口、兴致勃勃而别不暇顾了。这是他所最高兴的东西。

这里把收入本书的论文的最初情况简单说一下。

《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面》原连载于《书评》19号至46号,一期也没有中断过;从昭和四十七年5月起到昭和五十二年5月止。令人惋惜的是,最后一期先生未及目睹。顺便说明,这份《书评》杂志是“关大生协组织部”^①书评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不定期刊物。据编者说,“无论何时,增田先生的稿件总是按时送到”,看来,勿宁说该刊的发行受到先生的巨大鼓

^① 关大生协,“关西大学消费生活协同组合”的略称,即消费合作社。——译者

励。先生不计发表舞台的大小,都是一丝不苟地坚持撰写。这确实符合增田先生那种不喜欢位份上下的作风,也正是竹内好氏称之为“超俗高士”的缘由所在。

《日本开国与鸦片战争》发表于《政界往来》(昭和四十三年3月号)。

《〈满清纪事〉及其著者》收载于鸟居久靖教授华甲纪念会汇编的《中国语言与文学》(昭和四十七年12月)。

《山本宪(梅崖)》刊载于《关西大学年史纪要·二》(昭和五十一年12月)。这篇论文采取了传记形式。因为山本宪是“从近世日中关系史上看也是当然不能不讲到的人物”,文章色调虽然有些不同,但仍收入本书。

此外先生所撰关于“杂书”的文章甚多,其与收入本书的文章有重复之处者,即不采入。对这方面特别关心的读者,请参阅刊登该文的杂志等。先生的全部著译目录,请参阅《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纪要)19卷、29卷。

关于增田涉先生的略历,有先生在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定年退休之际写的自述,这里采录如下(但转职关西大学以后的部分是中岛利郎所记):

明治三十六年10月12日 生于岛根县八束郡惠昙村(现为鹿
岛町)大字片句^①,医师增田忠达的长子。

大正七年4月 惠昙村小学毕业,入岛根县立松江中学。自
二、三年级起嗜读文学杂志,与友人办同仁刊物。

大正十一年3月 在该校修完4年。

热衷文学,对学校课程失去兴趣,自该校退学。

大正十二年4月 入旧制松江高等学校(文科乙类)。

受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作品的影响,逐渐倾心于中国与中

^① 大字、町、村以内再划片称“字”,有“大字”与“小字”之别。——译者

国文学。

其间自上海购到《太平广记》、《说库》、《唐代丛书》、《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小说书籍。是时与芥川龙之介通信，接受其中国文学的指教，决心专攻中国文学。

大正十五年3月 该校毕业。

同年4月 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对教授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讲义及教授泷精一的东洋美术史演习(中国画论讲读)感兴趣。课外师事佐藤春夫，并协助其翻译中国小说。这时，在关东大地震后，研究室几无藏书，频去上野图书馆。

昭和四年3月 该大学毕业。

毕业后仍协助佐藤春夫翻译中国小说。

昭和六年3月 游学上海，师事鲁迅，每日约3小时，在该氏寓所聆听对《中国小说史略》及《呐喊》、《彷徨》等的讲解(3月至12月之间)。

与鲁迅接触中，得知其为人及中国现实之严峻。欲将此情介绍至日本，草《鲁迅传》百页，投日本杂志(翌年4月《改造》杂志发表)。

这期间还结识了郁达夫、郑振铎等。

昭和六年12月末 因“上海事变”归国。

以后专以信函请教鲁迅，迄至昭和十一年10月其逝世前夕。这之间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出版《中国小说史》、《鲁迅选集》(与佐藤春夫合译)等。

这期间还结识亡命中的郭沫若。

昭和九年10月 参加竹内好、武田泰淳、松枝茂夫等组成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尔后约10年之间，在该会机关刊物《中国文学月报》撰写《周作人论》、《茅盾印象记》等有关中国文

学的短文。

昭和十一年 6 月 在上海探望鲁迅疾病。

又在该时会见茅盾，获《子夜》翻译权（但此译稿未完成）。

又当时应旧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师傅抱石邀请，游南京数日。

同年 7 月归国。11 月受改造社之邀为《大鲁迅全集》出版负责人，筹划该全集的编辑和翻译。

昭和十二年 2 月 入改造社，参加翻译以及《改造》、《大陆》等杂志编辑事宜。

昭和十四年 3 月 离开改造社。

同年 5 月 任内阁嘱托，在兴亚院工作（专职，奏任待遇），从事中国文化关系的调查（迄该院合并于大东亚省均在职）。这期间前后二次出差中国（上海及南京）。

昭和十五年 4 月 兼任法政大学文学部讲师（同十七年 3 月辞职）。

昭和十七年 11 月 任大东亚省嘱托（专职，奏任待遇），职务内容同前（至该省于战争结束后与外务省合并均在职）。

昭和二十年 8 月 任外务省嘱托（专职，奏任待遇），职务内容同前。

昭和二十一年 9 月 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同二十二年 9 月辞职）。同年任文部省人文科学委员会委员（一年后辞职）。

昭和二十二年 4 月 兼任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讲师（同二十四年 3 月辞职）。

昭和二十三年 4 月 任外务省调查员（与二级官待遇相同），职务内容同前。

昭和二十四年 4 月 从外务省退职（该时设置新制大学，为就

任专任教员退职)。

昭和二十四年7月 就任文部教官、岛根大学文理学部教授。

昭和二十八年2月 由该大学退职。

岛根大学在职时兼任北海道大学法文学部非专任讲师。

昭和二十八年3月 转任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

昭和四十一年11月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作为日本学术代表团团员访问中国,参观各地,特别参观“文化大革命”。

昭和四十二年3月 自大阪市立大学定年退休。

大阪市立大学在职时期兼任岛根大学、关西学院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冈山大学、和歌山大学各校非专任讲师。

昭和四十二年4月 转任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昭和四十八年9月至10月 应邀参加中国国庆节活动。此行还参加了日中复交一周年纪念及鲁迅先生逝世37周年纪念仪式。

昭和四十九年3月 自关西大学定年退休,继续作为非专任讲师授课。

是年10月 仙台举行鲁迅先生留学仙台70周年纪念和祭悼鲁迅,受邀请并讲演。

昭和五十年1月 上海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

昭和五十一年10月 仙台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览会,参加开幕仪式。归途应邀到北海道大学文学部讲演。

昭和五十二年3月10日 于东京新宿千日谷会堂举行竹内好氏葬仪时宣读悼文中途倒地。同日午后2时39分逝于庆应医院。

由这一年谱可以得知,先生曾经在上海直接受教于鲁迅,以这一体

验为基础写出了名著《鲁迅印象》。先生又研究鲁迅文学，他翻译的大量鲁迅著作，特别是《中国小说史略》即其一端。这些业绩的产生当然离不开鲁迅几十次的恳切书函所作的解说和指导，但也不能轻视了先生多年的呕心沥血、勤奋精进。当时辞典类工具书尚不完备，先生身居岛根偏僻乡村，没有固定职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奋力于翻译的。其后，除了鲁迅之外，先生还翻译了很多中国近代作家的小说和《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

翻译了《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先生更继续其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特别就清末民初的文学家撰述结集了一本《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学革命”与其前夜的人们》，由岩波书店出版。

这一工作告一段落后，先生的兴趣急速转入“非虚构的作品”方面，尤其着重关心西学东渐的资料和日本遗留的鸦片战争资料，以及太平天国资料等杂书类。以前先生也并非没有这种倾向，他早已就前述著作中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所列西学东渐类杂书进行了收集。特别是晚年，着迷似地只对“杂书”显示出兴趣，甚至连悬而未决的《中国小说史·下》的改译也被推迟了。这里要指出的是，《日中文化关系史的一面》等文在《书评》杂志上发表以后，先生也把后来想到的补充和订正文字，用密密麻麻的小字记了上去。为了贯彻先生的这一意志，这次尽可能予以采用，以注释的形式录于各章末尾。由于书写潦草、难于辨识的字甚多，这项工作十分困难，幸得先生最后所授门生中岛利郎氏不辞辛劳的帮助，方成为今日的规模。不过杂书类方面向有版本异同等问题存在，编辑工作是否已臻佳境，不敢断言持有自信。倘有错误自是编者的责任，衷心欢迎大方指正！

承小野忍、伊藤漱平两位先生大力惠助，值本书出版之际，特表谢忱。

思念起来，先生专心致志于杂书类的研究，其原因之一是受了鲁迅教导的影响。这之中也贯注了日中友好的心意。有关方面凡有要求，他都承诺，在和鲁迅有缘的仙台，有什么举动的时候，他都欣然前往。一贯

如斯的先生突然去世，在与鲁迅曾有亲密交往之人日见其少的今天，不能不令人深感痛惜！

最后，于缅怀增田先生在世容颜的同时，衷心祝祷他的冥福！

片山智行

1978年3月25日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出书目

- 中国的现代化 [美]罗兹曼 著
- 中国食物 [美]安德森 著
-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 著
-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 著
-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布迪,C.莫里斯 著
-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美]杜赞奇 著
-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 [美]柯文 著
-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性的两难 [美]艾恺 著
-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 著
- 佛教征服中国 [荷]许里和 著
- 中国政治 [美]詹姆斯·汉·汤森、布兰特科·沃尔克 著
- 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 [美]爱莲心 著
-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史华兹 著
- 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 [美]郝大维、安乐哲 著
-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美]许倬云 著
-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十年文选 乐黛云 编
- 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十年文选 乐黛云 编
-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 [美]狄伯瑞 著
- 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美]墨子刻 著
- 孔子哲学思维 [美]郝大维、安乐哲 著
- 中国:传统与变革 [美]费正清、赖肖尔 著
- 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 [美]杜维明 著
-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德]夏瑞春 编
- 东亚之锋 [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 著
-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美]艾尔曼 著
- 台湾:走向工业化社会 [美]吴元黎 著
-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化 [美]贺萧 著
-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积极的发展 [美]彭慕兰 著
- 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 [美]伊沛霞 著
- 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加]朱爱岚 著

- 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 [美]郝大维、安乐哲 著
-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 著
-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 著
-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美]贾志扬 著
-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著
- 为权力祈祷 [加]卜正民 著
-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 [美]高彦颐 著
-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美]曼索思 著
- 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以及所生成的意义 [美]艾美兰 著
-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美]德里克 著
- 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变迁 [加]宝森 著
-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45 [美]郭颖颐 著
-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张灏 著
-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 著
-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王国斌 著
-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美]格里德 著
-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美]周锡瑞 著
-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美]周策纵 著
-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美]本杰明·史华兹 著
- 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经学派 [美]艾尔曼 著
-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美]柯文 著
- 孔子：即凡而圣 [美]艾伯特·芬格莱特 著
- 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德]魏丕信 著
- 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 [美]倪德卫 著 [美]万白安 编
- 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法]谢和耐 著
- 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 [美]田浩 著
- 莱布尼兹与儒学 [美]孟德卫 著
- 宋代江南经济史 [日]斯波义信 著
- 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 [美]萧邦奇 著
-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日]滨下武志 著
- 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澳]杰华 著
-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权力经纬 [美]白馥兰 著
-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日]佐藤慎一 著
- 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欲望 [美]罗丽莎 著
- 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 [美]费侠莉 著
- 中国大众宗教 [美]韦斯蒂 编著